

序　　言

明末叶昼在《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中说：“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骋空造以实其事耳。”同样，小说中的地名环境是一个艺术空间，并非等同于现实环境中的某地。这里有虚实、真幻的不同，有艺术真实与生活事实的区别。《金瓶梅》中描写的地理环境是作者创造的艺术世界，明代的临清、清河等地是现实世界，它们之间不可完全等同坐实。

但是，小说家在写作小说时必然以作者的直接阅历为基础，以实际生活为素材，在地理环境描写上，往往以现实中的某地或某几地为蓝本，加以艺术概括集中。从地理环境考察中，可窥测作者的行踪阅历乃至籍贯，这可能是近年来东昌《金瓶梅》研究会暨临清《金瓶梅》学会重视《金瓶梅》地理环境研究的主要原因。

自 1987 年以来，东昌、临清的《金瓶梅》研究者们，在《金瓶梅》地理环境等问题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金瓶梅考论》（1988 年出版）与《临清与金瓶梅》即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荟萃。1990 年，在临清召开了全国第四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摄录了学术电教片《金瓶梅》，又进一步加深了对《金瓶梅》地理环境的研究。这些论文表明，研究者重视发掘与运用新资料，重视对明代文化遗存的考察，勇于提出新的见解。

经过考察论证，有的同志认为：临清为古清河郡，《金瓶梅》托名清河，实写临清。小说中的东京以明代京城北京为蓝本，个别地方是指宋代都城开封。这种古今并提，南北交错，甚至有地名错乱，这正说明是幻造的艺术空间的特点。虚虚实实、幻而能真，也确有实的成分。临清钞关，明宣德十年初设。嘉靖年间，临清钞关所收

船料、商税在各钞关中居第四位，仅在苏州、杭州、崇文门之下，说明临清商业在当时是很突出的。《临清州志·职裁署》载：“户部榷税分司署，在会通河新开闸西浒，中为正堂，左为科房，左下为皂隶房，右下为巡拦房，北为小税房，为船料房。”《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八回写西门庆差韩道国去江南办货：“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钞银两。方才纳税起脚，装载进城。”作者所写税署主事“钞关钱主政”、巡拦查点货物、税货名、税关制度等细节，是根据明代中叶临清钞关的事实为素材为依据的，是符合生活真实的。

地理环境考、方言考等论文的论证说明，《金瓶梅》作者是非常熟悉临清的，应该有在临清的生活阅历。作者把故事发生地设置在南北交通大动脉运河沿岸，这种地理背景给作者塑造西门庆、潘金莲这样反叛孔孟之道的人物，提供了具有潜在意义的典型环境。

临清在明代是运河岸上的第一码头，有东方威尼斯之称。今天，临清市已是一个经济繁荣、精神文明建设先进的鲁西北名城。它是一座天然的明代文化博物馆，到处都有明代文化遗存：砖厂、钞关、土山、流沙河、卫河、会通河、广济桥、临清闸、晏公庙、箍桶巷、雪狮猫等等。《临清与金瓶梅》充分地运用这些遗存资料，来说明《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对读者了解与研究《金瓶梅》提供了大量有益的材料与新鲜的见解，应引起读者与研究的重视。以上所言，聊表对《临清与金瓶梅》出版的祝贺之意。

王汝梅

1992年5月于吉林大学中国
文化研究所《金瓶梅》研究室

目 录

《金瓶梅》地理环境与临清	王汝梅(1)
《金瓶梅》作者之谜	王 萍 王连洲(6)
明代临清钩沉	毛佩琦(35)
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	许 檬(57)
《金瓶梅》本事时代考四题	王 萍(90)
临清方言和《金瓶梅》	张鸿魁(101)
《金瓶梅》中的临清地名考	王连洲(111)
《金瓶梅》临清地名续考	王连洲(128)
丁耀亢眼中的清河与临清	于润琦(142)
《金瓶梅》是山东临清一州方言	殷黎明 张荣楷(153)
《金瓶梅》与临清及运河文化	马 征(159)
论明代临清经济的发展与《金瓶梅》成书之关系	陈昆麟(178)
山东地理的研究	池本义男(190)
《金瓶梅》写临清缘由初探	鲁 歌(199)
《金瓶梅》中临清钞关摭谈	马鲁奎(213)
《金瓶梅》与临清方言、土语	黑建文(220)
再论运河经济文化与《金瓶梅》	陈东友(224)
恶棍与官商	
——从西门庆说开去	王崇山(238)
“达达”考	魏 聊(246)
《金瓶梅》占卜与临清	玄述贵(248)
《金瓶梅》菜系研究	王宝玉(256)
《金瓶梅》部分遗址简介	王连洲(263)

美肴佳馔犹留香

- 《金瓶梅》食谱临清风味考…………… 赵冰端(273)
跋语…………… 郭维元(278)

《金瓶梅》地理环境与临清

王汝梅

《金瓶梅》中描写的地理环境是作者创造的艺术世界，明代的临清、清河、徐州、淮安、扬州等是现实世界，它们之间有真幻、虚实之不同。小说家在写小说时必然以作者的直接阅历为基础，在人物塑造上概括集中的素材多些，在地理环境描写上可能有错讹、有古今并提、南北交错，但往往以现实世界为蓝本。从地理环境考察中，可窥测作者的行踪阅历乃至籍贯。这可能就是近年来学者们重视《金瓶梅》地理考的主要原因。

对《金瓶梅》地理环境描写的感受理解，正象对人物的评价那样，学者们的见解是不同的。一丁有一篇地理考，认为《金瓶梅》明写清河实写徐州。陈诏有一篇地理考认为故事地点在扬州、徐州或淮安。阎增山、王萤、王连洲分别作三篇地理考，共同认为：临清为古清河郡，小说托名清河，实写临清，小说中的东京以明京城北京为蓝本，个别地主是指宋代都城开封。

《金瓶梅》故事背景地，到底是徐州？是扬州、淮安？还是临清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于1989年春，来到临清。在临清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临清城管监察大队、临清市市志办公室、临清博物馆等单位有力配合下，顺利完成了在临清考察工作。在临清诸位朋友陪同下，我们走遍了临清的运河故道，大街小巷。临清市不但一个经济繁荣、精神文明建设先进的鲁西北名城，而且是一座天然的明代文化博物馆。

临清处于会通河与卫河会合处。会通河自南来，至临清北与卫水合流，北流至京津。后会通河北支入卫河口处运道不畅，因开会通河南支入卫。遂使会通河、卫河二水在临清城内形成一个三角洲名

为“中洲”，临清夹河筑城。元代开会通河（会通河自山东汶上引汶水而来，又称汶运河），后淤塞，明永乐九年（1411年）疏浚从济宁北至临清凡385里；南至沛县，凡300里，因地置闸，定时启闭，会通河疏浚后，运河成为漕粮的主要运输孔道，大量商品南下北上，临清成为繁盛的商业都会、运河岸上的第一码头，明代中叶人口有百万，被称为东方的威尼斯。

现把与《金瓶梅》有关的临清明代文化遗存采访录摘要如下。

砖厂 参观永寿寺塔，沿卫河返回途中经过一处明代官窑遗址，临清友人告诉说：至今当地群众仍称此处为北大窑。在博物馆、在街道旧建筑房基处，随处可见明代的大砖，砖面上刻有印记，例如：“嘉靖十五年窑户罗凤，匠人郑在仁”等。据《临清州志》记载：临清砖窑始建于明永乐初，朝廷“岁征城砖百万”。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烧好的砖，经检验后，每块都用黄裱纸封住，用车推到运砖码头，由漕船搭解，后及民船装运。北京故宫各大殿，十三陵等建筑，大部分用临清砖建造。砖窑建在临清，一是因为临清土质细腻无杂质，用之烧出的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二是因为临清为运河码头，便于运往京城；《金瓶梅》中多处提到“管砖厂刘公公”，还提到“工部黄主政”，即为工部常设临清“工部营缮分司”督理砖厂的主事。参观之后，主张作者为峰县贾二近说的张远芬同志说：临清官窑、临清砖，这一文化背景，是扬州、淮安、徐州、峰县等地所没有的。这一文化遗存深深触动了《金瓶梅》研究者，启发我们重新思考。

临清钞关 钞关署有税课局。临清钞关旧址现为市二轻局办公处，院内保留有明正德年间税课局重修公堂石碑。临清钞关明宣德十年初设。宣德四年（1429）规定，各钞关差御史及户部官照钞法例监收船料钞。“……惟装载自己米粮薪刍及纳官物者免其纳钞。”（《明会典》卷35、户部22）船料，是船只大小的计算单位，比如，遮洋船头长一丈一尺，梁头十六座算作一百料。每船百料收钞一百贯，后减至十五贯。各钞关都是船料钞、商税兼收。嘉靖年间，临清

钞关船料商税在各钞关中居第四位，仅在苏州、杭州、崇文门之下，说明临清的商业在当时是很突出的。《临清州志·职裁署》载：“户部榷税分司署，在会通河新开闸西浒，中为正堂，左为科房，左下为皂隶房，右下为巡拦房，北为小税房，为船料房。”《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八回写西门庆差韩道国去江南办货：“韩人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钞银两。方才纳税起脚，装载进城。”第五十九回写韩道国通过税官钱老爹关照少交税钱：“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作者所写税署主事“钞关钱主政”、巡拦查点货物、税货名、税关制度等细节，是根据明代中叶临清钞关的事实为素材为依据的，是符合生活真实的。

晏公庙 词话本第九十三回写王杏庵送陈经济到晏公庙做道士：“王老到于马头上，过了广济闸大桥，见无数舟船停泊在河下。来到晏公庙前，下马，进入庙来”。晏公庙遗址在今小白布巷 85 号，庙毁于民国初。80 岁老人张金春住此，他年轻时尚见到庙宇面貌，张老人院内有一株古槐，位置在会通河北支入卫河口附近，离明代临清闸不远，当年庙内供晏平仲像，是道士庙。王冀云：“《金瓶梅》所写清河去临清晏公庙经广济桥，晏公庙又在临清闸附近，此三者关系不仅地名全同，且地理位置与临清地理全符。此三处地方所构成的地理组合与小说描写相符的程度，似为全国任何地方的地理台所不能达到的。《江苏清河县志》亦记载有晏公庙，在清江浦

但该处并没有广济桥等。可推知《金瓶梅》所写晏公庙确为临清寺庙。（《金瓶梅地理背景为今山东临清市考》）我们参观了古槐，会见了张金春老人，并合影留念。

土山 词话本第四十八回：“出南门，到五里外祖坟上，……坟内正面土山环抱，林树交枝。”土山，明永乐间开会通河南支时积河

土而成，是南北长数里，高达五六丈的人造土山。清乾隆帝曾到此游览，后改称龙山。在清初，“上山晚眺”是临清十景之一。我们登上土山眺望卫河、永寿寺、临清全景。现在以土山为主要景点建设龙山公园。

流沙河 词话本第二十六回写来旺被递解去徐州，铁安对宋惠莲通消息：“嫂子，我告诉你知了罢，俺哥这早晚到流沙河去了。”临清东城由西南至东北有一条很宽的古废河，俗称沙河，据说这是宋时黄河故道，往徐州大道，由城内取道向东，正经城东流沙河。

箍桶巷 手帕巷 据《临清州志》记载，临清街巷有箍桶巷、手帕巷、纸马巷等，词话本第五十一回写李瓶儿要陈经济捎几方汗巾，经济道：“门外手帕巷，有名王家，专一发卖各色改样销金点翠手帕汗巾儿”。《金瓶梅》多处写到西门庆家里用马桶，有学者以此为据，认为《金瓶梅》故事背景地应在南方，以为北方临清等地不用马桶，临清人王连洲对此作了调查：马桶是运河船家的必备用具，沿河人家亦多使用。女子出嫁时嫁妆物也有马桶。今临清箍桶巷为明代古巷名，箍桶巷的居民以制作马桶者居多，此外，还有估衣巷、线子巷、灯挂胡同、白布巷等，均说明临清商业繁盛，与《金瓶梅》中的描写多相吻合。

狮子猫 《金瓶梅》写潘金莲喂养雪狮猫，让猫扑抓官哥。官哥被吓而死，狮猫为临清特产。《临清志》载：狮猫比寻常者较大，长毛拖地，色白如雪，以鸳鸯眼为贵。狮猫是用白色波斯猫杂交培育的珍奇品种。雪狮猫，分鸳鸯眼、两眼蓝、两眼黄。临清市民喜爱喂养狮猫。狮猫择食性强，习惯于某种食物后，较难改变。学术电视片《金瓶梅》中拍摄了临清雪狮子猫的镜头。

笔者赴临清考察采访后，沿运河故道南行，途经聊城，参观了山陕会馆、光岳楼，在阳谷参观了狮子街、狮子楼，到济宁参观了太白楼、济宁铁塔、声远楼、浣笔泉。从济宁东行到曲阜、邹县参观了孔庙、孔林、孔府和亚圣庙。从邹县经滕县到微山湖，由微山湖到丰

县、到徐州，在徐州参观运河、黄河故道、徐州洪。在考察过程中，拜读了毛佩琦《明代临清钩沉》和阎增山、王萤、王连洲撰写的地理考文章，丰富了采访录。

《金瓶梅》作者是非常熟悉临清的，应该有在临清的生活阅历。《金瓶梅》故事是以运河沿岸临清等商业都会为地理背景，又概括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场景。作者把故事发生地设置在南北交通大动脉运河沿岸，设置在儒家文化发祥地区。在这种地理背景文化背景下，《金瓶梅》作者塑造了西门庆、潘金莲这样两个全面反叛孔孟之道的人物，作为他百回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这种地理背景给作者塑造人物提供了具有潜在意义的典型大环境。

一九八九年春于临清

《金瓶梅》作者之谜

王莹 王连洲

一 《金瓶梅》是三人合作的作品

《金瓶梅》这一部我国杰出的古典文学作品，其作者到底是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自成书迄今约四百年来，据统计已提出了二十三说。近年来研究者在考证上确也花了一些功夫，但是并没有惊人的突破，似还都拿不出足资令人信服的证据。本文将数年来我们于此问题研究考证所得公诸于世，以求公论。

从一些迹象看来，《金瓶梅》的写作，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其作者最低应有二人，亦间有第三者的插笔。全书之主体部分系由主作者所写，余则由另外一人辅助分工合写，或最后续集敷衍而成书。所以这种说，并非出于主观臆测，而是据大量事实材料考证判断得出的结果。根据是：

(一)《金瓶梅》主体部分所用语言为山东方言。据笔者研究，《金》之语言与小说安排的地点——山东临清州的语言关系极为密切。(见拙文《从现山东临清语言看〈金瓶梅〉方言》，原载《火花》87年文艺理论增刊——《艺术审美丛谈》)然而于一些回目中，又确有不少吴方言在内。即便除去被人认为系“陋儒补以入刻”的第53—57回，其开头几回及后二十回中，也有不少明显确非山东话而系吴方言者。同一书内出现有两种截然不同大系统的方言现象，不能视为由统一作者所用语言不纯所致，而应表明本书由分别操南方语、北方语两种不同方言的作者所写。

(二)明人所提供的线索中，也揭示出并非出于一人之手。明人记载有关作者身分的四说：①“大名士”(沈德符)，②“绍兴老翁”

(袁中道)。……“金吾戚里门客”(谢榛)。“巨公”(甘公)。这是由于他们各自所获传闻消息的来源根据不同的结果。但他们之中确有系知情人，可靠性不可忽视，都可能有一定根据，这透露出并非专指一人的信息。

(三)《金瓶梅》中有些回目、段落，出现前后脱节；人物性格有矛盾；时间有错乱；情节有重复或不衔接；尤其大段回目，如 53—57 回留待别人后补等现象。这不一定是某些人认为的“抄本拼集”现象，而很有可能是反映二人以上分工合写的遗留痕迹。

笔者经长时间查考研究，认为具有“嘉靖间大名士”身分的作者，与所用方言为近于山东临清一带方言的现象可统一起来，并可归结到《金瓶梅》的主作者名下。而具有“绍兴老儒”身分者所用方言为吴方言的现象又可统一归结到另外一位副作者身上。

二 《金瓶梅》的主作者是谢榛

兹先从“嘉靖间大名士”之说谈起。

笔者由考证得出：《金瓶梅》所写地名有二十余处与清代编纂的《临清州志》相符。其中所说临清钞关、临清码头、临清闸、广济桥、晏公庙已明说出是临清地名。即小说所说属清河的地名，如手帕巷、莲花庵、砖厂、守备府等，也都是明代临清州的实有地名。此已在拙文《〈金瓶梅〉的地理背景为今山东临清市考》(载《晋阳学刊》87 年 5 期)中作了详细论述。

我们又发现了《金瓶梅》所用方言，与现临清土语十分吻合。许多难解词语用今临清土语解读，多可揭示原意。用临清土语可辨别出一些研究文章及后印《金瓶梅》版本中校改诠释的谬误。因之，将《金瓶梅》主体部分所用方言说为系作者用山东临清一带方言所写，是很确切的。

因此可以设想，如果作者从未到过甚或未长期居住过临清，是不可能凭空出现一连串的街道、衙署、寺院、桥梁等具体名字与明代临清实有地名相符的。如果作者不是生长于临清的土著人，或

多年游后者，也是断然不能用如此熟练流畅的临清一带土语进行写作的。

又，《金瓶梅》中所写风土人情、习俗等亦与鲁西北的风习相符合。对少数一些属于南方的事物，如马桶、大米饭、鲥鱼、金华酒等的描写，似与北方城镇临清的习俗相矛盾，但一深入考查，都正说明作为明代运河码头新兴商业城市的临清的地方特点。这些事物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产生的南北物资与文化的交流现象。临清是运河的咽喉与枢纽，是南北物资的集散地，南方有的，这儿几乎都有，如马桶，临清不但使用，而且进行生产。使用马桶成为地方民俗，这与其他运河过路城市显然不同。

仅上所述，由地理背景、方言、风习三者构成的交织网络判断，《金瓶梅》主作者是山东临清人或者多年侨居于临清的人，应是确定不移的。

笔者在《〈金瓶梅〉究为何事鸣“沉冤”（见另书）一文中，又详细论述了作者为寄寓和抒发对嘉靖边政军事措施不满的写作动机。所谓鸣“沉冤”之说，实意是为抗俺答入侵反遭杀害的主战派曾铣等鸣不平，以刺严嵩、陆炳等权奸人物。书中主体故事均是围绕此事展开的，故成书的时间也应在严嵩父子当权至严世蕃被杀的这一段时间内。明人说的“嘉靖间”“世庙时”“永陵中”是指作者从事文学活动的年代。这个大约的说法也是不错的。但并非严格的确指。

就《金瓶梅》的艺术水平及所达到的审美高度而言，已被袁中郎在《觞政》中将其与《水浒》并列为逸典。其作者称为大手笔的文学家，自不待言。再从书中收入的大量词曲、俗语、歇后语看，除词曲见于《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等曲词总集外，尚有许多不见出处的作者手笔，故又知作者酷爱俗文学，是位长于散曲的作家。

这样，我们便可前人已论述的基础上把作者应具备的条件扩充为几条：

第一，作者是山东临清人，或多年侨居于临清的人。

第二，作者的身分是“嘉靖间大名士”。所谓“大名士”可包含其为名望颇高、文学才华属一流的文人。

第三，在作者的政治思想倾向中，对明代朝廷边政极端不满，对社会现实中的腐败黑暗亦有切肤之痛、切齿之恨。

第四，作者是大手笔的文学巨匠，又是熟谙俗文学且长于词曲的作家。笔者以这几点基本条件为主，并全面考虑到其他较次要的条件，经多方面查证核实，最后以铁的证据证明了《金瓶梅词话》作者，托名“兰陵笑笑生”的不是别人，正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明嘉靖间“后七子”之一的山东临清人谢榛。

下面先从其基本条件方面论证：

谢榛，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山东临清人。生于明弘治八年（1495）卒于万历三年（1575）。其从事文学活动的主要时期，约在嘉靖、隆庆年间。他是有明一代大诗家，与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列于“后七子”之首。著有《四溟集》、《四溟诗话》。明史记载他：“游道日广，秦、晋诸王争延政，大河南、北皆称谢榛先生。”^①其于“嘉靖间大名士”可谓当之无愧。其实称“大名士”还有另外的原因。谢终生布衣，是从未登过科第和仕进的大诗人。且为人任侠，奔走于京师公卿间，脱浚县人卢楠于冤狱^②，更使其名声大噪。明后起学者给予他的别的称谓均不恰当，称其为“大名士”，寓有学问及人品两方面均为著名文人之意，也寓有非达官贵人之意，具有针对性强和专指的意义在内，这样称呼真才是恰如其分的。

谢榛约于嘉靖三十年（1551）五十六左右离开临清，西游并迁居于彰德（今河南安阳），为明藩王赵康王朱厚煜所宾礼，为其幕客。嘉靖三十九年（1560）赵康王卒，乃“归东海”^③。后游燕赵，万历三年八十一岁卒于大名。谢榛的临清故居，据民国《临清县志》地图标示，即住于《金瓶梅》所写临清地名群的左近。如帅府周守备衙署所在地、今仍未易名的帅府街，陈敬济当道士的晏公庙，王杏庵

路经的广济桥、韩西桥从江南回来行船经过的临清闸，刘公公主管的砖厂都处于谢榛故里的家门口。跑临清钞关、手帕巷、莲花庵、玉皇庙等地，也仅有一步之遥。

由此不难看出，也许只有谢榛和与其合作的另一作者，才有可能将其本人家门口及临清全城的地名作为他构思《金瓶梅》地理环境的依凭。其他非久居临清而只是路过临清的人，根本不可能做到。从未涉足过临清的人更不可能凭想象描写出这样具体的环境来。此条当构成谢榛确是《金瓶梅》作者的铁证之一。

《金瓶梅》故事叙述中所出现的大量方言土语，与现临清一带方言关系极为密切。作者这种方言写作，随心应手，毫无生涩做作的痕迹。从方言角度讲，似除谢榛这位临清籍贯的文学家，其他地方的人也是难以做到的。这应视为铁证之二。

谢榛可称得起大手笔的文学家，这早有定评，勿容赘述。但他与丘世贞等“后七子”打出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文学旗帜，与作者热爱与熟谙通俗文学则有抵牾。其实，如深入考究，这也容易找到解释。谢榛早期的文学主张与后期热爱俗文学的兴趣，相反相成，并不矛盾。见诸下面一些史料记载，足资证明他不仅熟谙与热爱俗文学，且为有明一代大词曲作家之一。

(一)《明史·谢榛传》记载：“谢榛，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已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

(二)《四溟诗话》中谢榛自记：“予自正德甲戌年甫十六，学作乐府商调，以写春怨，尚记首一阙云：‘隔花漏残春梦醒，星斗落江城，珠箔金钩低控。玉钗珊枕斜横。画堂前紫燕交飞，绿杨枝黄鸟和鸣。倚危栏，又看三月景，杳不见多情。断肠芳草碧，回首乱峰青。’统录若干曲，请正于乡丈苏东皋，东皋曰：‘尔童年爱作艳曲，声口似诗，殆非词家本色。初养精华而别役心机，孤此一代风雅何也。’”^⑤

(三)《明史·谢榛传》：榛西游彰德，为赵康王所宾礼。“复游彰

德，王曾孙穆王亦宾礼之。酒阑乐止，命所爱贾姬独奏琵琶，心泽制竹枝词也。榛方倾听，王命姬出拜，光华射人，籍地而坐，竟十章。榛曰：此山人里言耳，请更制，以备房中之奏。沾朝，上新词十四阙，姬悉接而谱之。明年元旦，便殿奏技，酒止送客，即盛礼而归姬于榛。”^⑥（按黄云眉《明史考证》更正言与贾姬事系赵康王，非穆王，当从^⑥）

（四）《四溟诗话》谢自记：“初未阅《太和正音谱》，故有硬字。”可知其后已阅此著，其潜心致力研习词曲之情况，可于此窥知一

（五）明徐复祚《曲论》：“若夫散曲小令，则未易枚举。试数其人，则周宪王，赵[国]王、刘诚意、王威宁、杨遂~~斧~~陈大声……谢茂条，彼皆海岳英灵、文章巨擘。……正业后游戏为此，或滔滔大篇，或寥寥小令，含跨金元，真所谓种种殊别，新新无已矣！”^⑦

（六）明张琦《衡曲麈谈》作家偶评节中，逐一记述了明中叶曲作家，如杨升庵、王美陂、康对山、李伯华、陈大声等并加品评，后继谓：“谷继宗、谢茂条辈，皆有逸。”^⑧

（七）任纳《散曲概论》作家第六节亦记载有谢榛（榛）的名字，与王世贞、屠隆等名字并列。并注：“以上五十三人，据《曲家姓字小典》增。明人著有散曲者共三百三十人。”

从以上零星记载可知谢榛少年时期即喜作歌词乐府，度新声，通音律，且写作散曲很多，侧身于曲作家行列且见知于当世。其“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只是早期针对台阁体、八股文而提出的对诗文方面的主张，貌似复古、实意在革新。这并未能防碍他后期随着时代思潮的推移，兴趣转向对散曲、传奇等俗文学的酷爱。他晚年浸沉于散曲传奇，还曾使王世贞产生错觉，在《曲藻》中说他“惭愧不出”。当时文人作散曲传奇等，可能被见为不体面的事，故见于刻印的曲总集所收入的曲作均不著录姓名，因而谢榛的曲作亦不传，遂仅以诗名世。

谢榛一生经历中亲眼目睹的灾难，莫过于当时“俺答”多次对明的入侵，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师附近时，他正值京师，亲睹京城近郊被焚掠、人民遭难的情况，感慨万端，写下了许多悲愤的诗篇，其爱国爱民之心，溢于言表。“乱后骚人同百感，年来壮士若长征。樽前莫话边庭事，弹剑悲歌气未平。”^⑩从这一诗句可想见他面对人民遭难柔肠欲断、悲愤难遏的心情。他饱含着血泪写下了《哀哉行》《少女行》等篇，哀叹燕京少女那种“驱之北去悲吞声。独恨跣足走荆棘，不与爷娘同死生”的惨痛遭际。^⑪他在《四溟诗话》中录《四禽言》：“鹁鸪鸪，鹁鸪鸪，帐房遍野相喧呼。阿姊含羞对阿妹，大嫂挥泪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掠，犹幸同处为妻孥。愿言相怜莫相如，这个不是亲丈夫。”并后记：“此作可悲，读者尚不堪，况遭其时乎？”^⑫说明正因他身遭其时，读此诗就更加悲愤异常，无比感慨。尤其使他痛心的是朝廷的昏庸无能与对入侵的妥协退让态度，奸佞当道陷害忠良。三边总制曾铣因议收复河套反被严嵩陷害，罹杀身之祸，更使他无比愤恨。他面对朝政的昏暗，内心充满痛苦，敢怒而不敢言，心境十分矛盾。有时采取无可奈何、明哲保身、劝友人亦要克制而“远是非”的态度。甚至对收复失地感到无望，表现出一些悲观情绪。但他对严嵩在军事上的倒行逆施忿然于心，谓：“然借此开曾（铣）夏（言）二公狱，另有史氏之评。”^⑬严嵩被罢后，他便毫不掩饰地流露了真情，诗寄新内阁参机务的严讷，为民请命。

《……兼寄严家宰敏卿》：

黠虏交攻孤垒破，马牛去尽犬独留。犬蹲屋角吠山月，鬼打钟声登戍楼。三关父老且挥泪，当代应多卫霍侍。^⑭

这便是他对边政事不满、充满愤怒的明确表白，对朝廷的谴责，真可谓直揭疮溃、一针见血。当时朝廷中相继发生了主战派曾铣、沈炼等遇害事件，谢榛对此产生的憎恨与一般文人显著不同，皆因他与被害诸将帅有着特殊的眷念之情，他们的遇害给他的感

情刺激是巨大的。因曾铣在山东巡抚任内挂帅督修了临清的“新城”，使临清城延袤三十里，临清人都怀念他的功德。^⑯沈钦于嘉靖二十一年，在临清东的邻县茌平当过县令；而名相夏言的父亲夏鼎又曾为临清州守。后世临清修了“褒贤祠”祭祀他。^⑰谢榛出于家乡观念对彼等怀有特殊的崇敬心情是肯定的，他不能不为这些以身殉国的英雄们暗弹同情之泪，其骨鲠在喉难于忍受，而只有将国家的千古奇冤与自己的怨愤寄寓成书才能使自己郁闷的心情得到抒发。为国鸣“沉冤”的《金瓶梅》创作动机，当易被理解。《金瓶梅》于主体故事刚展开后，即于第 17 回横楔入“兹因金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的重大军事事件的描写。紧接着又写了宇文虚中“消虏患事，河湟失议”的奏本，直接托出了作者的创作初衷。这个初衷与谢榛政治思想的联系也是十分吻合的。

其次，《金瓶梅》中，活绘了运河边新兴商业城市的缩影。既有逼真的上层社会：豪门仕绅、官场景及豪华服饰、饮食、器具的细致描绘，也有下层市民瓦子小巷三教九流的生活的生动写照。既塑造出有闲阶层西门众妻妾贵族妃女的典型形象，又刻画了一大群出身微末的卑微小人物的嘴脸。前者决定，非有能跻身官府豪门熟稔洞察官场相者不能熟悉者；后进又决定，非与下层社会市井生活有广泛接触极为熟悉者，也断难成文。由此又可得出《金瓶梅》作者必须具备的第五个条件，即作者需兼有对上层社会官府豪门及下层社会市井小巷各色人等广泛接触的社会经历。让我们以此再与谢榛加以对照。

谢榛终生为布衣，出身微末。其前半生经历，现尚不确知，但却知道他除“发愤读书，刻意为歌诗”外，还生活潦倒，十分贫寒。赵康王看到他“山妻只管怜儿女，不顾秋风去典衣”的诗句时说：“谢先生何以一贫至此也！”^⑱《金瓶梅》第十三回中有一句话说：“原来大户人家两层窗寮。”这便无意中透露了作者系出身于小户人家的底蕴。如本人出身于官绅豪门，便不会有此口吻。谢榛前半生的长

期贫困生活，给了他广泛接触下层社会的际遇，使他具备了植根于社会基层的深厚生活基础。由于他有丰富而深刻的市井生活体验，才能够写出诸如帮闲应伯爵、勾搭丈母的陈敬济，把老婆让给主子的韩道国，不甘居人下与主人通情，但却真心疼爱自己丈夫，因丈夫蒙冤而悲愤自缢的宋蕙莲等具有复杂心理、多重性格、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点正是出身高贵门阀的王世贞等所不能作为的。这点也正是谢榛较之同时代身为贵族上流文人所独具的优越条件，而不应被我们忽视。

谢榛中年以后，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即来往于公卿、王侯、权贵、仕绅、名流之间。后又在赵康王府做幕客，被礼为上宾。这就远远脱离了青灯黄卷、妻儿无米为炊的生活，一跃而进入豪门上层社会。赵康王以爱姬贾赠之，足见对他优礼有加，他在这种际遇中，也便逐渐习惯了酣酒击节、日逐欢乐、笙歌满座、珠光缭绕的豪华生活。从他下面两首诗中窥见他生活中的一般。

月也观妓分得堪字

月白池台迥， 征歌客更酣。
名花出山右， 春色似江南。
漏转仍呼酒， 参横尚驻骖。
从来赏音处， 感旧对何堪。⑯

夜集王元美宅赋得弄玉吹箫障子

童老疏狂燕赵客，今宵雅集王郎宅。
堂开屏障出丹青，杂花抱石烟冥冥。
中有仙匹为谁子？云是秦娥及萧史。
秦王昔日起高楼，帘卷曲栏人并倚。

.....

二仙飘渺不可知，吴歌且复挥金卮。⑰

他便象应伯爵那样，随西门庆在李桂姐等妓女队伍中说笑逗趣，和琵琶，拍手唱《山坡羊》《挂真儿》等流行小曲，以“鞋杯”行酒

令当做普通平常。

谢榛后半生近十年的幕宾生涯，以及在都门结诗社时受到缙绅名流的优厚待遇，后漫游又被“秦晋诸王争延致”，这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豪华宴集自不必说，对官场中的贪赃枉法、宫廷秘闻、轶闻琐事他也司空见惯，娴熟于心。其直接间接的生活阅历见闻足够应付写出诸如：“狎客帮嫖丽春院”、“西门庆结交蔡状元”、“合卫官祭富空娘”、“吴月娘玩灯请兰氏”等诸多广视角的精彩场景了。这种对上流社会的生活体验，谢榛较之同时其他中末流文人、民间说唱艺人，又具备了独特的优越条件。

既有穷困潦倒生活的深刻体验及因本人的平民身分而能够与下层人物交往，又有享受过奢华生活、出入于达官贵人官场的经历，集于一身兼而有之，这种极特殊的具有双重地位的人，除谢榛外，于当时恐怕再没有其他人可供合适的选择了。

又其次，从《金瓶梅》中还可看出作者的人生观及处世态度的一些轨迹。他应是一个玩世不恭、放浪形骸、不拘小节、思想达观的人。他流连声色、贪图享乐，带有一定的市民意识和趣味。他有明显的反正统儒学的哲学观点。他决不是道貌岸然的君子。《金瓶梅》人物应伯爵似乎便掺有作者自己的某些影子。他虽然也在贵族上层社会中周旋，逢场作戏，但他骨子里却憎恨这个社会。他自视不凡，他于幽默感中充满了辛辣，这个社会表面的神圣尊严都被他在笑声中撕得体无完肤。这点其实也构成了作者应具备的第六个条件，即具有上述人生哲学与个性思想的条件。谢榛于此点上也是相符合的。

谢榛性格任侠豪放，有正义感，解人之危，以布衣身分奔走于京师权贵之门，脱学士卢楠于冤狱，成为士林佳话。后冯梦龙即据此事写成《醒世恒言》中《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篇。他为人洒脱，不受礼教世俗羁绊，不屑道貌岸然的儒士类型。“四溟在七子中倔强自喜，目眇而好骂，故同社多与之不合。”^②“谢茂秦素善济南（指李攀

龙）。已而有隙，谢在京师逐李不法事，众默然。魏顺甫闻之往质曰：先生为见之耶？谢遽曰：亦闻之人耳。魏正色曰：此乃尽市交态。便拂衣迳去。”^②“济南居官廉慎，谢榛尝私事来干，冀其枉法。祈请再三，李终不听，谢~~目~~^目奋袂起，以拳击之，于鳞走入得免。谢怒犹未平，鞅鞅而去。”^③《四溟诗话》中谢自己：“嘉靖甲寅春，予之京，游好餽于郭北申幼川亭，赵五枕易遣中使留予，……幼川曰：子才如此，子左右恶得无忌？昔闻卢生楠以诗获罪蒋令，子为遍陈当道，始脱其狱。……若不虚己，是以卢楠而救卢楠，其不免夫？”^④可见他的傲慢使友人亦为之担心。故郑仲夔《清言》将其与卢楠同列入简傲之品。我们对谢的生平为人所知甚少，但从他的《四溟集》中却也可以感知他的一些超然物外的思想。

从上述记载中可看出他性格中的某些侧面，其人决非处处遵循孔孟之道、仁义道德信条的儒士。嘉靖中晚期，王学左派思潮兴起，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城市中产生。临清做为绾毂南北的运河商业城市，则成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较早的地方。《金瓶梅》的成书离不开这儿商业急剧膨胀，有的人靠重利盘剥、巧取豪夺而成暴富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基础，其作者的人生哲学、处事态度也应与此相符合。上述行证资料可以证明，谢榛的思想见解、行事方法亦与此并行不悖。

再从社会风习考察。一些史料、方志和明清小说，对临清多有记述，诸如《金瓶梅》中反映的市肆繁华、节日的灯市、缎绢铺、银饰铺、卜巫、医药、香火、蜡烛、马桶、“雪狮子”等应有尽有，包罗万象。至于勾栏、娼妓、丝竹之艺、服饰穿着、饮食肴馔方面，则素有奢靡之风，为历任州守惊叹（拟将另文叙述）。这也是作者生活阅历中应具备的常识。谢榛在临清生活了大半生，当然对此十分熟悉、了如指掌。

从以上论述的七项作者基本条件与谢榛逐一对照，就可知谢榛足可当《金瓶梅》主作者之任。我们不知道还有那一位作者比他

具备的条件更为优越而充分。一些不占据全面条件而虚拟假定的跛脚候选人，似都难以令人凭信，不能成立。

但问题的解决并不能到此为止，能作为定论的还有待于下述一个极为重要的佐证，这也应视为论定作者的铁证之一。

三 “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如前述《金瓶梅》作者是山东临清人，即能成立，也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即除谢榛外是否尚有同为临清籍、生活于嘉、隆年间、又擅长俗文学的其他作家？这便需要以另外的佐证加以辨别了。

《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谓：“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盖有谓也。”这个托名为“兰陵笑笑生”者究系何人？这个疑难，在文学史上被称作“斯芬克斯”之谜。既然是谜，就很费解，后人尝试着作了许多解释，但还是都未能解开。于是有人怀疑此序言系后刻者所加，这才真叫做疑团重重了。我们试先设问，刊刻者为什么不把作者托名于名声响亮的通都大邑，以把作者隐藏得更深，也更符合作者阅历丰富的身份？而偏托名于“兰陵”这个早被历史淹没的郡县？这并非毫无缘由。倘若是“兰陵”与《金瓶梅》作者毫无关系，后人也不可能凭空杜撰出“兰陵”来。因此，“兰陵笑笑生”之托名，应是可信的，沿此去寻求作者，实不失为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

兰陵，按照中国文人标示名籍的惯例，当是置于笔名前的祖籍或原籍名称，含有不忘世系源流之意。经查证，谢榛虽是山东临清人，但临清却并非他的祖籍。他的祖籍正是在“兰陵”。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笔者考证的新成果。在《四溟诗话》王渔洋序中，叙述谢榛被排出“七子”“五子”之列之后写有这样一句话：“赵康王薨，秦归东海。”^{②4}清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谢山人榛》条亦载入“茂秦归东海”^{②5}之句。按赵康王死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谢榛亦在此年结束了他在河南彰德今之安阳赵康王府的幕宾生活。令人疑问的是，他并没有回山东临清故里，而是“归东海”。既称“归”，可见“东海”才是他的真正故乡。他过了多年的流寓生活，临清的故居

早归王氏南村，其弟尚依王南村居住。^②可见临清并没有他的祖先产业。当然不是他的老家，只是侨寓的第二故乡；东海才是祖籍。

按光绪《武进阳湖县志》载：“梁天监元年，晋陵郡改南东海郡，曰兰陵郡，改武进曰兰陵。兰陵郡领兰陵。陈，晋陵郡改兰陵郡，曰东海郡，领兰陵。自宋迄陈，皆隶南徐州。”可知，梁、陈两朝南东海郡亦称兰陵郡，兰陵郡亦即东海郡，改来改去，都是一个地方。

我们既据条件判定《金瓶梅》的主作者是谢榛，又查出谢榛的祖籍是东海，东海又是兰陵，又知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问题从判定的起点出发，绕行一周，又循环到原点，这一循环的链条内隐藏着的谜底确实已被揭示得十分清楚：即《金瓶梅》的作者谢榛因祖籍是兰陵郡，故署名“兰陵笑笑生”。笑笑生者，系讥笑当世之意，则无需赘言。在此需要指出，兰陵，并非今有人认为的山东峄县的兰陵镇，亦非江苏的武进县，而是广指古代的兰陵郡。

从谢榛的诗作中也查到了足够确切证明其祖籍为兰陵的记载。

（一）《吴母太夫人哀词》

城上鸟啼正夜分，归魂遥归楚江云。

故园春笋空成竹，冷雨凄风不忍闻。

这首诗不象为别人作的掉词：正是说他自己的母亲死在异乡的北方，归魂悠悠，返回南方的故家。这反映了谢对母亲死于他乡的哀怜之情与他自己凄婉的乡思。

（二）《九日寄邹子序》

少小论交已白头，别来幽事赴沧州。

吴中旧侣惟君在，江上青山重我愁。

竹叶漫倾孤馆月，菊花空老故园秋。

欲乘兰舟东归去，共息尘机对白鸥。

这首诗是说，邹子序是他吴中的同乡。他们是青梅竹马的童年好友。相别后他来到沧州一带（泛指北方的平原），时隔多年，吴中

的少年伙伴都已亡故，只剩下邹一人了。又点出他那长满竹菊的故园仍然存在，愿乘船回到有白鸥的家乡栖止话旧。那么，他这水乡的故园又系何处呢？

(三)《怀邹子序》

渺渺太湖水，湖中多鲤鱼。

故人时把钓，应有北来书。

(四)《寄怀邹太湖逸人》

天涯含泪染征尘，丧事连悲万里身。

.....

.....

独安蓬荜悬游子，每见亭台易主人。

翠壁放歌林屋晚，黄柑酿酒洞庭春。

花间杖屦闲无客，湖上风涛暗有神。

.....

.....

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邹子序的家住在太湖，故称邹太湖逸人，在太湖上把钓。邹既是谢榛的吴中同乡，说明谢榛的家也在太湖。太湖位于江苏武进县南，古时当隶属于兰陵郡或称东海郡。

(五)《寄洞庭山邹子序》(诗略)

从此诗题又可知邹的家是在太湖洞庭山。

(六)《哀江南八首》(录二首)

华亭未奏捷，烽火更西湖。

海舰贼来去，天兵功有无？

古来兵不到，湖里洞庭山。

纵熟黄柑酒，谁能长醉颜。

这是写倭寇侵犯江南地区，官兵在华亭(今松江一带)失利，烽火又西燃太湖，即使古来兵不到的太湖中小岛洞庭山，也再不能确保了。

(七)《吴下洞庭两山诗客每从予游，四十年来凋敝尽矣，率成

短律用志悲感》(诗略去)

从此诗上记看出，谢榛虽久居北国，但却每思早年太湖洞庭两山的旧时诗友。查《历史地图集》(元明)江浙行省北部图，标示太湖洞庭两山所处位置如下：

很清楚，洞庭两山即太湖小岛上的两座山名。明代后改洞庭山为包山，东洞庭山为莫厘山。

(八)《邹子序见过有感》

湖上青山旧业存，橘花春冷白沙村。

遥思社日邻翁醉，燕子归来空闭门。

从上首诗又知谢榛的故乡即在太湖洞庭山，湖水青山映照，早春橘花开放的山村，即白沙村。那里还存有他的旧宅院。这村庄就是他的出生地与渡过童年的地方。邹子序既是他童年的好友，也是他的近邻。在谢榛全家在北方侨居的数十年中，他的房产就由邹代管并居住。谢榛想到邹在社日出游酒醉未归，燕子飞到一座无人的空屋里。多年来，他就是与邹互通音讯，保持与故乡的联系。“归东海”，亦当是当太湖洞庭山下的白沙村了。

至此我们可以作结，谢榛的祖籍与出生地是古兰陵郡治下太湖洞庭山脚下的白沙村。这便是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所说作者是“兰陵笑笑生”的来历。

前文论述了临清人谢榛有广泛掌握临清地理、方言、市情、民俗的最优越条件；论述了他的政治、哲学、以及他的风貌、个性等；论述了他是一代大诗人、大词家、热爱俗文学的文艺巨匠。继而以大量的论据确证了他的祖籍是兰陵，谢榛就是“兰陵笑笑生”；他正是《金瓶梅》的作者。那生于嘉、隆间具有“大名士”身分，又具有上下两层经历，具有双重籍贯，具有优越的写作《金瓶梅词话》的条件，托名之谜也迎刃而解的作者，除谢榛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人了。

谢榛便是《金瓶梅》的主作者，这是无可置疑的铁一般的事实。

找到他虽比大海捞针还要困难，但是毕竟还是找到了。

我们找到《金瓶梅》的主作者，只是解决了作者之谜的重要一环，还必需让操吴语的副作者，与写《金瓶梅》的发起人与组织者都站出来亮相，才可解决另一个疑问课题。

四、从成书过程说到副作者郑若庸

万历二十四年袁中道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万历四十四年谢肇浙说：“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借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此二说所说“绍兴老儒”与“金吾戚里门客”，实指一人，这位老儒是绍兴人或泛指江浙一带人。其在文学上的地位，远在“大名士”之下。

我们也不难发现，《金瓶梅》所使用方言，除绝大部分山东方言外，确实还有少部分吴方言在内。除见于沈德符指出“时作吴语”的53——57回外，还见于第1——6回及80回以后的二十回中。这就是说，写作《金瓶梅》除掌握临清方言的主作者“大名士”谢榛外，还有一位掌握吴语的“绍兴老儒”或称“金吾戚里门客”与其合作，他在成书的全过程中，起到了助手作用。这位起辅助作用的副作者是谁呢？需先从另一个问题谈起。

廿公《金瓶梅》跋谓：“《金瓶梅》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既是“巨公”欲有所刺，而寓意于《金瓶梅》中，知道这个巨公是谁也十分重要。按“巨公”之称，非朝廷首辅、六卿、或藩王、勋戚无以当之，在嘉、隆间朝廷诸公卿中，由于统治者的地位与封建道德伦理思想，并为保全自己的名声，似均不可写《金瓶梅》这种离经叛道的“淫秽”之作，也没有将其托为寓言的可能性。

还需从另一个角度去考察历史，“朱元璋一面分封诸子为王，一面又怕藩王割据威胁王权，因此对分封的藩王法禁极严，另外则相利用词曲歌舞来消磨诸王政治野心，使他们沉湎于声色之娱，

……对亲王不但赐以词曲，还赐以乐户。”^⑦因为藩王府中具有沉缅声色之娱的条件，在社会上被严禁的淫秽戏曲作品，在藩王府高墙内反而合法存在。所以藩王府多半可成为俗文学戏曲孳生发源之地，即便是淫秽作品，也不被视为禁区。因此“巨公”若指藩王，倒可能真的寻到《金瓶梅》的出生之地。某“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的含意是某巨公藉《金瓶梅》寓意以刺他人。因被刺之人一定是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不敢直说，只能采取转弯抹角的讥讽手段。因著述此类书籍，要冒风险，故必需有一个相对秘密、安定的写作环境。在这个场所中必定拥有大量藏书与公文邸报之类信息资料以供参考。这在当时，只有藩王府，才具备这些条件而可能成为产生“巨公寓言”《金瓶梅》的温床。前已述及谢榛在河南彰德为幕宾，又证明了他即是写《金瓶梅》的主笔。以其所处时间、地点、交往、活动判断，与其发生联系的“巨公”当指赵康王朱厚煜。

可证实此判断的有一重要佐证，即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透露的“旧时京师”之线索。既称“旧时京师”，则非指当代的明京师（今北京），亦非指与明代相近的京师、宋之汴梁，元之大都。含义当为遥远年代的京师。此处指战国时的魏都，后赵、前燕、东魏、北齐均建都在此的邺，即明代分封赵藩王于此的彰德府。经查嘉靖《彰德府志》街巷里卷记载有：“赤脚、里阙、长寿里、吉阳里、永平里、思忠里、戚里、石窦桥”，^⑧这儿记载的“戚里”与谢肇所述“金吾戚里”，颇相象。“戚里”是一条街巷的名称，而“金吾”则应为王府的金吾卫使。可知，“金吾戚里”指赵王府金吾卫使住的里巷。此金吾卫使“凭借奢汰，淫纵无度”，是个依恃主人势力，怙恶不悛的家伙。连他家的门客亦很憎恶他，“病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袁中道说的“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也正是谢肇浙说的这个“无恶不做、淫纵无度”的金吾卫使。这一官职，享千户之禄，也很相应。故袁称“西门千户”。很清楚，“金吾戚里”与“西门千户”就是指的同一个人。这“金吾”应是武将。有可能他住的“戚里”，位置在王府西

门，随将其托为西门庆入书。这个晋霸、淫棍的劣行，就成为“绍兴老儒”，也就是他家的门客写《金瓶梅》之初的取材来源。《明史》赵康王下载：“厚煜性和厚，……宗人辅国将军杨椋等数犯法，与有司为难。厚煜庇杨椋。杨椋卒得罪，并见责让。”赵康王对宗室属下既难管束，又在他们屡次犯法，被地方官治罪时难以庇护的情况下，忧态交加，自缢而死。^⑨这就是隐在小说故事背后的历史真实。不过绍兴老儒以《水浒》为缘起托西门庆初著的故事，一到了谢榛笔下，便又将临清这个商业城市的腐败现象大量写进书中，泛讽当朝佞臣严嵩父子等。这就把西门庆加工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使小说具有了揭露时代的政治属性了。

根据已经判断和证明了的结果，再与明人提供的线索印证对照，即可知《金瓶梅》成书与作者之谜的全部含义了。这就是：在古老的京师~~邺郡~~（即明彰德府）赵藩王府中，有“巨公”赵康王朱厚煜，延请来一位江浙一带老儒生，后又请到“大名士”谢榛，著书以寄寓对朝政的忿懥。虽积冤愤于心，但因牵涉朝政，不敢明说，只能采取隐晦曲折的寓意手段。在成书过程中，绍兴老儒恰取府下一“西门千户”淫荡奢汰生活为素材，以从《水浒》故事为缘起开始著述，继而临清人谢榛撰写时，即将临清商业社会的淫奢腐败现象与环境取之入书，（老儒，赵康王此时均成为辅写词曲、杂学与商榷的助手）经艺术剪裁加工托之《金瓶梅》以刺严嵩父子、陆炳在政治军事上的倒行逆施与生活上的靡烂腐败。这就是明人线索与字里行间隐约透露的全部含义。几位距成书年代甚近的明人，都是知情人，大多对来龙去脉都很清楚；但碍于诸多不便，当时不能说破全部秘密。但一细考较则可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上对包括成书年代、写作动机、作者（巨公、绍兴老儒、大名士）身分籍贯、取材来源、成书地点等均已表露无遗。这样，《金瓶梅》之谜实可谓真相大白了。舍此，其他答案，在距成书年代很近的明人提示的线索面前，都站不住脚。

现在我们寻找这位在成书中起辅助作用的绍兴老儒是谁。既知在赵康王府朱厚煜作幕客的谢榛是主作者，那么，这绍兴老儒也需在赵王府中去找。见诸文献记载，与谢榛同时在赵王府作幕客的文人，还有昆山郑若庸，吴江顾圣少，嘉兴尤嘉、仲春龙。后三人只有零星诗作见于《明诗综》等处。《列朝诗集小传》也收入了他们的传记。但均不著名，鲜为后世所知。而郑若庸却是与祝希哲、唐寅齐名的三位南曲作家之一。当我们在他的传世戏曲作品《玉玦记》中查到了与《金瓶梅》相同或类似诗词达七、八处之多时，便可确认他正是《金瓶梅》的另一位作者、“金吾戚里门客”或“绍兴老儒”了。

见于《顾曲麈谈》记载：“吴中以南曲作名者，祝希哲、唐子畏、郑若庸三人。若庸，字中伯，号虚舟，昆山人，早岁以诗名吴下，赵康王闻其名，走币聘入邺，客王父争担簦而之处，以中伯与谢榛故也。中伯在邺，王为庀供帐、赐宫女，及女乐数辈。中伯乃为著书，采掇古今奇文累数千卷，名曰《类隽》。康王薨后，乃去赵，居清源，年八十余卒。中伯所著曲以《玉玦记》最著，其他《大节记》《五福记》皆不传。予谓《玉玦记》典雅工丽，可咏可歌，开后人骈绮之派。”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郑若庸，字中伯，妙擅乐府，尝著《玉玦记》以讪妓院，一时白门杨柳无系马者，群妓患之，乃醵金数百行薛生近充，作《绣襦记》以雪之，秦淮花月，顿复旧观。”^⑩

我们肯定郑若庸是与谢榛合作《金瓶梅》的副作者理由有四条：按照判断的顺序再分别详述于下：

(一)他是与谢榛先后被赵康王聘来写作的高级文人幕客，且是擅作词曲的名士。根据，在以上行文中已很清楚。

(二)他与谢榛友情深厚，过从甚密，有合作写书的感情基础。这固然因他们同是长于诗词、艳曲的文人，同时也因为是吴下的老乡。谢榛的祖籍兰陵郡之洞庭山，距郑若庸的家乡昆山只有百余里。在临清《康熙州志》上记有谢榛《九日与吴门郑若庸北城联句》二首，其中有“幽事知谁重，浮生待此闲。乾刊惟旧侣，霜露各衰颜。

莫待黄花老，明朝更一攀”之句。这应是他们五十岁后登临清城垣时所作。从两个老作家互相同情与勉励的诗句中，可知他们是乡情、诗情、友情息息相通的知音。更耐人寻味的是郑若庸也与临清有不解之缘，除他来临清会谢榛的联句外，在赵康王死后他来清源（即临清）定居直到八十余岁死在临清（见前引《顾曲麈谈》）便是证明。可见从对临清的地理环境了解上，他也可以配合谢榛的写作。

(三)《金瓶梅》中不少吴语应是郑若庸的手笔。如书中前六回抄袭《水浒》原文时加进的吴语：“听信你兄弟说空生有鸟卵嘴，不怕别人笑耻”(二回),“却不恁的家无主、屋倒竖”(三回),“便入在材里”,“这个易得，你那边只敲壁子”(五回)等。第五十三回中的“~~那~~遭鬼的杠相知”“可卵孵”，第八十二回“怪捣鬼牢拉的，别要说嘴，与我禁声”，第八十三回“贼破家误五鬼的奴才”，第八十九回“没的禁，拿我煞气”等，无论从词汇或从语法结构上看，均是颇浓重的吴语。这些，就不是从童年就来到北方并定居在临清的谢榛所能写出来的。那么，是不是同操吴语的顾圣少、尤嘉所写呢？当我们查出《金瓶梅》中的不少俗语、诗证、词曲出于郑若庸的《玉玦记》时，就把这个疑问排除了。

(四)《金瓶梅》与《玉玦记》①之比较：

《金瓶梅》

[一]前车倒了千千万，
后车倒了亦如然。
分明指与平川路，
却把忠言当恶言。
(九回、十八回)

[二]谁人汲得西江水，
难洗今朝一面羞。
(许多回目反复
出现的套语)

《玉玦记》

曲突无功最可怜，
焦头受赏已徒然。
分明指与平川路，
错把忠言当恶言。

(十三出熟尾词)
假饶决尽湘江水，
难洗今朝一面休。

(二十九出熟尾词)

[三]几向天台访玉真
天山不见海沉沉。
侯门一日深如海，
从此萧郎是路人。

(八十三回诗证)

[四]柳底花荫压路尘，
一回游赏一回新。
不知买尽长安笑，
活得苍生几户贫。

(十五回诗证)

[五]正是百年终日醉，
也只三万六千场。
(五十三回)

[六]堪笑西门暴富，
有钱便是主顾。
一家亚斯胡缠，
那识纲常礼数。
狎客日日来往，
红粉夜夜陪宿。
不是长久夫妻，
也算春风一度。

(十二回回首诗)

重到天台访玉真，
三山不见海沉沉。
侯门一日深似海，
肉此萧郎是路人。

(十六出煞尾词)

柳底花荫压路尘，
一回游赏一回新。
不知买尽长安笑，
活得苍生几户贫。

(十二出赏花煞尾词)
百年终日醉，
三万六千场。

(六出访友煞尾二句)
堪笑穷儿暴富(丑)
有钱便是主顾(净)
不是长久夫妻(丑)
也算春风一度(净)

(第八出煞尾词)

以上六例中，例一虽抄袭《水浒》，但又同见于《玉块》，例二、三仅有两字之差，例四一字不差，例五在句首增加了二字。例六则在《玉块》基础上增加了中间四句，把意思表达得更为完整了。不难看出《金瓶梅》源出《玉块记》。(七)《金瓶梅》第十二回诗证中有句：“勾栏妓者媚女猱。”其中“猱”字非常用字，《辞源》注：兽名，猿类。^又

猱，猕猴也。猱儿，妓女的别称。《玉玦记》中对“猱”字亦有专题别解：“〔丑〕：北方人都叫大姐是猱儿，猱是山中的小兽，善能与虎搔痒。爬在虎头上猱破头顶骨，吃了脑髓，虎死尚然不知……。”写《玉玦记》的郑若庸，为比喻妓女而对“猱”做了如此细致而独特的解释，《金瓶梅》中亦用如此生僻、为一般文人少用的典故描写妓女，可见这也是出于郑若庸之手。

〔八〕《金瓶梅》第九十回后的故事情节大体上亦系《玉玦记》的延伸。例如陈敬济嫖妓被骗沦为乞丐，酷似《玉玦》主角咎喜员外的结局。号称铁指甲的杨先彦又酷似《玉玦》第三出的丑角解帮闲。连第九十二回描绘杨先彦为人的两句话“他许人话如捉影捕风，骗人财似探囊取物”，亦由《玉玦》中“博奕”折中一字不错地照搬过来。

〔九〕《金瓶梅》第九十八回王六儿与女儿韩爱姐在临清码头上沦为暗娼卖淫，与《玉玦》第八出“入院”一折中李翠翠为鸨儿令其女娼奴为妓的情节相仿。

以上例证，足以说明《金瓶梅》中有多处模仿、套用《玉玦记》，有的是修饰后入书。如仅系一二孤例，可视为事出偶然，既然二书重合之处如此之多，便决非巧合了。因此可以断定：《金瓶梅》中大部分诗证、回首诗、结尾诗段落诗词、小曲，多数系郑若庸插入。《金瓶梅》的前六回，抄袭《水浒》作为小说的入笔章节，亦出于郑若庸之手。第九十回后的十回，其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等明显沿袭《玉玦》，是由郑若庸续作补缀、敷衍铺续而最后成书的。

至此，我们已有充分理由论定郑若庸即是明人提出线索中所指的“金吾戚里门客”，或称“绍兴老儒”。至于未称他~~山~~或吴中老儒，则系以绍兴代江浙一带或系当代对他籍贯的传讹。因《金瓶梅》主体故事多数由谢榛写成，出于郑若庸之手的章节毕竟较少，故只好称他为辅助写书的副作者了。

五、《金瓶梅》成书的发起人与组织者 ——赵康王朱厚煜

前文已论述过“巨公”是指赵康王朱厚煜。《金瓶梅》的成书，首先由他发起，先后聘来了郑若庸与谢榛进行写作，他同时也是组织者与全书主旨的拟定者，甚或参与了少数章节的资料选材与定稿工作。他的地位与作用非常重要，故也必须对他的思想、性格、情趣等有个深刻的理解。

朱厚煜讳庄，字厚煜，为明成祖第三子赵简王高燧的五世孙，正德十六年（1521）袭封彰德为赵康王，“好道，喜读《易》，故自号枕易道人。”“事祖母杨妃，以孝闻。”^②嘉靖八年“境内饥，厚煜上疏，请辞禄一千石以佐赈。帝嘉王忧国，诏有司发票，不允所辞，……性和厚，构一楼名‘思训’，曾独居读书，文藻赡丽。”^③“爱文艺，思想旷达。宫左有堂曰‘居敬’，日读书其中，暇则操觚挥毫。或留心著述，或游情文坛，厌流俗之陋习。”^④由此可知，他是一个性情和厚，有忧国忧民之心，爱文艺、好著述的读书人。在他的王府中，拥有丰富的藏书，聚集了几位文人词客，已知者除谢榛、郑若庸、顾圣少、尤嘉、仲春龙外，还有音乐家《琴谱》作者张德润，“嘉靖中与谢榛并客赵藩”。^⑤厚煜亦善作曲，王世贞《曲藻》谓：“赵王之《红残驿使梅》……出自王公，脍炙人口；然较之专门，终有间也。”^⑥徐复祚《曲论》谈及散曲、小令作者亦有“赵□□王”之名（阙二字应为“枕易”）。在赵王府内，以他为核心，聚集了戏曲家、文学作家、音乐家，还有能谱曲擅弹奏的贾姬，又有许多歌舞乐伎每日弹唱演习，俨然形成了几可与周宪王朱有燉平分秋色的另一戏曲中心。

朝廷为使藩王安于藩位，“对亲王不但赐以乐曲，还赐以乐户。”那时，“开封和临清是戏曲集散地”，与赵藩府相距不远，赵藩府便成为极利于戏曲发展的温床。这为《金瓶梅》创作准备了文学词曲方面的条件。赵藩府中姬女众多、婢仆成群，日逐作乐，还“强买良家子充宫人，时召乐府留宫中不出。”^⑦这种由其祖父辈留传下来的淫荡、骄奢风气，即使性和厚、喜读书、厌陋习的赵康王也急难遏制其府中“西门”的荒唐，为所欲为的靡烂生活遂成为老儒讥

讽淫秽生活的取材来源。

从政治角度看，不仅谢榛对“俺答”入侵事耿耿终日，赵康王对此事的关心也不比谢差。谢虽出于义愤，但由于是一个平民的文人，却无可如何，只能积忿于心，而赵康身为王室成员，国事即家事，在面对边事不可收拾的情况下，则是惶惶不可终日，时刻欲有所行动。有人上《九边图论》，他大加赞赏说：“此论长虑远识，出人意表，斯人斯言，斯时方用。”³⁸按捺不住为保护朝廷欲有所举动的心情。他上《广设备以御黠虏疏》³⁹说：“虏至辽潞，止隔一山，人民惊惶，生理大废，官军渐集，粮草不敷，器械未利”，遂自愿捐禄米一千九百石供应军饷。又“愿将林、武二县接年未收禄粮交付，并赐臣玺书岁加禄米三百石，欲具奏辞免”，充分表达了统治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责任感。赵王对“俺答”入侵问题上的主战派，与谢榛的见解完相同。他们在看到朝廷主战派代表人物曾铣、沈炼、杨继盛先后被杀害，而奸佞严嵩父子与陆炳等却被朝廷信用时，胸中充满的忧愤感情是可以想见的。但由于自己处于无权的藩王地位，有冤愤却不敢明伸，这就产生了写书讽刺朝廷昏庸、奸佞祸国的写作动机。为了达到泄冤愤、讽奸佞的目的，采用暴露他们荒淫无耻生活的手法，自属于必然的事。从此看出，赵康王是写《金瓶梅》的率先发起者，也是组织者、庇护者与参与者。

请看《金瓶梅》第六十四回刘、薛二内相谈的一番议论朝政的话：“……依着蔡京老贼，就要许他。”“你我如今出来在外做土官，那朝里事也不干咱每。俗语道，咱过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还有

一个大汉。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这些酸子弄坏了。”从这段话的_三，决非能出于两个普通的太监之口。因为即便不把他们放在外做土官，对朝政大事他们也是无身分过问的。只有与朝内掌权人物身分相比肩，但因身处虚职，对朝政有见解而又无法施展抱负的藩王们，才会有这种口吻。有可能正是赵康王对边事初抱幻想，但看到朝廷大事一旦毁于那酸子文臣之手而陷于失望，心情转为

沮丧的反映。

赵康王反对科举取士的见解，在《金瓶梅》中也有明确反映。他在《纪客语》^⑩中说：“客有怀科举程度之文见者，予难之曰：‘安事此为？士生熙世达则赞皇猷敷治化……抽黄对白、骈四俪六，割裂经史……上之所求，下之所举，使之无真儒以经国；无名将以定乱；无巧工以创物；无名医以疗疾；无良史以记事，职此故也！’”于此可见，他反对科举制度的态度，十分彻底，认为按“八股”取士，选拔的都是一些无用的庸才，足以误国。他并且把实行科举制度的病因，直接归罪于皇上，“上之所求，下之所举”，真可谓酣畅淋漓，一针见血之谈。“然以本朝宗室，心不容非议本朝制度，故此文后半，复假客语，以纠正己之失言，所谓反言若正耳。”^⑪这表达了他有先进的政见而不得伸，只能委屈于心的客观情况。《金瓶梅》第四十八回写道：“崇政殿大学士吏部尚书鲁国公蔡京一本：陈愚见、欲愚衷、收人才、臻实效、足材用、便民情以隆圣治事。第一日罢科举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国家始制考贡之法，各执偏陋，以致此辈无真才，而民之司牧何以赖焉？”与《纪客语》比较，如出一辙。第七十六回再次贬低了科举取士制度，提出了反对八股文的见解。这应该被认为是赵康王对科举取士制度见解在书中的体现。

《金瓶梅》中有不少处写医道治病，行文细腻，一丝不苟，对不学无术的庸医做了辛辣的挖苦，表明了作者的医学根底，决非寻常可比。在谢榛、郑若庸身上，都查不出精通医道的证明，在赵康王身上却找了充分的证据。康王厚煜在《读黄帝素问》中写道：“予读黄帝《内经·素问》，爱其文雅义赅。窃独疑其非黄岐旧文。所疑有三焉：一曰名物之疑……素问所引多尧舜时事，黄岐虽圣，曷由前知？二曰音韻之疑，是书原在二经之前，反用沈约、顾野王江左之音如‘生、荣、平、明’，‘藏、光、张、章’。三曰字画之疑，顾其字乃出叔重之后，如‘瘧、疔……’之类。”这足以证明赵康王精于岐黄等诸类医书，其考证、质疑决非精通者所能做到。书中涉及的医学知识，当出

自厚煜之手。

《金瓶梅》中对释家道家的描写如第三十九回“玉皇庙打醮”，写出了九十三重天的神祇来。这点恐怕谢、郑亦难做到，应视为是赵康王提供斋文稿本资料，或是他自己插入正文的痕迹。

《金瓶梅词话》用项刘故事起手，旨在说明“色”足误国，以引起“西、潘”因色丧命的长篇正文。这固是对淫风炽盛的明代中末叶社会恶习的惩戒，但其中刘邦戚夫人的故事恰与赵康王家史暗合，却颇引人注意。刘邦因宠戚夫人而欲废长立幼，把皇位给赵王如意，因消息泄漏而计未得逞。刘邦去世后吕后掌权，遂人彘了戚夫人。很明显，作者的同情是在吕后一面。康王祖父“见舅爱幼子祐极，遂诬长子祐极以大逆，复被治诮让。薨，子康王厚煜嗣。薨，子康王厚煜嗣，事祖母杨妃以孝闻。”赵康王厚煜的父亲是祐极。祖父却因偏爱而废长立幼，夺去其父祐极的王位继承权。直至其祖父死后，其父才得正王位。这段康王家史几乎与刘戚故事一模一样。其父从丧失王位继承权到正名为王的残酷激烈斗争过程，不能不给他带来极为惊心的印象。当他听祖母杨妃叙述这段历史时，当历历如在目前。很可能他祖父是在王权之争中的蒙冤者，并且后来由于他的努力才得以使其父收回王位。如果祖母稍一软弱，也就没有他厚煜的王位了。赵康王对他祖母敬重孝顺之心，不同于一般，是有其家历史前因的。不难看出，以刘戚之事影其家史的良苦用心。他们是赵藩府争王，而又取自赵王如意在刘戚支持下夺取皇位，这更是《金瓶梅》采取以古喻今、巧妙对比的一贯艺术手法。以刘戚故事这顶“平民头上的皇冠”^④起手着笔，应是赵康王开始著书原始创作意图的留存。不过后来，在多年的成书过程中，随着国事的变化，与郑、谢二位作者的介入，已使故事发展大大超出了他原始构思的范围。

以上，从赵康王的政治思想、个性特征、曲艺、医学才长以及在康王府形成的文学、戏曲阵容诸方面，分析了他组织著书的动机与

条件。同时从《金瓶梅》书中引述了在议论朝政、科举制度、叙述医道、刘戚故事等方面与赵康王完全吻合的内证。在此基础上才认定他是《金瓶梅》成书的发起者与组织者，相信不会有杜撰之嫌。

六 结 语

为了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多年来我们努力求索，除查证各种资料外，也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我们认为已经找到了打开迷宫的钥匙，把设在这座迷宫中的机关，已大体窥视清楚了。这就是，在多年成书的过程中，明代后七子早期领袖人物山东临清人谢榛写就了主要部分，他是大主笔作家。长于词曲的江苏昆山人郑若庸是着笔较早，后期辅助作用的副作者。赵康王府是写作《金瓶梅》的主要场所。赵康王是初拟写作主旨的发起人与成书的组织者（但他并未看到书成即自缢身亡）。三人对成书起到了各自不同的作用。虽然这是一个写作小圈子，但从著作的观点讲，主要应归功于谢榛。

我们认为，在研究的过程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明人提示的早期线索，他们中间肯定有知情者，如欣欣子（若欣欣子即是笑笑生，则更是知情者）、甘公、稍晚的浓德行、袁中道、屠本畯、谢肇浙，均有可靠的信息来源。如谢肇浙曾参予临清会通河的疏浚并留下数首记载临清的诗篇，说明他的信息正是在《金瓶梅》的故乡临清获得的。他们因距成书年代较近，说法都有较大的可靠性，而不应为我们轻易舍此取彼。那么对他们说法的差异又将如何解释？初看之下，似自设障碍，难以自圆其说；细思之，则不然。明人诸说不够一致，那是由于他们故意埋藏真相与信息来源不一造成的。其实都反映了成书与作者之谜的一个侧面，并不相悖。各个侧面的总合，就是事物整体的映象。我们论定的三人有主有次，合作成书，就使明人说法得到了完满合理的解释。舍此，似难再找出另一种正确答案来。

王萤 87.4 于太原遗作未完

【注释】

- ①《明史》7375—7376页。
- ②《四溟山人诗集》、《明史》7375页
- ③《四溟诗话》王渔洋序。
- ④根据清乾隆《临清州志》及民国《临清县志》图绘制。
- ⑤《四溟诗话》卷三，载于《历代诗话续编》1190页。
- ⑥《明史》7376页。
- ⑦黄云眉《明史考证》：“按以贾姬归棲，《静志居诗话》卷一作赵康王非穆王。”
- ⑧⑨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 ⑩⑪见《四溟山人诗集》
- ⑫《四溟诗话》卷一，载于《历代诗话续编》1143页。
- ⑬⑭《四溟诗话》。
- ⑮⑯康熙十二年《临清州志》
- ⑰康熙十二年《临清州志·人物》。
- ⑱《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
- ⑲《明史资料丛刊》。
- ⑳㉑《四溟山人诗集》。
- ㉒《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 150页。㉓《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 150、154页。
- ㉔见《历代诗集续编》1134页《五渔洋序》。
- ㉕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423—424页。
- ㉖《四溟山人诗集》
- ㉗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
- ㉘嘉靖本·崔铣《彰德府志·邺都宫室志》。
- ㉙《明史》第十二册，3621页。
- ㉚见蒋瑞藻《小说考证》。
- ㉛据毛晋《六十种曲》本。
- ㉜《居敬堂集》。
- ㉝《明史·诸王志》
- ㉞郭朴《居敬堂集序》
- ㉟《金声玉振集》、《居敬堂集序》。
- ㉟《山东通志·艺文》。

^③成化十二年元月实录，张宣奏闻赵藩见。事。

^④^⑤《金声玉振集》中《居敬堂集》。

^⑥^⑦《金声玉振集》中《居敬堂集》。

^⑧台湾魏子云语。

明代临清钩沉

毛佩琦

古今城市的兴起，除政治原因外，经济的发展是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两者无不联系于其时其地的交通条件。所以，城市多在交通路线上，或路边，或河畔，或港口。

明代由于会通河的疏浚，处于会通河与卫河会合处的临清，随着大运河交通作用的发挥，迅速地繁荣起来。本来一个无足轻重的偏僻小县，成为北方一个重要的都会，其战略地位也从而提高。这种情况在明代一直没有改变。

清代末期，黄河北徙，运河淤塞，漕运制度也渐行破坏，东南物资兼用商运。迨海运大开，运河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平汉、津浦铁路的开通，南北运输便全被取代。与临清的繁荣相一致，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作用消失后，临清的繁荣便迅速成了历史的陈迹。

明代的临清号称名城，它的面貌到底怎样？它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究竟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试图就史籍所载加以考察。我想，这不仅有助于了解明代临清，而且有助于了解明代社会生活，即对今日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不无借鉴之益吧？本文所述，拟为三题，有关问题则分别附之。

一、战争要地

临清地处鲁西，位置本不引人注目。临清有县，始于后魏。自隋开永济河，其地遂与运河为邻^①。但隋唐以来废置相寻，统属无

定²。临清地位的提高，始于元朝。元大都（今北京）供给皆仰东南转运。会通河、通惠河开凿，东南财富可经水路直达大都。这样，处于会通河与卫河会合处的临清，一下子便成了水路要冲。临清自然地理形势的变化，导致了经济地位的提高，而更重要的，则是临清政治地理形势的变化。元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都于大都，全国政治中心向北转移。山东成为大都的南部屏蔽，是联络河北与江南的纽带，而临清适当其会。元朝末年，田丰、毛贵率起义军扫荡山东，元政权南北的联系便被切断，南方已无法控制，朱元璋的势力从而得以发展。其后，朱元璋命将北伐，亦先下山东，会师于东昌、临清之境，然后进逼大都。

明朝洪武初，东昌路（今山东聊城市）改为府，隶山东布政司，临清县成为东昌府的属县³。明朝虽然定都南京，但由于北平曾有辽、金、元相继作陪都或首都，长达四百余年，已经成为北方政治、军事重镇。它对控制蒙古和掌握北方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要保证全国统一并向北发展，山东作为南北联系的纽带仍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临清因而为人瞩目。洪武年间，朱元璋曾先后派信国公汤和、西凉侯濮英以及汉、卫、谷、庆、宁、岷诸亲王练兵于临清，并在临清储粮，以给训练之兵。⁴朱元璋死后，惯于征战的燕王朱棣拥兵北平，威胁着帝位。建文帝同样把临清作为控驭北方的桥头重镇，曾于建文三年（1399）三月命都督徐凯练兵于临清。⁵靖难之役，朱棣南下，也以临清、东昌为必争之地。其初，燕师克德州、据临清，谋下济宁，以东昌之败，不得已还师。官军正因在山东取得了胜利而阻挡了燕军。同样，燕师也正因于建文四年越过这一障碍而驱师徐州。至此，虽有长江天险，也无济于事了。

永乐迁都北京，使政治地理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山东重新处于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财赋之地相联络的纽带地位。大学士丘浚说：北京“南则以临清为辅，坐镇闸河而总扼河南、山东之冲，又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两京之咽喉”。⁶永乐九年（1411），会通河疏浚以

后，运河成为漕粮的主要运输孔道，临清的地位更加突出。顾炎武认为，山东要塞之地凡五，而临清首当其冲^⑦，就是因为“积贮，天下之大命也”，如有“不逞之徒，乘间窃发，八百里中，泥丸可塞也”。^⑧

明初，临清设有守御千户所。正统末年，土木之变发生，朝廷以临清为必守之地，“公卿咸议，临清要地即不守则燕蓟不可居，而中原不可保”。^⑨于是派平江侯陈豫出镇临清，并接受陈豫的建议，于景泰元年（1450）调济宁左卫五所来临清，合原驻军为卫^⑩。兵部尚书于谦建议在临清筑城。同年，在巡抚洪瑛与陈豫以及都御史孙曰良主持下，在会通河与卫河会合处东北方的“闲旷之地”建成了临清城。城以砖^甓之，高三丈二尺，厚二丈四尺，周九里一百步。有四门，戍楼八，戍铺四十六，匝城凿隍，深广皆九尺^⑪。弘治八年（1495），兵备副使刘壁又增建了临清城的女墙、月城，可谓蔚为壮观了。

但是，临清新城并不紧靠会通河岸，不仅对控扼漕运不便，即其繁胜也因而远逊于二河会合处的中洲。盖会通河在靠近卫河附近分为两支，分别在南北两处流入卫河，因此在会通河与卫河之间形成了一块周围环水的狭长陆地，这就是中洲。临清的真正要害在中洲。大学士丘浚说：

惟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易泄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河，此其要害也。

东控齐青，北临燕赵，且去边关不远，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为国家深长之患者，宁有而弃，毋无而悔。书生过虑，请跨河为城，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而包围巨网在于其中，设官以司启闭，屯兵以为防守，是亦患患豫防之一事也。^⑫

他所说的跨河为城，即在中洲设城。中洲本有土城，为明正德年间筑。中洲为集中之地，居民繁盛、正德六年（1511），刘六、刘七，造反，兵及博平、夏津，陷高唐、武城。朝廷命兵部侍郎陆完驻兵临

清加以镇压。兵备副使赵继爵在中州掘堑筑土以及卫城外之民，当时称为边墙，亦称为罗城。嘉靖二十一年，巡抚曾铣根据丘浚跨河为城的建议，将原边墙拓而广之，历时四十有六日，费四万金。^⑨城为土质，延袤二十里，跨汶河（即会通河）、卫河二水。史称“池之深阔，垣之高广，一如砖城，而~~圆滑~~^⑩之宏丽峻敞实过之”。^⑪俗称此城为玉带城。

成化二十年（1484），朝廷设临清兵备道。由按察副使或佥事，于诸要害处出使一二人以分别掌管不同工作，称道，有提督学道、清军道、驿传道、分巡道、整饬兵备道等。兵备道职在理问刑名，操练人马，协同抚按控制一方。当时东昌府，临清高唐二州，聊城、清平、茌平、博平、堂邑、冠县、馆陶、邱县、夏津、武城、东阿、平阴、阳谷、寿张十四县，平山、东昌、临清三卫以及五个巡检司都受管^⑫。兵备道所部州佐主警，卫佐主操，百户主牧，有马兵、步兵、卫兵及新军壮勇、守城民兵，总数二千有奇。^⑬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临清设协镇署，置参将，崇祯十一年（1638）改为镇，莅以总兵。据州志记载，“临镇原有十三营，共兵一万三千余名”^⑭，大概是驻兵最多的时期。在临清驻扎重兵，除因它的经济、战略地位重要外，还因为这里聚集了大量人口：运军、商民和一大批为漕河服务的人员。诚如明礼部侍郎许成名说：“方贡绎骚，供荐委填，应之非道，民力奚堪！”^⑮一旦失去控制，情形将是十分可怕的。

临清的战略地位，是全国的政治地理形势决定的。这一点明以后也没有改变，李自成起义、太平军北伐、宋景诗、张总愚、义和团甚至国民革命军北伐诸大事，莫不牵动临清。清乾隆时的王伦起义就在临清。

二、漕运咽喉

国家要维持政治、军事机器的运转，粮饷储积须臾不可缺少。统治阶级的享用开支也是巨大的。元代以后，如何把江南财赋之地的大量物资运输到北方，始终是大问题。不过，元代以海运为主，兼以河运，即使在会通河开凿后，河运所占比例仍然很小。明初，供给辽东、北平军饷仍以海运。永乐迁都北京，粮饷运输逐渐繁重。但会通河已于洪武二十四年因黄河决口而淤塞。永乐初，用可载重三百石以上的浅船运输北上。劳费甚巨。永乐九年（1411），宋礼疏浚会通河。十年，岁以河运百万石，海运则三岁两运。¹⁸到永乐十三年，竟罢海运。

据《明史》记载，宋礼建议造浅船二千余艘，以供漕运，开始时岁运二百余万石，后来逐渐增加到五百余万石。¹⁹到成化年间，岁运漕粮稳定在四百万石，成为定额，但这数字仅指运赴京通的正粮。实际运京通的漕粮，除例折外，正耗共计五百一十八万九千七百石之多。²⁰

表一

单位：万石

年 份 (公元)	永乐 12 (1437)	永乐 16 (1418)	宣德 8 (1433)	正统 2 (1437)	景泰 2 (1451)	景泰 7 (1456)	天顺 4 (1460)	成化以后
漕粮数	50	460	500 余	450	423	292	435	400

资料来源：郑晓《今言》卷三。按此表所列数字与历朝实录所载略有出入。

除此之外，还有江南常、苏、松、嘉、湖各府白粮十八万八百六十余

石，山东、河南粟、米、豆、麦又若干石，不在四百万石之数。^④根据丘浚提供的数字“今日十八人驾一船，一船载米三百石”计算，每年经过运河的船只仅漕船一项就达一万只到一万六千只，运军达十万人到十六万人之多。^⑤这与许多文献所记载的数字是一致的^⑥。各地漕船至京皆有定限。自三月一日至六月一日之间，从北直隶以至于江南漕船都必须到京，后者罚俸，前者进秩。所以，三月到六月前后是漕河中最繁忙的季节。每年有如此众多船只、人口通过运河，便造成了运河沿岸城市的迅速的畸形的繁盛。

临清的特殊之处在于，“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⑦临清实际是一个边路转运站。其表现之一就是临清粮仓的建立。

临清粮仓最早建于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同时派兵三千以戍守之。^⑧洪武二十四年（1391）五月以诸王练兵临清，又储粮十六万石于兹，以给训练之兵。^⑨会通河疏浚以后，大运河成为主要粮道，“以程远物多，因而率五七百里严储峙之区”。沿运河两岸建立徐州、淮安、德州、临清、天津等“水次仓”，以资转运。临清仓，即洪武之旧^⑩至宣德中，又增造临清仓，可容漕粮三百万石。^⑪盖永乐、宣德间漕运曾先后实行支运法。支运，即民运粮就近交纳各仓，再由官军从仓中支取运送至京、通二仓。比如，宣德四年复行支运法，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于淮安仓；苏、松、宁、池、庐、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官军分别就近支取各仓粮运至京、通。支运法使民粮就近入仓交纳，大大节省了劳费。“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支”，“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⑫这样，各仓就成为吐纳暂存的必要一环，而临清仓在水次五仓中的地位尤为突出。请看下表：

表二

仓址	天津	德州	临清	徐州	淮安
仓名	天津 天津左 天津右	德州 常盈*	临清 广识** 常盈	永福 广运	常盈
仓数	3	2	3	2	1
建仓时间	永乐二年 (1404)	宣德五年 (1430)	永乐四年*** (1406)	永福洪武元年(1368) 广积永乐十三年(1415)	永乐十三年(1415)
万历时所存仓库数	18	28	48	4	2

资料来源：明会典卷 21 户部 8

*《天府广记》卷十四：德州仓曰常盈。《明史·食货志》：德州仓曰常丰。

**《永乐实录》十三年六月：移德州之广积仓于临清。

***洪武六年即设仓，称旧仓，见注②

明户部主事胡尧元的《仓部题名记》说，永乐以后，临清“岁受山东、河南之赋几三十万，以节漕力，以望京储，厥为重哉！”^③临清三仓都建于临清砖城未建时。景泰建城后，仓在城内。竟占全城面积四分之一，各仓以军守卫，官给营房，其军原皆方国珍部下，因而当地人俗称守仓军为“蛮子营”，嘉、万间仍相沿不改。临清、广积二仓俗称大仓，共“寄留备缓急之虞，补缺够京通之数，时给续挽牵之食。”常盈仓俗称小仓，其储“乃有司卫所官吏军旗暨养济月粮米也”。万历时，大仓岁入山东河南并大名州县两税二十万余石，小仓岁入山东州县所供米麦六万余石。^④自永乐年间起，政府每年派户部主事一人督理仓务。自宣德至正德，督仓务者共有七十人，其中员外郎九人，主事六十人。宣德至正统，三岁一代，景泰至正德，

每仓八人，成为定制。当时称他们的工作是“司内宰之分职，而外方伯之掌”。在临清设有督储分司，作为办公机构，但开始时他们并不掌管仓库，仓库由临清县暨后来的临清州管理，其后由于“军需横耗制”，仓库逐由户部官直接控制。^⑨三仓还设有大使、副使、攒典数人，斗级数十名，修仓夫二百名，以管理具体事务。^⑩

除此外，自宣德末年，通京各仓始监督中官，后遍及徐、淮、临、德各仓场。^⑪这些中官往往营私舞弊，骄横无道。成化二十三年（1487），曾下令京、通仓并淮安、徐州、临清水次各仓场内官原设者存留，添设者撤回，正德十六年（1521）嘉靖皇帝即位，复起孙交为户部尚书，孙交力主尽罢监督仓场中官，并临、干、徐、淮诸仓一切勿遣。嘉靖尚未有决心全部裁撤，只下令临清仓场监督内臣只留现在二员，着廉洁行事，不许纵容下人生事害人，以后不必添补而已。嘉靖十四年（1535），监督中官王奉、李顺互以奸赃讦奏，下法司按问。给事中管怀理因言：“仓场钱谷，皆户部事。今参用内官，惟肆贪？无裨国计，请悉撤回。”于是督理仓场中官才尽行撤回。^⑫

临清除上述三仓外，还有水次仓，在中洲马市街，洪武年间创建，名曰水次兑军仓，又有预备仓，在县东帅府旧址。^⑬

宣德六年（1455），行兑运，江南民不再运粮入仓，而是将粮运至淮安、瓜州兑与卫所官军，运载北上，但支运并不废止。正统初，漕粮四百五十万石，兑运二百八十余万石，徐、淮、临、德四仓支运一百七十万石，占十分之三四。成化中岁运额四百万石，其中兑运三百三十万石，到了成化九年，又将四仓支运七十万石之数全部由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长运至京、通。但，此外仍有交兑不尽者，依旧由民运赴四仓。^⑭

临德二仓所储预备米，岁入十九万石，其中临清广积仓山东五万四百石，河南六万石，共十一万四百石。积之十年，临清仓可得一百一十万四千石。如果遇有灾荒府分，其应纳之粮可以停免，而于邻近府分照数接补，候丰年再归还。但如果各府均受灾，无处接补，

那么就动用临清、德州二仓的贮备粮，支运说通，务使漕粮足于四百万石之岁额。^⑨但是，预备粮储，久无支销，以致陈腐。正德二年（1507），令浙江、江西、湖广三省卫军赴临德等仓每年支运三十五万石。^⑩，以使仓粮更新。

兑运法实行后，运军长运于京，临德诸仓所储渐少，而京通仓则多不能容。于是，临清、德州、河西务仓各废弃三分之一，同时扩大京仓。成化年间，临清城外的预备仓废置不用，而用城内仓库储存预备米。^⑪万历时，以临德仓有所储，而徐淮仓无粒米，便规定，临德储足五十万余石，其余存于徐淮二仓。^⑫但这时，漕粮折银渐多，万历三十年。漕运抵京仅三十八万余石。京军月俸、边军给饷已变为银米兼支。官兵除领得本色粮米外，仍需以银买米以供消费。是漕运虽减，而消费未减，可以想见，商人贩米的规模是扩大了。天启、祯，多事之秋，天下萧然烦费，自运河北上物资的实际数量只会扩大。

总之，临清不仅是漕粮的必由之路，而且它的仓场还起着粮食盈亏的调节作用。丰由储，欠由支，一如洞庭湖调节着长江的水量。

临清因为地处运道，便于运输，在明清两代还担负着向北京供给营建所用砖瓦的任务，是重要的砖瓦烧造地之一。自永乐时起，便在临清设立了工部营缮分司，派工部侍郎一员管理烧造，提督收放。

临清所烧的砖有城砖、副砖、券砖、斧刃砖、线砖、平身砖、望板砖、方砖，二尺、尺七、尺五、尺二四样凡八号。后来只派黑白城砖及斧刃砖，^⑬每年烧砖一百万个左右。北京营建长年不断，烧砖运砖也就成了固定任务。用砖最多的一是永乐，一是嘉靖。嘉靖时，砖料价银向河南、山东二省，北直、南直、安徽、浙江的一些府、州征收，派官解赴临清发给。^⑭

起初，砖料运输全靠运河中官民船只带运。其始于洪武时。当时令各处客船量带沿江烧造官砖，于工部交纳。永乐三年（1405）规

定，船每百料带砖二十个，沙砖三十个。天顺间，令船每只带城砖四十个，民船依照梁头每尺带六个。到嘉靖三年（1524），规定粮船每只带砖九十六个，民船每尺带十个。十四年（1535）更增加到粮船每只带一百九十二个，民船每尺带十二个之多。官民商船派带砖料是强制性的，如有损失，还要责令带运者赔偿。但是，也有特许免带砖料的。弘治八年规定，“一应官民马快运粮等船”均应带砖，惟“荐新进鲜黄船除外”，盖为保障皇帝享用也。此外还有雇船带运的办法。永乐时曾命河南、山东、直隶各处巡抚督金所属军卫、递运所等，量起人夫，措置车船，由窑运至存放场所，官府给以适当脚价。嘉靖四年，则命令临清砖料顺带未完者雇船运解，其脚价由各司、府、州、县摊出。砖料所过地方还要应付夫糜。^⑨运砖成为运河上运军商民的沉重负担，成为无法逃脱的额外差役。张瀚在《暂免运砖以恤运军疏》中说：“粮运带砖，始于一时权宜，今已遵行年久……往年河渠通利，加带不胜苦难，然数止四十八块，不令过重以伤挽力。继因工作迭兴，用砖渐多，加带亦渐增益，驯至载重难行。”因此他要求暂免运砖。^⑩然而这种呼吁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同样，造砖也成为临清等地军民的沉重负担。在烧造中，营缮分司官将烧造委诸从吏、军尉。这些人从中刁难窑工，苛索贿赂，以致“估溢而器不精”，“作业剧而费不偿”。“财诎于县官，而赂出于陶人”。因而“公私交病”。^⑪尽管有清官干员力行整饬，其基本负担也是难于免除的。另外，烧砖需用大量的柴薪，这便使临清和附近东昌府所属诸县，柴薪短缺，价格高昂，成为当地军民的又一困难。^⑫

丘浚说：“会通一河，譬则人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而立有死亡之祸。”^⑬漕运粮道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万历年间，仓场侍郎赵世卿针对当时漕粮减少的情况说：“太仓入不当出，计二年后，六军万姓将待新漕举炊。倘输纳衍期，不复有京师矣。”^⑭粮储断则京师不存并非恫吓之语。

既然如此，明朝对于运河漕路是十分重视的，而临清则为漕路

之关键所在。会通河是一项了不起的水利工程，宋礼筑坝，遏汶水等水，加大了会通河的流量，从而使其运载量大大超过元代。自南旺至临清地隆九十尺，其间置闸十七座以控制水位。为了保证运路的畅通，政府设有专官管理。自瓜州、仪真至通州河道皆属漕抚兼理，下设郎中二员，分南北专理之。各洪、闸又各有主事一员负责。^⑨修理洪闸、疏浚河道，建筑堤防，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同样给沿河人民带来极大的负担。谢肇淛《挑河行》写道：

堤遥遥，河弥弥，分水祠前人如蚁。鹑衣短发行且僵，尽是六郡良家子。浅水没足泥没膝，五更疾作至夜半。西风天雨霜，十人九人趾欲断。……五百河犹可，里胥怒杀我。无钱水中居，有钱立道左。……道旁涩草炊无烟，水面浮冰割人膝……君不见会通河畔千株柳，年年折尽官夫手。^⑩

正是当年挑河工地的生动记录。

大运河既是一条经济命脉，又象一条难以摆脱的绞索。它缠绕着庞大的帝国，缠绕着千百万军民。数百年来多少治世能臣为之殚精竭力，多少沿岸军民为之流血流汗。究其所始在于自明代永乐以后罢弃海运，专赖河运。

其初，永乐五年，有人上言：“北京军饷河运不能给，须兼海运”。“请于太仓设海道都漕运使司，择文武大臣中公勤廉干者充使，行移如布政使司，提调各卫所海船，并出海官军”。看来当时不仅有海船，而且有出海官军，可供运输。但是朱棣根本不同意这一建议，“令再议”。^⑪其后，宋礼上言，海道险远，远船多有损坏漂没。他说：“计海船一艘，用百人而远千石，其费可办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人可运靠”，“利病较然”云云。^⑫但这一估计仅仅是机械地计算，而未顾及长远的得失。元人的海运，清朝末年的海运都证明海运不仅可行，而且其损失远远低于河运，费用也远远小于河运。^⑬以朱棣之雄才，可以派大规模船队远航西洋，而不能解决近海漕运问题，不亦很奇怪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朱棣好大喜功

而少重实效于兹又见一例。专赖河运不能不说这是明代君臣的一项重大失误。

三、商业都会

会通河疏浚后，漕粮贡赋以外，大量商品通过运河南下北上，成为南北重要商路。

首先，官府允许漕运军人船只附载自己的货物。洪熙元年（1425）的一道敕谕说：“官军运粮，道远勤劳，寒暑暴露，昼夜不息，既有盘浅之货，粮耗米折所司又责其赔补，朕甚悯之。今后除运彼粮外，附载自己什物，官司毋得阻挡。”正统三年（1488）又重申：“顺带土货以为盘费，不许沿河巡司官军人等生事阻挡。”^⑨对于漕船所带之货，各钞关免征税钞。弘治时，每船带物限十石，到万历时则至六十石之多。^⑩以前述漕船约一方二千只计，则弘治时漕船所带土产约为十二万石，万历时则多至七十二万石。实际的数字可能要多于上述估计，因为免税带货是有利可图的。

其次是有大批商船往来于漕河之上。这从明代于临清所征的大量船料商税可以看出。《明史·食货志》说：“关市之征，宋元颇繁。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资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⑪洪武时规定，商税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似有保护商民之意。至于朱棣，则说：“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⑫则在企图限制商品经济发展了。永乐二十一年（1423），山东巡抚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监榷一年，以为定额。”^⑬朱棣批准了这一建议。税有定额，虽便监督，但定额长期不变，往往脱离实际，反映封建统治者缺乏商品经济的观念。临清正式设关征税是从宣德年间开始的。当时，在各商贾辏集之地设钞关凡七所：

表三

关名	漷县	临清	济宁	徐州	淮安	扬州	上新河	浒墅	九江	金沙湖	北新
设年	宣德四年 (1429)	宣德四年 (1429)	宣德四年 (1429)	宣德四年 (1429)	宣德四年 (1429)	宣德四年 (1429)	宣德四年 (1429)	景泰元年 (1450)	景泰元年 (1450)	景泰元年 (1450)	景泰元年 (1450)
今治	通县、香河 之间旧县	山东	济宁市西	徐州市	江苏	江苏	南京市西	苏州市西	江南	湖北武昌	浙江
备注	正统十一年 (1446)移 至河西务	一度废， 弘治初复设	后废	后废			后废	成化四年 (1468) 废，七年 (1471) 复设	同上	后废	

资料来源：《明会典》卷三十五等。

宣德四年(1429)规定。各钞关差御史及户部照钞法例监收船料钞。“……惟装载自己米粮薪刍及纳官物者免其纳钞。”^⑨临清、杭州除征收船料钞外，还要兼征商税。^⑩但后来，各钞关都是船料钞、商税兼收^⑪。所谓船料，是船只大小的一种计算单位。比如，遮洋船头长一丈一尺，梁头十六座算作一百料。宣德四年规定，每船百料收钞一百贯。景泰时减至十五贯。至成化时，因为船料难于核定，依船头广狭为收税根据。其税钞钱中半兼收。后来也有每岁本折轮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二者。^⑫万历十一年(1583)议准，一应商货，如在临清发卖者，照旧全税。在四外各地发卖者，临清先税二分，至卖处补税四分。其赴河西务、崇文门卸卖者，临清先税二分，然后即发红单注明某处发卖，给商执至河西务、崇文门外，税八分，共足十分之数。^⑬其所榷本色钱钞归内库以备赏赐，折色银两则归太仓以备边储。弘治六年(1493)今河西务、苏州、九江、临清钱粮多处，户部各差官一员；淮安、扬州、杭州钱粮少处，南京户部各差官一员，俱一年一更，以专门管理钞关榷税。现将各钞关历年船料商税收入列表如下：

表四

年 代	项 目	单位: 银, 两; 钱, 贯, 文						资 料 来 源
		湖 西 务	临 清	淮 壁	九 江	杭 州	扬 州	
* 嘉靖六年 (1527) 以后, 万 历以前	钞	119 万余	1260 万余	586 万余	293 万余	190 万余	300 万余	169 万余
	船料牙税银	4000 余						
	商税正余银	4000 余						
	一条船二税银	14900 余						
	船料商税 正余银		83800 余	39900 余 (元商税)	15000 余 (无商税)	36800 余	22700 余 (无商税)	1290 余 (无商税)
	钱		2520 万余	1173 万余	689 万余	381 万余	600 万余	338 万余
万历以前	旧额银	46000	83806	45000	25000 余	40000 (北新)	23000 (两淮)	13000
天启元年	新增银			22500 (天启二年)	12500 余	20000	7600	2600
天启五年	新增银		20000	20000	15000	10000	20000	
崇祯二年	合 计	(议减 10000) 36000	(议减 20000) 63800	87500	57500	80000	45600	88929

* 此资料原来未注明年代, 其中无上新河、济宁、徐州、金沙洲诸关, 因为这些关已经废置。考上新河关废置年代最晚, 在嘉靖六年, 故断此材料为嘉靖六年以后的。

从上表可以看出，临清的商业地位是很突出的。即使在船料商税银议减之后数字仍然很可观，仅在苏州、杭州、崇文门之下。万历六年。山东一省税课折银只八千八百六十两。仅及临清一州的十分之一稍多。^⑧

宣德十年，朝廷在临清设立户部榷税分司。以督理关税，以御史或郡佐（通判等官）充任专职。正统及成化间曾两次罢废不置，景泰初及弘治初又两次恢复。于是，每岁出户部主事一人，督理船料商税，具体收税的是临清会通税课局，而以州印票防之。所收分季解京，以充内帑。^⑨万历以后，朝廷命户部贵州清吏司带管在京各衙门仓及各边镇关钞。^⑩

如此大量的商税收入，刺激着封建统治者的贪欲。弘治中，倪岳上疏说当时：

“改委户部官员出理课钞。其间贤否不齐。往往以增课为能事，以严划为风力，筹算至骨，不遗锱铢。常法之外，又巧立名色，肆意诛求。船只往返过期者，指为罪状，辄加科罚。商客资本稍多者，称为殷富，又行劝借，有本课该银十两，科罚劝借至二十两。稍有不从，轻者重加笞责，重则坐以他事，连船拆毁，客商船只号哭水次……其科罚者……率皆借名入己，……此等官既出部委……是以肆无忌惮。”^⑪

看来，乱罚款，乱摊派，乱征求资助的事明中期已然，这是妨碍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股封建势力，自隆庆以后，“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累诏察革，不能去”。^⑫万历时，两宫三殿灾，营建不赀，开始增设矿税，于是，百税杂出，征税中官遍布天下，临清是被害地之一。

万历二十七年，中官马堂、陈增因争夺在山东征税的地盘而发生冲突。万历皇帝为之和解，命马堂征税临清，陈增征税东昌。马堂始至临清，诸亡命从之者数百人，白昼锒铛夺人产，抗者辄坐以违禁之罪。仆告主者，给以所告的十分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

远近为之罢市。州民万余纵火焚烧马堂署邸，击毙其党羽三十七人。织筐夫王朝佐，慨然承担责任，以免众人之难。^⑧当时舆论认为王朝佐应从宽处理，但巡按张大谟、抚臣刘易从、道臣马怡，都与马堂同党，逐列王朝佐罪状加以杀害。矿盐税使的劣迹是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丑恶的集中表现。马堂是它的代表之一。王朝佐则成为千载传颂的英雄。其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正在北上京师途中，他曾从时人的口中听到这场壮烈的斗争。^⑨征税宦官对各地商业的破坏是空前的。当时记载，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等钞关，由于税使的横征暴敛，使商旅裹足不前，商税急剧减少。请看下表所列各关所征钞税减少情况：

表五

单位：两

年分	万历二十五年 (1597)	万历二十七年 (1599)	万历二十八年 (1600)	万历二十九年 (1601)
税额	417500	340549	306132	262800
百分比	100	81.57	73.33	62.99

资料来源：《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赵世卿《关税亏减疏》

在临清关，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盘验抽罚，资本尽折，独存两人。临清向来段店三十二座，闭门二十一家，仅余十一座。布店七十三座，闭门四十五家，仅余二十八座。杂货店六十五座，闭门四十一家，仅余二十四座。^⑩自税使四出，“虽平昔富庶繁丽之乡，皆成凋敝”。这种情况，只是在万历皇帝死后才稍有好转。

商业给临清带来了繁盛。本来，山东地广人稀。明初曾移山西泽潞二州之民往临清等地。会通河疏浚后，临清为“漕挽之喉，为萃货之腹，舟车络绎商贾辐辏，天下商旅出乎其途”。^⑪作为商业都

会，临清不仅“冠于济西”。而且在全国也有相当地位，利玛窦称其为“著名的港口”。^⑧

小说《金瓶梅词话》曾写到，来保“往临清马头上，将封寄店内布货，尽行卖了八百两银子”。又写到，“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蚕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马头迎着客货而买。”^⑨可见，临清已经成为公认的一个商品集散地。大量的人口集中于临清，本地所产粮食不敷用，必须靠商人贩入。根据各种书的记载，临清的市场上除粮食、布疋外还有棉花、丝绸、瓷器、皮毛、铁锅，梨、枣等等。

临清最繁华的地方在中洲，即会通河、卫河二水会合处，周围环水之地也。李东阳《咏鳌头矶》诗说：“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⑩正所谓“连城则百货萃止，两河而万艘安流。”“虽无名山之观，而亦非僻壤可比也。”^⑪所以，当时有人说，虽然身在临清，而“居人只说是苏州”。^⑫临清的段店、布店、杂货店已如前所述。其桥梁，庙宇也装点了它的繁盛。临清地域并不大，但仅于文献记载的明代桥梁就有永济、同津、广积、狮子、宏济、通济、米公以及浮桥八座、渡口八处。庙宇则包括释、道、回教，仅明代的就有二十三处之多。城隍、社稷、先农、文昌以及乡区小庙、各种杂神庙均不计在内。

临清的繁盛，使得“四乡之人就食日滋”^⑬，人口迅速增加。据康熙《临清州志》记载，洪武时临清县只有一千五百二户，八千三百五十六口。万历二十八年迅速增至三万三百二十三户，六万六千七百四十五口。崇祯十三年有丁达六万三千八百一十九人，后因战乱逃亡五万三千一百七十，所余尚一万六百有奇。^⑭这是指固定人户。此外，“四方商贾多于居民者十倍。”^⑮由于临清地位的重要和人口的增加，弘治二年（1489）从巡抚山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钱铖和巡按监察御史向暉之请，升临清县为州，“改附官制，增长官属。

悉如全设上州事例”。上隶东昌府、下辖馆陶、邱县二县。^⑨

临清的民风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其特点是逐渐远离了纯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请看旧志中对临清民风的描写：

质直怀义，有古风烈。（隋志）

士风彬彬，贤良宏博。（博平旧志）

其民朴厚，好稼穡，务蚕织。（元濮州志）

俗近敦厚，家知礼逊。（元志）

□俗节俭，人多读书。（同上）^⑩

再看看明至清期间的情况：

舟车毕集，财货革止，衣冠文物，胜于他邑，俗近奢华而有礼，士务功名而有学。崇信礼让，重廉耻，不好健讼。而服贾之民恒居十之六七。（州志）^⑪

吾清习奢土瘠，逐末者十室而九。^⑫

兗东三郡，濒河招商，舟车辏集，民习奢华，其俗也文若胜乎质。^⑬

盖此地五方走集，四民杂处，商贾辐辏，士女嬉游，故户列珠玑，家陈歌舞。饮食燕乐，极耳目之欢。至于本境人民逐末者多，力本者少。^⑭

乃民贫而俗尚不易，仆亦绮罗，婢皆翡翠，陈歌设舞，不必缙绅，婚丧之仪越礼制而不顾，娇奢相效，巧成伪风，岂独外腴中枯已乎？^⑮

相反，离临清仅数百里的周围州县，其民风相对说来就没有什么变化。

民务耕稼，士习诗书，节俭之风自古而存。（夏津）

士谦顾朴野，百姓务稼穡。（邱县）

民朴实，无浮华。（馆陶）

朴厚而茂，有秉心塞渊之旧俗。（堂邑）

俗近朴约。（清平）^⑯

可见，商业经济对农业社会的冲击是十分猛烈的。

经济的发展还为临清的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大学士李东阳说：国家定鼎北方，百年于兹，文轨玉昂与弦诵之声日益月盛，固人材之渊薮也。”^①礼部尚书王崇庆说：“吾见是地，有衣冠人物之盛，有甲科先后之继，有商贾辐辏之繁，蔚乎盛矣。”^②学士张元桢说：“兹州天下重镇，密迩京师，玉帛万国，舟车攸萃，而文化沾被，视他邦为先。”^③由于地理之便，经济的发展给临清带来了大量的财富。有了财富，则会有文化，这是顺理成章之事。

临清的兴盛由于大运河的开通和明代的漕运政策。清朝统一全国后，仍然采用明代的漕运制度，东南财赋仍然大量从大运河北上。因而临清的繁荣有增无减、乾隆十一年，临清由州升为直隶州，再次在政治上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咸丰五年，黄河北徙，截断汶流，运道阻塞，漕粮多由海运，同时，官办漕运行之既久，弊病百出，制度尽坏，反不及商运省钱省力。于是官办漕运逐渐为商办（包括洋商用火轮）海运所取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河运便完全消失了。

临清随会通的开凿而兴起，随漕运、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运道之不存，临清亦迅即衰落。临清作为古代经济名城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了。然而临清的繁盛为什么不能维持？究其原因，其繁盛完全由于外部条件所促成。其本地既无特产，其百姓又少特别技艺。四方就食之民差不多都是为运道服务，赖运道而生存，它们始终处在被运道这一外在条件所左右的地位。临清的繁盛并非自身的繁盛，而是运道的繁盛，漕运的繁盛，一旦这个外部条件消失，临清的繁盛便迅即消失。临清的兴衰，不亦可以作为今天的发展城市经济的一种借鉴吗？

【注释】

①《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②万安等《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四：“后魏太和间于县（指今清源县）西四十里置临清县，属魏州，北齐废。隋初复置，属贝州。大业初属清河郡，唐属贝州，大历中属瀛州，又析属永济县。宋初，以永济省入临清。后废为镇，寻复置，属大名府。金属恩州，元属濮州”。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同。

③康熙《临清州志》卷一建置。《明史》卷四十一地理二同。

④《明太祖实录》十二年二月、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四年五月。

⑤张廷玉等《明史》卷四恭闵帝纪。

⑥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十五。

⑦⑧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五山东，形势。

⑨《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四山东五，临清州。

⑩民国《临清县志》第三册建置引《东昌志》。

⑪《临清县志》第十册艺文，工部郎中王良柱《重修临清卫记》《明史》卷六十六，兵二：“兗州左护卫，为临清卫。”

⑫《临清县志》第三册，建置。《临清州志》卷四，王直《临清建城记》

⑬《明经世文卷》卷七，《漕运河道议》。

⑭《临清县志》第十一册艺文，方元焕《创建土城记》。

⑮《临清州志》卷一，城池。

⑯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卷十兵防。

⑰《临清州志》卷三，兵防。

⑱《临清州志》卷四，艺文，许成名《兵备题名记》。

⑲⑳《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宋礼传》。

㉑《明史》卷一百五十三，《陈豫传》。按，《明史》卷七十九，食货三载：“平江伯陈豫继之，颇增至三千余艘，……可三百万余石。”龙文彬《明会要》引《食货志》则为“可五百万余石”。《明宣宗实录》五年六月，“运河转输漕粮达五百万石”。

㉒万历《明会典》卷二十七，户部十四。《明经世文编》卷四十，马昂《会议漕运事宜》，李东阳《重修通州新城记》。

㉓㉔郑晓《今言》卷三，卷二。

㉕《明经事文编》卷七，丘浚《漕挽事宜》。

㉖查慎行《人海记》卷下：“景泰以前，漕船无定数，天顺以后，定船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只，官军十二万一千五百余员名。至崇祯中，额船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三只，米四百万石，每舟正米三百三十石，每石加耗米九石八斗。”（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又万历《明会典》卷二十七，嘉靖时漕船为一万三千一百余只，《天府广记》卷十四，军旗十二万一千七百一十一名，每船十人，一人正米三十七石。《明史·食货志》略

同。《隆庆实录》六年十一月：漕船缩减为力只上下。

^②王直：《临清建城记》，《县志》第十一册，艺文。

²⁵《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五月戊戌。

²³见《临澧县志》第十二册艺文，阎因《修理三仓记》。

^{28 30 33 39 41 42 43 52 54}《明史》卷七十九，食货三。

³⁸《明宣宗实录》宣德六年九月；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四，仓扬《明史》卷七十九同。

^②③《临清州志》卷四，艺文，胡尧元《仓部题名记》。

^②《修理三仓记》。按，《临清州志》卷一职官五：广积，临清三仓，岁额河南、山东诸府米“本折旧贮常百万”。常盈仓“岁额济南诸府麦米五万石有奇，为临清任城卫俸，旗军孤老粮”。数字不同。

^③《明会典》卷二十一，户部八：“天顺七年奏准……山东东昌府临清仓存留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撰典一名，斗级二十名。二仓存留修仓夫匠二百名。”

^③《明会典》卷二十一，户部八，《明史》卷十七，世宗本纪一，卷一百九十四孙交传。

《临清县志》第三册·建置。按，水次仓或为宣德七年以后建。《明会典》卷二十七，宣德七年，会官军运粮，各于附近水次交兑。

³⁰《明会典》卷二十七，户部十四；陈仁锡《皇朝世法录》卷五十四。

¹⁰⁴⁵ 1647《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工部十。

⁴《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张无洲先生台省疏。

^④《临济县志》第十一册，艺文，于慎行《司空大夫刘君陶政记》。

^④《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税，附临砖。

⁵⁰《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十三引《海运论》。

②③④《天府广记》卷十四。

^④《临清县志》第十三册，艺文。

[◎]《清輔通志》卷一百五、一百六。

⁶⁶ 參見《明史》卷八十一，食貨五。

^⑤《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十月甲戌。

^⑩⑪⑫《明会典》卷三十一，户部二十二。
^⑬《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按，明徐复作《花当阁丝摸》：“钞关：临清、河西务、浒墅、九江、淮安、扬州、杭州、金沙州，内惟河西务、杭州、金沙州税货，余止税船料。……性收塘税货在船上。”与此稍有出入。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

◎《晚清四志》第八册 雜志附

◎《明会典》卷十四·户部二

- ⑦《明经世文编》卷七十八，倪岳《会议灾异陈言》，《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六，“倪文
毅岳曰”，大意相近。
- ⑧《明史》卷三百五，陈增传。
- ⑨⑩《利玛窦中国礼记》第十一回。
- ⑪《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赵世卿《关税亏减疏》。
- ⑫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 ⑬⑭王俊《临清直隶州志序》（乾隆十四年）
- ⑮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一回。
- ⑯《临清州志》卷四，艺文。
- ⑰于普明《临清州志序》（康熙十二年癸丑五月仲夏）。
- ⑱《临清州志》卷四，艺文，秦炳《大悲寺》诗。
- ⑲《临清县志》第十一册，文艺，程敏政《东义？记》
- ⑳《临清州志》卷二，赋役。
- ㉑《临清县志》第十一册，穆孔晖《善锐亭记》。
- ㉒《临清州志》卷四艺文。王？《临清州治记》。
- ㉓万安等《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四。
- ㉔㉕光绪《山东通志》卷四十，疆域志第三，风俗。
- ㉖《临清县志》第十二册，艺文，胡悉宁《豁免土税碑记》（康熙二十五年）。
- ㉗贺王昌《临清州志序》（康熙十二年）
- ㉘《临清州志》卷四，艺文，李东阳《修孔子庙记》。
- ㉙同上，王崇庆《修庙学记》。
- ㉚同上，张元桢《儒学新修记》。

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

· 许 檨

宋元以来直至明初，我国北方经济远远落后于江南。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京师所需及北边军用，除每年供应“百官六军之食”⁽¹⁾的数百万石漕粮需自南方各省北运外，“公私一切应用货物”⁽²⁾也多需仰给东南。明代因长期禁海而海运驰废，陆路转输又费用不赀。因此，自永乐中会通河浚通后，运河就成为南北物产交流的主要运输渠道，为当时国计民生命脉之所系。这样，运河自南而北所经淮安“济宁、临清、德州以及天津等各大码头，自然成为经济上的重要城镇；其中，临清又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临清，地处山东西北部，位于会通河口，为南来北往及西向运输的“舟航之所必由”⁽³⁾。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临清成为“南北往来交汇咽喉之地”⁽⁴⁾，从而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明万历年间临清钞关所收船钞商税达八万三千余两，超过京师所在的崇文门钞关，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⁵⁾。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开放以后，南方货物开始由海道、运河两条途径运往北方。随着海运的发展，上海、天津等沿海港口的迅速崛起，临清的经济地位已不如明代那么显赫了。不过，直到乾隆年间临清的城市商业仍相当繁华，它仍是北方诸省中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道光年间黄河决口，继而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会通河长年失修，淤塞不通，漕粮改由海路北运。运河运输阻断，与运河共命运的临清商业也渐趋式微，不复昔日。

通观明清时代的经济史，临清这座商城曾闪烁过耀眼的光辉。临清城市的兴盛，如果从明景泰元年（1450年）建城算起，至清道

光四年(1824年)黄河决口淤塞运河为止,持续了将近四百年。其中,明嘉靖至清乾隆,则是临清商业的鼎盛时期⁽⁶⁾。那么,繁盛时期的临清,其商业状况如何?该城市市场上汇聚的是些什么商品?这些商品的来源和去向如何?活跃在临清市场上的商人从哪里来的?临清商业的繁荣给周围地区带来什么影响?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做一粗略的探讨。

一、繁华的临清城市商业

临清,明初为东昌府属县,系漕运五大水次码头之一,然有仓无城。景泰元年始于会通河北岸“缘广积仓为基”⁽¹⁾修建砖城。城周九里有奇,面积约五平方里,略呈方形,东南西北各设一门,依次名威武、永清、广积及镇定。城中设衙署、学官;粮仓占地面积约四分之一。十五世纪中叶以后,运河交通日繁,临清人口渐增,弘治二年(1489年)升为州,又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扩建城垣,自砖城东南及西北两角开始,夯土为墙,延袤二十余里,面积扩大了五倍。砖城隅于东北,变为新城的一个组成部分。土城设新门六,水门三,砖城的广积、永清二门则成为内门了。卫河自南水门入,穿城偏西境曲折北行;汶河(即会通河)自东水门入,至鳌头矶一分为二:其北支西北行,于临清闸与南来之卫河合流北上,即为北运河;其南支过鳌头矶掉头而南,于板闸与卫河交汇。三条水道把土城切割成形状、面积各不相同的东西南北中五个部分。鸟瞰州城全貌,宛如一颗心脏,汶、卫二水恰如动脉、静脉,运流悉张,使其怦然博动,生机勃勃。土城建成后,砖城完全成为政治中心,仓储要地。原在此进行的某些市集贸易,逐渐迁出砖城,如线子市,移至广积门外小市以北;马市,大约更早在砖城营建之初就已迁出了。城内虽亦“间有阑,不过菜果食物之属”⁽⁸⁾,除粮铺十余家外,在商业上已不占多大地位了。而土城的五个区,商业均甚繁华。⁽⁹⁾

中州,由汶、卫二河环抱而成。“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是临清商业“最为繁盛”⁽¹⁰⁾之区。一条长街贯穿南北,自北而

南分为锅市街、青碗市街、马市街三段，长达三里有余：锅市街及青碗市街两侧，皮货、冠帽、鞋袜、杂货、米豆、纸张等各类店铺林立，其中磁器店和纸店最多时都曾达二十余家，羊皮店也有七、八家之多。马市街主要集中了银钱、皮货、帽靴、海味、果味、杂货等铺。长街以西有白布巷，店铺以布店为主；绸缎店则集中在与其相交的果子巷，布匹、绸缎等铺在明代都曾多达数十家。再南为粮食市，有粮店十余家，主要经销自河南卫辉等外运来的粮食。长街尽南端的东西夹道，亦为“市贾所聚”⁽¹¹⁾之地。长街以东为榷税分司所在，南来北往的船只，在此验关纳税。

北区，东起广积门，西抵卫河东岸，南以汶河为界，北至怀朔门外塔湾，这是临清商业的又一聚集区。天桥以北的小市是北区最主要的商业街，自关帝庙至张仙祠，长约里许，两侧店铺百余家，古玩珍宝、金属器皿、粮食、木材、故衣，应有尽有。另有牛市街，有钱店、杂货店；小闹北岸有缎行以及零剪铺、金珠宝饰等店。怀朔门外塔湾一带，集中了粮店十余家。北区的另一特点，即聚集了较多的手工业者，除牛市街有碾房、磨房、油坊等外，这里还有加工皮、毛及竹木器的手工业者聚居，其产品也有很多“列肆于市”⁽¹²⁾。

卫河西，指卫河西岸至州城土墙之间的狭长地带。靖西门为本城的西向通道，本区的商业主要集中于城门一带。靖西门内有粮店十数家，收采临清西乡一带运来的粮食。棉花市，在灶三庙，与东城宾阳门内的棉花市遥遥相对，分别集散来自西、东两个方向的棉花，收花季节每日可入数万斤。本区的另一特点为茶叶店集中，大者二十八家，小者不计，南方茶船到临清，皆靠卫河西码头。

东区，北至永清门，南濒汶河，东起宾阳门，西迄鳌头矶。本区商业主要集中于鼓楼斜街，永清大街和柴市。沿汶河北岸的鼓楼斜街有粮店十余家，经销自济宁一带沿汶河北上的粮食，每年可达数百万石。永清门外的永清大街亦有粮店二十余家。永清大街以西有横街名柴市，东西长二里许，两侧多柜箱、金漆、张罗、杂货、丝

店、机房等店铺、作坊。此处另一特点为四乡柴薪集中之地。临清有官窑二十余座，承造城砖，随漕船搭解上京。每烧砖一窑，需柴八、九万斤，均由附近州县及济南、兗州二府所属十八县领价办纳。途远州县运薪困难，皆挟赀来临清就近采买，因而形成临清东区偌大规模的柴薪市场。⁽¹³⁾。此外，宾阳门内有棉花市，前已提及。

东南区，指汶河南支以东与中州隔河相对的狭长地带。其街市分为三段，互不相接。北部的车营面积最大，在砖闸以东，有粮店十余家，主要经营本地粮食买卖。临清东南诸县农民及商贩将米谷牛载驴驮至此售卖。板闸南二里许为南厂，此处货物以船具为主，如绳缆、木篙、橹、桨、船只等等；亦有烟、酒、油、茶等铺杂处其间。最南端为南水关，俗名土桥，每逢三、八日为绵绸市，馆陶、堂邑、冠县等地小农或手工业者负绸以售，日集绵绸可达千余匹。⁽¹⁴⁾。

从该城商业布局可以看出，临清市场同时兼有批发、零售和农产品集散的功能。中州地区布匹、绸缎、磁器、纸张等店铺以及卫河西的茶叶店等同类店铺的高度集中，显然带有中转批发商业的特征，其中很多店铺是兼营批发业的，还有一些则属于存储货物并作为商业中介机构介绍大宗商品成交的邸店、货栈。经营不同商品的各类店铺错处于同一条街市——最典型的是北区小市街的店铺结构——则明显地反映着它以本地居民消费为主的性质。卫河西、东区及东南三区除了茶叶及来自济宁一带的大宗粮食的贸易外，基本上属于以农产品的集散为主的市场，其商品多来自本州及相邻县份。除了生产者的直接出售外，当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商贩从乡集和县市中收购的商品的汇集。这里是城、乡市场的交汇点，也可以说是墟集市场的扩大与集中。

临清城内如此繁华的商业，不仅大大超过与它平级的州城，就是在当时的府城、省城中也是较少见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市几乎遍布全城。据民国志记载，临清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市肆栉比”⁽¹⁵⁾，随处可见。如中州

的锅市街、青碗街、马市街以及北区的小市街等，均属于百货荟萃的综合性商业街；而白布巷、果子巷、卫河西浒的茶叶店，以及遍及全城六个区的粮食市等，则是以专营某一类商品的店铺集中为特征的商业街、区。

第二，店铺种类繁多。上述已经提及的店铺就有数十种，其中包括：粮食、布店、绸缎店、丝店、皮货店、羊皮店、鞋袜靴帽店、裁衣店、锅店、磁器店、纸店、金属器皿（如金、银、铜、锡、铁等）铺、烟、酒、茶、盐、果品、海味、辽东货（人参、貂皮、青黄鼠皮等）、木料、船具、木器、家具、首饰、古玩等各种店铺；碾房、磨坊、油坊、皮毛加工、竹木作坊等也有一些是带店铺的。此外，还有银钱、典当等铺，焦石木炭店、药材行、饮食店、和制作香烛纸马、盆、桶、锅盖等作坊店铺，以及棉花市、绵绸市、线市、姜市、柴市、猪市、驴市、鸡鸭市等农副产品的专门市场。可见，城区商业经营的商品门类繁多，档次齐备，可适应各种各样的消费需要。

明代清代临清城内主要店铺数量及其增减比较

类别	明隆庆万历年间	清乾隆十四年
布店	七十三家	各街俱有
绸缎店	二十二家	七八家
杂货店	六十五家	二三百家
粮店	不详	百余家
磁器店	二十余家	减半
纸店	三十四家	五六家
羊皮店	不详	七八家
辽东货店	大店十三家	今无
茶叶店	不详	大者二十八家，小者不计
公店外	十余家居各街	近不及半
杂货店	百余家	十六、七家
典当店	大小数百家	减半

注：表中“隆庆、万历”一栏，除布店、缎店、杂货店三项为万历年间记载外，其他各项，原资料中多称“昔年”、“旧有”，大约是指临清最繁盛的隆、万时期。明清之际的战乱波及临清，使该城一度萧条，至乾隆时虽

已恢复繁荣，但显然已不如明代，商业布局也有所改变，这从表中均可看出，而粮食的经营则极兴盛，可能远胜过明代。

资料来源：《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七十六，万历三十年九月丙子；
(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第二，商店数量众多。在这个方圆三十里的城市中所汇聚的店铺究竟有多少？我们无法找到完整的统计数字。这里只能摄取较为重要，并尚能获得一些确切数字的十余种行业作一粗略的统计：(见前页表)

此外，据州志记载，乾隆时北区的长仅里许的小市街，就有商店百余家。以上二者相互参证，可以肯定，明代和清代临清城内店铺的数量起码有五、六百家以上，明代则更多些。如果再加上各种类型的市集商贩、作坊店铺，临清的大小店铺可能达到千余家。

与明清时代的其他城市一样，临清的商业无疑是为本地居民的衣食所需服务的。不过，其商业的繁荣程度又远远超过临清本地城乡消费的需要。临清州人口在万历年间为三万余户，六万六千余口⁽¹⁶⁾，以后直到乾隆年间仍未超过此数。商业繁荣与人口构成的差距悬殊，表明临清城市商业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为本城服务的。

二、景清市场上的主要商品及其流向

如此繁华的街市，表明临清有大量的商品在流通。临清商业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外来商品的输入和转销贸易。经由临清转运销售的商品以棉布、绸缎及粮食为最大宗。

先谈棉布和绸缎。明清时代，江南是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其产品质地好，产量高，行銷全国。棉布，以松江一带所产为佳。如上海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¹⁷⁾嘉定棉布“商贾贩鬻近自歙、杭、清、济，远至蓟、辽、山陕”⁽¹⁸⁾；常熟之布“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者常什六”⁽¹⁹⁾。丝织品，则以苏杭、南京称最。张瀚《松窗梦语》的记述：“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宁而三吴为最”，秦晋燕周大贾不

远数千里而求之者“必走浙之东”⁽²⁰⁾。南京绸缎也是“北沂淮泗，达汝格、趋京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陇”⁽²¹⁾，大量北销。

明代南方棉、丝织品的北销多从临清中转。如直隶河间府市场上的丝织品来自临清的为数不少。辽东、山陕布商都曾活跃于临清市场，他们从临清购买江南的纺织品，运回北边贩卖⁽²²⁾。河南及山东的乡间商贩也到临清采买布帛，运回销售⁽²³⁾。临清本地与北方各省一样，棉纺织业尚不发达，城乡的棉布消费大约也需依赖于江南。

此外还应注意的是，明代政府及军队所需棉布和丝织品的供应问题，据严中平先生估计，这项需要约在 1500—2000 万匹之间，而明中叶以后除少量征收本色外，百分之八、九十是从市场上购买的。军用之中又以九边需量最大，戍守官兵有七、八十万之多，军队及其家属的消费，再加上互市的需要，数量至少在五、六百万匹以上⁽²⁴⁾。这项军需有的是朝廷发银委员前去产地购买⁽²⁵⁾；有的则由各地商贩自行运往北边销售⁽²⁶⁾。前者需借道临清北上；后者之中则有相当数量购自临清市场。前述活跃于临清的辽东、山陕商人就有不少是转贩军需及互市用品的。所以明人陈继儒说：商人自数千里外装重资自江南贩布，“其汎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缤毂”⁽²⁷⁾。清源，即临清之古称。运销整个华北、东北及西北地区以供军需民用的大量的江南布匹、绸缎，主要是以临清为中转轴心的。因此，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开店设肆，隆万年间临清⁽²⁸⁾内有布店七十三家，绸缎店三十二家，布匹年销量至少在五百万匹以上⁽²⁹⁾，加上绸缎，则为数更巨。其中除少量销给本境及周围地区城乡居民外，绝大部分是批发中转贸易。临清是当时北方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故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

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江南布匹绸缎的北销逐渐转而利用更为便利低廉的运输手段，即由沙船海运天津、辽东。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北方棉纺织业的发展，华北、西北对布匹的需求逐渐

转向北方市场上获取。直隶的肃宁，山东的历城、定陶在明代后期已有商品布的外销⁽³¹⁾，到清代，北方棉纺织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数省相继出现了一批较著名的棉布产地⁽³²⁾，在明代经常远涉数千里赴江南采买布匹的秦晋巨贾大多转向北方棉布产地购买。如：直隶正定府元氏县“男女多事织作”，为晋商聚头之地，“布甫脱机，即并市去”⁽³³⁾。永平府乐亭县所产布匹“本地所需一二，而运出他乡者八九”，大抵以销往关外为主⁽³⁴⁾。河南孟县的孟布，“山陕驰名、商贩不绝”，“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车马辐辏”⁽³⁵⁾。正阳县的“陡布”也是“东达颖毫，西至山陕，衣被颇广”⁽³⁶⁾，因而北方的棉布消费对江南市场的需求大大减少了。在丝织业方面，清初北方尚无长足的进展，对江浙绸缎的需求仍保持相当的数量，江浙绸缎仍是临清关税中的大宗。⁽³⁷⁾。不过，由于海运的畅通，一部分绸缎可由海路北上京、津；另一方面，往来于畿南、鲁北的商人为了逃避商税，往往由济宁、东昌等处弃舟起旱，绕越临清榷关，因此绸缎的输入量也远不如明代。这样，临清作为纺织品中转贸易市场的作用不断削弱，直至基本丧失。到乾隆年间，临清市场上的布匹绸缎已转由济宁、东昌拨贩，主要是为本地的消费服务了⁽³⁸⁾。随着这一市场功能的改变，临清城内的布店、绸缎店已显著减少，其分布也由高度集中转为散见各街了。

粮食，是临清市场上商品之又一大宗。据州志记载，进入临清市场的粮食来源有四：南路而来，主要产自济宁、汶上、台儿庄一带，“每年不下数百万石”，沿汶河北上；西路而来，主要为河南所产，年亦“不下数百万石”，自卫河东运；北路而来者，产自沈阳、辽阳、天津，年约数万石，“自天津溯流而至”；临清本境及附近州县所产运入州城交易者，为数亦在不少。如：临清以南的馆陶、冠县、堂邑、莘县、朝城等诸县的粮食，多车载驴驮而来，于车营一带出售，“日卸数百石”；城北塔湾上市的粮食，多来自北部直隶广平府的清

河等县，“日卸数十石”；靖西门内的粮食市场，则系临清本境西乡一带村庄入城粜卖，亦“日卸数十石”。乾隆年间，临清城内粮食市场共有六、七处，经营粮食的店铺多达百余户，年交易量达五、六百万石——千万石。粮食品种则包括米、麦、粟、秫、豆类等等。⁽³⁹⁾

这些粮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经临清转销外地的。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丰歉调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流向。

临清位于山东西北部，北界直隶，西近河南。三省水旱蝗雹等灾间有发生，商人运粮以丰济歉是经常的。如：乾隆九年，直隶收成歉薄而河南丰稔，“商贩趋利如鹜，自南往北，连樯不绝。”⁽⁴⁰⁾乾隆二十一年，河南歉收，又有他省的大批粮食运入河南⁽⁴¹⁾。流向虽有所改变，但都须经过临清周转，临清的粮食市场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临清市场上粮食最主要的去向之一。因此项需要而经由临清转销的粮食的总量虽然没有确切的记载，乾隆初年临清关米粮免税金额的记录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参考数据⁽⁴²⁾，据此可估算大概。（见下页表）

乾隆初年临清关免过米粮税银统计表

单位：两

年 份	免 过 税 银
二年(1737)	12.830
三年(1738)	18.630
五年(1740)	19.643
七年(1742)	17.298
八年(1743)	47.314
九年(1744)	52.970
十年(1745)	25.985
总 计	194.670
平均每年	27.810

资料来源：《钞档》，吏部尚书协理户部事纳亲乾隆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乾隆六年二月十九日乾隆六年十月八日题本；山东巡抚喀尔吉善乾隆八年十月二十一日题本；户部尚书海望十年十一月十五日题本；户

部尚书刘于义乾隆十一年九月二日题本。

如表所示，临清关乾隆初年免征米粮税银，最少者为乾隆二年；最多者为乾隆九年。按照临清关税则折算粮石，前者当在 58 万——116 万石之间，但该年并非全年免税，故这一数字不能反映全貌；后者则为 240 万——480 万石之间；如以七年平均计算，折粮为 125 万石到 250 万石⁽⁴³⁾。在这些粮食中会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临清市场直接购买，或经由临清批发转销的；也有很大一个量则只是经临清过路，在此应上纳过税⁽⁴⁴⁾。因而经由临清市场转销的粮食当分别在上述各项的上限之上；而实际过关的粮食总量自然都超过了各自的上限。也有一些年份，各地粮食差价不大，长途贩运者少。如临清关的奏报称：乾隆十年“直隶、豫、东三省粮价尤甚低昂，商贩获利无几，往来者少。”⁽⁴⁵⁾不过，即使如此，该年经由临清关转运的粮食仍在一、二百万石之间⁽⁴⁶⁾。

南船回带豆类是临清市场粮食的又一流向。江南、闽、浙诸省豆制品加工业颇为发达，当地手工业者用黄豆等磨豆油、榨油饼，或加工制作其他豆制品，倚以为生⁽⁴⁷⁾。他们所需的原料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北方。政府明文规定，回空漕船可免税带回黄豆等物⁽⁴⁸⁾。所以直隶、山东等地豆类经运河而南销者数量很大，在临清装船者也有一定数量。该海关税中，此项税收一直占有相当的比重。⁽⁴⁹⁾

临清为明清最重要的漕运码头之一，有广积、临清仓二仓设置于此，主要收贮河南、山东并直隶大名府两税所入，岁额“二十余万石”⁽⁵⁰⁾，“以备漕粮四百万之不足”⁽⁵¹⁾。明初，漕粮全部起运本色，中叶以后实行变通的办法，“许粮户责银径赴水次收买”⁽⁵²⁾，所以，距临清较远的粮户，为免运送之劳，多携银两往临清市场购粮，就近交纳上仓。嘉靖三年户部征粮则例更明令上述二仓并德州所承运的漕粮，每石连耗征银八钱，“趁米贱时赴临清并附近去处，仍买本色上纳”⁽⁵³⁾。此外，大名府的小滩镇，收兑河南开封府漕粮“二十万

石”⁽⁵⁴⁾，嘉靖、隆庆年间亦已折征银两（每石一两五钱）于小滩附近买米交兑⁽⁵⁵⁾。临清距小滩仅百里，又有水路之便，应在小滩交纳本色的粮户当会有相当一部分来此购买。以上两项合计，在临清市场籴买上仓的粮食大约可达二三十万石之谱。清代当亦不下于此。

临清本地的粮食购销也有相当的数量。

首先是城乡非农业人口及往来客商的消费。临清城乡人口约六七万，其中商业、手工业人口比例较大，所谓“逐末者多，力本者少”⁽⁵⁶⁾。加之外来商贾、游客、漕丁众多，流运人口至少在四五十万人次⁽⁵⁷⁾。因而“地产麦谷不敷用，犹取资于商贩”⁽⁵⁸⁾。城居人口、工商业人口及流动人口的消费，绝大部分需从市场上获取。

其次为农业人口中的余缺调剂，品种调剂。临清一带经济作物的种植很广，以植棉、种果为主的农户需要从市场上购买一部分甚至全部口粮。即使种植粮食的农户，由于小麦与杂粮的差价悬殊，也往往出售小麦，购入杂粮自食以增加收入。这种粜精籴粗、余缺调剂、有无调剂以及“人挟帛一缣，易僧石之粟”⁽⁵⁹⁾的购买，就每个人而言数量固然有限，但却是经常地、普遍地存在着，是构成临清粮食市场交易不可忽视的又一内容。

其三制曲造酒的消耗。东昌府及直隶大名府的小滩一带所产小麦的质量在北方小麦产区中首屈一指⁽⁶⁰⁾，是制曲的好原料。因而明清两代临清的踏曲业都曾盛极一时。东城、西城各有踏曲巷，每年麦收季节，富商大贾挟重资而来，广收新麦，在巷中“安箱踏曲”，致使麦价为之涌贵⁽⁶¹⁾。临清酒肆众多，酒的消耗量也大，酿酒当亦是本地粮食的一项很大的消耗。

外地运入临清的大宗商品还有铁锅、磁器、纸张和茶叶等等。

铁锅，是临清市场上的重要商品之一，其品种有广锅、无锡锅及西路铁锅等。广锅出自广东，辗转运销而来；无锡锅则由南船带至；西路铁锅大约即出自山西潞安的潞锅。临清本地的消费以广锅、无锡锅为多；西路铁锅及其他铁器、铁钉、犁铧、转运外地，在临清

只报过税⁽⁶²⁾。高唐、河间一带所用的“山陕铁器”就有不少系由临清转运而至。临清城内有街名“锅市”，以锅名市在一般城市中似不多见，估计其上市的商品量当属可观。

磁器，主要来自江西景德镇，“每岁进货多者十万，少亦不下四万”⁽⁶³⁾，经销磁器的店铺明代曾多达二十家，清代亦有十余家。纸张，来自福建、江西，品种甚多，如杠连、古连、毛边、三把头、五披、八披、头堂、本、表、箋等等；店铺多时也有二十余家。关于纸的销售状况，目前所见资料不多，仅见康熙《永平府志》记有：布帛裘材“自临清转至”⁽⁶⁴⁾。不过，永平府地处直隶最北部，据此推论，临清输入的纸张的转销起码可达直隶的大部分地区。茶叶，来自安徽、福建等地，品种有松萝、雨前、天池等，经营茶叶的店铺大小数十家。其集中于卫河西者，以山西商人经营的边茶转运贸易为主，茶船到临清，“或更舟而北、或舍舟而陆，总以输运西边”⁽⁶⁵⁾，其余散处于城内各街的茶叶店及布店、缎店、杂货店等代销的茶叶，则是为本地消费服务的。

他如来自山东或长芦盐场的盐，既有就地零售，也有转销他处，还有辽东的人参貂皮等高档消费品，临清亦有销售。

冀南及其附近地区经由临清外销的商品主要有棉花、梨枣、丝织品等。

棉花。北花“柔细中纺织”⁽⁶⁶⁾，临清所在的冀鲁豫交界地区更是以棉花的优质高产著称。《山东通志》称：“棉花六府皆有，东昌尤多”⁽⁶⁷⁾，东昌府又以高唐、夏津、恩县、范县、武城为棉花的集中产区，并且以其质地优良被商人誉为“北花第一”⁽⁶⁸⁾，是以“江淮贾客列肆责收”⁽⁶⁹⁾，大批运往江南。明末农学家徐光启曾说：“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⁷⁰⁾清代仍有大批棉花南运。临清附近的高唐、夏津、武城等州县均有棉花收购市场。如夏津城内“自丁字街以北直抵北门皆棉花市。秋成后，花绒纷集，望之如荼，年之丰歉率以此为验。”⁽⁷¹⁾武城

县也是“每岁秋成，四乡棉花云集于市。”⁽⁷⁴⁾附近州县的棉花或零星地、或大批地汇集到临清，“日上数万斤”⁽⁷⁵⁾，从这里远销江南。

梨枣。临清一带盛产梨枣。嘉靖《山东通志》记载：梨，“出东昌、临清、武城者佳”；枣，“东昌属县独多”⁽⁷⁶⁾。故有“千亩之家千树梨枣”⁽⁷⁷⁾之赞。相邻的河南彰德、直隶大名、河间等府也盛产梨枣、核桃、柿子等果品⁽⁷⁸⁾，大都也需经由临清贩运江南。北上货船轻舟返航时，很多在临清购买此类干鲜果品压舱南下。档案记载，乾隆七年临清关所征枣税银一项就达 700 余两之多也⁽⁷⁹⁾，而这一数字尚未反映南下梨枣的全部，因为漕船回空捎带梨枣在 60 石以内的部分是属于免税之例的。⁽⁸⁰⁾。足见此地梨枣干鲜果品销售量之大。

丝织品。这是临清外销的最主要的手工工业品。明代临清的丝织业已相当发达，城内聚集和散处的机房估计可达百余家。丝织业的原料分别来自山东、河南及江南等地，用途各异。如：东丝织绫绸，湖丝织帕幔，西丝织带子并作线，茧丝织茧绸、绵绸等。产品较精美者有首帕、汗巾、帕幔、帛货（哈达之类）等，质地虽比不上苏杭所产，但在当时北方的丝织业中已堪称佳品，行銷于北方数省，“远近人多用之”⁽⁸¹⁾。京师、开封、宣府等地都有专门经销临清丝织品的店铺，与南京、苏杭的罗缎铺、山西潞绸铺、泽州帕铺比肩相争。⁽⁸²⁾。其中尤帕幔最为绮丽，堪称第一流的佳品；祭神所用的“帛货”则远销于西藏、西宁⁽⁸³⁾。至于绵绸茧绸、丝布等则属于低档产品，多在土桥的绵市上交易，每集可聚千余匹。其生产者及消费对象大抵以附近州县的农民为多。

此外，羊皮及绒毡制品也是临清外销的本地手工业品。

山东北部畜牧业较为发达。《东昌府志》称：“羊裘，毡罽，出自府城、临清者佳。”⁽⁸⁴⁾。临清以硝皮、制皮、鞣皮为业者，主要是聚居于北城的回族居民，他们“制皮作裘，列肆于市”⁽⁸⁵⁾。羊皮，本地自产占十之三，其余主要来自直隶河南及西北诸省，而以束鹿小羔皮及西口皮为最优。由于水质关系，临清的羊皮制品具有“特柔而不

“羔”的特点，雍正年间起被列为贡品，岁进三千张，每年冬春于临清关预发价银，令铺户采买上纳⁽⁸⁷⁾。其余产品大体也以北销为主。

绒、毡，均为羊毛制品。制毡，“以春毛秋毛中半和用”；织绒，“纺羊毛而织之，刷之，绒卷似羊羔皮”。此类制作多有店铺，前店后坊，“经年工作”，自产自销；亦有小贩街头零卖⁽⁸⁸⁾。较低档的产品则为荐毡、鞍具之类，以“败絮杂毛染织合纺成线”，制成马褥、车围、坐具、铺垫等等，为农业及运输业所需。另有织作床毡等，也是临清的特产⁽⁸⁹⁾。不过，丝织、皮毛、绒毡等业的进一步发展，则是清中叶以后的事了。

在以上的考察中我们看到，活跃于临清市场上的商品包括农产品、畜产品、手工业品及其他各类杂品。门类繁多，品种齐全。无论就品种，还是就数量而言，民生日用品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其中又以衣、食所需为最大宗。在这些商品中，又有高低档次的不同，从而适应绸、棉布等价格相对低廉，更适于一般百姓的消费。此外，江浙绸缎一般说为高档的丝织品，而绵、绸、棉布等价格相对低廉，更适于一般百姓的消费。此外，城内还有为数可观的数十家专营故衣的店铺⁽⁹⁰⁾，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以临清众多的脚夫、纤夫及下层劳动群众为消费对象的。又如日用器皿中景德镇磁器价格高于磁州所产，故乡间所用以附近磁州的产品为多⁽⁹¹⁾。

至于完全属于奢侈品则有金银器皿、珠宝首饰以及一些名贵的毛皮、药材，无论是绝对量，还是就其在整个商业中所占比重来说，均属有限。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生产资料型的商品在该城市市场上为数不多，马、牛等牲畜的交易已退出城市市场⁽⁹²⁾；而犁铧、车川等农具虽有输入，但未见有专门的店铺经销，这些交易显然是转到更接近农村的下一市场去进行了，在较低层次的市场上清晰地见到了它们的踪迹⁽⁹³⁾。城内商业中可列为生产资料性质的商品，大抵只有运输所需的船具、鞍具之类以及丝、线、皮毛、竹木等手工业原料型商品。这种商品构成，突出地反映了临

清城市商业是以民生日用品的贸易为主的消费性特点。

16—18世纪，临清曾是北方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和粮食贸易中心。不过，作为纺织品市场的临清，以明隆万年间为鼎盛，到清代地位逐渐下降；而作为粮食市场，临清的地位则是逐渐上升的。明代临清粮食市场的规模，没有见到确切的记载。不过从需求量来估计，明代临清的粮食交易量也当为数可观——临清城乡非农业人口及流动人口的数量之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之广，制曲造酒业的兴盛，以及漕粮籴买上仓的需要，都有赖于商品粮食的供给，而冀鲁豫三省之间的丰歉调剂也不是在清代才出现的。另一方面，从宏观上考察，限于明代粮食商品化程度和北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可能提供的商品粮数量尚远低于清代⁽⁹²⁾，因而作为粮食贸易中心的临清，从明代到清代是处于逐渐发展过程中，到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此时，临清城内外粮铺百余家，粮食年销量达五六百万石——千万石，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粮食交易中心之一，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

临清城市商业是以中转为主的商业。为了本城及周围地区需要，临清大量输入粮食、布匹、纸张、磁器、铁锅、盐及竹木等手工原料；同时，它也在大量地集中本地区特产如棉花、干鲜果品以及裘皮、丝织品等输往外地。不过其商业中更大数额是粮食、茶叶、绸缎、布匹、磁器、铁器、纸张等商品的中转贸易。从一定意义上讲，临清的商业繁荣乃是中转贸易的繁荣。因此形成了它城不大而商业街市甚多，人口少而贸易兴隆的特点。

临清城市市场兼有三个不同级别市场功能。如前所述，临清既是零商业构成的消费市场，又是农产品集中收购市场，同时还是多种商品的中转批发市场。因此，临清商业既作为地方性市场为本城居民、手工业者及附近州县的农民服务，又作为区域性市场为鲁西、晋以及直隶一个相当广大的物资交流服务；同时还作为商品运转中枢在全国经济活动中为南北两大经济区的商品流通服务。在

16 18世纪临清的全盛时期，它的市场功能显然是以后者为主的。这一时期的临清是一个身兼三级功能的复合性市场，而其活跃全国经济，并从巩固封建政权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其间，明、清两段又有不同：在明代，临清作为全国性转市场的作用极为突出，到清代，它作为全国性市场虽仍在发挥作用，而为区域性市场的功能已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日益占有重要地位。北方经济自身的发展，使之对南方的依赖性逐渐减少，而它们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则在不断加强。

三、临清的客籍商人和服务于商业的土著

商品流通当然离不开商人有其商业资本的活动。活跃于临清市场上商人既有本地土著，也有外来客籍。州志称：临清“本境之民逐末者多，力本者少”，甚至说“逐末者十室而九”⁽⁹⁴⁾。这当然不能视为确切的百分比，但临清经商人口占有很大的比例是可以肯定的。客籍商人有来自南方的徽州商人、江浙商人、南京商人，也有来自山陕、辽东、河南、直隶乃至山东本省的济宁、青州、登、莱诸府的商人。其中以徽商、晋商及江浙商人为数最多，资本也最雄厚。明人曾说，临清大贾“皆侨居，不领于有司版籍”，而本境“土人列肆屈指可数”⁽⁹⁵⁾。州人刘梦阳也说，“临清以聚贾获名”⁽⁹⁶⁾。外来客商是构成临清商人队伍的主体。在临清，外来的商业资本以绸缎布匹、粮、茶、盐等项的批发中转贸易及银钱典当业为主要经营项目。

要想对临清各行的商业资本做出一个确切的估计，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史料。这里我们只列举一些较著名的商行及其商品经销额，供以管窥临清商人队伍及其资本的构成。

徽商在客籍商人中为数最多，故明人曾有“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⁹⁷⁾之语。临清有专为徽、苏二府商人所设义塚两处，“寄榇有屋宇，葬地有封识”，专供客死在临清的徽、苏商人寄木棺或葬埋之用，占地30余亩，“他郡不得与焉”⁽⁹⁸⁾，也反映了徽商人数的众多。徽商经营的内容相当广泛，而比较集中的为银钱典当业。明代临清的

银钱典当铺，多达百余家，“皆徽、浙人为之”⁽⁹⁹⁾。他如盐、粮、布、缎、竹木、磁器等，当亦有徽商资本渗入其间。虽然徽商在临清的商业活动缺乏具体的史料记载，但从当时徽商资本之雄厚，经营范围之广在全国商人中所占的显赫地位，及其在临清的人数之多，可以推论徽商的经营范围至少会涉及临清商业的大部分门类。

绸布业，以江浙商人较为集中。成化年间苏州、南翔、信义三会的布商合而为行，到隆、万年间达以鼎盛，每岁进布百万匹有奇。当时一家字号为“一左元”的布店，每出一银必点一珠，每年需用珠粉达二、三十斤，可见其经销额之大。临清的布店、缎店总计有百余家之多，“合以各家，其费难量”⁽¹⁰⁰⁾。山陕、辽东布商由于北边军需、互市需量甚大，也多从临清市场上购买布匹绸缎转贩北边，当亦有不少资本投入绸布业中。

茶叶业，以晋商资本最为集中。⁽¹⁰¹⁾，为西北少数民族生活所必需，又为国家官榷的商品，利润最大。但由于转销路程遥远，“非巨商贾不能任”⁽¹⁰²⁾。唐宋以来，历朝政府屡行以茶易马之法，而明制尤为致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征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¹⁰³⁾清代因之，仍于陕甘易马。其茶产地、销地大多以引行茶，惟直隶、河南、山东等地不领茶引，仅于茶商到境时，“由经过关口纳税，或略征地税”⁽¹⁰⁴⁾。临清由于运道方便，又没有引额限制，遂成为商茶由产地销往西北的一条重要通道。此项边茶转运贸易主要由山西商人经营，卫河西岸设有大小数十家专为边茶转运服务的茶店货栈。康熙年间山西茶商韩四维等曾捐资在卫河西岸修建一座大王庙，“壮丽无比”⁽¹⁰⁵⁾，茶商资本之大及获利之丰从中也可得到间接的反映。

盐行，明代曾于临清“开中”，故盐行“昔年最盛”⁽¹⁰⁶⁾，砖城内州前街设有公店，其余十余店散居各街，每年行盐万余引。清代减半。临清的盐多来自长芦、山东两处盐场。长芦盐顺运河南下，“天津盐船络绎不绝”⁽¹⁰⁷⁾；山东沿海利津、富国等场的盐，则经南大、小清河

水陆接运至张秋入运河北上。经营盐业的有徽商、天津商人、山东商人等。按引行盐，各有销地。此外由于销盐利润特丰，南来北往的各地商人也多籍漕船夹带私盐，“北行则夹带抵通州，南归则贩卖抵临清，皆权贵势力者窝顿兴贩”⁽¹⁰⁸⁾。虽屡禁而不能止。

如前所述，粮食是临清市场上最大宗的商品。虽属廉价粗重商品，但年交易量甚大，经营粮行的商业总资本当亦为数可观。业此者大约包括徽州商人、江浙商人、山陕商人、辽东商人。从大宗商品粮的来源估计，直隶并鲁豫三省商人也会有不少参与其间。

此外，辽东商人在临清的，明代也为数不少，他们从东北贩来贵重的皮毛、药材及其他土产，回程贩去货物“各不一”⁽¹⁰⁹⁾，大抵以军需及互市所用的布匹绸缎、铁锅等项为大宗。

在临清活动的商人，大都归属于不同的商行。“行”既是商人的同业组织，又是政府管理商人的一种手段。在临清，布商有行，绸缎有行，磁器、盐、纸等业也各有归属。如布行，明成化年间由苏州、南翔、信义三会商人联合而成，每岁轮置“行首”一人，“司一岁出入，凡庆谒、献、宴饮、交际、大至贷饷助公”，均由“行首主其事”⁽¹⁰⁶⁾。看来，行首的职责权限大体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总理本行公共事务，并协调同业内部关系，本行与其他各业及社会各界之的相互关系。其二，包括商税胶支应各项公务。如万历年间临清“三大行”共承纳税额三万五千余两，占临清关税总额的二分之一；其他诸“杂货小行”共承纳商税万余两。⁽¹⁰⁹⁾临清每逢举行乡饮、宾兴、考试三大典，所需磁器均在磁行取用。其三，经营本行公共经费收支，即所谓“司一岁出入”，其经费来源主要是本行各商一岁所交厘金，以及其他捐助款项。其四，措办义举，如修桥、建寺、兴学等等。临清三行商人集资扩修汶河以南的大王庙等，即属此类。万历年间税监马堂在临清激起民变被裁革后，山东巡抚黄克缵力主利用商人原有的“行”的组织来管理商人，他建议“不用委官，止用行首，量行户之大小，各二三人，或三四人，使司其事。盖以商贾而侦察商

货，计甚便也”⁽¹¹²⁾

还应特别注意的是，活跃在临清市场上的还有大批漕军。有明一代及清代前期，政府每年役使军籍运丁，将数百万漕粮由南方各省解运京师及有关仓库，是谓漕运。由地方政府所发运粮脚费往往不敷支应，而且运军长途颠簸辛劳，饷银又低，所以明清两代政府都曾规定，准许漕运官军利用漕船搭运一定数量的私人货物，沿途贩卖。明代，“漕运军人许带土产易换柴盐”⁽¹¹³⁾，并“置有土产、松杉板木、篙竹等物，沿途易换银布，以备交粮车脚等用”⁽¹¹⁴⁾。清代规定亦相类似。政府对这些搭运的土宜货物免其抽税，“以资运费”⁽¹¹⁵⁾，“以恤军困”⁽¹¹⁶⁾。这批漕军每年往返运河之上北上重银限额携带“土宜”，南下回空时又往往在免税额外，揽载商货，更完全变为客货商船。明清两代漕船约在万艘左右，每船配置运军水手 10—12 人，于是运河沿线十数万非正式的商人每年往返进行贸易活动，其中相当数量的漕军要在临清购销商品。可以肯定地讲，这批不是商人的商人，在促进临清的商业繁荣中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不仅要有商人及商业资本，而且需要一系列为之服务人员、设施、机构。因而围绕着这些外来客商及其资本的活动，在临清形成了包括购销、存储、运输在内的一整套商品流转环节及辅助设施，从而保证了外来客商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临清本地的商业资本大多投资于此。

临清以转运贸易为主，商贾辐辏，百货汇集，“商旅之所往还住止，水陆货物之所以储蓄贸迁”⁽¹¹⁷⁾，均需有个落脚之地。因此，临清的宾馆、邸店业甚为发达，大小店坊公行别类，有数百家之多。这些宾馆即是商人过客的停居之所，也为商人存储和转运货物服务。故州志称：“商贾虽周于百货，而贸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¹¹⁸⁾。这些宾馆、店坊有的是临清的官民之家、“街市人户”利用个人闲置屋宇充作“停货店舍”⁽¹¹⁹⁾。招揽过往客货。较大的商行一般则有各自的专店。如纸商，店在会通河南北锅市及工部街，“商来

寓店，店列字号”；茶商，店在卫河西，大者二十八家，小者不计；辽东客商，巨贾店主有七家，后增至十三家。客店店主从客商货物中抽取一定数量的租金，“资为生业”⁽¹¹⁸⁾，有些店主并兼充买卖双方的中介人，赚取佣金，亦即牙商。这种情况大约并不罕见，故所谓客馆，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乃是这种邸、店、牙三者合一的机构。有些店主还与商人相互立有合同，甚至属于行商、坐贾合营性质，当然，有些较大的商行也可能是由客商自己在此设店的。有些店主并包纳商税，万历年间临清商税中由牙店包纳的税银为二万余两，约占商税总额的三分之一⁽¹¹⁹⁾。

除上述兼事牙商的店主外，临清还有一批专门的牙侩、经纪人。举凡故衣、杂货、布缎，“各行贸易俱有”，“细至柴炭、蔬果亦不能少”⁽¹¹⁸⁾。他们以居间拉拢赚取牙佣，约有百余之数，但“凡有店主及按货合同者不在此例”⁽¹¹⁸⁾。

外地输入商品的分销和本地农产品的汇集并不总是生产者直接入城购买和出售，而需要一批经常出入于较低级别市场的商人，如车营、塔湾及靖西门内的粮食市以本土及附近州县的粮食买卖为主，其中会有相一部分粮食是由乡集、县市的零星收购汇集而来。东西两城的棉花市场棉花的汇集当也是如此。临清本境从事商业的人口众多，大约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

由于商品运输的需要，临清的运输业也随之高度发展。作为重要的水运码头的临清，民船运输十分发达，明代小说中记载，由京师放外任的官员，或径赴任所，或回乡接取家小多在临清雇船，由水路南下⁽¹²⁰⁾。往返漕船搭载客货，也是临清码头水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商品的运销往来，所需装卸脚夫为数甚多，以至大批本地小民依以为生计。脚夫也有行，并且分区分帮划定地界：自东水门至钞关，钞关至砖闸，砖闸至板闸，板闸至广济桥，广济桥至北水门，各为一界，“船载止处，各出运货，不相侵犯。”⁽¹²¹⁾至于粮行、纸店等，又有

专门的脚行为之服务，不在此例。

为护送商货而设立的临清标丁，“有马有步”，共百余名，以精骑射，骁勇为“称最天下”，主要是护送三行货物、金钱南北往来⁽¹²²⁾，暴徒不敢相犯。

为运输服务的手工业则有油篓业、织席业及船具制造业等。油篓，“编竹成之糊以油纸”。临清的油篓以轻坚耐用，不怕鼠啮而著称，故南来客商在临清购买香油、菜油北上者必购此装油，城内从事此项编织业的手工业者为数不少，聚集成巷，即以“油篓”名之⁽¹²²⁾。临清的席厂街，为织席者聚集之地，席的编织主要是为漕仓，漕运以及大量的商品粮的运销所需。橹、浆、绳缆的制造更显然是为水运需要服务的。

此外，外来客商人等作为庞大的消费人口，他们食宿所需还导致了临清饮食业、旅店业的发达。临清宾馆甚多，除上述作为商业经营的辅助设施外，同时属于消费性服务设施，不仅只接待客商，也接待过往士子游客，明薛瑄《临清旅店诗》曰：“有客乘船来借宿，新诗留作赁房钱。”⁽¹²²⁾饮食行业，如茶饭食店、酒肆等“随待皆有”，制曲造酒均很发达。生猪，临清本地所产不敷供应，需从济宁、沂州等地贩来货卖，“日集千余口”⁽¹²²⁾，这也是由饮食业的需要所致。此外，临清专营制作修理桶、盆、锅盖、笼屉的手工业者有数十家之多⁽¹²²⁾，主要也是为城内众多的宾馆、饮食店及过往船只的此类消耗服务的。而为了一掷千金的商人们买笑挥霍，娼妓麇集，青楼栉比，甚至勾栏成巷，则使人们透过这座城市由商业发达而形成的“繁华”，看到这个社会的阴暗的一面。

这样，以外来客商及其商业资本的活动为中心，在临清形成上述的一整套商业、服务业体系，构成临清城市经济的主体，并左右着本城大部分居民的生计。临清城内虽亦有丝织皮毛加工等手工业，但与这个庞大的商业经济体系相比，在整个城市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甚微。临清的城市经济基本上是围绕着商品流通一中心运

转的。

临清的商业活动是以客籍商人为主体的，而他们所获商业利润又大多流出本境很少在此落脚，如河南洛阳郑氏，行贾临清，而把所获利润带回家乡，维持其在原籍的地主家族的经济。⁽¹²³⁾徽商李君“时时贾临清，往来江淮间”，间岁一还乡，而最终定居江南嘉定⁽¹²⁴⁾。资本既不进入生产过程，又不在此扎根，因而临清的经济繁荣也就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基础极不稳固。

四、商品流通对临清及相关地区的经济影响

没有畅通的运输渠道就没有繁盛的贩运贸易。前已述及，临清商业的繁荣主要得利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分合于临清的三条水道，北达京、津、南抵苏、杭，西及汴梁，是临清商品流通的主脉；以这三条主干为端点，再与其他水路、陆路相互衔接，就构成一张动脉与支脉纵横交织的广袤的商品流通网。正是通过这一流通网络，临清的商品运销所及，除山东本省各府州县外，包括京师、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以及辽东等地，遍及明代十三布政司中的九个，清代关内十八行省中的十四个以及关外的广大地区，甚至远及西藏、内蒙等边疆特区。可见州志所称，临清盛时“南达闽粤，北通辽海”，⁽¹²⁵⁾，当属纪实而非虚妄。

临清作为南北物资交流中心，从南方输入的布匹、绸缎、铁锅、磁器、纸张等等，大多为当时经济相对落后的北方地区不能生产或所产不敷需求的商品；而输往南方的棉花、豆类、梨枣等农产品亦为南方所需，商品的相互流通，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满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各种需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商品流通也当然地对临清本地及周围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商品流通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临清原为东昌府属县，元末明初的战乱曾使“淮以北鞠为茂草”⁽¹²⁶⁾，对这一带破坏很大。明初，临清编户仅只六图，地广人稀，

疮痍满目。洪武年间，划堂邑等县版图归之，并屡次迁民以实，渐增编为三十六图⁽¹²⁶⁾。即使图图满额，达110户，也不过三千余户。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游官侨商日渐繁衍”⁽¹²⁷⁾，“四方之人就食日滋”⁽¹²⁸⁾，临清城乡人口都有了迅速的增长，在建置上也升格为州。临清城也因“生聚日繁，城居不能什一”⁽¹²⁹⁾，于正德、嘉靖年间两次扩建，“以卫商贾之列肆于外者”⁽¹³⁰⁾。到万历年间，临清州户口已增至三万余户⁽¹³¹⁾。

各地商人的涌入，商品的汇集，在临清形成了遍及全城熙攘喧嚣的商业街市；为商业资本活动所需的购销储运等各项设施，则为本地居民提供了门类众多的就业机会。这二者相辅相成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临清城市经济的整体。商品流通使临清由明初的荒郊僻野，以及其后的漕运码头，发展为一座繁华的商业城市。

第二、商品流通促进了本地区农业生产的商品化。

临清城的南北物资交流中心分别为本地区农产品的汇集和远销，以及南方手工业品的输入和转销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活跃与发展。“商业依赖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¹³¹⁾，二者互为因果。明初，临清地区值战乱之后“田乡荒芜，居民鲜少”⁽¹³²⁾，社会经济亟待恢复，尚拿不出多少商品与南方相交换。中叶以后，随着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植棉的普及，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农产品输出增长，交换能力也随之提高，能够从江南输入更多的手工业品和其他必需品，而交换的需要反过来又促进着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嘉靖、隆万以降，该地区农业的商品化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而且形成了农业种植的专业性分工。夏津、高唐、武城、恩县都是棉花的集中产区，夏津县五个乡中就有三个乡以植棉为主，以至“年之丰歉率以此为验”⁽¹³³⁾。植树种果也很普遍，有些农民甚至专以种植果树为业，“每岁以梨枣附客江南”，以出售果品的收入开支全家的衣食日用所需和交纳赋税⁽¹³⁴⁾。经济作物的种植自然是以出售为目的的，另一方面，经济作物种植

的专业化意味着有更多的农户需要从市场上获得粮食，也就同时反映了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棉花、梨枣等农产品的大量输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农的经济收入，如棉花的输出就使锦州很多农民“以此致富”⁽¹³⁵⁾，甚至引起民欲转奢⁽¹³⁶⁾；而这一地区农产品输出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为江南地区提供了手工业原料和产品市场，从而为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事实上南北两个经济区的频繁交换，不仅对于交换双方，而且对于活跃全国经济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交换中枢的临清，功不可没。

第三，商品粮食的流通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起着平抑粮价的作用。

粮食的流通是临清商品流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粮食的流通满足了临清城市大量非农业人口、流动人口、附近乡村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人口的日常消费，以及种植粮食的农户的调剂品种、余缺的诸多需要。不过，由于临清粮食市场的流通规模甚大，其作用远不止此。

我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粮食生产是农业的最主要內容，生产条件、技术水平的基本一致，使得商品粮食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会形成大致相同的价格。这种地区性的平均价格又会由于供求关系发生波动，而波动的结果是使粮价在一个更大的范围的趋向平均。我们知道，地区间的价格差是商人追逐的商业利润的重要来源，因而也是吸引商品流通的动力所在。从一个较短的周期来看只要价格差大于流通费用，这种商品运动的势头就不会停止。如果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反复流通的结果，必然导致相关地区之间的价格趋向一致。灾荒歉收或其他意外变故，会引起某一地区范围内供求失调，从而使长期流通形成的地区性的“常价”被打破。商人的囤积居奇更推波助澜地加重了价格上涨趋势。但是，这种状况不可能长期持续。如前所述，地区性的价格差会引起丰产低

价地区粮食的大量流入，使粮价回跌，重新达到平衡。如天启年间，丘县遭受蝗灾，谷价沸腾，知县高继凯“为转河南粟千余石而价以平”。¹⁷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粮食的丰歉调剂正是临清市场粮食流通的一项重要内容。透过临清这一窗口，我们已经看到，因丰歉不均引起的供求失调是三省间出现粮食差价的主要原因，这个地区的差价既是吸引商人贩运粮食的主要动因，也是粮食流通量的重要调节器。差价小，“商人获利无几”，则贩运者少；差价大，“商人趋利如鹜”，粮食流通量激增。从孤立的每一个商人来说，他从丰产低价地区运往灾区的粮食越多，速度越快，自然获利就越大。但是由于众多商人的争相趋利，结果却是这种输入速度越快，输入地的粮价回跌也就越快；输入量越大，粮价就越是趋向于“常价”。以临清为中心的粮食流通正是通过供与求这对矛盾的不断运动，使粮食价格在一个相当大的区域范围内趋向平均，并不断地维持着这一平均化趋势。这样，建立在地区性生产水平基础上的小范围内的粮食价格，通过流通波及相关地区，从而形成一个较大范围内的价格平均；而这一大范围的价格平均，又通过流通不断地起着稳定某些小范围内由丰歉或其他原因引起的价格波动的作用。换言之，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正是通过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自发调节，形成“常价”并不断地维持“常价”的过程，也正是通过本身使封建商人的贪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从而使其商业活动更多地起到了保证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进行的积极作用。明清封建政权为了保持政治上的稳定，也是采取措施尽力稳定灾区粮价的，除了利用传统的常平仓之外，还采取鼓励商品粮食流通的政策，灾年免收粮食运销税就是政府利用临清这一重要的粮食市场的证明。因此，封建商业贱买贵卖的规律在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范围内，在象粮食这类商品的流通中，其作用并不是无限度的，同理，布匹、绸缎以及其他各种大宗民生日用品的贸易，或多或少也是如此。

总得说来，临清作为商业中心，对于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无疑

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过，对于该地区生产结构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其所起作用则甚微。

活跃在临清市场上的商品——我们暂且撇开其中属于中转的部分不论——输出以农产品棉花、梨枣为主，输入以棉布及日用器皿为主。即以本地的初级农产品换取南方的手工业品。“以州之所以有余易州邑之所以不足”⁽³³⁾，反映了临清地区与江南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的这种交换，显然对经济较发达的手工业产品输出区更为有利。这种交换的发展，交换双方在经济水平上的差距也就越大。因此，商品交换不仅只是个量的扩大，还有个质（这里是指输出商品中手工业产品所占比重）的提高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临清作为商品中心存在了数百年之久，并没有给其周围地区经济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这里的单一种植结构依然如故，商品输出仍以初级农产品为主，历史证明，农产品的直接输入城市乃至远销，可以引起城市商业的高度繁荣，却不能导致本地区生产结构的显著变化，只有农产品就地加工的发展，才可能促成农村经济的根本性变革。

临清的商业是为封建政府的国用军需服务的，也是为社会各阶层的消费需要服务的。这种类型的商品流通是建立在需求基础上的，它从属于消费。一个很说明问题的现象是：作为纺织品贸易中心，临清的繁荣是与北方纺织业的落后，从而形成的北方消费市场对江南纺织品的需求相联系的；而它衰落则恰恰是由于北方棉纺织业的发展造成的。足见这种商品流通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16—18世纪的临清城市经济，一方面是商业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是产业的相对薄弱，由于资料的欠缺，我们尚难以确认在该城经济中有无资本主义的因素产生⁽³⁴⁾。不过，如果从该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考察，起码可以认为，临清商业的高度繁荣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曲，商品流通并没有为之带来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

临清属于商业中心型城市。临清城在建筑之初，几乎完全是为了保卫国家漕运仓储的需要；其后的城市扩建以及建置上的升格，

主要也是因为它在保证政府和军队的供应方面，以及财政税收上的重要地位。封建政府为了漕运而对运河不断修浚，随之而来的则是商品流通的发展，这一经济的自然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或者说是冲淡了该城的政治色彩，使之最终得以商业著称于世。如果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划分为政治中心型、手工业中心型及商业中心型三类的话，临清无疑属于第三种类型。与各级较大的政治中心，如开封、济南等城市相比，临清没有众多的高级官僚，也没有封王赐爵的世袭府第；和以较发达的手工业著称的城市，如与苏州（当然，该城的商业也很发达，这里暂且撇开不论）相比，这里没有闻名遐迩，行銷全国的特殊手工业产品；临清在某些方面倒是与位于长江中游的汉口有类似之处，都以发达的转运贸易而著称。

临清的繁荣并非基于自身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恰恰相反，它的繁荣是当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是北方消费市场对较为先进的江南经济的高度依赖的产物，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全国范围内的余缺调剂、有无调剂。南方商品的大规模北销，需要有一个中继市场，而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方面的特点，则使该城得膺以此重任。正因如此，临清商业的繁荣与北方经济的发展程度成反比，随着清代北方经济的发展，临清的重要性势必日益下降。这一点，在 18 世纪已经有所反映。

临清的商业多为转运贸易，是沟通产品与消费的桥梁，它以生产过程的终结为前提，并不介入生产之中，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16—18 世纪的临清并没有由于商业发达而产生资本主义。在中央集权制度下，临清所起的作用不仅是为保证国用军需的供给。同时也在为整个地主经济的运转服务，该城市场上粮食、棉花的大量吞吐正反映了这一点。临清的商业并不是地主经济的对立物，而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就决定了这座繁荣的商城的封建性。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

【注释】

- (1)徐阶:《漕运新渠记》,见《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四十五。
- (2)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十六。
- (3)王直:《临清州治记》,见(康熙)《临清州志》卷四,艺文。
- (4)王直:《临清建城记》,见(康熙)《临清州志》卷四,艺文。
- (5)八大钞关为:崇文门、河西务、临清、浒墅、淮安、扬州、北新、九江。八关商税总额三十四万余两,临清一关即占四分之一。参见:《续文献通考》卷十八;赵世卿《关税亏减疏》,见《明经世文编》编四十一。
- (6)明嘉靖——清乾隆,约相当于16—18世纪。其间,明末清初的政治变革与战乱,曾使该城一度萧条,至康熙年间逐渐恢复。因此,临清的繁盛时期实际上分为明嘉靖至万历,以及清康熙至乾隆两段。本文以下所言“明代”及“清代”除特别注明外,即分别特指这两个阶段。
- (7)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建置。
- (8)(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建置。
- (9)以下关于城内商业街市的描述,除特别注明外,均依据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和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建置。虽系乾隆年间的记载,但亦多述及前代。从这些材料记载看,明、清两代除某些店铺的数量增减(见后文所列店铺增减表)和少量迁移外,市街本身变化不大。
- (10)(11)(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建置。
- (12)(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物产志。
- (13)(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榷附临砖。
- (14)(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15)(民国)《临清县志·经济志·商业》。
- (16)(万历)《东昌府志》卷十二,赋役。
- (17)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
- (18)(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物产。
- (19)(嘉靖)《常熟县志》卷四,食货。
- (20)《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
- (21)陈作霖:《金陵物产风土志》。
- (22)(嘉靖)《河间府志》卷七,风俗。
- (23)《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七十六,万历三十年九月丙子:《万历会计录》卷四十二,钞关船料商税。
- (24)《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一回,“韩道国拐财依势,汤来保欺主背恩。”

- (25) 参阅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9—30页;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57,明代各镇军马额数。
- (26)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二,万历十七年六月丙戌;范濂:《云间据目钞》卷四,记赋役。
- (27)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三十六,景泰四年十二月辛亥;(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物产。
- (28) 陈继儒:《陈眉公全集》卷五十九,天税议。
- (29) (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30) (万历)《东昌府志》卷二,风俗。
- (31)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万历)《历乘》卷十二布帛;(万历)《兗州府志》卷四,物产。
- (32) 参阅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第二章第六节。
- (33) (乾隆)《正定府志》卷十二,物产。
- (34) (乾隆)《乐亭县志》卷五,风土。
- (35) (乾隆)《孟县志》卷四,田赋·附物产。
- (36) (嘉靖)《正阳县志》卷九,物产。
- (37) 《抄档》:山东署抚按晋道光四年二月十七日题本。
- (38) (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39) 以上均见(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40) 《抄档》:户部尚书海望乾隆十年十一月十五日题本。
- (41) 《抄档》:户部右侍郎吉庆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九日题本。
- (42) 乾隆二年起,天津、临清两关奉旨免征部分过关米粮税银;乾隆七年又令全国各关全部免征米粮过关税;至乾隆十三年停止免征。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七,征榷考。
- (43) 临清关税则“征收米麦税银,照浒墅关之例,签量计石,每担纳银二分二百,杂粮照原额,每担一分一百”(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三十九,户部·关税)。如果按每石征银二分二百计,乾隆二年免征税银12.830两,折粮为58万余石,如以每石征银一分一百计,折粮当为116万余石。按此推算,乾隆九年免征税银52.970两,折粮分别为240万石和480万石;以平均额27.810两计,折粮则为125万石和250万石。
- (44) 按规定,商货于临清发卖者纳全税;在四处发卖者临清税六分;如系赴河西务、崇文门发卖者临清只税二分,其余至发卖地补足(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三十五,商税《士商要览》卷一)。由于临清关免征的税银中,肯定有一部分属

过税，因而上述折算的粮食量显然低于实际的粮食过关数量。

- (45)《抄档》，工部尚书哈达哈乾隆十一年五月十四日题本。
- (46)参见免税表中乾隆十年免征税额及注①。
- (47)併豆业建神尺堂碑(道光二十三年)，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82页。
- (48)(光緒)《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七，户部·漕运。
- (49)《抄档》，署理山东巡抚琦善道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题本。
- (50)(明)何廷桂《修理三仓记》，见(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三·田赋·仓库。
- (5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十一，山东七。
- (52)《万历会计录》卷三十五·漕运。
- (53)俞諒，《漕例疏》，见孙旬：《皇明疏抄》卷四十二，转引自鲍彦邦《明代漕运的形成及其赋役性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一辑。
- (54)张维新，《改折漕运疏略》，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十三，河南四。
- (55)马森，《明会计以预远图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九十八。
- (56)(乾隆)《临清直隶州志》旧序。
- (57)每年经由临清往返的漕丁雇达24万人次，往来客商从其贩运的商品量推算，当亦不在此数之下。
- (58)(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建置。
- (59)(万历)《东昌府志》卷二·物产。
- (60)《三台万用正宗》卷二十一，商旅门·大小麦条：“小麦高者，须是小滩，东昌”。
- (61)(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光緒)《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九十一，户部·积储。
- (62)(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63)(嘉靖)《高唐州志》卷三·地理志；(嘉靖)《河间府志》卷七·风俗。
- (64)《明穆宗实录》卷五十四，隆庆五年二月庚子；卷五十五，同年三月庚寅。
- (65)(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66)(康熙)《永乐府志》卷五·风俗。
- (67)(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68)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
- (69)(嘉靖)《山东通志》卷八·物产。
- (70)《三台万用正宗》卷二十五，商旅门·棉花
- (71)(万历)《东昌府志》卷二·物产。
- (72)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

- (73)(乾隆)《夏津县志》卷二,建置志。
- (74)(道光)《续武城县志》卷二,街市镇集。
- (75)(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76)(嘉靖)《山东通志》卷八,物产。
- (77)(万历)《东昌府志》,卷二,物产。
- (78)《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十二,河南三,彰德府;《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百四十,大名府风俗考;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
- (79)《抄档》,户部尚书刘于义乾隆十一年九月二日题本。
- (80)《清河文献通考》卷四十三,漕运规则。
- (81)参见(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82)(84)(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物产志。
- (83)(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物产志;《如梦录》街市记;《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百五十五,宣化府风俗考。
- (85)(万历)《东昌府志》卷二,物产。
- (86)(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物产志。
- (87)(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物产志。
- (88)(民国)《临清县志》经济志,旧工艺。
- (89)(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90)(光绪)《馆陶县乡土志》卷八,商务:“磁器由直隶磁州贩来,若碗碟等器,质担价廉,人多用之。南磁贩来者少,且价昂,买者少。”这虽是清代后期的记载,但所反映的事实当同样适用于我们所考察的时代。
- (91)(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记载:马市、牛市,当年曾分别为马、牛等牲畜的交易市场,今则名存实亡。
- (92)(嘉靖)《河间府志》卷七,风俗:“贩铁者,农器居多,至自临清、泊头。”
- (93)参阅吴承明:《明代国内市场及商业资本》及《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分别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四集,《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 (94)(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首,旧序;卷九,关榷四。
- (95)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十一,山东七。
- (96)(明)刘梦阳:《修东岳庙记》,见(康熙)《临清州志》卷四,艺文。
- (97)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
- (98)(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建置,嘉区。
- (99)(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清代临清的典当业转由山西商人经营。
- (100)参阅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中对徽州商人的考察。

- (100)(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101)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 (102)《明史》卷八十，食货四·茶法。
- (103)(104)(105)(106)(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107)(康熙)《馆陶县志》卷六，赋役·盐课。
- (108)周庆去：《盐法通志》卷十九，职官七·政绩·明。
- (109)(110)《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一十八，万历三十四年二月丙午。临清的三大行为三行，尚未直到确切的记载，如果从商品经销额的大小推论，当以布、缎、粮三者为最。暂附志待考。《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一十八，万历三十四年二月丙午。
- (111)(万历)《大明会典》卷二十七，漕禁。
- (112)《万历会计录》卷三十五，漕运下。
- (11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七，户部·漕运。
- (114)同(111)。
- (115)《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五十四，景泰六年六月乙亥。
- (116)(明)王直：《临清建城记》，见(康熙)《临清州志》卷四，艺文。
- (117)《续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
- (118)(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119)《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一十八，万历三十四年二月丙午。
- (120)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红忍辱报仇。
- (121)(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122)(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 (123)何乔远：《名山藏》货殖记。
- (124)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 (125)《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户口。
- (126)(康熙)《临清州志》卷二，赋役。
- (127)程敏政：《义塚记》，见(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建置·惠区。
- (128)(乾隆)《临清州志》卷三，城池。
- (129)《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百五十，东昌府城池考。
- (130)(万历)《东昌府志》卷十二，赋役。
- (13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1页。
- (132)《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癸丑。
- (133)(乾隆)《夏津县志》卷二，建置志。

- (134)(康熙)《堂邑县志》卷十六,人物。
- (135)(万历)《东昌府志》卷二,物产。
- (136)《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百五十四,东昌府风俗考。
- (137)(康熙)《丘县志》卷五,职官志。
- (138)(康熙)《临清州志》卷二,土产。
- (139)明清时代,临清有不少曲坊、酒作、油榨等,这种作坊是要雇用一些工人的,其中有可能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但需作专门考察方能证实或否定。

《金瓶梅》本事时代考四题

王、莹

一、从运河看《金瓶梅》本事的时代

《金瓶梅》中屡写及“那时朝廷运河初开”、“官河”、“临清钞关”、“临清闸”、“临清码头”等语；西门庆差人数次去杭州办货，路经扬州码头，徐州洪等地，都是运河边的城市；东昌府的官员都从河道中来，即指东昌到临清的一段运河。可见《金瓶梅》所写本事与明代大运河有密切关系。第九十三回写道“临清第一座酒楼，谢家酒楼，前临官河”。“官河”即为运河的俗称，指明代朝廷使用专供南粮北运而开凿的运河，以别于一般河流的称谓。临清是运河边的重要码头。临清钞关也是因运河而设置。小说中故事很多是围绕明永乐年后海运已罢，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命脉这一特定历史地理环境为背景而展开的。因此，在对运河兴衰沿革的考察中，可以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一定的时代痕迹。

第六十八回有一段有关运河的叙述，至关重要：

“安郎中道：一年以来，王事匆匆，不遑安逸，今又奉命修理河道，况此民穷财尽之时，前者皇船载运花石，毁闸折坝，所过倒悬，公私困弊之极。而今瓜州、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一带，皆毁坏废圮，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

“三年欽限，河工完毕，圣上要差官来祭河神。”

这位工部安郎中，完全是朝廷钦派治河大臣的口吻语气，对运河的河通情况全局在胸，了如指掌，所言及的地名都是运河边的城

镇或闸坝。

从这段话所述及地名分析，是否能窥知一些时代内容呢？

黄河，自金、元直至清咸丰年，都是由河南东出徐州，由泗夺淮入海，大运河自南来在徐州交汇穿黄河北流。徐州东有吕梁洪。徐州、吕梁、沛县这一三角地带，是最容易泛滥决口的危险地带，黄河水于此冲入运河，携带大量泥沙，致运河漕运常遭淤塞而阻断。

嘉靖四十四年（1565），河决沛县，运道淤塞二百余里，留城以北经下沽头、中沽头等闸过沛县至鱼台、南阳闸一段运河遂废。隆庆元年（1567），在此段运河东三十里自留城至南阳闸开新河，即东运河，凡百四十里。

《金瓶梅》所写安郎中言及的徐、沛、吕梁、沽头、鱼台几个地名，均处于此段地区内，在此约一百多公里内竟被提及大小地名五个。由此可见治河大臣工部安郎中对此段南起徐州北至鱼台一段中运河关心之程度，远较运河其他地段大得多。

又所言及“新河”，靠运河之滨并无此地名。有一新河县是在广平府清河县之西北，东距运河尚远，当并非安郎中之所指，应排除。此外所说“新河”地名之解释，只能被理解为系新开河流之义笼统的泛指。明代中叶以后，属运河的新开河流只有两条，除一为上述东运河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泇河，于隆庆四年河决邳州后，由总河侍郎翁大立建议请开的，是为了使运河漕运不致中断，以避黄河之水引见，但未决而罢。至万历间始开，但又时开时止，延续至万历中期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泇泇，由微山湖东经韩庄、台儿庄至董沟会黄河。如系指此泇泇河为所言新河，从安郎中与西门庆谈话心理判断，他应更多关心因而也会多提及泇泇河边的地名，如夏镇、韩庄、台儿庄等，但他却连一个也未提到，可知所言“新河”并非指泇泇河也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进而证明，《金瓶梅》中工部安郎中与西门庆谈话中所涉及运河地名的年代内容，毫未涉及泇泇河的踪影，说明泇泇河之议及泇泇河开凿都是在这以后年代的来。自万历中期泇泇河段通

运后，南北这一段河道的祸患已成为历史陈迹，而被新开的泇河所代替，作为治河大臣的安郎中，也应是早将这些地方的印象撇在脑后，不需置理，自不会遇人交谈时辄频频提及。

又见于第四十七回写：“苗天秀…从扬州码头上船，行了数日到徐州洪”这一段描述与安郎中谈内容言及运河情况年代相符，既经徐州洪，便未及隆庆末至万历中期所新凿之泇河。显而易，既非泇河，所言“新河的解释，只能落在隆庆元年（1567）所开的南阳至留城东运河段头上。

新河既为对待旧河而言，则新河即东运河已成，安郎中谈话中为什么又把旧河道的地名鲁台、沽头、沛县又与新河同时并提呢？说明这正是反映了它的时间是在嘉靖四十四年至隆庆元年（1565～1567）这两年期间，兼理河漕工部尚书朱稀，循嘉靖初年盛应期开凿过新河当时未成而罢的故迹续开此河，同时兼采众议又与疏浚旧河同时进行的历史情况。

由于运道阻塞，“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三年钦限，河工完毕，圣上还要差官来祭河神。”朝廷心急如焚的心情跃于纸上。安郎中的一段谈话，从地点、时间、朝中治河决策都与上述河运史真实情况非常相符，且合乎逻辑。因而据此判断，《金瓶梅》所描述的有关运河情况，其年代下限应为隆庆元年（1567）不及历万。所写工部安郎中，作者构思所依据的人物原型，说不定正可能是当时兼理河漕的工部尚书朱衡，或系与朱衡同时“廖典水利”总理河道的金都御史潘季驯。

二、从临清钞关看《金瓶梅》的年代

《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八回写西门庆差韩道国去江南办货情况：“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段绢货，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缺税钞银两，方才纳税起脚。”西门庆便令书童写封书交胡秀说：“与钞关上钱老爷，教他过税时青目一二”。第五十九回又写，韩道国：“全是钱老爷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段箱两箱并

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爷接了银单，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第六十七回：“我与雷兵备不熟，如今又转央钞关钱主政替他说去”。此外尚有数次写及“临清钞关”“钞关钱老爷”“钱主政”等语。

按“临清钞关”，并非出于虚构，《明史》及《临清州志》明人笔记史料均有详细记载，因而可从又一角度窥视《金瓶梅》故事描写年代。

《明史·食货志》：宣德四年（1429），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是……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远近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其倚隐匿不报者，物尽没官，仍罪之。于是有^漷县、济宁、徐州、金沙州、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

《临清州志·职官》（康熙十二年）载：“户部榷税分司明宣德十年（1435）设（临清）关，以御史或郡佐，无专职，正统、成化间再罢，景泰、弘治初再复。乃岁出主事一人督收船料商税之课，课无定额，大约岁至四万金钞，嘉靖庚戌以东昌府幕一人为监收官”。

明吴宽有诗一首，亦有史料价值。诗云

献蒸金门苦未休，
归心日夜水东流。
扁舟载得愁千斛，
闻说君王不税愁。

（见《清诗话续编》张谦宜《茧斋诗谈》）

吴宽为长州人，成化八年进士，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侍武宗东宫讲学，弘治十六年进礼部尚书。（《明史·吴宽传》）此诗当约作于弘治十六年（1503）前后，即可能吴宽由京返江南途经临清钞关时，与临清户部榷税分司钞关主政的赠答之作，吴宽的诗写得自然风趣，语气流露当时的临清钞关的户部主事可能与吴是熟人，

赠答之词无拘束。此际临清钞关的户部主事约可能为：“王舜夫（新都人）、或刘煥（藁城人）、徐琏（武邑人）、刘绎（代州人）、朱本端（陵县人）（见《临清州志·职官》）究竟为谁何当然很难弄清，但从此诗中可弄清了^①《金瓶梅》中的称谓“钞关钱主政”与诗题“临清榷关主政”全相吻合；^②对照《临清州志》记载，“户部（临清）榷税分司，弘治初再复，岁出主事一人”等语的时间、地点、称谓均全相符。

据史可知临清钞关正式设置在宣德十年（1435），但有户部主事时是在弘治初。再下推至弘治十六年吴宽与临清钞关主政的赠答诗，这当是《金瓶梅》所写临清钞关的时代上限。其年代下限应止于何时？是否会象有同志据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临清民变反税使马堂事件，推断结论为“临清上税，不能早于万历二十六年，《金瓶梅》即写于万历二十六年之后”（见《文学评论丛刊》十八辑）呢？

《金瓶梅》第九十二回描写：“到了临清，看临清市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当为临清市面正处于繁华鼎盛时期。这鼎盛时期持续延至万历中期，后则有较大的改观。

“万历二十七年三月上命马堂税临清，其初至临清，于四月青黄不接之际，临清工商士庶深受其害，忍无可忍，于是高山一呼万众聚首，拥至马堂署门前请恩要求免征。”（《明史纪事本末》）遂发生了震惊朝廷的临清民变“（马堂）始至（临清），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夺人产，抗者辄以违禁罪之，中人之家破者大半，远近为罢市。州市民万余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事闻，诏捕首恶，诛连甚众。有王朝佐者，素仗义，慨然出曰：‘首难者，我也’。临刑神色不变，临清民立祠以礼”（《神宗实录》）

从上举史料可知，临清钞关之设远在宣德十年，与万历二十六年始派太监为税使不是一回事。无庸再赘。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以《金瓶梅》是否直接间接反映此临清民变事件，作为判断年代的根据。但是，大体可以此事件为《金瓶梅》年代作如下印证：

(一)从称谓看,《金瓶梅》所写屡称“钞关钱老爷”“钞关钱主政”,决非指万历后派遣至临清收税的中官太监,因《金瓶梅》中称太监为“公公”如“管砖厂刘公公”“管皇庄薛公公”,或称“内相”如“薛、刘二内相”。与对钞关朝廷所派命官户部主事称老爷是有严格区别的。

据此可知,《金瓶梅》所写之临清钞关决非指万历后中官临清收税年代。

(二)据临清民变义民王朝佐反税使马堂事以论证《金瓶梅》成书年代不能早于万历二十六年之说,不但不能成立,却从反面启示了另一确证。即临清民变事件发生于当时,并非一偶然孤立事件,而是与时代有着深刻联系。它掀开了明史上群众自发抗税关键的一页。紧接,万历二十七年发生了荆州反抗税使陈奉,二十八年武昌矿工反矿监王虎事件等。大学士赵志皋言:“今一见于天津,再见于上新河,不意临清一发如此之烈也”。(《神宗实录》)成为带有近世民主运动色彩的先声,影响波及朝野大为震惊,被称为“直斥时事”之作的小说《金瓶梅》,不但在内容上看不到此临清重大事件的丝毫痕迹和瓜葛,即从作者的主要写作思想倾向判断,也决得不出半点预示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信息和兆头。就大的时代轮廓而言,可从反面得出其反映社会时代不及万历中期的论证。

又见于万历三十年九月实录记载:户部尚书赵世卿疏:“各关税史征:以致商少,……在临清关,则称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边¹通商折本,独存两人矣,又称临清向来段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二座,今闭门四十五家,辽左布商绝无矣”。

万历中期经过中官税使的掠夺,且运河屡因吕梁洪沛县一带决口淤塞,无法通航运,一度再复海运。临清、杭州间通商几陷于停顿。临清市面的繁荣已今非昔比,已决不是《金瓶梅》所写的“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的繁华大码头去处”的。

从临清钞关看《金瓶梅》故事的年代,决不及万历中期是一望

可知的，但具体下限年代可准确判断截止为何时呢？

因临清钞关景泰、弘治初再复后，岁出主事一人督收船料商税之课的制度，延续至嘉靖庚戌二二九年（1550），不再由户部直接派主事管理，而改由东昌府幕监收，如果《金瓶梅》的故事是描写此年代后的临清钞关，便不会称“钞关钱主政”即户部主事的称谓了。因此，其年代下限应截止于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

三、从钱币的流通看《金瓶梅》本事的时代

《金瓶梅》中描写民间交易用银钱情况，及陈经济唱曲《银钱名山坡羊》，给我们提供了一定本事的时代意义。

第二十三回：“妇人向腰里摸出半侧银子来，央及贲四叫他凿，称七钱五分与他，那贲四正写着帐，丢下走来蹲下身子替他锤……小厮把银子凿下七钱五分，交与卖花翠的。”

第八十六回：“周守备见了春梅满心喜欢，就兑出五十两一锭元宝来，这薛嫂儿拿来，凿下十三两银子，那吴月娘免不过，只得又称出五钱银子与他，恰好他还禁了三十七两五钱银子”。

《金瓶梅》中描写涉及银钱交易，绝大部分都用银子，大至行贿送礼、奴婢买卖，小至买花翠、连买菜，潘金莲当家时还专教春梅提戥子付银子。言及用钱的地方很少，如第六十五回：“拿出二十吊钱来，五吊赏巡捕军人，五吊与卫中排军，十吊赏营里人马”。第八十六回“经济向腰里解下两吊铜钱来，说：这两吊钱权作五奶奶一茶之费”。可见有时亦间以用铜币。

明代货币流通史大概就是这样：洪武间中书省造“大明通行宝钞”，申交易禁作金银。天顺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弘治间，山东、河南、顺天各钞关钱钞兼收，嘉靖四年，钞久不行，钱已大壅，益专用银。隆庆初，钱法复稍通，钞不用垂百余年。令民间货鬻值银一钱以上，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金瓶梅》中描写情况，盖多符合嘉靖至隆庆初这一段的情况，即钞久不行率皆用银，及后钱法复稍通时这四五十年的情况。

第三十三回陈经济唱“银钱名山坡羊”，第一段以双关语说及了“黄票儿”“狮子头定儿”“铜馨儿”“印箱儿”等银子样式及铜钱名、铸造过程、用具等，第二段则有一定时代内容：

“姐姐你在开元儿家我和你燃香说誓，我拿着祥道祥元好黄边钱也在你家行三坐四。谁知你将香炉拆爪哄我，受不尽你家虔婆鵝眼儿闲气。你榆叶儿身轻，笔管儿心虚。姐姐你好似古碌钱，身子小眼儿大无庄儿可取。自好被那一条棍滑镘儿油嘴把你戏耍，脱的你光屁股，把你线边大漆打硌铁洞儿无所不为来啊，到明日只弄的倒四颠三一个里沙也是不值。叫了声二兴儿姐姐，你识听知，可惜我黄邓邓的金背，配你这锭难儿一脸褶子”。

陈经济所唱曲《山坡羊》，正是嘉、隆年间盛行的时兴曲牌。而且曲中内容亦与嘉、隆年间的货币吻合。可能这并非出于作者本人之手的创作，而似应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民谣小曲或流行于妓院的小调，内容俱以银钱名谐喻妓女生活，以双关语连缀而成。为作者曹集顺手写入小说。所言“黄票儿”即桑穰为质的“大明宝钞”，“黄边钱”，“线(锭)边”、“火漆”、“金背”、“二兴儿”、“一条棍”、“滑镘儿”、“里沙”、“鹅眼儿”、“榆叶儿”、“笔管儿”都是当时铜钱及私铸劣质铜币的各类俗称。“行三坐四”“倒四颠三”是指当时好钱及劣质钱的比值。从下面史料中可得到印证：

徐阶《请停止宝源局铸钱疏》：“盖制钱之解自南京者，其背或以金涂之，民间因谓之‘金背’，或以火熏其背而使之黑，民间因谓之‘火漆’，其去南所解及宝源局先年所铸，纯用铜锡，……钱边又皆经由车鑊，民间因其色黄美，其质坚重，其边圆整，谓之‘鑊边’，近年所铸，革去车鑊，止用鑄模二匠，而工匠等人又复侵盜铜料，民间因其色杂质轻，其边鑊磨_多粗，遂谓之‘一条棍’。（见黄云眉《明史考证》）

陆深《河汾燕闲录》：

“予少时见民间所用皆宋钱，杂以金、元钱，谓之好钱，……新铸者谓之低钱，每以二文当好钱一文。弘治末，京师好钱复不行，而惟行新钱，谓之‘倒好’。正德中则有倒三倒四，…嘉靖以来，有五六至九十者。”（同上书）

徐阶上疏的时间，约在其以礼部尚书入阁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前后。“嘉靖三十三（1554）修改钱法，嘉靖钱七文值银一分，洪武等钱十文值一分，前代钱三十文值一分，小钱从此废”。（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正是倒四颠三至倒五六时期。隆庆初“时钱八文折银一分，禁民勿得任意低昂”。至万历四年虽亦“准嘉靖钱式铸金背、火漆、镴边钱”但“粗恶者罪之，盖以费多利少则私铸自息。”“古钱阻滞不行”，此时则根本无“倒四颠三”“倒好”之说矣。

从以上史料对证可推断，《金瓶梅》所写及银钱币制情况，当以嘉靖末隆庆初为下限。

四、“狼筋”再考并及其时代

《金瓶梅》第四十三回写西门庆因丢失了一锭金子，分付月娘：“你与我把各房里丫头叫出来审问审问。我使小廝街上买狼筋去。早拿出来便罢，不然，我就教狼筋抽起来”。

第四十四回又交代，小玉向月娘告诉发觉夏花儿偷金的过程：“头里听见娘说，爹使小廝买狼筋去了，吓的他要不的，在厨房间我，狼筋是什么？教俺每众笑道，狼筋敢是狼身上的筋，若是那个偷了东西不拿出来，把狼筋抽将起来，就缠在那人身上，抽攢的手脚儿都在一起”。

这段描写是西门庆刚得知丢失金子时，当着吴月娘、潘金莲的面说的话，亲分咐月娘叫人去街买狼筋。以其当时心情和说这番话的场合判断，当不会是开玩笑，口气严肃而认真；此时此刻他不加思索脱口而出说去街上买狼筋，那么，这狼筋并非是很贵重也并非难买到，而是街上店铺普遍出售的普通东西；又这时说话并没有婢

仆等用人在场，好像也并不是以狼筋吓人，后来小说说狼筋敢是狼身上的筋，抽攒的手脚儿都在一处，这才是故意拿来吓人的话。并可见连小玉等众人都知道狼筋的本来意义，并非真是狼身上的筋。

那么，这狼筋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金瓶梅》所写及的物事都相当真实可靠，大多数可考，因此，又不能怀疑独此狼筋系出于作者无中生有毫无根据的杜撰。

陈诏《金瓶梅小考》曾有考证，他援引了《酉阳杂俎》的记载：“狼大如狗，腔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盗者熏之，当令手挛缩，或言狼筋织络，小蠹虫所作也。”又引证《两般秋雨庵随笔》“狼巾”条谓：“其色枣赤，…不镂白雕，如细目之网，缘督为经，又若小口之囊，以是知为虫所结…是物为狼巾，不知何据”

此二条所引似均为药物，故可以之烧烟而熏盗贼，且似稀有罕见也较贵重的东西，故在上层社会中可以资“团结决赌”。与《金瓶梅》所说令买办最普通日用东西的跑腿小厮到街上去买，并可用以“抽将起来”等语对照，无论从该物的形状大小、售求途径、使用方式、贵贱程度看，显然都毫无共同之处，因而此考不可信。

狼筋，从小说描写判断，当是一种可抽人的鞭子、藤条之类，街上店铺有售，但又不是普通常见的刑罚用具真的是皮鞭、藤条、竹箠等，应是特制的比普通刑罚具更厉害，否则在家中随手可找到便不必上街去买了。又从狼筋二字的字形及发音判断，应是“狼筅”的误写，或是对此新兵器约定俗成的俗名。

《明史》记载，戚继光防俺答于蓟，隆庆二年，帝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守三镇练兵事，辽蓟步兵三万，浙兵三千，专属继光训练。继光立军营，用四人推挽结方阵，寇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间以长枪，狼筅，寇奔，则骑马逐北。

筅，音先 xiǎn，筅？是用竹丝做成的洗涤用具。狼筅亦名“狼筅”。《辞源》注：“[狼筅]兵器名，长一丈五尺，有竹、铁两种，附枝九层、十层，明将戚继光施于水田中以代蒺藜与拒马木。见《武备志》

一〇四《狼筅》”。

实际“狼筅”是一种用竹或铁制的长扫帚形状的东西，是戚继光练兵特用的兵器或可用以拒马。他在京师周围蓟州、昌平、保定这大三角地带内练兵，所需兵器狼筅等军需品当不在少数，后勤补给需仰给于广大地区内的手工作坊，地方征派也需靠商业的转输贩运。北方不产竹，与清河天鼻毗邻的临清是离此练兵区较近的大码头，货物集散交易场所，从南方在运河运竹至临清、清河，由当地加工制成狼筅这种新兵器，供应军需且进入市场以备征集，在街上店铺中出售是完全可能的。西门庆派个小厮去买，很便当。“狼筅”或“稂筅”可能是戚家军在浙江御倭时曾用，传到北方不仅是稀罕事物，且这个名字对临清、清河来说是外来说，很不顺口，以音相近形相近，便始由误传继而约定俗成便均呼为“狼筅”了。

如果上述判断不错，其年代便很易查考，即正是处于隆庆年间。

临清方言和《金瓶梅》

张鸿魁

我的看法是，《金瓶梅》的作者应该是个曾经在临清长期生活的人，他熟悉临清方言。

这里说的临清方言是四百年前的临清百姓的口语。比起那时候来，现在的临清话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但有很多特点是相同的，可供比较研究。在作这种比较之前，有必要说明两点。

首先是文学作品反映方言口语的程度。百万字的小说不会是大字不识的土佬写成，而读书识字的文豪就不免受官话书音的影响，此其一。文字的东西不能完全反映口语方言，这是天下通义，汉字更甚，轻声儿化诸多生动的音变现象只能曲折地有所表现，此其二。一部小说经多人口传手抄，辗转流刻至今，漏落讹误可以想见，此其三。今天所见的《金瓶梅》和当年活跃在口头的方言俗语，有不少距离。

其次是“方言”的概念的理解。一地方言总起来说是有特色的，但每一个具体的特点的覆盖面都不是绝对稳定的。从外部看，很难说，某一特点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别的方言甚至临近的市县都不这么说。从内部来看，临清的东乡和西乡，老人和孩子，文化高和没文化的，语言也有差别。临清城内这样有限的地方，南城和北城，老派和新派，汉民和回民也都有相当的差别，但都应当包括在临清方言的范围内。想当年，运河大码头商贾行聚，仕宦过往，临清话也应该是相当复杂的。

现在的临清方言，可以运河为界分成两区，下文说的临清方言以城关（归西区）为主，有时举东区的例子简称东派乡。东乡有些话也许是四百年前临清话的遗留，而城关则因为太活已经走了样。

下面分别以语言、词汇、语法几个方面把现代临清方言跟金瓶梅用例作些比较。

一. 语 音

我在《“金瓶梅”的方言特点》一文中(文载《中国语文》1987年第二期),曾证明了以下几个特点:

1. 韵母——(1) —m 尾并入 —n 尾,(2) 入声韵脱落辅音韵尾,(3) n 尾字和 —ng 尾字有混淆,(4) ao 韵和 —ou 韵有混淆 (5) uo 和 u 韵有混淆(6) 儿化韵—er 和 —ir、yr 同同,(7) ang 和 ar 同音;

2. 声母——(1) 浊音声母清化,(2) 舌面音 j、q、x 产生,(3) z、c、s 和 —ir、yr 同音,(7) ang 和 ar 清音;

2. 声母——全浊上声变去声。

其中 1 条的(1)(2)(6)、2 条的(1)(2)、3 条符合现代多数北方方言、临清话也包括在其中。

1 条的(7)和 2 条的(3)范围就缩小了,现代北方方言话只有个别地方有,就我所知,河北昌黎、山东东平、济南符合 1 条(7),但不合 2 条(3),山东菏泽(即《曹州兵备管得宽》中的曹州府)符合 2 条(3),但不合 1 条(7)。临清西区却是二条兼备。

1 条中的(3)(4)(5),临清话不普遍,但个别字是如此,举例如下。

(3) 条 —n、—ng 相混:“懂”有的读 dun、“婶子”可同“饼子”押韵,“好生”读 hao shen

(4) 条 —ao、—ou 相混;害羞说器、害臊,山药读如“塞友”。

(5) 条 uo、u 相混:暖和读如暖乎,凑和读如凑乎、做读 zu 或 zou。

就特殊字音看,现代临清话也有很多可以解释《金瓶梅》中的谐音和异体。

“撅”(→),意义是折断,引申为折迭肢体,临清读“缺”音上声。(35 回“缺撅着行房”=“缺着行房”(42 回“唐胖子吊在醋缸里把撅子酸了”22 回“撅臭了你这王八了”、=77 回“蒋胖子掉在阴沟里缺臭了你了”)现代临清仍有很多阴平、上声两读的字,后文还集中讨论。

“踏”临清 zha,“才次才作”临清读 zha。(5 回“大踏步直抢入茶坊里来”9 回“大权步云飞奔到狮子街来”18 回“二娘没嫁蒋太医,把

他倒踏门抬进去了”)这里也有阴平调和上声混淆的情况。

“僻”临清读同“背”。《金瓶梅》37回“僻格刺子”21回作“蛤蜊子”(“合”有 ge 音，如“合气”“蛤蜊”，25回有“石头貉刺”“貉”也应表示 ge)

“国”临清音 guo，有音 gui。“鬼”临清读 gui(《金瓶梅》用韩道国谐“捣鬼”，“破家误国”写作“破家误鬼”(83)“搊混”又写作“鬼混”。这里也是阴平字和上声字谐音。

“忒”临清音 tei，同“推”。32回“鬼酉儿上车“射”忒(推)丑酉鬼”。

“畦”临清音 xi 同“席”。86回“你叫薛妈替你寻个好人家去罢我腌臜正还是入不的畦了。”

“别划”临清音 hai huai《金瓶梅》^别划(30回)又写作“别划”(43回)(“别字”临清今音“hai 字”)又作“摆话”(21)

介词“把”临清口语多读 hai，32回“摆人的干花也圈了”、61回的“愁来别酒强重斟”。

“倘或”或作“倘忽”。临清音“倘 huit=hur”“一会儿”有作“一回儿”“一忽儿”，临清今音“一会儿”的“会儿”读轻声同“回儿忽儿”。

“恁(那么)(何等)临清音同“能”，38回“砖儿能厚？瓦儿能薄？”(《水浒》回作“砖儿何厚？瓦儿何薄？”)39回“隔墙掠肝，能死心踏地”

“猫”临清音同“毛”19回西门庆讲故事“你下面有猫儿没有”谐“毛”。

临清阴平字读折调，上声字读高平调，都跟读高平调，都跟北京音相反，有些字阴平、上声两读可能是读书者和口语音的差别。

“蒋”临清有读同“姜”(姜)，厨子蒋聪即谐“姜葱”，“蒋胖子吊在阴沟里”(见前)也是谐“姜”。

“锦”临清又读同“巾”“金”。61回曲中“簇红巾”写作“锦”。10回“悬起锦帐”写作“金”。“晓”临清又读同“消”。72回“怎么曉得？雪里埋死尸，自然消将出来。”

“隐”临清又读同“阴”。46回“醉花阴”写作“隐”。

古入声字临清今音的韵母和声调，跟《金瓶梅》中押韵和白字表现出的情况相符。

“学 xiao”“鹤 hao”和“桃”押韵，见 60 回。

“落”lao“跟“赵、叫 ~~勒~~”等押韵，见 40 回。

48 回“犒劳”写作“犒乐”

475 页“四脯着地”59 回，又写作“四扑着地”(795)

“铁”临清读阴平声，32 回“胡铁”可以接替“胡说”。

“塔”临清读阳平声，80 回“桥塌客过稀”写作“桥塔客过稀”。

“八、发、煞”临清同读阴平，96 回叶头陀韵语可以相押他如：10 回“业畜”即“孽畜”“孽”读 ye。

有些上声字临清读阳平。55 回“佛桑花”即“扶桑”，“佛”读 fu。“蠢”读同“唇”，39 回“八十岁妈妈没牙，有那些唇说的，”，用“唇”谐“蠢”。“卵”读同“鸾”，86 回“我把你短命王鸾儿割了，教我直孤到老！”用“鸾”代“卵”。

“差(岔)”cha，去声，临清话“差”是“错了”的意思。53 回：“檐头雨滴从高下， 点也不差。”91 回：“官差吏差，来人不差”。回“说岔了话”。

二. 词 汇

汉语中方言的词汇量是很大的，系统也是极复杂的，个别词语的比较无法确定语言的属性。本文试图用新的方法观察金瓶梅的词汇系统。(一)几种特殊构词法，(二)极具地方特色的动词，(三)使用频率高的名词。(四)反映特定地理文化的词语。

(一) 特殊构词

1. 不——：

“不是”意为错误、缺点。前面可加修饰或限制成份，表明它已是一个结构稳定的词。例如：“许多不是”，“我的不是”(8 回 3 页上)

“不好”意为“病”，有名词、动词两种用法。前者如“害不好”，后者如“不好了一场”(12 回 9 页上)。

“上齐”，意为“身体、本事”不好。

2. ——不的：

这里指的“不”是象“吃不的”“吃的”那样的可能式，这与“不”的“不的”没有相对应的肯定形式“怕不的”是表推测兼担心语气的相当于普通话的“恐怕”

“少不的”仅表推测语气，相当于普通话的“大约、大概”

3、害 —

这种支配式结构，金瓶梅中很多，如“害热”、“害眼”、“害疼”、“害饿”、“害馋痨痨痞”。

4、——嘴

“嘴”作为一个词素，泛指语言活动。

(46回)“说嘴”、“偏嘴”，都是显示自己的意思。

(51回)“回嘴”，意为辩驳，(1060页)“强嘴”即“犟嘴”是更顽强的辩驳。

5、——口

“和为词素，义指“言语”。

“转口”、“倒口”指改变言语，改换说法。

“吐口”指发出言事，表明真实意图。

(二)特殊动词、形容词

许多词语注释把重点放在名物称谓上，实际上方言词语的特色在动词上表现的最突出。

手的动作如“掠”(liao)指轻率放置，大意“扔”

脚”的动作有“~~踩~~”“踏”“~~跳~~”。~~踩~~音 chai，指相对稳定地用脚支撑。~~跳~~音 ci 是不稳定支撑；一种用法是用脚虚踏，重心不在上，如“~~跳~~着门框”；另一种用法是用脚尖支撑，“~~跳~~着小板凳”。~~踩~~特指脚踏入胶态物，如“ 在泥里”。“踏”则有明显的动态，如“大踏步”，“倒踏门”。

服食动作有“噙”(nan)、“卷”(yan)均指大把地倒入口中吞食，前者指吞食粒状物，后者指吞食粉状物，又指用粉末敷盖。

其他身体动作。歪~~扭~~、仰摆~~扭~~、合蓬；徐顾斩眼；顾拾(故事)、拾位；(打)662 噴(p32,1197)。

其他动词：“扁担大蛆~~蛆~~(jiang)口袋”屎污了嫂子的手”

“整目标(biao)住在院里”“拿长锅(hu)吃了我”。“谁人保得不寻常”,“闲嘈(操)心”(230、365)

有些熟语式的词语:7回:“有的是”(多的很)不得闲(没时间)9回:“气不会”12回“不待见”“气不愤”

(三)使用频率高的名词。

如果要观察名词,也要改换方法,这里从衣食住行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名词入手,这不仅体现系统观察词语的方法,而且这些词是使用频率高而又通俗的,很难受地方言的影响。其中有些词语是从口语对话中选出,有些还是从其中的歇后语中选出的,尤其不容易受通语、学名或其他方言的影响。

衣着:帽头子、兜肚、鞋曳跟、提跟子、嚣纱片子、嚣段子。

饮食:麻糖、扁食、果子(糕点)、甜水、卷子、面筋。

居住:客位(71、1427)、倒坐(73、359)、台基(144、792、1458)、厦子(608)、隔扇(1159)、影壁(1050)、当天井(388、1404)、当街、街心、打墙板、出头椽子。

时间:早侵(辰)(673)、晌午(677、1169)、后晌(680、1045)、头里(刚才1022)、临了(最后225、1050)、年时(去年—1053、1057)、过年(明年—1044、1054、1316)、多吃(7回)、住会儿(677)、年下(1069)、大节间(177)。

方位:——以里、——后里

(四)反映特定地理文化的词语

临清是运河大码头,金瓶梅中有许多与运河有关的俗语。如:放着河水不洗船(74回)、船多不碍港(74回)还写到放河灯的习俗,指在运河里放灯荐亡。

临清地处平原少石头,而地砖生产却名列前茅,《金瓶梅》中歇后语“毛司里的砖又臭又硬”(85回)(299)(1282),在其他方言里多说成“石头”。

临清院墙多用湿土夯成,《金瓶梅》中有“打墙板儿翻上下”(90回)表示时势无常,我们的地位时常在变动改换。

临清称老太太为“老嬷嬷”(mar mar),《金瓶梅》俗语有“八十岁妈妈没平,有那些唇(蠢)说的”(38回)“老妈妈吃干

肉，恁 线一絲的。”

临清又称水饺为“扁食”，《金瓶梅》俗语有 41 回“常太尉吃扁食也学人样儿办事”，王婆卖嘴说 1 回“翻包着菜肉扁食”。

临清把柱杖称作“拐棒”，《金瓶梅》俗语有 26 回有“灯草拐棒柱不定”60 回“抄化子不见了拐棒，受狗的气了”。

临清一带，驴是主要牲畜，过去还是重要交通工具，《金瓶梅》中有关驴的俗语极多，反映了不同南方的习俗，如：“好心倒做了驴肝肺”（28 回）“驴粪球番前”（78 回）“牵着不走，打着倒退”（1 回）“老粉嘴”（7 回）“为驴扭棍伤了紫荆树”（25 回）“破磨对瘸驴”（60 回）“打着羊狗驴战”（198. 976）。

俗语中的动物也多是北方的，有些名称叫法至今保存在临清话里。69 回“出笼的鹌鹑，也是个快斗的”60 回“斑鸡跌了弹，嘴签谷了”“蝗虫蚂蚱，一例说着”85 回“虾蟆促织都是一锹土上人”（297. 1287）。86 回“养虾蟆促织得水蛊儿病”（211. 517. 1295）。34 回“虼虼脸儿，好大面皮。”16 回：“惹虱子头上的挠。”

三. 语法

(一) 动词词尾

1. ——刺

倘刺在床上 和刺不上（1052）

强如手拔刺（566） 拉刺家来（234）

刮刺（1381. 1385）

2. ——搭（答）

看答（211. 270） 饿答的个脸（1020）

雌答（662） 抗搭（1060）

搅搭（929. 1020） 丢搭（1428）

3. ——弄 long（“梳弄”又写作“梳笼”）

撮弄（901. 1103. 1209） 摆弄（789）

摆弄（787） 祸（“和”）弄（346）

搬弄（1458） 撮（cuo）弄（275）（407）

4. …—磨(莫) 埂(zhuai)(958)磨挨磨(865)
约莫(24) 料莫(1243. 1180)

5. —落:上落,数落,索落(673)、扯落、出落。

(二)形容词尾

刺刺(辣辣):大刺刺 热刺刺 焦刺刺

平不答的(974 111)

奸诈不级(967)

毕里剥刺(1019)

(三)副词:《金瓶梅》中有些表程度或语气的副词,用临清…带的话解释似更贴切

专一(1216)—专门

旋(15、145、149)—临时

恒数(291) 恒属(599、346、972) 恒是(311、369、923、1208)—大概、总是。表达一种自以为然的口气。临清话用“横(hou)是”

得为(1109)—有意地

刚(1383、1466)—勉强,临清读犟(jiang)

情(1465)—一个劲地

单(24)单管(77. 1284)—只

没的(1)没有别的可……(反问、表示不满)“没的说”

(2)莫非 难道 (表示推测)

强占(1264)—太、过分“强占的多了”

紧(9回、6页下)—最“紧隔壁”

“紧里头”。

随(7回0页下9回2页上)—任凭

再—有三种用法:(1)另外(2)还(7回3页上)(3)根本
(8回3页上)

(四)连词:

用—因为。临清口语读成“拥五”或“拥”(55、1312)

紧自(着)(124、128)……又……临清今音正是“紧自……
又……”

倘或、倘忽——设或、万一，今音 tang、hanir
但(146)、但无(11、47)——只要
一个(868)——一旦
不是(954)——不然
好(440)——读 hao，以便

(五)动补结构

1. ——杀(煞)(1)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杀(程度：极了)

“乐杀我老太婆了”“可不把唬杀”

(2)及物动词+杀(结果、死、灭)

走杀金钢坐杀佛 冤杀旁人笑煞贼

吹杀灯挤眼 房倒压不杀人 舌头倒压杀人

2. ——却去了：形容词+“去了”表示程度极高，到无法形容的程度。

“你的心眼好去了”

“鬼儿去了”(鬼：精明狡猾)

“兵马司倒了墙，贼走了”(疑“走”字为“去”字形误，“去”跟“走”的草书形近。“贼去了”，贼逃离了，谐指精明(贼)极了。

(六)代词

1. “俺”“咱”的用法

“俺”为第一人称，有表单数，复数两种用法。

“咱”可用于单数，表复数有排除式和包括式两种用法。

2. “旁人”“人家”——即别人、其他人。有时代指“我”、“冤杀旁人笑杀贼”“上门儿怪人家”。

3. “那么”(指示程度)读如“能”。“能死心塌地”“砖儿能厚、瓦儿能薄”。

(七)介词

“问”——“向”某人索取

“阁”——“从”某处取出(643. 998)

“赶”——(1)“指”某人称作某某：“赶他叫娘”

(2)“趁”：“趁眼错”

“绕”一(公读 yao)“遍”“绕地抓不着”

(八)“待”

1. 能愿动词:想、欲(215)

2. 时间副词:将要(860)(9回7页上)
(11回12页下)。

3. 语气词:用在句首缓和语气(1)“让”我来(8回2页下)。(2)“等、到”明天再说(8回4页下)。

(九)“来”

1. 表约数的助词:“碗来大疔疮”

2. 介词:“到”、“在”(21、87)、(1025、1181)。

3. 语气词:大致相当于北京的“来着”,多用于疑问句。用法比较复杂。

(1)用于特指向句询问对方过去(包括仍在继续的)行为:大官人过往哪里去来

吃谁的药来

姑娘说甚来

(2)用于特指向形成的反问句,表达不以为然或不满情绪:我身管着哪一门来。

(3)用于是非问形式的反问句,不满情绪更强烈。

我做下的,孝顺你来。

(4)陈述语气,陈述过去,而未完成(成又返回)的动作:

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备府去来

说姑娘骂五娘房里春梅来

说明:例证后括号内的页码据人民出版社本(戴鸿森校点);“×回×页上(下)”据万历本。

《金瓶梅》中的临清地名考

王连洲

一部现实主义著作总是把这描写的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就写作上讲也必然选择一定的典型地理环境为依托。《金瓶梅》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选择的典型地理环境是什么地方呢？一百回书中就出现了清河、临清、阳谷、东平、徐州、扬州、苏州、杭州、南京、湖州、严州、湖广、泰安、开封、枣强等约二十座城市，加上城市中的街巷、河桥、码头、关闸、市场，楼坊和一些不够具体的地方名字约有百处之多，初看之下，真令人觉得头绪杂沓、难寻端倪。如果我们把这些名字集合在一起进行认真分析后，就不难看出两个明显特点：其一是小说本事是发生在清河县城，而主要场景却是写与清河毗邻的临清。除书中多处直接提及临清外，在书中出现的城区细部地名也以临清为最密集，景物描写也最具体。其它地名则呈星散状态，大多未做详尽描述或是一笔带过。其二是这些城市与具体地名多与明代运河的漕运及因漕运发达起来的商业繁荣密不可分，有血肉联系。换言之，《金瓶梅》描述的故事是以运河漕运孕育的明代城市的商业繁荣为背景的。蔡国良先生在《金瓶梅反映的明代商业》一文中说：“由于商品交换，从南到北出现了一批商业城市，运河沿岸的临清就是这样沟通南北商品的重要城市。”他接着引述山东巡抚陈济的话，“淮安、济宁、东昌、临清、直结商贩所聚”（《明史·食货志》），故而“临清多大贾”，“临清为南北都会，萃四方货物滞焉其中，率非其地所出。”（《古今图书集成》卷二五五）。显然蔡先生已注意到临清这座运河城市对于《金瓶梅》成书的重要性。就连主张作者不是山东人而是江苏太仓王世贞的朱星先生也说

道：“清河县、临清码头等地都写得很具体”这也客观上承认了清河、临清在书中的特殊地位。尽管临清在书中随时出现，不知是什么原因却至今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为对研究尽点微力，现对《金瓶梅》一书中出现的部分临清地名作些考证。为使叙述方便，把这些地名分为几组去考释。

一组 临清与清河

《词话》本 26 回写：“来旺随着两个公人哭哭啼啼从四月初是离开了清河县”。另处又写由清河“出城门，径到临清码头晏公庙来，有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庙天色已晚。”

按：“清河，明代为县治。元属大名路。从明洪武六年改属于中书省（京都）广平府”。其东有卫河（《明史》897——898页）。汉高祖元年（公元前 206 年）置清河郡临清属之。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开地斥境，乃分十三部，置刺史”。冀州刺史部清河郡治下厝县、贝丘县、清渊县皆在现临清版图内，厝县在临清东十五里处，汉安帝时，移城北，更名为甘陵。贝丘在今城东南十五里近古村，尚有古城遗迹。清渊 在城西南四十里，北魏移治清水？，改属冀州部魏郡。（见《临清文史·第一辑》二页）清河曾因东汉安帝（刘？）为清河王，入继大统后受封为国，尊其母耿氏为教德皇元妃、甘？大贵人，今河北临西县简庄有耿贵人墓。

临清：三国时，魏文帝黄初元年隶于冀州清河郡。西晋武帝寿始元年，临清隶于冀州郡清河国。自后赵建平元年改名临清县，后隋朝又属冀州部之清河郡。唐代贞元之末曾隶属于贝州清河郡，以后多次改属。至明洪武间隶属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弘治二年升为州，辖二县（馆陶、邱县）。（康熙十一年《临清州志·建置沿革》）城址：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复置临清县。城址在今临西仓上村东，当地称为旧县集，距今临清市西三十一里。南宋高宗建炎元年，（当时县属女真族治内）因水患移城于曹仁镇，即今城南旧县村。明洪武二年迁至中洲纸马巷，今福德街南楼上有县治遗址石刻。景泰

七年平江侯陈豫等建砖城，县址迁城内，嘉靖二十一年（1542）巡抚都御史曾铣跨汶卫二水建新城，俗称玉带城，砖城与新城方圆共29里。（民国二十三年《临清县志·城池》）

两县的名称均由卫河得名。《战国策》：“苏秦说齐曰：西有清河，说赵曰：东有清河”即指此河，于是两县一名清河，一名清渊、清泉、临清。

以上为清河、临清的沿革与城市史。从这些资料可导出以下结论：

1、临清与清河都有悠久的历史。名字同以卫河而起，临清曾在几个朝代置于清河治下，形成了难以分割的关系。就历史的角度讲，说清河也泛指临清，说临清也要想到清河。

2、两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清河由古代的封国、郡县而降为县。临清却由县升为州。盖因清河土地贫瘠，地势低洼，大水漫漶而日趋衰落。而明代的临清却在得天独厚的用运河漕运之利的条件下空前发达起来。

3、在地理集团上，两县隔河毗邻，清河在西北，临清在东南，相距五十里，习惯说六十里，比《金瓶梅》的叙述少了十里，这可能是由于城址变迁，里制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4、现在的临清市属于山东省聊城地区，清河县在河北省邢台地区治下。

总之临清与清河两座城市是历史与当代的现实，它们就是《金瓶梅》书中所写的临清与清河，这应该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另一个问题是，从明代史考查，临清与清河城市的发展已有天壤之别，只有商业、手工业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临清才是产生一部伟大现实小说的典型地理环境，而处于衰退中的清河似不可能。作者因两城渊远流长的紧密联系，并因取材于《水浒》的清河，才用了移植的方法，名写清河而实写临清。这就出现了把许多临清的地名置于清河县城去写，造成“二清”混淆难辨的情况。这正如吴晗先生说的明写

开封实写北京一样。

二组 运河、码头、广济闸桥、“二闸”、临清闸，新河口

93回：“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得”。“王老到了码头上，过了广济闸大桥，见无数舟船，停泊在河下。”

92回：杨大郎跟着陈敬济“前往临清码头上寻缺货去”、“这临清河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81回：“正月初十起身，一路无词，一日到临清闸上。”“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地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涌贵……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月娘不放心，使经济骑上头口，往河上寻舟去了……一日钞关上纳了税放船过来，在新河口起脚，往临清县城里来。”

这几回中提到了流经临清的运河，设在运河岸的码头、桥闸，并具体写出了运河码头一带的繁华。从文中人物活动的路线，还可判断这组地名的相对集团，逐一考证于下：

运河：运河在临清的形势是：卫河由南往北，流经城市西部；汶河（又名会通河）由东往西，流入城区，自鳌头矶分为南北二支横穿城区，汶卫交汇后北流至海。故在临清段的卫河又称卫运河。卫河，战国时期称清河，隋大业四年春，循此河往北开永济渠，寻河南卫辉县苏门山百门泉，引淇、洹、漳诸水汇集之，以利军运之需，赐名御河。到南宋时，此河大部湮没。元代建都大都，由于运输南方粮食与物质的需要，和避免“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有”的海运艰难，必须重新疏通运河航道。为缩短漕运里程，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由礼部尚书张孔孙等自安民山西南开河，由寿张西北，经东昌、临清引汶绝济，直属漳卫，以转漕运河成，赐名‘会通河’”（《临清县志》），沟通了济宁到临清的航道。这一新的运河路线比隋代运河路线缩短了九百多公里。在临清城区内，这一次开挖成会通河北支。元至元三十年（1293），在河上建会通、临清二闸。至明洪

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决口，会通河随即淤塞。因洪武、建文建都于南京，不需漕粮北运，弃置未修，到明成祖建都北京，为沟通政治中心北京与财赋主要来源江南的联系，才重新开会通河。这次开河由工部尚书宋礼任事，从永乐九年开始到永乐十三年结束，用了五年的时间。（见《明史·河渠》）但是新问题又出现，因在临清城区的会通河，即现在鳌头矶以北的北支，水流湍急，“中缩而尾回，数坏舟”不能利用，“乃于永乐十五年（1417）开凿南河，即现鳌头矶经二闸口到头闸口入卫河的一支，自此以后，河运通行”。河上设新开、南板二闸。

“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不应指元代在会通河北支修的会通、临清二闸，而应是会通河南支的新开、南板二闸。康熙十一年《临清州志》载，大学士徐溥《会通东闸记》就说“永乐间初行漕法”。现今此二闸尚有较完整的遗存。南板闸在东夹道街南端，会通南支入卫河处，俗称头闸口，新开闸在今车营街北部，青年桥南约三百米处，俗称二闸口。

新河口即指南支的南板闸入卫河的河口处。在这个河口旁，正有一处钞关，叫南水关，《金瓶梅》中说：“一日钞关上纳了税，放船过来，在新河口起脚 往临清县城里来。”这个行船路线，完全与实际地理相符。

临清闸指元至元三十年在会通河北支入卫河口处建的“临清”闸，此闸在明永乐弘治间相继重修，但因该河淤塞，不利使用，终于湮废，其遗址尚可辨清。（即后世修的月径桥处）另一处会通闸处，后来改建为会通桥，尚存遗迹。临清码头，经查在临清城区卫运河东岸，有三元阁、狮子桥、临清闸等几个卸货码头，其中三元阁码头现有残存的遗迹，其它码头在治河筑堤中湮没，书中所说码头即指偏北的临清闸处之码头，南距广济桥约 300 米。“王老到了码头上，过了广济闸大桥，见无数舟船，停泊在河下。”走向当是向南。

广济闸桥，即今所谓浮桥口处，在竹竿巷（亦名果子巷）西端。

志载：此桥东西横跨卫河，为河西通河东之要津，明弘治时副使陈鳌创建。清乾隆时为临清八景之一，“官桥晓月”即指此桥，“乾隆时毁于兵燹”。

由于明永乐间，开挖了会通河南支，才正式使南北大运河这条运输大动脉得以畅行无阻。明清两代数百年中，每年在此河通行的漕船数以万计，俗称为一丰二十八帮。（每帮船队约漕船百只）。每年货运量仅漕粮一项达四百万石以上。故城内设广积、临清、常盈三仓，贮官粮数十万石。运河的通航，对明人的经济与文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临清这座城市是收漕运之利最大的城市。它不是一般的漕运过境的城市，而是运河中的大站。南来的仓粮多在此卸货转运并往山东河南等地分配。商船和随漕船带来的物资，如淮盐杭缎、景德镇瓷、绍兴南酒、金华火腿、板鸭与金华酒、云南药材等均在临清码头上货卖。官船携带的私货则在此卖完后方再北行。回程带来的是天津进口的煤油、火柴等杂货。焦作的煤，南方的毛竹多由卫河来到临清。当地则主要以棉、麦、皮等农村产品输送外地。临清窑户产的大量砖亦靠运河经天津、转运北京。这使临清成为南北物资交换的最大集散地。明代的临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空前的发达起来。此处引贺王昌《题清源》诗如下：

1、名区东郡首清源，水陆交冲市井喧。

翠羽明珠多大贾，奇华怪石有名园。

2、千帆寒影落平沙，烟火沿堤几万家。

富商善向红楼醉，豪客惊看白日斜。

大学士李东阳有《鳌头矶》二首道是：

1、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2、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

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这些诗文形象地刻画出明清之际，临清因运河之利而达到的鼎盛

繁华，是超出今人想象的。同时也使人看出与《金瓶梅》所写——“临清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这是何等的一致。

三组 狮子街与灯市、大酒店、勾栏后巷

《金瓶梅》14回：“花子虚买了狮子街一所房子居住”。39回写西门庆替王六儿在“狮子街石桥东边使了一百二十两银子，买了一所门面。”15回写吴月娘等坐轿来到狮子街灯市。14回写吴月娘对李瓶儿说：“只说二娘家门首就是灯市，好不热闹”。吴月娘等搭扶定楼窗往下观看，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怎见好灯市”。接着对五光十色，交相争辉的各种华灯作了详尽的描绘，真个令人产生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

这条狮子街是在临清城什么地方呢？它的来历怎样？民国二十三年临清县志载：位于“卫河北岸”。再对照一下民国简临清地图就更清楚，它位于三元阁之北，在此处，卫运河之流向为折向西北。狮子街顺河而建，是一条东南西北方向的大街，实际在河东北岸。笼统地说就是在卫河北岸了，现在临清青年路西端卫河岸是明清狮子街的北端位置。康熙《临清州志·孝义王勋》名下记道：“官巡抚、好义喜施。先是临清诸街，水道咸汇。大寺门前，居民受患者不下千余家。隆庆元年，勋狡捐资，力修沟渠，建石桥于卫河东岸，名狮子桥，至今赖之，有碑文载其事云。”这座桥建在城内通卫河的排水沟口上。狮子街也就是因桥取名。现在青年路西端水塔稍西处堤内尚可指出此桥遗址。狮子街南端往南约二里处是南支会通河口、此街面对运河背靠新城，地处全城之闹区，自然是热闹非凡了。

对于灯市，康熙《州志·风俗》篇下写道：“上元作市，棚结彩，下缀华灯，灯有锦绣宝料褚革诸色，绘画花鸟，鳞骑以相胜。市民、田竖，朝游夕饮，为留连之会者三日始罢。”民国《临清县志·礼俗志三》记述更详细：“正月十五日为元宵佳节，街市及庙宇皆悬灯三

日，其灯以绢为之，彩绘精美，各项社伙，彻夜游行，鱼龙漫衍，极一时之盛。先期在狮子桥侧有灯市，市上花炮纷陈，各种纸灯，殊形？制，尤呈异采。自军兴以后，此风已熄，然歌舞升平，回首如昨日也。”此处描绘的灯市，与《金瓶梅》写的灯市有什么两样呢？有人论证书中对狮子街灯市的描写抄袭《水浒传》33回“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大闹清风寨”，我不反对此议。不过，这并不说明作者缺乏写作灯市的素材，而只能抄袭。恰恰相反，他是把从现实生活中见到的临清狮子街灯市，套用上描绘灯市的成功模式，只为把灯市情景写得愈加精彩而已。书中有几处写谢家大酒店的文字。酒楼位于河下码头上，“里面有百十个座阁儿，周围都是绿栏干，就紧靠着山岗，前临官河，极是个人烟热闹去处，舟船往来之所。”（93回），在98回中又写陈敬济将店主告了，“把酒楼夺过来，”委托主管，重新开张。临清河下在码头上又是否有这么一座面临官河，背靠山岗的大酒楼呢？深知临清史的郑世荣先生告诉我在狮子桥侧，曾有座望河楼。我又访问了八十七岁的李占魁，他说：“在狮子桥西北不远处，有一座三间两层面对西河的楼，位于卫河东岸半腰处。这楼有绿栏干和红窗子。记的约毁六十年了。这叙述应是可靠的。此楼就是面临运河（又名御河，即官河），其东就是龙山。这座山是明永乐间开会通南支时积土而成，其后每年挖河，将淤泥聚积其上，逐年形成了南北长数里，高达五六丈的人造土山。山上树木繁茂，庙宇严整。清初，“土山晚眺”是临清十景之一，就指此山。这大概就是二三百年前谢家酒楼，在历代维修中留下的遗存。至于是否当年叫做谢家楼，则不可考。

勾栏后巷是个不太具体的地名，意即妓院后面的一条巷子。这个地名是在书中71回提到的。94回写刘二“专一在码头上开娼店”；92回写的管弦楼均指女子卖艺卖身的地方。明、清、民国间，在临清这个“多大贾，达官要人递临”的商业畸形发展的城市中，妓院、勾栏妓女一直存在着，尤其盛于明清两代。京剧《陈三两爬堂》

中的名妓陈三两，就是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德知府李本固的姐姐，后因祸栖身于临清竹竿巷富春院的。民国期间，妓院有数十家、妓女几百名，较大的有杨家班、郭家班、蒋家班、何家班等（见临清地方史志载洪波《滔滔妓女泪》一文。田家店、大桥、银锭巷均是妓院所在街巷。大桥、银锭巷都近卫河，《金瓶梅》提到的勾栏后巷当指此处的巷子。这也说明《金瓶梅》的地名，在临清大多可以找到根据。

四组 钞关、砖厂、教场

52回写“这胡秀递上书收说道：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见今直低临清钞关。”81回写敬济“……一日钞关上纳了税，放船过来，在新河口起脚，往临清县城里来。”

按康熙十一年《临清志》钞部下载：“户部榷税分司，明宣德十年（1435年）设关，以御史或郡佐领之，无专职。正统成化间罢。景泰、弘治初再复，乃岁出主事一人，督收船料商税之课。课无定额，大约岁至四万金。……分季解京，以充内帑。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年）以东昌幕府一人，为监收官。”位置在“会通渠南浒”。乾隆五十年（1785年）《州志·张度序》记：“宣德十年置清源关榷税，以御史领之。”民国二十三年《县志·钞关》载文是：“明宣德四年设关于此，内有大堂、仓库、巡拦舍……前为正关，有坊二，曰裕国、曰通商。……北为阅货厅。河内沉铁索达两岸，开关时撤之。隆庆元年关主事刘某……扩充之。”

上三条资料记载的年代不一致，康熙与乾隆州志说宣德十年设关，民国县志记宣德四年设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经查明，这里说的是两处钞关。宣德十年设的关是指南水关。位置在会通河南支入卫河口处、南板闸之南二十米。即现在临清发电厂所对的卫河东岸，当地群众俗称“关厅”。此关曾为总关，下辖税卡，主收卫河船税，并收会通南河船税。正统间，始隶户部榷税分司之下，为分关。《金瓶梅》81回记的钞关，指此关。民国志记宣德四年设的关，

是指设在钞关街的钞关监督衙门，位置在南支会通河西岸新开闸之西北，今为后关街二轻局处。此关初设时，主收旱路税，正统间升为户部榷税分司，又称钞关监督衙门，辖五处分关，南水关、前关皆在治下。此关除领导各分关税务外，直接收南支会通河船税。52回胡秀说“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绸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这只船入临清城后循会通南支西行必经此关纳税，到南水关时，只查一下总关开的税单，便可放行入卫河了。

昔日钞关收税开单后，定时将关前设的铁索，从水面沉落河底，将成批船只放行，称为开关。随后将沉索以绞盘拉至水面拦行，则称闭关。每日漕船、货船数百艘只得在这座钞关以东至三里铺到歇马亭一段抛锚停靠，等待检查办理手续后再过二闸口（即新开闸）西经头闸口（即南板闸）入卫河。在新河口南水关复验后由卫河北行，还得再向三元阁税卡纳小税，再分别被安排到三元阁、狮子桥、广济桥三处码头卸货。据查在会通南河上未凤码头。（只有一处卸货口）故书中提到了码头均指西河上广济桥与狮子桥二处码头。临清闸则不然，有时是指南河的二闸口，有时指北河入口处的“临清闸”，按船只行进路线可以判别，由南方来的船先到的是二闸口。由卫河中从北方来船先经过的是北支的“临清闸”。从以上对于停船待检、办理纳税手续、开关放行、码头卸货再加之私货成交和复杂过程看，临清会通河与城区卫河沿河常停船数百艘以上的情景是可以想见的。卫河中从头闸口起，北至临清塔湾，南河中从头闸口起，东至三里铺、歇马亭，绵亘二十余里，形成了“商航蚁集、帆樯如林”的壮阔景观，这功绩是与钞关税卡分不开的。

再考临清砖依靠运河北运的情况。这件事，在《金瓶梅》书中得到反映，31回“有管砖厂刘太监差人送礼来。”25回“昨日砖厂刘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拔开筛了来。”这就是朝廷征用临清砖的凭证。临清砖以质地优良和运输方便而被选中，作为贡品，专供朝廷修建宫殿、城墙与陵寝之用。在北京的明十三陵，清代的东陵等建筑群

中随处可以看到“临清”砖的印记。明清临清砖的管理“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查工部司设在中洲，即今考棚街第三中学。该处前代称“工部厂”。分司下设砖厂，征收各窑户送来的砖，并安排北运，每块砖均用黄裱纸封好，然后船运至天津直沽厂卸货复查后送往北京。城内砖厂有四处，按康熙年间地图查出，一在头闸口北，今为竹竿巷西端处。一在卫河西岸，先锋桥西端偏南。第四处位置不详。砖厂刘太监、刘公公是指砖厂的主管，官品在工部营缮分司主事之下。明清两代临清沿卫运河与会通河两岸村庄有砖窑数百座，著名者有城东二十里铺、城南白塔窑、西南吊马桥、东北张家窑等五六处。由砖窑之盛可见明代砖厂之规模决非一般。厂主自然是受朝廷委派的“太监”之类的人物了。

书中还提到“教场”，临清既为畿南重镇，也必为兵防要地。明清设有兵务道、指挥使司、靖裁卫等军事机关，设有兵备、守备、把总、千总，游击、提刑等职官共有兵一万三千余名。其练兵场所就是“教场”、阅射厅等。兵备道设在砖场西南隅，成化间设。创教场二处，一为东教场，在威武门外，景泰间平江侯陈豫创，为岁试考武之所，有大厅、观射台、驰马厅等设施，占地百亩，民国四年拆毁，约在今临清化肥厂附近。一为西教场，在靖西门外，明嘉靖二十年巡抚曾铣、副使王扬创建，今临西教场村有遗址。

五组 街巷

临清素有三十二趟街、七十二条巷子之说，现在巷子虽然不足数，街道仍有三十多条。这与《金瓶梅》所说的“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恰成数字的巧合。这又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现把书中出现的街巷与临清原有街巷名称对照如下：

帅府街：92回写：刘二是有名的坐地虎，他是帅府守备府中亲随张胜的小舅子。”查明初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玉春在临清设府，后称此街为帅府街，今为先锋桥以东大街。

猪市街：6、7回写西门庆到猪市街。查志有此街名称，地址不

详。

南关街：1回提到南关街。在今电机厂处。

南门外：指砖城永清门外。现永清路北端。

手帕巷：51回提到此巷，康熙志载此巷名，集团待考。

菜市口：见15回，在今卫河西、临西县菜市街。

细米巷：见15回，今锅市街路西有粜米巷。

牛皮巷：今临清在有皮巷，约在今商场街附近。

臭水巷：见70回，是指从御史巷经大桥到狮子桥排水沟所经的巷子，在大桥处有一个很大的臭水坑，盖指此处。

此组地名考释欠详。但至少有前六个地名完全相同，四个已找到位置，后几个有一字之差。

六组 寺庙

晏公庙：见93回“临清码头上有座晏公庙”，王老“领着陈敬济到晏公庙做了道士”。《康熙志》记有崔道士在晏公庙仙升云。知其是道士庙。经访问小白布巷85号八十岁老人张金春，知庙内供的晏平仲像。此庙位置在残存的月径桥西北100米处。他与邻居家就座落在晏公庙原址上。庙为民国初赵仁泉指挥拆掉。该院落内幸存数百年前古槐一株，尚为丰茂。这个位置就在会通河北支（俗称死河子）入卫河口东200米，即明临清闸之处，与《金瓶梅》所说的“临清码头上有座晏公庙”完全相合。

莲花庵：见50回。按志载在怀朔门外。经访80岁郑观云先生知为女尼庵，他幼年去庵中见有房三间，已荒芜。临清有一个传统戏目《莲花庵》即是写此庵，写一女因受婆母虐待而出家的故事。此庵位置在今城北油库西卫河东堤外，没有遗迹。

真武庙：39回“真武庙有个黄先生，算的好数”。查在怀朔门外渡口处有此庙，与莲花庵相近。另一处在西夹道街真武庙胡同，还有一处在今柴市街东口，不知究为哪处，现均无遗迹。

玉皇庙：见14回，在宾阳门内南坛，今约为杨桥村东南之苹果

园处。

水月寺：96回写侯林对陈经济说“明日我领你城南水月寺晓月长老那里。”志载：“水月庵在汝河南岸”，今约在永清街南端小庄之内。

地藏寺：26回写宋惠莲自缢后。西门庆贿赂了知县三十两银子，让贲四、来兴儿同送到门外地藏寺，与火家五钱银子，加些柴薪，才待烧毁……”30回又称地藏庵，故知有时寺与庵不分。志载宾阳门外有大藏庵，庵内有地藏殿，明末知州贺王昌建。位置约在杨桥村之东田地，无遗址。又在靖西门内有地藏堂，今在卫河西米市街南端。此处应指城东宾阳门外的大藏庵。

岳庙：见16回，在砖城广积门外，明正统二年建，民国二年关岳合祀，民国十七年已拆毁。约在今汽车站附近。

土地庙：39回写“吴神仙，云游之人，来去不定，但来只在城南土地庙上。”经查，砖城永清门即南门外有土地庙。还有其他几处，不能备考。

海神庙：志载有保运海神祠，在汝河之南，址在江坝桥西北。

观音庵：见50回。大宁寺街有观音堂，鳌头矶上有观音阁，保存完好。明人王英作诗咏观音阁，“有瞻帘外飞红日，俯瞰波高跃锦鳞。栋宇峥嵘先得月，栏干潇洒绝无尘”之句，不知是否指此。

碧霞宫：见84回，位在西夹道西半部。此宫相传为泰山娘娘的行宫，四月中迎请，邻县亦来此进香，名曰朝山，盛会空前，五月送行。今位于发电厂之北，解放后已毁。

书中还记有石佛寺，城南有大佛寺。像这类寺庙《临清志》载有一百三十余处，颇难一一印证。仅举上例以见一斑。

七组 流沙河 夹道

26回中玳安对宋蕙莲说道：“嫂子，我告知你知道了吧，俺哥这早到流沙河了。”当西门庆审问众小厮是谁告诉宋蕙莲来旺被解徐州的事，忽有书童晚上说道：那日小的听见玳安跟了爹马家来，

在夹道内，嫂子问他，他露了口，对嫂子说的。”临清城东由西南至东北有一条很宽阔的古废河，俗称沙河，春夏风多，往往喷沙伤禾。现在城东少数区段仍可辨识出河床与方向，土质纯为细沙，关于此河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古赵河无水则积沙，夏秋间水盛则成河。东流入高唐马颊河。一说是老黄河，为宋时决河故道。无论那一种说法正确，都告诉我们临清城东在明代以前早存在一条流沙河。这又是一条城市地理特征。来旺被押送着往徐州大道而来由城内取道向东，正经城东的流沙河。如果有人认为故事发生在别的城市，也必须具备向东走和城东有流沙河这两个条件。

再说夹道。一般说夹道是指狭窄的过道，窄至一个人侧身通过的也是夹道。本书所说的是否是这么窄小的过道呢？不是。只要一分析就会清楚。玳安跟在西门庆马后，这时宋蕙莲走过来问玳安来旺的情况，玳安说露了口，才告诉了来旺被押送徐州的情况。这个能行马，对话的夹道实际是一条较窄的街道。在临清狮子桥街故址东面就紧靠着两条窄街，一条是西夹道街，一条是东夹道街。临清人简称为东夹道、西夹道。这不正是书中说的夹道街吗？

八组 香巷、蜡烛巷、银锭巷、白布巷、箍桶巷

考完第七组地名，本待作结，忽又想起蔡国良先生写的《明代商业》等那几篇很有见地的文章来。他抓住以运河为地理背景而膨胀起来的城市商业这一观点去研究《金瓶梅》，这确实是找到了问题的本质，因为西门庆就是在那个私欲熏心的商业社会中堕地的怪胎。先生有一点不足之处，就是他未能解开清河与临清的关系这一个结子。这一点，我就是从他的两句话看出来的。他在引证资料证明了临清的商业繁荣之后说：“临清既成为南北货物集散地，那么邻近临清的清河县自然也跟着繁荣起来。”（蔡著《金瓶梅考证与研究》242页）又说：“靠近商业运输中心临清的清河县虽不及京城繁丽，其盛况亦可想见。”（同书216页）。这种对主体城市清河不直接去写而用繁华的临清做为清河必然繁华的旁证的推论法显然是

很牵强的。先生在这个地方，对作者托名清河实写临清的良苦用心未揣摸透，深信，如果先生来临清考察过或是手头有足够研究临清与清河的资料，就决不会出此疏误的。

为进一步认识临清在《金瓶梅》书中的重要位置，尽管本组地名在书中未直接出现，（而触及的只是商业与手工业门类名称）在此说明一下，也不是毫无用处。51回写道：“东平府又派下三万香来了”这说的是一条生产、上纳供香交易。临清有两条很长的巷子，一名前香巷，一名后香巷，就是做香的地方，现处于先锋路之北。

38回：“三万香蜡等料钱下来，该一万两银子，也有许多利息。”45回又写：“蜡里多掺些柏油，那里查收去。”这说的是做蜡烛获取利润的事。临清有蜡烛巷，在锅市街的北端。

90回写来旺“便投在城内顾银铺家里，学会了此银行手艺”，“卖些金银生活首饰花翠。”20回写李瓶儿从箱内“拿出一件金厢鵝青帽顶子”，让西门庆拿与银匠替他做一对坠。下文写出一些要打造的银饰名目。据访问，临清的银锭巷就是分割金银、打造银饰的巷子，在狮子街北。今在大寺街之南。

81回写因“山东大旱，不收棉花，布价一时涌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码头上，迎着客货而买。”这里说的是布匹交易，临清也有两条巷子，一条叫小白布巷，一条叫大白布巷，至今均未易名，位置在卫河的东岸。

书中写杩子，（即马桶），有人即以杩子不是北方用具，而论定的不是北方城市。据调查，马桶是运河船家的必备用具，沿河人家多使用。用马桶之广已经过习俗产生了影响：女子出嫁时赠送的嫁妆中，就必须有马桶。这件事，凡当地50岁以上的人，都亲身经历过。临清仍未易名的箍桶巷的主要产品中就有马桶。这实在出人意料吧。其它如书中写到的当铺，临清有估衣巷。书中写绒线铺，临清有线子巷。书中写灯市，临清则有灯挂胡同。书中写葬品，临清就有纸马巷。书中写马市，临清又有马市街，等等。这些街巷

都是以从事的行业而得名的。此类例子，真不胜枚举。临清店铺之多据对《神宗实录》卷五中万历三十年的统计，临清有绸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杂货店四十一家以上，这不正是《金瓶梅》写的各类店铺在临清的实际情况吧？

现在将本文归纳一下。文中详略不同的对 47 个地点作了考证。这些地名可分为五类：

1、有显著地理特征的 13 处，包括临清运河、码头、广济桥、二闸、临清闸、新河口、狮子街与灯市、大酒店、晏公庙、水月寺、地藏寺、流沙河。这些地名不但临清实际与书中所写完全相同，而且地理位置也很一致。如酒楼的面对官河、背靠山峰，晏公庙面对官河，在临清码头上，流沙河在城东等。按照这些地名我们能够判断书中角色活动的方向与路线。这类地名是重点，多数做了详细考证。它们给《金瓶梅》一书打上了临清独有的商标性印记，其专利属于临清。如果说还有其他城市也出现如此多的上述地名，同时还必需以其与书中地理方位相同为佐证。

2、与书中地名相同的 16 处，包括钞关、砖厂、教场、帅府、手帕巷、菜市口、南关街、南门外、猪市街、牛皮巷、莲花庵、真武庙、玉皇庙、岳庙，土地庙、夹道。前四个地名也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作了详细考证。

3、与书中地名基本相同的 7 处，包括海神庙、观音庵、碧霞宫、石佛寺、细米巷、臭水巷、勾栏后巷。

4、书中写出行业式店铺名称，而临清有街巷名称的有 10 处。包括：香巷、蜡烛巷、银锭巷、白布巷、箍桶巷、估衣巷、线子巷、纸马巷、灯挂胡同、马市街。

5、其它地名城市 1 处：清河。

从以上粗略的考察可以看出，《金瓶梅》作者对临清是非常熟悉的，简直是一个地道的“临清通”。反过来说，《金瓶梅》一书非是“临清通”而决不能为，作者只有在这个环境中长期的生活过，感受

过，才能在他思想中形成了一幅致密的地理图象，并把他所感到的人物、情节如此生动逼真地交织进去，构成一部从思想到艺术上完整统一的长篇巨制。有人超脱这一环境，而只从个别事物特征上论证不是写的山东，而是写的江南某地的事情，这是违背一般的创作规律的。具有长期的（而不是短暂的）在临清居住生活的历史，应是作者具备的条件之一。由此还可以导出第二点推论：《金瓶梅》一书所写的人物，市俗民情也是以明代临清为主要背景的，所用的方言也是以明代临清土著方言为主导方言与外地方言组成的整体，因为人物、情节、语言不可能与写作的主要环境完全脱节。

研究社会科学的傅崇兰先生在临清作了全面考察之后说：“临清居运河的要冲，‘帆樯并集，百货流通，商贾操厥奇赢，趋利若鹜。……’是明清时期运河沿岸的一个著名的绾毂南北的商业城市。”（见《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287、292页）临清对研究明清运河城市的形成、明清商业与经济发展有重要价值，对研究《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金瓶梅》临清地名续考

王连洲

破解《金瓶梅》地理背景之谜，是《金瓶梅》研究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为此，我已故世的胞兄王萤写了《〈金瓶梅〉地理背景为今山东临清市考》。（简称一考）。几乎同时，拙作《〈金瓶梅〉临清地名考》已成篇（简称二考）。^①二文提出了地理背景是临清与“托名清河、实写临清”的论证。限于条件，前文难免有些缺陷，故成续篇加以补充与纠正，这是本文的首要任务。其次，试提出几点新的认识与看法。

一、从大环境上再证“金瓶梅”背景是临清

如果说，只从临清沿革只与细部地理上求证它是“金”书背景城市还嫌不足的话，请再检验它在人文、地理等大环境方面具备的条件：

（一）行政建置：书中写的清河，既是县治、又是州治。如 1 回：武松在“清河县做了个都头”56 回则称应伯爵朋友的孙子“见是本州一个秀才”。同一城市，既是县又称州，这与临清县由弘治二年升州的历史暗合。

（二）自然环境：运河，书中多处写西门庆家丁到江南办货，从运河经临清钞关回到清河的情节，这与临清城区中有隋、元、明三代所开运河经过的情况相合。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书中写及“西河”“河东水西”的文字。如第 1 回：清河知县说武松，你“在我这县里做个巡捕都头、专一河东水西擒拿盗贼，你意下如何？”48 回写狄斯

彬寻尸破案“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因清河没有西河，所以是指临清的西河无疑。临清人至今称隋代开凿的南北卫运河为“西河”，称西河两旁的城区为“河东、河西”。作者是照抄《水浒》23回：“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一句时，特意加上河东水西，显然是在书中埋伏的地理暗记。

土山。48回：西门庆“出南门到五里原祖坟上，……坟内正面土山环抱。”93回，写临清谢家酒楼前临官河、背后“紧排着山冈”。清河非但没西河，也没土山。临清的这座山冈，就是书中所说清河的土山。据临清县志载：“土山：在土城景岱门内汶河东岸……长约里许，蛇陀起伏，形成数段，每段高约六七丈。相传明永乐时浚会通河泥土积累而成。”这土山至今仍保留着可观的规模。其南端位置距砖城南门五里之外。

流沙河。见二考。临清城东，有黄河故道，土称沙河，集雨水则成流沙。这是26回来旺儿递解徐州经过的地方。

总之，城中有运河、城南有土山、城东有沙河这三个书中交待的地貌特征临清完全相合。

(三)重要名物：狮猫：59回：潘金莲“养活的一只白狮子猫儿……名唤雪里送炭”。据临清整理的资料，“现代临清狮猫分白、黑、花三类”。“白狮猫类中有南亚黄、波斯猫、鸳鸯眼、鞭打绣球、雪里送炭五个优良品种”。“它们是元末明初由波斯、印度来临清定居的”。当今日还能在此地看到与潘金莲雪里送炭完全一样的狮猫时，能不让人想到临清与《金》书背景之间的联系吗？

大城砖与方砖：35回：写出刘公公管辖的官窑烧制品中有“砌墙的大城角”和“漫地的尺二方砖”。按临清从永乐始，即为烧造“皇砖”的重大基地，每年往北京输运“贡砖”一百万块。至今在临清到处可见的大城砖，即是书所称的大城角。方砖规格分“二尺、尺七、尺五、尺二四样凡八号”^②显然这第四种正是书中所称“漫地的尺二方砖”。这表达了《词话》^③与临清官窑业的形影关系。

(四)人物形象:《词话》人物与《红楼》毫不相象。他们缺少京都贵族之家那种雍容高贵的风度、隽秀典雅的气质,有的只是商埠城镇中那种商贾官绅式的骄矜与奢华、庸俗与无聊。语言上,也同样具有上述特点。这与明代临清为运河中枢重要商埠码头的城市性质极为一致。也与因商业而形成“骄奢相效巧伪成风”^④“冠带衣履天下,人仰机利而食”^⑤的社会习尚极为一致。

简言之,临清与《词话》描写的大环境是十分相符的。

二、新考证出的地名资料

《词话》写入清河与临清地名共 102 处,除明写 7 处临清地名外,其它均托为清河地名。现已从临清考得与《词话》相同地名 67 处,占两城地名的 66%。分五类汇总,对前已考过的地名汇总在本类后部;增补资料前写[补]字。前文误写地名,此次舍去。相近地名 16 处不录。

(一)官署及相关建置 27 处

州治所。56 回:“他见是本州一个秀才”。《康熙临清州志·公署》(后以“康”代)载:“州署在旧城中近西。弘治己酉升州,知州张~~璫~~址辟废。……知州宅东,同知、判官宅各一。西,判官、吏目宅各一,皆附吏舍。久圮。”

县治所。1 回:武松打虎“哄动了那个县治”《康·职官》:“临清初为县,设官如县治。明弘治二年改州。”《公署》载,县址:“明洪武初,颁公廨式,遂自曹仁镇移建中洲,景泰再徙今治。”意指洪武二年,由宋治所曹仁镇迁到汶运河处的中洲区内,景泰元年建砖城后,即迁入砖城内。

察院。75 回:西门庆吩咐把“流金八仙鼎写贴儿抬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去。”《康·公署》“都察院行台在州署西北。嘉靖辛丑知州黎~~默~~改守备司为之,今圯。”提刑院。34 回:西门庆吩咐把二捣鬼“明

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门里听审。”《康·公署》：“按察分巡行台，在州署北、成化间创，今圮。”按：提刑是宋时设提典刑狱的职官“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明清为提刑按察使”。“建提刑按察使司”町见按察分巡行台即提刑院。

兵备道。35回：“向五被人争告土地，去在屯田兵备道打官司。”《康·公署》：“临清兵备道在州署西南，明成化丁未副使潘瑄肇创，弘治癸丑副使陈璧凿外坊之南为三桥，嘉靖己亥己未副使张鉴相继拓而广之，并修建其未备。”久圮。

屯所。72回：吴铠升“指挥金事，见任管屯。”78回：“吴大舅还有屯所里未曾去到任，明日是个好日期，卫中开了印，来家整了些盒子须得抬到屯所里到任。”《康·兵防》：“临清卫指挥使司，旧惟中左二所。明景泰初，调济宁左卫五所合之，设官指挥使一人，同知二人，金事四人，……军屯四十在济宁、嘉祥、钜野、郓城、鱼台、滋阳、邹县。军屯八在临清、清平。”

巡检司。95回：吴典恩“把平安留在巡检司。”《康·职官》：“临清设分巡东昌道，辖府一：东昌；州二：临清、高唐；县十有五（略）卫三：平山、东昌、临清；巡检司五，并受管辖。”

牧马所。93回：“王乾袭祖职为牧马所掌印正千户。”《民国县志·废署》。（“民国”后以“民”字代）载：“蓄锐亭即牧马所，在兵备道署西。明嘉靖间付使张邦教修。”《蓄锐亭记》云：“蓄锐亭，太原陈公瑞卿所创建，蒲州张公以宽所重也。”

太仆寺。7回：孟玉楼驳张四舅：“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向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康·赋役》：“太仆寺马价银七百五两六钱九分六厘。”又据《民·废署》：“太仆行署在中洲。”

社仓。51回：吴大舅说：“东平府下书来，派俺本卫两所掌印正千户，题准旨意管工修理社仓。”又称义仓或仓廒。《康·公署》：“户部督饷分司在旧城西北隅。仓三：曰广积，曰临清，廒八十一连十间。曰常盈，廒二连百间。”《职官》：“户部督储主事，明永乐间肇设，

岁出主事一人，督理仓务。仓二：曰广积、曰临清，岁额河南开封，山东济南诸府米又麦折米十一万石奇，以备漕米四百万之不足。二仓本折旧贮常百万。又仓一日常盈，岁额济南诸府麦米五万石奇，为临清卫、任城卫旗军孤老粮。”“临清仓在运河水次五仓（天津、德州、临清、徐州、淮安）中占有突出位置”^⑦

县仓。67回：西门庆戏伯爵，说他家孤老多，烘使得“教丫头直搬倒大南首县仓墙底下那里泼去，因起号叫‘南泼’。”此仓与朝廷设在临清的社仓不同，它是归本县管理的粮仓。《康》公署：“预备仓在州署东。”“水次仓在中洲，明洪武间创，即旧县预备仓。”此处是说，洪武初设在中洲的水次仓，是由宋代旧县预备仓迁来。后来在砖城东南隅又建予备仓，即是县仓。

工部。65回：“管砖厂工部黄老爹来吊孝。”《康·公署》：“工部营缮分司在中洲。”《职官》：“工部营缮员外郎，明永乐间设。初侍郎或郎中。后以主事督征山东、河南、直隶河间诸府砖价。”《民志》载乾隆四十一年临清升直录州后“知州李涛就工部旧署始建考棚。”现为第三中学。

都水司。70回：“都水司郎中安忱、伍洲各升俸一级。”《康·公署》：“工部都水分司在旧城外西南隅，圮。”

府学。58回：温秀才道：“学生不才，府学备数”。《康·学校》：“儒学在文庙右，明景泰间平江侯陈子创。”《民志·学校》：“本州旧制以孔庙为学宫、置教官二人（学正一，训导一）以训导诸生”。知儒学即为府学。又社学在州署西。

武学。48回：夏承恩“武学肄业，做了生员，每日邀结师友，习学弓马。”《康·学校》：武学“东北为射圃。……学规：读卧碑一通，每月上旬，下旬各习射二日，明永乐重定射式、朔望以提调官主射行礼。”

驿站。30回：“我安你在本处清河县做个驿丞，倒也去的。”《康·公署》：“清源水马驿在中洲，北向。”城中官驿街、驿夫厂均为驿

丞及驿夫居住所在。州人程轨作有驿站记。

太医院：17回道蒋竹山贬胡医：“他又不是我太医院出身，知道什么脉？”按：“金、明代均把专设的医务机关，称做太医院。”《康·公署》：“医学在州署西。”

僧正司。道正司。阴阳学。49回：“合署州县方面有司、军卫官员、吏典生员、僧、道、阴阳，都具连名手本，伺候迎接。”按：明时僧、道、阴阳均为职官，故有署。《康·公署》：“僧正司在大宁寺，即司仪处。道正司在城隍庙。”“阴阳学在州署西。”

★临清钞关，清河左右卫、教场、皇庄，（以上见一考。）守备府、砖厂、官窑（以上见一、二考）

注：书中明说临清的地名，冠以★

（二）运河及其相关位置 8 处

河东水西。1回：“河东水西，擒拿盗贼。”按：临清俗称卫河东、西两侧的城区及本县所辖村庄为河东、河西。今仍称之。

新河口闸。72回：“他好小近路儿，还要赶新河口闸上回说话哩”，指新河口处的南板闸。俗称头闸。

新河口。二考[补]：81回：“在新河口起脚装车，”指临清城内汶河南支入了河口。俗称头闸口。因此河系永乐十五年开，相对元至元二十六年所开的汶河北支称为新河。

★二闸。二考[补]93回：“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由《康·艺文》徐溥《会通东闸记》：“永乐间初行漕法”句，知当指永乐十五年凿汶河南支上的南板，新开二闸，俗称头闸、二闸。

★临清闸。一、二考[补]92回：“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此处专指汶河北支的临清闸。81回：“韩道国从江南办货回来，一日到临清闸上”，则是指城东汶河上的闸。

★临清码头。二考[补]92回：“前往临清码头寻缺货去。”泛指卫河上的临清、广济桥，狮子桥、三元阁及汶河上的钞关前、南门外

诸码头。★广济闸大桥★运河(均见一、二考)

(三)风光名胜类 9 处

井泉。51回：西门庆道：“学生贱号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说。”《康·河渠》：“泉十一：广济、通济、普惠(濒汶河)显晦、漱玉、清惠、威武、镇定、遗泽、洙泗、渊源(在旧城中，各~~城~~为井)。四泉当指旧城八泉中大而名者。《民·古迹》载：“漱玉泉：旧志称，有古井在道署西，今博源门迤南。离水底丈余，有泉水旁出，自间喷薄下注，声如佩环，副使陈璧为护栏，并覆以亭，今亭圮井存，官民咸汲水焉。”因城中多泉，故临清又名清泉县。

宝塔。89回：“宝塔依稀侵霄汉。”志载：多宝寺中有舍利塔，高三丈。永寿寺塔九级十丈^③

白塔。36回：“不然随你跳上白塔，我也没有。”按临清城东南二里许，约为大藏庵处，有白塔一座，与北京白塔形制相同而略小，俗称和尚塔，毁于1966年地震。

鼓楼。89回：“永福寺内，钟鼓楼森立”。民志载启秀楼，在土城东水门内启秀津上……明景泰时所建。”俗称鼓楼。毁于1966年地震。又：“西门外关帝庙，不知所起，正统间守臣刘方扩而新之。傍为钟鼓楼。”不存。

藏经阁。89回：“藏经阁巍峨”<康·艺文>李东阳《修孔子庙记》弘治丙辰春，知临清州冯美杰莅政之初，谒先师庙，见其……尊经有阁。

土山。一、二考[补]五里原。80回：“南门外五里原”。89回：“城外五里……郊原野旷、景物芳菲。”知指南门外五里处的郊原。非专名。今附土山后。土山，由北而南延伸到南门外五里之遥，今龙山公园内。盖小说西门庆祖莹处。

狮子街石桥。见一、二考

狮子街酒楼。(临清谢家酒楼，)流沙河，均见二考。

(四)街巷类 8 处

县门前东(西)街。一考[补正];2回:西门庆“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1回:“武大自从搬到县西街上来,照旧卖炊饼。”4回:“老身只去县东街。”三处街道均依县署得名。“县署在砖城中。景泰间始迁今治,弘治己酉知州张鲁扩而新之。”改为州署。无论就年代或位置均以此署为对;一考所说洪武二年由宋旧县迁至中洲纸马巷文昌祠处的县署不对,原依此构想的人物起居环境亦属错误,特提出纠正。

大街坊。1回:“武大又消折了资本,移在大街坊张大户家居住。”从花太监、尚推官、陈千户均住此街的情况,知此街是书中主要街道,又从65回:“刚转过大街口望南走,那两边观看的人山人海”,可见此街是城内的南北通衢。”当为砖城里南门大街。

南门外。1回:“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指砖城南门外(永清门外)现为古楼街,南北长一千米。

猪市街。7回:“出的南门外,来到猪市街,到了杨家门首。”按“洪武二年,临清县衙迁纸马巷,其东有柴市、猪市。”^①今南门外仍有柴市街,故知从前亦有猪市街。

牛皮巷。11回:“二条巷要桂阴。”34回:“四条巷何金蟾儿家。”志载:“砖城内有:户部二条巷、四条巷。^②

手帕巷。一、二考[补]51回:“门外手帕巷有名王家,专一发卖各色改样销金点翠汗巾儿。”志载其名,“位于砖城内南门大街”^③

狮子街。见二考

(五)寺庙类 15 处

慈惠寺。48回:狄斯彬“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七八将近新河口而止……公人禀道:‘离此不远就是慈惠寺。’在此发现了尸首。诘问众僧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灯儿、见一死尸,从上游而来,漂入巷里,长老慈悲、故收而埋之”。《康·庙祀》:“定惠寺在新开闸南。《民·礼俗》:“七月十五日,人多致祭于野外。三元阁一带,施放河灯作盂兰会,颇极喧闹之致。十月一日亦祭扫日。”前

文已证西河指临清的西河；新河口即临清头闸口，与三元阁相近。十月放河灯的习俗又一致，通观全文，情节必发生在临清·定惠寺即书中慈惠寺无疑。盖因取慈悲之意，改此一字。

文庙。31回：付末白：“不免来来去去，到于文庙门首。”《康·庙祀》：“文庙在旧城北隅之中。明景泰既城、平江侯陈予创，弘治丙辰付使陈璧扩之。”

城隍庙。53回：“我许拜城隍，土地。”《康·庙祀》：“城隍庙在州署东，平江侯陈予创。”

东岳庙。82回：“灵的是东岳、城隍。”《康·庙祀》：“东岳庙在广积仓南，三月二十八日，州人建大会三日，城乡士女，杂踏来观。”

岳庙。二考[补]90回：来旺与雪娥往“东门外细米巷”逃，谎称“前往城外岳庙烧香。”故知此庙在东门外。《康·庙祀》：“岳鄂王庙，在威武门内，郡人王台修。”威武门即东门。指门外曲城。岳鄂王：岳飞死后于宋嘉定中的封号。

土地庙。二考[补]61回：吴神仙“但来，只在城南土地庙下。”《康·庙祀》：“宜公祠在南门外迤西，土地庙在宜公祠南。”

晏公庙。一、二考[补]一考征引《山东通志》：“晏公，江西临江人，生于元，讳戊仔，歿封平浪侯。”又据“晏公庙为平浪侯晏公敦之庙，晏敦，水神，传为明太祖所封。”^⑨二考参证，知系晏敦，戊仔之庙无疑。足证一考口碑之误。

真武庙。见一、二考。

玉皇庙。见一、二考。

石佛寺。一考[补]《民·金石》：“石佛立像，高约八尺，在城北石佛寺内……为唐时造像无疑。俗传，像身瑛珞垂珠，均嵌以宝石。”今移城中大众公园内。

水月寺。见二考。莲花庵。见一考。

地藏庵(寺)。二考[补]34回：“地藏庵薛姑子。”26回：“门外地藏寺”。《康·庙祀》：“大藏庵，在宾阳门外，距城里许。”“庵内有地

藏殿。”故知大藏庵即地藏庵。

观音庵(寺)。50回：“观音庵王姑子。”《康·祀》：“弘润庵，观音阁在鳌头矶。”可知鳌头矶为尼姑庵，因庵内有观音阁，《词话》遂称观音庵。“明嘉靖时建”^⑤

观音堂。54回：“这叫做接连三个观音堂，妙！妙！妙！”《康·庙祀》：“观音堂在大宁寺前。”

三、《金瓶梅》人物在临清行动路线

我们论证临清是《词话》真实地理背景，依据的不仅是一群与书载相同的地名集合，同时注意到它们的位置与故事叙述有惊人的一致性。如城东的流沙河、岳庙；城东南的玉皇庙地藏寺；城南的：土山、水月寺、土地庙、南门外，猪市街；城北的真武庙；从清河到临清必经的广济桥；临清码头处的晏公庙，新河口处的慈惠寺（定惠寺）等。并且按照临清明代地名图，检验《词话》人物行动路线时，（在补上艺术虚构的紫石街、砖城里狮子街、永福寺三处地名后）也都相符。兹按：引文、提要的顺序，对书中人物的主要行动路线检验如下：

（一）7回“薛嫂说娶孟玉楼”路线

引文：西门庆从家中出来，与薛嫂：“出的南门外，来到猪市街，到了杨家门首。”

提要：南门指砖城（旧城）永清门。

（二）9回：“武都头误打李外传”路线

引文：武松从县门前“径奔到狮子街桥下酒楼前。”

提要：此处狮子街是从卫河畔狮子街移来。

（三）26回：“来旺儿递解徐州”路线

引文：来旺被公人押着：“离了清河县，往徐州大道而来。”玳安告知蕙莲：“俺哥这早晚到流沙河了。”

提要：往徐州，出临清东门（威武）过沙河。

(四)39回：“西门庆玉皇庙打醮”路线。

引文：骑马“出东门往玉皇庙来。……进约不上五里之地，就是玉皇庙。

提要：玉皇庙在城外东南。由县署处去庙，以出南门较近。盖因南门大街阻塞难行，才出东门南行至庙。此程约五里。

(五)47回：苗青害主潜逃路线

引文：“苗青另搭了船只来到临清码头上，钞关上过了，装到清河县城外官店内卸下。”“暗暗躲在经济乐三家。这乐三就在狮子街石桥西首，韩道国家隔壁。”

提要：临清马头指钞关前码头。官店：指临清砖城外卫河畔狮子街石桥附近的娼店。

(六)48回 狄斯彬查访尸首路线

引文：“这狄县丞率领一行人，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七八将近新河口止，”挖出尸首。公人禀道：“离此不远就是慈惠寺。”

提要：实指临清西河与汶河南支入卫河口处。（俗称头闸口）。附近有定惠寺。（亦有十月放河灯的习俗）。此西河、新河口、慈惠寺地理组合与广济闸桥、临清码头，晏公庙地理组合。共同构成实写临清的铁证。

(七)49回：“西门庆迎接宋巡按”路线

引文：宋、蔡二御史“京中起身，都行至东昌地方。”“西门庆与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至新河口，地名百家村。”“鼓吹进东平府察院。”

提要：1、按宋蔡先从（北）京沿运河到东昌，西门庆后从清河到新河口（在临清）迎接。可知已把清河与临清艺术转移到东昌以东。

2、此处指从清河到临清头闸口迎接。为五十里。

3、接进东平府察院实指迎入到临清察院。

为什么又托名东平府？后文交待。

(八)54回：“应伯爵郊园会诸友”路线

引文：从伯爵家出来“众人一同上船，就摇到南门外三十里有余，经到刘太监庄前。”

提要：从南门外码头上船，溯汶河往东，二十里堡为官窑基地。至三十里瓦房村与刘孩子村，疑为管砖厂刘公公庄园。

(九)58回：韩道国杭州贩货归来路线

引文：“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收银两，未曾装载进城。

提要：由汶河西行至临清钞关。城，指临清砖城。

(十)65回李瓶儿殡葬路线。

引文：起棺后“刚转过大街口望南走，那两边观看的人山人海。”又说：“出东街口……迤逦出南门……到于山头五里原。”

提要：出县城东街口，转过大街口往南经南门大街，出南门到土山；约五里。

(十一)68回：“玳安殷勤寻文嫂”路线

引文：由西门庆家“出了东大街经往南，过同仁桥牌坊，由王家巷进去，果然中间有个巡捕厅儿，对门就是座破石桥儿，里首半截红墙是大悲庵儿”往西小胡同到文嫂家。

提要：东大街指县东街。出南门外有一石坊（明江西监察御史方元彥家牌坊）。由此转往东约里余是慈育庵（民国时称谓），疑即大悲庵。

(十二)77回：崔本湖州贩货归来路线

引文：“崔本沽了二千两湖州绸绢货物，腊月初旬起身，雇船装至临清码头。

提要：此处指南门外码头。

(十三)81回：“韩道国拐财”逃走路线

引文：扬州起程：“一日来到临清闸上，这韩道国正在船头上站

立，忽见街坊严四郎从上流坐船而来，往临清接官去。”当他得知西门庆已死，便“在码头上发卖了一千两布货……往清河县家来。在瓮城南门里，日色渐落。……打头口径进城中……来到十字街口……经到狮子街家中。“次日五更……把箱笼细软之物都装在车上，投天明出西门，经上东京去了。

提要：临清闸：指城东的闸。码头：南门外码头。瓮城南门里：指有月城的永清门里。十字街口，南门里大街口。狮子街：指艺术转移到砖城内的狮子街，西门：砖城广积门。

(十四) 81回：“汤来保欺主背恩”路线

引文：“一日钞关上纳了税，放船过来，在新河口起脚装车，往清河县城里来。“往临清码头上，将封寄店内的布货，尽行卖了八百两银子，暗买下一所房子在外边。”

提要：钞关：临清钞关。新河口：头闸口。清河县城：指临清砖城。临清码头：卫河东岸码头。

(十五) 89回“清明节寡妇上新坟”路线

引文：“清明佳节，吴月娘……往城外五里原新坟上与西门庆上坟祭扫。……出了城门，又见那新原野旷，影物芳菲，花红柳绿，仕女游人，不断头的走，……那府州县道与各处村镇乡市，都有游玩去处。”回来时，远远望见绿槐影里一座禅院……名唤永福禅林。”

提要：城外五里原：砖城南门外五里郊原。城门：南门。府州县道：土山脚下通向东、南一带村镇的道路。永福禅林：虚构庙名，当指土山北端之三官庙。

(十六) 90回：“来旺盗拐孙雪娥”路线

引文：来旺与雪娥五更天从西门庆家跳下房来”，前边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拦住。”谎称：“俺们是夫妇二人，前往城外岳庙里烧香，起的早了些。”“走到城下，城门才开，打人闹里挨出城去，转了几条街巷，”到“东门外细米巷。”

提要：十字路口：南门里街十字路口。岳庙：在东门（威武门）外月城内。

（十七）93回：王杏庵带陈经济晏公庙出家路线

引文：王杏庵从清河县城“乘马，雇了一匹驴儿与经济骑着。安童、喜童跟随，两个人抬了食盒，出城门经往临清码头晏公庙来。止七十里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庙，天色已晚。”“王老到于码头上，过了广济闸大桥，见无数舟停泊在河下，来到晏公庙前。”

提要：清河县城：河北清河县，今距临清五十里。临清码头：汶河北支入卫河处的临清码头。广济闸大桥：东西跨临清西河。晏公庙，在临清码头处。

（十八）94回：“洒家店雪娥为娼”路线

引文：山东卖棉花客人潘五在清河“娶雪娥到张妈家，止过得一夜，到第二日五更时分，谢了张妈妈，作别上了车，经到临清去了。此是六月天气，日子长，到码头上才日酉时分，到于洒家店，那里有百十间房子，都下着各处远方来的寡子行院娼妇。”

提要：潘五到河北清河买到孙雪娥，带回临清广济桥西的洒家店。由上文可知，临清，无论从历史发展上，大环境上，细部地理上均与《词话》高度一致，“名托清河实写临清”的论证，是论之有据，证据确凿的。显然，它就是《词话》故事发生的背景城市。

【注释】

①—②考载于聊城金学会编《金瓶梅作者之谜》。

③本文均依戴鸿林校点词话本。④乾隆·临清直隶州志。⑥《辞源》第112、128页。
②⑤⑦转引自《北京大学学报》1988.5期《明代临清钩沉》⑧⑩《金瓶梅词典》，王利器主编。
⑨⑪民国《临清县志》

⑪⑫《临清二轻工业志》，临清市二轻局编。⑭《临清地名志》，临清市地名办公室编。
⑮《中国名胜词典》639页文化部文物局主编。

丁耀亢眼中的清河与临清 于润琦

清河是《金瓶梅词话》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有人对清河的所在似乎还有争议。或主张其地在今河北邢台地区，明属广平府；或主张其地在江苏淮阴地区清江市西，明属淮安府。^①现据丁耀亢《续金瓶梅》一书对“南北清河之争”谈谈个人的管见。

《续》^②书对清河、临清、东昌府、东京和徐州、清江浦、扬州等地及其相互间的地理环境作了不少描述。现择其主要章句胪列于下。

一、清河与临清的地理位置

清河县地方，去临清不远。（一回）

婆子道：“前日晚上，他说腿走不动，要往临清河口里船上去。如今才二日，有人去还赶得上。”……月娘道：“只怕还在临清河口里，雇船也赶上了。……不如大家赶到临清河口，找着玳安，……。”（十六回）

“（翟云峰在东京）……不拘那个船上，送月娘到临清。离家百余里，就是他家清河县了。”（二十四回）

……刘公父子想忆仙师前言，知道清河县近临清，不遭兵火。（四十九回）

以上几段文字可见清河、临清两地较近，不过百余里，水路仅二日途程。又可见清河在临清之北，因为月娘从翟云峰（东京）处回清河，先到临清，后回清河。东京在临清之南。这里的清河显然不

是南清河。

二、清河与东京的地理位置

(妙趣)“只借你一坐后梢舱，到京与你二两银子。”……梢工见是女僧，说话在行，也不计较。(十六回)

……却说吴月娘在盐船舱里，不消半月，早到汴京城门首。(十六回)

(由东京)次日登舟，一家人口上船。不消半月，到了清河县，在毗卢庵住下。(五十九回)

以上几段方案可见清河、东京往返路程均为半月。两地船价是二两银子。这里的清河依然说的是北清河。

三、清河、临清、东昌府、东京诸地间的地理位置

a、如今听得番兵破了东京，不久还要回来临清驻扎。(一回)

b、这金子不敢在这里(指清河)卖，不是临清，就上东京去。(一回)

c、……说是兗州府上临清下文书的。(一回)

d、那东昌府提准官，……姓刘名锐，是个极负气性的，发牌到清河县，过了临清。这典史骑马，接到交界，跟着进城。(五回)

e、……却说这张大自从小河口杀了来安，……上东昌府里破落户开赌场的李小一家躲着。(六回)

f、东京渐渐平息。这些花子们，散往各府去赴食。那金哥母子先到山东临清，住了半年。游到清河县地方，进得西门来，不往别处去，那狗只往当日提刑千户西门庆的住宅里。(十四回)

g、即如月娘，……上东京流落在给孤寺中，幸亏翟云峰念旧，资助盘费，又与他搭了大船上的舱口，顺路到临清码头上，回到清

河来，算得是停妥之极。（二十五回）

试析以上几段文字

a、表明东京、临清两地相距不远；东京在临清之南，因番兵从北南下，且两地交通较为便利。

b、表明清河离临清近，而离东京较远，是先临清后东京；临清在清河、东京之间。即清河在临清之北，东京在临清之南。

c、表明清河、临清距兗州较近。而兗州府明属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查《嘉庆一统志》卷一百六十一《山东统部》：“……明洪武元年，置山东承宣布政使司，领六府（济南、兗州、东昌、青州、登州、莱州）……。”

d、表明东昌府在清河、临清以南，否则谈不上“过了临清”。

e、表明（清河县）小河口离东昌府也不很远。

f、g 表明东京、临清（码头）、清河水路的南北顺序。

综而言之，人们对隶属山东的临清、东昌、兗州诸地的地理位置大概没有异议。而清河又与这些地方有着天然的近邻关系。在《续》书中见不到描述南清河的半点影子。至此是否可以得出有争议的清河应是北清河，而不是南清河的结论。

丁耀亢，字西生，号野鹤。山东诸城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 1599 年）卒于清康熙十年（公元 1671 年）。《续金瓶梅》为其晚年作品，成书于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2 年）前后。

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续金瓶十二梅》十二卷六十四回。存傅惜华藏顺治原刊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字。附精图六十四页。

孙先生著录、傅先生收藏的顺治原刊本当为丁耀亢《续金瓶梅》首次刊刻本之一。

应该承认丁耀亢是见过《金瓶梅词话》^②原刻本，或比《词话》本更早的本子，比现在我们更能见到原刊本。丁氏据此而演成的六十四回的续书，凭着这部续书他可以称为研究《金瓶梅》的专家或

权威了。这位明末清初的金学家，生活的时代相距《词话》本问世的时代并不甚远。（据成书于嘉靖年间说，充其量过半个世纪）从《词话》本到《续金瓶梅》问世也不过百年左右的时间。凭着丁耀亢的山东籍贯，（虽然《金瓶梅》作者之谜至今尚未揭开，但倾向其作者为山东籍的研究者为数不少。）凭着其对山东地理的熟悉，凭着其对《金瓶梅》的深入研究。使他敢于写续书，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虽然对《续》书的褒贬不一致。）尽管人们对《续》书的思想与艺术诸方面可以做出不同的评定，但对《续》书中地理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还应持一致的意见。即《续》书中的地理环境的描述还是忠实于原著的。由于两书问世相去不远，书中所依据的地理环境及其背景虽有变化，但不会很大，况且都是不易变迁的河流、城市、码头、港口等，具体讲《词话》本中提及的清河、临清、东昌府、兗州、东京及徐州、淮安、清江浦、湖州、扬州诸地至《续》书时代不会发生多大地理位置上的改变（当然行政区划可能会变化）。据此，有理由认为两书中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同一性。从而可以证实《续》书中地理环境描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或许有人可以提出反问，稗官小说只是街头巷议，不足为据。但有一点应该看到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或言中国通俗说部（尤其明清通俗小说）的特点之一还是以真人实地为据，由此敷衍成篇，以飨读者的。反过来讲，作者本人也无须在地理环境上故弄玄虚。

一言以蔽之，丁耀亢《续》书中描述的清河、临清、东昌府、东京等地的地理位置是清晰的，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可信的。《续》书中的清河是北清河。如果说“清河”地理位置在《金瓶梅》诸多易刻本中产生了疑异，那么这种疑异在《续》书中得到了澄清。换言之，由丁耀亢这位明清之际的金学家给予了完好的订正。

《续金瓶梅》多处记述明代临清的一些情况。现将其择录并分析如下。

一、记述临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及布匹业的兴隆

由于山东临清地处南北漕运的咽喉。随着明初资本主义萌芽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出现，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临清必然会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影响，而在嘉靖、万历时期其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这在《续》书中可以得到证实。

如：“清河县地方，去临清不远。富庶繁华，……（一回）。

又如：“这是临清河口地方，来往官员客商极多。”（三回）

历史上清河临清地小人稀。例一虽只言清河是富庶繁华的，而清河的富庶与近邻临清很有关系，清河的繁华离不开临清的。例一虽只言清河，没言临清，而临清的富庶也是可以想见的。

如果说以上引证只是一般性的概述，不足以说明问题。下面再举例进一步说明。

临清的繁华，临清河口的喧闹，临清河口官商的集结。他们在做什么？重要的活动之一是经商，而经商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做布匹生意。

如：“（张小桥）……买下货来，咱就在临清开青布店。……这临清三行生意，布行是上等，不拘有几千几万来，不消几日，就发脱了，都是两京三边上的大客人。凑来总收，各边关上去卖，还要挣钱呢。”（二回）

又如同回，（来安老婆）道：“咱如今只和他合伙开布店，去临清买货，他自然取出金子来卖，那时买下几百筒布，这是藏不了的。”……夫妻议定，到明日和张小桥说要上临清去卖金买布的话。……“到临清置了货，开起店来，过两个月把他娘们，雇辆车子，离了清河县，在临清住下，谁来问你，此计如何？”

又如同回：“张小桥先说道：‘这银子还好零使，这金子不敢在这里卖，不是临清，就上东京去。这三百两金子，少也要七八换，值

二三千银子，买下货来，咱就在临清开青布店。咱兄弟二人一个上南买货，一个坐店开张。不消二年，连本三合，这布货是算得出来的，又不零碎，又没剩货。”

又如：“张大笑道：‘你老人家怎么当差来？这一时就糊涂了。咱有这些行李，父子二人上了临清。把金子卖了，才好做生意。难道来安会做买卖，咱父子二人倒不如个奴才么？’”（三回）

以上是来安、张小桥等合谋劫取吴月娘的不义之财后，双方心怀鬼胎想进一步独吞此财的几段对话。姑且不管他们如何分赃。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

1、临清当年布行生意是相当兴隆的。市井小人物有了钱财，就想做生意，而做生意就做布匹生意。因布行是“上等生意”，并且“不拘有几千几万布，不消几日，就发脱了。”张小桥、来安还有笔经济帐，不消二年，连本三合。”甚至要把家眷都搬迁到临清去。可见临清的布行生意多能赚钱。

2、卖布有市场。买卖是双向的，卖方有上市场，买方有购买力。来临清买布的“都是两京三边的大客人。”他们“凑来总收，各边关上去卖，还能挣钱。”这些两京三边上的大客人，左右着临清的布行市场。商人唯利是图，什么买卖赚钱就做什么生意，哪儿的生意兴隆就往哪儿钻。临清能调动两京三边上的大客人的积极性，说明临清当时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临清当年商品经济的繁盛景象是可以想见的。

3、临清的金融市场。兑换较大数额的金子“不是临清，就上东京去。”引文把临清与东京并论。张、来的不义之财，自然不便在清河县兑换（姑且不管清河有无兑换能力）。而临清近邻东昌府，临清是县。东昌是府；而去东京也要经东昌府。把东昌府搁置不论，说明什么呢？说明东昌府虽为府郡，但经济上的繁盛并没比身为县地的临清强富多少。而临清的金融市场可与东京相提并论，这又从侧面反映出临清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度。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小说家言、街头巷议，不可当真，不足为据。我们承认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有作者主观上的随意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这种主观随意性是以现实社会为基础的即文学作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我们不可能否认这种反映论。拿以上所录《续》书中的引文来看，来安、张小桥等都是作品中的小人物，而这些小人物打发这笔不义之财的方式可以开赌场，可以贩卖粮食，可以开茶坊，可以开饭馆，可以做其他生意。但作者没让他们干其它营生，只选中了布行生意。这又当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布行生意在当时临清的商品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且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几乎在这段时间里，布行生意成为临清商品经济的代表之一。以至山东地区的人们说到临清就不能不谈到布行生意，反之，提起布行生意就不能不想到临清。正由于这种情况，离这一时间不远的，又生在山东省境内的丁耀亢对临清的布行生意当然会知晓。临清布行生意的现实当然会给其深刻的印象。在他眼中山东地区的布行生意的代表即是临清。以至有意无意地（甚至可以说是有的）把这种现实反映在其作品中了。这也正是为来安、张小桥等讲谈布行生意的所在。

为了证实我们的观点，姑且再引经据典。

《明经世文编》卷四十一，赵世卿《关税亏减疏》中记有：“临清向来段（缎）店三十二座，闭门二十一家，仅余十一座。布店七十三座，闭门四十五家，仅余二十八座，杂货店六十五座，闭门四十一家，仅余二十四座。”

虽然赵氏记录的是万历时期税使抽税后临清商行的凋敝状况。但从中仍可想见临清当时商品经济及布业兴隆的繁盛景象。由此可见丁耀亢《续》书中对临清布业的记述与史籍记载的一致性，进而证明他的描述的真实性与可信性。

《续》与《词话》中这方面的记述有相承性。翻过来看《词话》第八十一回：“（来保）往临清马头上，将封寄店内存货尽行卖了八百

两银子，……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蚕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马头迎着客货而买。”从金瓶梅时代到《续金瓶梅》问世，从兰陵笑笑生到诸城丁耀亢，都对临清有着极大的关注。在有时一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临清做为一个贸易集散地始终保持着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态势。临清这个商品流通的热点，给着从笑笑生到丁耀亢几代山东籍文人深刻的影响，而类似《清明上河图》式繁闹场面的再现，无疑地会或多或少地在这一时期山东籍文人的作品中表现出来。

二、记述临清其它诸事

1、临清与官粮

《续》书五十九回：“(在东京)翟云峰三日不放，月娘急要辞回，云峰道：如今有临清解米的回船，起一路官？既是我的新眷，再不消费事。”

由此可见临清至东京是官粮运输的重要通道。临清也是官粮的重要来源地之一。临清、东京两地间不仅有定期定载的官船，而且一路绿灯。《续》书的记述与史书的记载是否一致呢？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初年即建立临清仓。后嘉靖、万历年间不断扩展。临清有三仓，临清、广积仓俗称大仓，常盈仓为小仓。“万历时，大仓岁入山东河南并大名州县两税二十万余石，小仓岁入山东州县所供米麦六万余石。”

早自永乐年间起，政府每年派户主事一人督理仓务。^④以后督仓者多有增加。

由此可见临清历史上又是重要官粮仓。

2、临清文化的剪影

商品经济的繁荣，必然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历史上临清地区

的文化也有过昌盛时期。这在《续》书中也能见到些过去的影子。

五十六回写道：“了空（在江淮一带）等了一起香客，是山东临清善人，当的南海进香社，僧俗有百十人，……朝南海去了。”可见临清善人不少，不仅在本地兴做佛事，还远赴江淮。又可见临清善人信佛虔诚，不仅在本地顶礼膜拜，还结社远朝南海。这不从侧面反映了临清地区宗教事业的兴盛吗？

查《临清县志》建置志三，宗教类，寺观：“临清寺观所在多有，名目繁多，兹区分为神道类、释教类、道教类、贤哲类、从祠类，列表於左：

寺庙表一 （神道类）

城隍庙	明景泰间建
文昌祠	明景泰
文昌祠	明万历
八蜡庙	明洪武初
马神庙	明弘治时
社稷坛	明洪武二年

寺庙表二 （释教类）

大宁寺	明时建
静宁寺	元时建
天宁寺	明永乐三年
满宁寺	元时建
大佛寺	明州人汪珙建，清光绪间京西 檀柘寺方丈僧慧宽重修
永寿寺	明万历间州人柳佐建
观音堂	明时建
禅觉寺	不详
圆觉寺	明时建

莲花庵 不详(为运河堤工最险要处)

净城寺 唐时建

(按:临清清朝所建庙宇尚多,因与本文所论无涉,故节略)

右表所列系规模较大或有古迹所在者。余如城内之广济寺,水月庵,福田庵等;城东之西方境、准提庵;城北之圆觉寺、宝泉寺、琉璃庙;城南之大藏庵、弥勒庵、观音祠;城西之大士殿、卫罗庵、多福寺、石佛寺、净土寺等不下数十,乡区小庙尚不胜计。释教之盛於此可见。

《续》书三十五回<三教堂青楼成净土、百花姑白骨演重门>中描写兴建儒、释、道三教堂的热闹场面。“这些僧尼、善男信女等众何止几千人,和起佛来,人山人海。这三尊佛无非是过去、未来、现在法像,用三顶八大木轿抬起,恰也灵应。这铜佛少也得五七千斤重,一上了轿,趁着经声佛号,如风行之速,往这汴河西李师师府中来。路旁看的人都手执信香,念佛之声如海潮雷动一般。安在画楼中间,挂起旌旗宝盖,蜡烛、香花烧的炉内沉檀香烟馥郁,木鱼钟磬声音不绝,即时就成了栴檀佛国,昙花香海,因此把汴河一千里内行善参禅,大家妇女都来进香,沿路车马不绝。”以上虽写汴京行造教堂,但从中是否可以窥见临清一带当年宗教的盛迹呢?

文化包含多方面的内容,除宗教文化外,市井文化也是其重要的一方面。

《续》书二十六回<蒋竹山官星妙药 苗员外卖富投诚>中写道:“(蒋竹山)又听的临清关上两个粉头弹得好,一个叫做李翠,一个叫做月娥,在篮旗营里,也使了六百两银子买了来。”

蒋竹山因治好了兀术妻子的病,被兀术赏赐了几船盐。谁知盐包内藏有大元宝,因而暴富。于是,又赎旧娘子韩金钏儿,又买粉头,可谓小人得意,忘乎所以。这且不论。青楼女子要想在京城立住脚不是件易事,而李翠、月娥这对双璧,誉满东京,名噪篮旗营。不仅立住脚,而且还颇有名气。她们是临清人,是临清造就了她们,

使她们具有与大都市青楼女子的能力。这又从一侧面反映了当时临清市井文化发展的高度。

3、清河与临清的替代

在《续》书中出现了清河与临清两地替代的情况。

如第二十五回中写道：“这月娘和小玉下了官船，守着个包袱，……又没个熟人问问路，如何往山东回临清去。”

这里表明吴月娘的老家好像就是临清，而没提是清河。如上例不足以说明问题，再举一例，如同回：“（月娘）……翟云峰送我临清……。”这是月娘亲口之言。进一步证明临清即是月娘老家。临清即清河。如果说因为清河、临清两地近在咫尺（按《续》书中讲两地相距百余里。）在当时（包括丁耀亢生活的时代）人们心中，清河即临清，抑或临清即清河，只是一种习惯而已，两地可以相互替代。如果不是这样，丁耀亢用临清替代清河是否还有什么其它寓意？临清与《金瓶梅》实际作故事发生地，临清与《金瓶梅》的作者，临清与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世及经历……，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待深入考查。

以上就《续》书中涉及到临清的几个小问题提出管见。希望能够引起学者们对丁耀亢《续》书的重视，并解决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死角。

【注释】

①本文所称“《续》”指《续金瓶梅》，下同。

②本文所称“《词话》”，指《金瓶梅词话》，下同。

③见《临清州志·修理三仓记》。

④见《临清州志》卷四。

一九九〇年元月十日

京华西郊万寿寺

《金瓶梅》是山东临清一带的方言

殷黎明 张荣楷

关于《金瓶梅》一书所使用语言问题，争论已久，众说纷纭，其目的是以此为打开作者之谜的突破口，虽然其用心是良苦的，但未必奏效，不论怎么说，反正是争论起来了，总是有好处的。语言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尤其是文学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我不想在这方面作更深一步的涉猎，只就《金瓶梅》一书所使用的语言谈一谈我的看法。

总揽《金瓶梅》一书的语言使用现主四说：1、山东方言说；2、山西方言说；3、吴语说；4、融官话、俗语于一炉。从以上所列看，似乎大相径庭，可是，这正是我要论及的主题——《金瓶梅》就是山东临清一带的方言，山东临清一带的方言（明代）特点就是和吴语、山东方言、官话、俗语、行业语融汇贯通，相互浸润而形成的一种临清运河文化语言，这种语言，不只在《金瓶梅》一书中使用，而且是在明清诸多文学作品中普遍使用。

临清城的形成和临清一带地域文化的形成，有着非常特殊的历史原因，搞清楚这一内涵，语言特点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临清是依清河而得名，清河史载为古河名，《战国策》云：“苏秦说齐曰，西有清河；说赵曰，东有清河”。《汉书地理志》云：“清河水出内黄县东北，至信成入张甲即系此河”。临清城东六百华里即为齐都临淄，四百华里即为鲁都曲阜，西三百华里即是赵都邯郸，南三百华里即是卫地大名府；北距沧州不足五百华里。历史上这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自然灾害连年不断，黄河频频决口，这里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大禹治水称疏九河其中有三条河流经此地。经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得知，唐、宋时期的的文化层均深埋地下七——八米，

其次便是朝代的更替和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势的连年战争，使得这一带基本上是无人区，直至元代运河会通渠开通后，临清城区的会通镇一带归堂邑县管辖，唐、宋时临清县治所还在今河北省临西县仓上一带，金、元时永济渠下游徒废，转入卫河，临清县治遂迁至曹仁镇，距今城址南五华里，《马可波罗游记》中记之强格里城即是，时只对河中往来货船有具体描述，而对城的建筑及规模均未记，现考金、元临清城，方圆亦不过二华里。

元末农民大起义，极其沉重地打击了官僚地主和蒙古贵族，红巾起义后，山东情况是：“往年大姓家存者无八、九”。近年我们在临清文物普查中发现明代重修开元寺碑，由方元焕草书碑文，就记载了红巾军在临清一带的活动，对当地造成极大的破坏，把规模宏大的开元寺焚烧殆尽，直到明嘉靖年间才得以修复。元帝国入主中原后，残暴压迫各族人民，又杀李、王、张、赵、刘等五族，刘富通起义后与元争战十三年之久，苏、皖、豫、鲁百姓死亡七、八。元朝诸王内讧遂起，先后在豫、鲁、晋展开争城夺地之恶战，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北京，统一中国。以上兵灾历时十六年之久，这又一次给临清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据明史载：“洪武二十四年五月谷、卫、庆、宁、六五练兵临清”。明大将常遇春，徐达也驻兵临清，至今，临清尚有帅府街遗址，常遇春倡建的清真寺尤存。所以，临清人常常谈起“燕王扫北”的故事。（朱棣平定北方后，封为燕王）此后，明惠帝即位，朱棣又以“靖难”起兵。明史载：“建文元年七月癸酉，燕王棣举兵反，称其师曰靖难，累战四年六月乙丑”，“督都宋忠、徐凯、耿山献帅兵三万屯开平、临清、山海关”高煦（燕王之子）尤从军有功，白沟（卫河古称白沟、清河）东昌之战危急时高煦皆预其场。此时的临清城已由曹仁镇移至现在的临清位置，城区居民的成分除少数土著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元代遗民和明诸王自南方随军迁来的军属，至今在临清城区 10 万居民中就有二万回族同胞，现乃存有“锦衣陈”祠碑。

元、明朝代更以及稍后的“靖难之役”均给临清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出现一片残破景象，顾炎武曾说：“明初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是可信的。

明朝政府为均衡人口分布，发展农业生产，恢复中原经济，曾先后七次向中原移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如：“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将山西无田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临清隶东昌）共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徒山东登州、莱州二府无地少地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于东昌府”。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又徙青州、兗州、登州、萊州、济南五府五丁以上及无田可耕的农民于东昌，编籍屯种”。（明太祖洪武实录）。

另据《文献通考》载，明太祖至成祖年间，屡移山西民于安徽、河南、山东、江苏四省。明初还施行军卫所制度，以使军队平时屯田，临清一地先设德州右卫，后又设临清卫，有大量军屯兵士，后遂形成自然村庄，临清一带有相当一部分村称某某官屯，某某官寨某某官营，就是与军屯有关，须知军队人员构成籍贯是很复杂的，对当地文化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据近年地名资料证实，临清一带自然村庄十之八、九是在明初和明初以后形成的，土著老村庄只占十分之一、二。据统计，明代临清自正德至万历间共有进士51名，而临清土著只有26名，其余均是客籍。

以上这种历史原因对临清一带的文化——语言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必然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这种历史事实恐怕是与《金瓶梅》一书有关的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这也是构成临清语言特色的重要因素。

对临清语言——文化起决定影响的要算是运河漕运的开通。

永乐13年，以元代所开会通河为奠基、明代开凿的大运河全线畅通，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与朝鲜、

辽东及东南沿海进行交通，永乐二十一年，明成祖择天下形胜，建都北平，百官六军之食，咸仰给东南。“漕运者，盖国之大计也”，为此，特设 12 总下属一四三卫，官军 12 万，宣德间又增至 16 万，拥有漕船一万一千多只，由江南经山东运河而北运漕粮年达四百多万石之多，另外漕船还携带各地特产进行贩卖，漕船回空南下时，可载运旅客及北方地产及手工业产品，这样南北物资交流，迅速使临清这一小镇发展成运河重要都会城市，洪武时，在全国各州县设仓贮粮，“政府出主旧贮，常百万。又仓一，日常盈，岁额济南诸府麦米五万石有奇”。“嘉靖间督储分司方喻，重修三仓”。（《临清州志》）。

宣德四年始设钞关七所，为河西务、临清……，临清杭州兼榷商税。

弘治二年，升山东临清县为临清州，以馆陶县及邱县隶。

时临清“地居神京之臂，势扼九省之喉，连城则百货萃止，两河则万艘安流”（《临清州志》序）“总计临清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明清史料甲编》）。

如前所叙。在这“百万人口中”（此数当有夸大之词），临清土著即操临清土话的人数若占过半的话，那么另一半所操语言定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让我们简单分类，应是有这些人组成：

1、衙门署员。衙门包括那些正式的中央派出机关如：钞关、工部营缮分司，户部分司，仓储，皇庄、卫所，教场等等，地方衙署如州署，六部，学馆，递铺等等。

2、宦官插手所设立的名目繁多的机构。明中叶的宦官专政和厂卫统治，形成了宦官专政的局面，他们的手伸向了国家的各个要害部门，对于当时临清这个“岁征四万金”的宝地，宦官更是不放过，时“有管仓太监一十五处，共占门下十六名，皂隶三百零二名，俱在本州拘要在役”。（《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自宣德末，京、通二仓置总督中官一人，后缘滋多……临清、徐淮诸仓，并多置

监督”。(《国朝典》),因修建皇陵,皇宫所用大砖而在临清设立的砖场,也由宦官管理。

……夫仓、厂、场、库、钱谷之要地,今皆内官主之”。(《明大政要撮要》)。

3、侨商,明代中期,临清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商阜,借助运河漕运,加上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产品的商品化,临清市的商业空前的活跃,万历年间,临清有“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酒店和茶、杂货、中药店数处,“商贩之夫,日益屯聚”(《天下郡国利病书》)这在《金瓶梅》一书中和临清现有的街、巷名称中均有充分反映,这些经商者大多来自山西、安徽、浙江等,现保存完好的运河四大名塔之一的临清舍利宝塔,是万历修建的,其第六层,就是山西王姓布商独资捐修。塔中刻石记载此事,可见当时商业之盛,到成化十一年末,“户部以游宦侨商,日渐繁衍,并令占籍”。至此,客居临清的各地商人便在临清定居了。

4、宗教人员与少数民族。由于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兴盛,为适应过往客商及当地居民佛事活动的需要,临清几处大型的寺庙道观,随着兴旺的经济建设而如同雨后春笋一样遍布全县有上百座。如大宁寺,行宫庙,碧霞宫,歇马亭,永寿寺,泥驮寺,晏公庙,开元寺等等,均具相当规模,另外回族进行宗教活动的大型清真寺就有四座,现存一座便占地 1 万平方米,至今保存完好的有两座,是在嘉靖、万历间修建。在《金瓶梅》一书中出现许多回特有的语言,至今在临清回族群众中仍在使用,难道说这只是巧

山 040

5、游宦公。在《金瓶梅》一书成书的那个年代,一方面是临清的繁荣兴盛,另一方面,也是明王朝宦官政治的最黑暗时期,全国政治的腐败、宦官的邪恶,厂、卫统治的横行,尖锐的阶级矛盾,导致一起起的冤狱,屈死者受诛连者不计其数,还有一些逃避政治,对现实不恭者,隐居世间寻求安逸者,政治落魄者,文场失意者,这

些人总想寻找一个栖身之地，临清当是最理想不过了，市场繁荣交通便利，各种信息集中而迅速，所以，当时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寓居临清。这些人对临清的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6. 船户。当时在运河上的漕船有一万一千多只漕军 12 万，民间以船为生如捕鱼捞虾者，摆渡客运，贩运经商，苏州班子等等，也不少于此数，以每只船 10 口计，人数是很可观的。象临清这样重要的商阜码头，漕运枢纽，每天在此营生的这类人等为数不少，这些人所操语言之复杂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据上所述，《金瓶梅》一书所用语言之谜，似乎不言而喻忽然明朗起来。

临清地区方言为山东方言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深受运河通航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借助运河之利，临清有数百年的繁荣，加之历史的原因，逐渐形成了以运河文化为特色的临清方言，也可称作以临清语言为代表的运河文化语言，《金瓶梅》一书就是用这种特殊的语言，编织了一幅宏伟的明代历史画卷。

《金瓶梅》与临清及运河文化

马 征

明代万历年间诞生的文学名著《金瓶梅》与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京杭大运河，以及运河城市临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本文试为论之。

一、《金瓶梅》中有临清的地理背景

众所周知。《金瓶梅》是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作由头，另辟蹊径创新著成的。《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是清河。这清河是个小小的县城，按此县的地理沿革，它历来属河北（或云京师、直隶等名称）。而不属山东。《金瓶梅》称清河县属山东东平府，除了要与《水浒传》合榫而外，作者是有意要把故事的发生地往山东的地理背景上靠，考察全书。故事多写山东的临清、聊城、济宁、东平府，都是山东境内的运河沿岸的城市，这用意自然就清楚了。

在山东境内，与清河离得最近的是临清。临清与清河相距七十里，在三国、魏晋时代，临清属清河郡（后改清河国）。而在明代，临清却发展成了一个新兴的运河城市。史料说它“自开渠运，始为要津”^①。其原因是这里“居神京之臂、扼九省之喉、连城则百货萃止，跨河而为艘安流”^②。“东西南北之人。贸易辐辏”于此^③。由于临清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而且是个重要的码头，临清码头来往商船甚伙，交易十分繁荣；临清钞关所征商税在全国占极为突出的地位，即以万历年间为例，临清钞关的税收相当于杭州、扬州钞关税收的六、七倍之多，所以当时临清有“天下第一码头”之称^④。据说那时的人口达“近百万”^⑤。

《金瓶梅》中写到临清的地方很多。有明写的，也有暗写的，明写的如第九十二回云：“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又如第九十三回写王杏庵指点陈经济说：“此去离城不远，临清码头上。有座晏公庙。那里鱼米之乡、舟船辐辏之地、钱粮极广，清幽潇洒。”次日，二人“到于码头上。过了广济闸大桥。见无数舟船停泊在河下。”“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书中不仅写临清，而且直接写运河。此外，书中又多次写临清的钞关。钞关的主事钱龙野是西门庆家的座上宾，西门庆的货船经过临清钞关。必要写书信拜托他，请求“青目”，以减轻税额。

由《金瓶梅》中所写临清的繁华景象和所云“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的话来看，可以断定该书所写的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临清城的风貌。这是因为：

第一、会通河（即流经山东境内、从临清到东平的一段运河）是元代至元二十六年才凿的，所以书中所谓“运河初开”就绝不可能是宋代的事。

第二、所谓运河初开是指明代对会通河的疏通。明初，由于黄河水患影响。“会通尽淤”。明朝政府对会通河的浚理反反复复进行了很长时间，直到孝宗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方得合龙”。^①所以《金瓶梅》所写必然是明中叶以后的事。

第三，再说临清一城建成的时间。“临清”一名虽然古已有之。但其城址建立在运河边上。还是明开国八十年以后的事。据当代学者傅崇兰先生考察，明洪武二年曾在今临清市设“临清县治”（至今“县治遗址”尚存）。但当时并未建城。原因即在于会通河淤塞。交通不便，妨碍了这个城市的迅速发展。直到明正统十四年（1449）。临清城始得建成^②。其后才日渐繁华，一跃而成为北方的通都大邑，以致有所谓“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之美誉（“张”指张秋）。

综上所述。《金瓶梅》中的临清实乃明代弘治末年以后或嘉靖以来临清风貌的真实写照。

《金瓶梅》不仅明写临清，而且还有不少地方是明写清河、暗写临清，或临清、清河混写。以临清代清河。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书中出现的御砖窑和管砖厂的刘公公和黄主事。《金瓶梅》的作者把烧制皇砖这桩重要的公差挪用在故事发生地的清河来写。但事实上这完全是明代临清的事情。临清在明清两代都是大型的御砖生产基地。北京的皇宫、天坛、定陵等雄伟建筑所用的大量砖料，都是临清烧制的。据史料记载，临清的砖官窑建于“明永乐初”。且“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⑧。据傅崇兰先生考察后计算，临清在明清时的砖官窑竟有“三百八十四个”之多，每年可生产御砖“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块”。这些砖“都靠运河的交通之便，送往通州，州志记载：明初‘临清砖就漕艘搭解，后遂沿及民船装运。’‘正是为了运输方便，临清砖官窑都分布在卫运河沿岸’。而‘管理机构一直设在临清’”^⑨。

我们之所以认为《金瓶梅》中所写的砖厂及其“管砖厂刘公公”、“管砖厂工部黄老爹”云云，不是清河县的情景，而是临清这个运河沿岸的城市的写照，其理由有三：第一，史料没有记载清河是御砖的生产基地。第二，清河不靠运河，在古代交通运输不便的情况下，倘要在清河大开官窑，大造御砖，其现实可能性是没有的。第三，史料明确记载临清是御砖的集中生产地，又是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见前所引临清志“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且临清当时已成为北方经济繁荣的通都大邑，皇帝所派命官和钦差理应驻在设有管理机构的临清，怎么会呆在弹丸之地的清河？由此可见此处的清河实系临清。

除此而外，清河与临清混写的情况也有，最明显的是第九十四回。写刘二在临清的谢家大酒店，把正在那里交欢的陈经济与郑（冯）金宝打骂了一顿。“叫将地方保甲，一条绳子，连粉头都拴在一

处墩锁。吩咐：“天明，早解到老爷府里去！”小说接下来写，“却说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经济、金宝、雇头口骑上，趁清晨早到府前伺候。”可是当陈经济、金宝等一行抵达守备府时，守备还未升堂。可见时间之早。然而，按书中的交代，守备府是在清河，清河离临清七十里地。纵然是雇了头口骑着，也得走一天，而决不可能在升堂之前就赶到清河。由此看来，守备府与临清又仿佛是在同一个城市。当然，作品这一叙述可能出于作者一时的疏忽，而作者的这种疏忽，又说明他在写作中其实是把临清、清河混在一起构思的。

总之，在《金瓶梅》的故事中，临清作为地理背景的因素和重要的景观都是不可否认的。

关于《金瓶梅》中临清的地理背景。王莹和王连洲先生都写过文章。他们认为《金瓶梅》的地理背景就是临清，甚至举出书中所写清河县的教场、手帕巷、皇庄、清河左右卫、玉皇庙、石佛寺、真武庙、观音庵、狮子桥、灯市、县前、土山、都督府等都是临清的地名。他们所说的是有些道理，但也不宜绝对化。因为教场、玉皇庙、观音庵、灯市、县前这些地方在清河县是必然有的。我们的看法是：《金瓶梅》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地理背景则不仅仅局限于临清一地。例如，主人公西门庆的官署——山东省提刑所。书中把它设在清河县，这自然是子虚乌有之事；但倘说这也是在写临清，就不合理。这是因为临清是当时的商业经济城市，而非政治中心；山东一省的提刑所，理应设在省会所在地的济南府。由此可见，《金瓶梅》的地理背景虽然包括临清，却又具有比临清更广阔的范围。再比如说，《金瓶梅》还经常把东平府与清河县连在一起写。例如第六十五回描写迎接六黄太尉的情景：“抚按率领多官人马。早迎到船上。……人马过东平府，进清河县，县官黑压压跪于道旁迎接……”。这样看来，清河与东平府又仿佛近在咫尺，甚至可以认为这清河县也就是东平府府署之所在地了。而事实上，东平府与清河之间，还隔着东

昌府、临清州等这样一些难以略去不计的地段，其间的距离相当远。由此可见，作者又有把清河与东平府混写的意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这样作结：《金瓶梅》故事有一个开阔的地理背景，这个背景集运河沿岸城市风貌之大成，而临清则是这个背景的轴心。

二、《金瓶梅》是大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

《金瓶梅》故事与中国的京杭大运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该书以运河沿岸的城市为地理背景，还因为这个故事的各色人物、种种心态以及整个故事的素材、氛围、环境和空间等等许多方面。都是因为有了这条运河的流通而后才存在的。换句话说：《金瓶梅》故事是大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

中国的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全长 1700 多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 10 倍，比巴拿马运河长 20 倍。”^①

中国的运河开始开凿的时间很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沟通江淮。甚至可以追溯到楚庄王“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的时代^②。而后来便有尽人皆知的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之举。但是，尽管如此，运河之所以被称为“京杭大运河”而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及其意义的历史，是自元代以后才开始的。

元代由于一反历史上建都中州的传统，把大都（今北京）定为京城，就急于要解决从江南到北京的漕运和其他货运等交通的问题。而当时旧运河的河道是从江南通向洛阳，而不是通向北京的。中间卡脖子的一段是山东，确切地说，便是从临清到东平一段的二百五十余里，此段路当时要靠陆运。这不仅频添装卸的麻烦，而且这段陆路地面低洼，道路泥泞，交通运输很不方便。直到至元二十六年，元朝政府开凿了会通河，稍后又开凿了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并疏理了江南运河。这时（大约元武宗大至年间）运河的全线工程才基本竣工^③。自此，大运河（从江南到大都）的通航及其“京杭大运河”这一称谓才成为运河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篇章。

明代的运河基本上是元代运河的袭用。明朝政府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对会通河的疏理(明初,会通河已淤塞)。这项工作始于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直到孝宗弘治七年(1494)才大功告成。自此,运河才真正成为南北的大动脉。

京杭大运河的全线畅通 保证了国家漕粮的运输和南北货物的通流,极大地促进了运河沿岸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此同时。一大批明珠般的城市也在河岸新兴发展起来。例如,杭州、苏州、扬州、淮安、济宁、聊城(东昌)、临清、德州、天津、北京等城市,都从这条运河获得经济、文化的实例,尤其像临清、聊城、德州这些城市,基本上是大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

《金瓶梅》的作者是有意识地要表现运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作为一部文学艺术作品,作者成功地把这一写作意图具现化为小说中生动的世态人情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是个商人,后来又做了官,他一出场就已“交通官吏”。不仅“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第二回)。而且早在他做官之前就已通过派出家人,拉扯亲家陈洪的关系,突破小县城,走出山东省,直奔京师,干求于权臣蔡太师、宰相李广彦门下。尔后,西门庆的经商活动与为官生涯更与大运河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大运河也就没有《金瓶梅》的故事。

《金瓶梅》对大运河空间的依托和展示,是作者创作意向的一种精心营构,清河本来并不在运河边上,但作者在行文中却有意要给人造成一种迷蒙感,仿佛西门庆派家人一出门就可以踏上运河的航道。或者沿着这条河道。从四面八方辐凑而来的官商宾客,仿佛一离运河的船就到了西门庆的家。这种忽远忽近的迷蒙感并不是作者弄不清楚这一带的地理位置,而是出于作者建构艺术空间的需要而有意为之的。例如。小说第三十六回写西门庆派家人来保到新河口迎接蔡状元。蔡“见西门庆差人远来迎接,又馈送如此大礼,心中甚喜。”既是远来迎接,有多远呢?据王连洲先生考证,这

新河口在临清，可见是远得很哩！但小说第七十四回写西门庆送别蔡九知府。“随即差了两名吏典，把桌席羊酒尺头，抬送到新河下处去讫。”由此看来，这新河口又不远，仿佛就在清河县的城池边。更为特异的是前引第六十五回叙写迎接六黄太尉的情景。作者说“抚按率领多官人马，早迎到船上。……人马过东平府，进清河县。……直到西门庆家中大门首。”在这里，大运河、东平府、清河县不仅一线贯穿，而且仿佛没有距离。但在事实上，距离却相当远，绝不是一天的行程可以达到的，然而在作者所营构的艺术空间里，这些距离通通被销解了。

《金瓶梅》的和者之所以要把大运河写得这么忽远忽近的，完全是由这部作品离不开大运河。大运河的流动不仅带来了江南的货物与商品，带来了北方的政治与传统，而且也正是由于大运河的流动，使这部讲叙日常生活故事的作品具有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宏大的空间。从而使整个故事变得色彩斑斓、异常生动起来。

《金瓶梅》是一部表现当时社会生活的世情小说。它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主要有三大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社会的政治生活；另一部分是社会的经济生活；除此而外还有市民阶层五光十色的日常生活。这后一部分的内容虽然极为庞杂。但若从文化的角度予以考察和研究，它却是最值得归纳和很有意义的部分。

《金瓶梅》中的政治生活与大运河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看到。由于运河的关系，朝廷在这里（指故事发生地）设有砖厂、皇庄等御用机构，派有管理人员，所以国家大事和朝廷的信息很快便能到达这里。例如。第六十四回在西门庆的筵席上，管皇庄的薛太监对管砖厂的刘太监说：“昨日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电把内里凝神殿上鸱尾震碎了，唬死了许多宫人。朝廷大惧。……昨日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地三镇。依着蔡京老贼，就要许他，掣童掌事的兵马，交都御史谭稹、黄安十大使节制三边兵马。又不肯，还交多官计议，昨日立冬，万岁出来祭太庙，太常寺一员博士，名唤方轸，早晨

直着打扫，看见太庙砖缝出血，殿东北上地陷了一角，写表奏知万岁，科道官上本极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以上所言三件事既有国家政治，也有朝廷内幕，甚还有宫廷新闻，由此可见虽是在小小县城，消息还是又灵又快的。

此外，也由于运河的交通之便，这靠近运河的城市便成为官员们过往、驻足的地方，自京至此，或经此赴京（请注意。《金瓶梅》中所说的京师，有时指宋代东京，但有不少处是按照明代京都北京的地理位置来写的）。而且西门庆又常常派出家人“东京干事”。他自己也出迎官员或上东京朝见皇帝，叩谒权臣，带回大量信息。因此，运河空间总与政治风云紧密相连，书中叙写了大量南来北往的朝廷命官，他们穿梭般辐凑于西门庆的生存空间，其中不仅有山东一省两司八府的官员，还有巡按、巡抚、新科状元一流炙手可热的达官显贵。甚至还有皇帝的钦差大臣，如六黄太尉，通过他们的活动，小说展示了封建朝廷特权等级社会的复杂关系及其黑暗，腐败的政治生活。

《金瓶梅》中所描写的经济生活，与大运河的关系更密切。小说采用点线结合的写法（点即清河——临清；线即运河沿线）。把当时运河流域一带经济繁荣、商业、手工业兴旺发达的景象刻画得非常生动、具体。

西门庆虽僻居一县，却拥有“几万产业”（第五十七回）。家中开着四、五个店铺，店中发卖的绸绢、缎子、绒线、布匹等货物都靠着运河从南方贩运来。例如：第五十八回所写韩道国“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第六十回所写：“那时来保南京货船又到了”。第六十七回西门庆对韩道国说：“兑二千两一包，着崔本往湖州买绸子去，那四千两，你与来保住往松江贩布，过年赶头水船来。”到了第七十七回，交代崔本治办的“二千两湖州绸绢货物”“雇船装载，赶至临清码头”。除此而外，西门庆还靠着运河之

地利，拉扯着蔡状元的人情，派家人来保、崔本到扬州支盐，大获厚利。

小说通过展示西门庆家的商业活动，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运河经济的窗口。此外，作品尽其所能还对当时清河、临清一带工商业发展的面貌作了宏观的描绘，一个小小的清河县城，不仅百业俱兴，而且店铺多多。临清的大码头更是熙来攘往，热闹非凡，货船一到码头，商贩们便“打着银两远接”。“迎着客货而买”（第八十一回）。临清的广济闸大桥下，总有“无数舟船停泊”（第九十三回）。码头不仅是装卸货物的处所，而且直接就是市场，临清钞关像咽喉一样，钳制着运河货船的税收。小说中所描绘的种种景象，与史料记载十分吻合，是当时临清码头商业经济文化实况的再现。

《金瓶梅》虽然只是重点反映了清河——临清的商业经济生活，但由于临清完全是个新兴的运河城市，足以概括和代表大运河流域的特征，具有高度的典型性，所以《金瓶梅》中有关临清的描写就不仅具有当地的特殊性，而且还具有整个运河空间经济文化特质的普遍性，反过来说，既然临清的商品经济文化是大运河的产物。而《金瓶梅》通过临清反映这一经济文化的面貌，那么这部作品本身何尝又不是大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呢？

《金瓶梅》所描写的五光十色的市民生活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这是因为，这部作品不仅宏观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方式、生活状况等）。而且动态地描绘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文化冲突，即两种意识形态的矛盾、对立和斗争。在这些矛盾冲突中。作为传统旧文化对立面的。是商品经济影响下产生的一些新的价值观念和反传统的思想文化意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冲突归根结蒂是社会经济的变更所引起的。这种变更如果足以强大到使旧的生产关系被破坏，新的生产关系被建立，社会生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时，新型的文化就会诞生。但是，如果经济的变化不足以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那

么旧文化就不可能发生质的改变。新观念将会与旧意识长期处于消长起伏的冲突之中。《金瓶梅》中所展示的文化冲突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一文化现象更充分地显示了大运河政治、经济、文化对这部作品所产生的影响。

三、从《金瓶梅》看大运河文化的特色与局限性

大运河文化不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因为它有比地域文化更复杂得多的人文因素。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使这个地区的文化在观念意识上呈现新、异的态势。但皇权的干预、朝廷的直接控制，又使这些变化难以向正常的方向和更本质的方面发展，许许多多的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都将对它产生影响。因而它不像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那样具有长久的稳定性。《金瓶梅》中所出现的文化现象正是大运河文化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小说把这些现象表现得如此生动具体、惟妙惟肖。正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一文化的最佳途径。

第一、《金瓶梅》中的文化景观具有新、奇、放、谲的丰富色彩。它具体表现为小说所展示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消费心理、人生态度、习俗风尚等各方面与传统观念相抵牾的现象。首先，长篇小说选取一个商人作主人公，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中国是个重农抑商的国家，长期以来，商人为人所不齿。是绝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而此际时代变了。西门庆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神圣的文学殿堂，居于首席位置。《金瓶梅》的作者（估计他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阶层）虽然并没有给他一个高度的评价，但却如实地写出了他独具的财神爷的“光彩”和威风，不仅社会的小市民阶层向他顶礼膜拜，连达官贵人也向他送媚眼。蔡状元专程到小小的清河县拜谒他，这是因为状元宦囊羞涩，要向他借钱，蔡太师不但讨好他，给他赐官，而且连他的家人也看得上了。其目的是为了以后再多收受些他的重礼。大太监何~~沂~~为了巴结他，连皇帝御赐的青缎五彩飞鱼蟒衣也拱手转赠。皇亲们在走下坡路，渐趋破产，连房屋、器具也卖给了他，甚至不敢和他争夺一个妓女，因为他已用大量的财物打

通了朝廷权臣做他的靠山。由此可见，中国特权等级社会中具有强大传统的森严的等级制。此时也变得不那么神圣了。这些变化是在金钱的攻势下发生的，再进而言之，便是大运河商品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直接后果。

其次，《金瓶梅》表现了市民阶层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观念的严重对峙、抵牾与冲突。

由于运河流域地区商品经济的成分占有较大的比重，金钱的作用比过去更突出，市民阶层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都比过去有较大的提高。这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的消费心理与价值取向。传统的价值观念是束缚型的。它要求人们“存天理，去人欲”；要求妇女遵崇“贞操节守”、“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但新的价值观念是开放型的，金钱引导人们冲破束缚，发现自我，追逐物欲，及时行乐。《金瓶梅》对上述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都有所展示，前者如恪守妇道的吴月娘、割发毁目出家为尼的韩爱姐、为陈经济守节的葛翠屏，但是，这一部分人在书中占极少数；然而与此相对立的却有一大群生动的形象。他们占据了书中的每一个角落，倘以书中人物有明确观点者计。后一类人要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由此可见《金瓶梅》作者的主要意图是想对这个社会新出现的价值观作多方面、多层次的展示。那么，作者是怎么展示这些新观念呢？

《金瓶梅》是通过对“人欲”的描写来展示新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种种反响和光怪陆离现象的。

1、追逐“财色”。这是《金瓶梅》表现人欲的重心。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世人对财色的追求。他们追逐财色的手段、方式各种各样，千差万别，但其动因是一致的，这就是出于对财色有欲望的天性。

小说主人公西门庆不折不扣地是一个追逐“财色”的迷狂。他几乎白手起家，到后来竟成了拥有数万家产的财主。他的人发横财与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他靠谋娶富妇孟玉楼、李瓶

儿起家，孟玉楼的前夫是一个出外贩布的商人。他死后钱财落在孟玉楼手中。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她的这笔财富：李瓶儿随花太监由广南回到清河。花太监死前将贵重财物交在她手里，没有大运河她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财宝。至于西门庆开绒线铺、缎子铺、绸绢铺，派人去南京、杭州、湖州等地贩货。江湖上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更明显地是得益于大运河之便。扬州的苗青在北上的船上成了杀人犯，来到清河，给西门庆送上贿银一千两，也必然要打运河而来。西门庆的淫荡也是骇人听闻的，作品写奸占过的有名目的女人就达二十二人之多，还鸡奸过两个男童。大运河不仅给他送来了其中的一苏州籍的书童儿，而且还给清河送来了大量的“南曲”。他在奸占一些男女前后，不但爱听“南曲”，而且他送给他们的缎匹、衣物等，也多经大运河而来，且不说被他奸占的女人有的就是经运河来到清河的，甚至他临死以前还要拼命地追逐女色，迫不及待地希望苗青在扬州为他物色的女子楚云能尽快地乘船经大运河来到他的身边。

其他的人在小说中的表演没有西门庆那样多，但对“财色”的欲望仍然很强烈，而这些也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有关，例如，杭州客商丁双桥不止一次地来到清河，他趁贩绸绢获利发财之机，先后嫖妓女李桂卿、李桂姐；浙江湖州客商何两峰也进了妓女何金蟾的勾栏；其兄何官人更是多次来清河、临清贩丝绵绸绢，他不但在临清娼店占着两个粉头，而且又跑到临清第一大酒楼上养婆娘；长得很出色的雏妓郑爱月，刚成人便被南方来的客商所梳笼；西门庆虽以每月二十二两银子包住了李桂姐，但她为了多得钱财，便背着西门庆又接了丁双桥。一开始便收了他十两银子、两套杭州重绢衣服；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来保乘船经大运河到南贩货，不但能捞到不少钱财，而且分别嫖着扬州的妓女王玉枝、林小红；如此等等。

总之，《金瓶梅》的作者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表示了“财色”作

为人的强烈的欲望所造成的影响，这个影响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丑恶的，但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却是进步的。马克思又并不否认历史上“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的办法，对于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所起的杠杆作用。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⑧《金瓶梅》还说：“世财、红粉、歌楼酒，谁为三般事不迷？”（第九十四回）作者的这些观点符合世道、人心，也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诚然，《金瓶梅》作者的本意是通过写出现实社会中人欲横流的病态，以揭示这个不可救药的社会的种种弊端，追究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由于作者思想的局限性和传统文章诫世、喻世的先验性框架作祟，小说中不乏道德说教的气息，但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超越这些先验性的框架，成功地把人对“财色”的欲望展示得如此生动具体，它使人们感受到：人的欲望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存在。“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⑨。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这样，小说就显示出了它的积极的意义：社会存在与当时还奉为圭臬的以禁欲主义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和价值观形成了全面的对峙。这种对峙既是对禁欲主义和旧价值观的否定，也是对新价值观的让步和变相支持。

2、追求幸福的人生。《金瓶梅》对人生欲望的表现是多层次的。追逐“财色”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层次较低，除此而外，表现较突出的是人对现世幸福的追求。主要体现为妇女们敢于蔑视“贞操守节”的旧道德传统，而以男欢女爱、幸福美满的现世生活作为新价值观念的标准。《金瓶梅》中这一新标准的代表人物是孟玉楼。她不但在丈夫死后改嫁西门庆，西门庆死后又改嫁李衙内，而且两次改嫁都由她自己作主，显示了她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这类禁欲主义的封建道德和价值标准的蔑视，以及对现实的人生幸福的

大胆追求。《金瓶梅》的作者最后给予孟玉楼一个非常幸福的结局。这不仅符合社会生活的现实状况。而且体现了作者对新价值观念的肯定,这是小说最有光辉的部分和最可宝贵之处。

在《金瓶梅》中,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孙雪娥、韩爱姐等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孟玉楼有相通之处,即为获得自身的幸福而苦苦追求。例如,潘金莲的思嫁武松和先后与西门庆、陈经济暗通款曲;李瓶儿在花子虚和蒋竹山先后给她带来失望和性饥渴的状况下勾搭、思嫁西门庆;庞春梅与宋惠莲贪恋从西门庆那儿获得性爱;孙雪娥下爱仆人来旺和韩爱姐对陈经济的痴情等等。其心理行为。或多或少都有合理性。不同的是孟玉楼的行为比她们有节制。合“礼仪”,而有的女子却因追求过当,迷失在欲海的深渊之中,从而导致了她们的罪恶和毁灭。《金瓶梅》的作者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这一追求。其中不同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冲突是很有意义的。

3、追求高消费的享乐生活。在《金瓶梅》中,作者对社会风气也作了相当深入的刻画与描写。总的来说,这个社会缺乏质朴之气,崇尚奢靡浮华的享乐之风。上自朝廷穷奢极欲。向民间要珠宝、玉器、古玩,下至市井细民讲排场、爱虚荣、“超前消费”等等。都是这种社会心理的表现,小说第五十六回写“西门庆周济常时节”,那情景颇耐人寻味,常时节通过应伯爵那张巧嘴,从西门庆那儿得到了十二两银子的周济,拿回家去,其时老婆已被“饿在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可是,这常时节亮出银子后与“饿得慌”的老婆商量,最先说到的是如何买些衣服、家俱。放在家里,等有了新房——这新房仍须靠向西门庆乞讨。“搬进去也好看些”。由此可见,他们所追求的消费生活已完全超过了他们实际的支付能力。这种现象在《金瓶梅》中是屡见不鲜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跟着富人(主要是商人)沾光。例如,西门庆结交的那帮“兄弟”。除了常时节,还有应伯爵、谢希大、孙天化、祝日念、白来创等,也都是同一类型的人,此外又

如。爱虚荣的宋惠莲靠与主子偷情得了些赏银。便把“银子成两家带在身边，在门首买花翠胭粉”（第二十二回）。仆妇王六儿仗着“输身”给主子，就趁机把消费档次提高了数级：不仅从西门庆那儿得到了头面、衣服，还让主子给她买了丫头和住宅。

在《金瓶梅》中吃喝之风也很盛。正因为如此，所以西门庆家的筵席总是吃喝起来没完没了的。但是，大摆筵席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对拥有数万家产的西门庆来说当然不成问题。可是其他人怎么办？除上面所说跟着富人沾光的小市民外，还有就是向商人借钱的上层人士，如蔡状元、安进士等。书中第七十七回写吴大舅做官须摆酒席，西门庆表示支持，说可以兑一千两银子，作摆酒席用。耗费之大，挥霍之宏，由此可见一斑。

《金瓶梅》中还有一个颇值得重视的人物林太太。此人向西门庆出卖色相，并不是完全出于“淫欲”；还有更深一层的隐衷是这个家庭入不敷出。为维持家庭不衰的外表，这个别无所能的上层妇女只好向西门庆这样的财神新贵频送秋波。

《金瓶梅》中还有许多关于社会风气的细致入微的描写，细细品味，可以深深感到，奢侈之风已遍被华林。

如何认识社会所产生的这些变化？如何评价上述价值观念、消费心理的失衡？那需要另作专文论述（我们认为它具有新、奇、放、谲的色彩这本身也是一种评价）。这里更关注的是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这原因与大运河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金瓶梅》所显示的文化现象是很复杂的，它既体现有新奇放序色彩的文化观念。也有不少完全流露封建传统意识的地方，这是下面要讨论的该书同样不可忽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与局限性。

第二、《金瓶梅》与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从观念意识的文化角度看，《金瓶梅》有许多相反相成的地方。但从小说总体性和作者的主要倾向看，这部作品与传统文化的悖离只占次要地位，而与之相联系、相合拍却是本质的和占主流的，

因而，该书所展示的种种新观念并不能被视为新文化的诞生。不仅如此，而且，由于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强大，再加上作者主观的倾向性，《金瓶梅》不但没有从本质上摆脱个文化的笼盖，相反却多次在宣言中将当时社会以高扬“人欲”为表现形式的新观念予以荼毒了，试举几例说明：

1、关于西门庆这个角色。前文已经说过。《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是个商人，这在中国文学史的人物形象中有开掘性的意义。但是，这个形象的终极意义却在于否定自我（这对为商人立传的创作旨意本身就是个微妙的否定）。西门庆是怎么实现否定自我的呢？其一是他迷失在欲海的罪恶渊薮中难以自拔。其二是他以钱买官，最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第五十七回他对婴儿官哥说过这样几句话：“儿，你长大了，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头，却没十分尊重。”西门庆企求的仍然是“学而优则仕”的“文官”！永福寺的长老来向他募缘。对他说“主得桂子兰孙，……日后早登科甲，荫子封妻之报。”西门庆听了“欢天喜地”。后来就助了五百两银子。西门庆显然希望子孙走“登科甲”的道路，这些都是作者让西门庆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实行的更彻底地否定，而肯定的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传统的士大夫之路，这在价值观念上，表示了他向旧传统的输诚与回饭。

2、关于“人欲”。如果说在西门庆的角色问题上，作者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他只能如此塑造西门庆的形象（这是因为社会没有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中国的商人和市民阶层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依附和堕落是他们的必然结局），那么小说对于“人欲”的表现却不是不可以选择的。固然，小说中也曾以新经济关系导致的价值观念对孟玉楼的三嫁行为给予高度评价，但这种新经济关系导致的价值观念在作品中并不占优势。相反，处处可以看到，在大多数场合，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具有压倒优势，例如作品对潘金莲等人的评价和命运结局的安排，就是从旧道德观出发的。小说对潘氏

等人采取否定和鞭挞的态度，而未能显示从新价值观的角度（如追求人生幸福、渴望爱情等）看问题就应对其复杂性格给予合情合理解释的不同寻常的意义。由于作品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传统的旧观念，所以书中对“人欲”的描写常常摄取纵欲式的病态的镜头。虽然就现实的社会现象来说，“纵欲”也是个不可否认的社会弊病。但它毕竟是一种极端状态。是社会的畸形。联系到当时全社会正在极艰难地争取人性的背景来看。作品的这些刻画与描写同时代的主潮是不相吻合的。相反，它是对人性和人欲的一种毒化，是旧道德观念意识派生物。《金瓶梅》所表现的这一文化现象充分说明该书与传统封建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3、关于作者的思想意识。《金瓶梅》的文化现象与作者的思想意识也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创作上。同时还表现在作者的直接插话中。纵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基本上是以旧道德观念来观照和评价社会现象及书中人物的。作者的倾向性在性文化意识上表现得甚为突出。小说对诸如男尊女卑、女人是祸水、性不洁意识等性观念，有露骨的展示和描写。小说一开篇，作者就宣称“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所以此书，“只爱说这情色二字”；作者在书中把潘金莲当作“淫妇”的代名词来刻画；把男女性交写得令人恐怖、作呕等等。都是上述性文化意识的表现。

总之，《金瓶梅》的文化意识虽然不乏某些新东西（例如新的价值观念、消费心理等）。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超越旧文化。《金瓶梅》具有的文化特色与局限性符合大运河经济文化的性质。

第三、《金瓶梅》所表现的价值观念缺乏长期的稳定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作者在举棋不定之际。只好将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念同时并举，这就是作者为什么既对恪守妇道的吴月娘表示极大的同情并给予善终结局，又对敢于藐视妇道、追求改嫁幸福的孟玉楼作高度评价。同样给予幸福结局的原因，这种在价值观念上两军对垒

的现象。有其深刻的原因，这就是权力的干预。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力统治着财产。这就是说，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政治权力还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¹⁹马克思的论述把两种权力的性质揭示得十分透彻。《金瓶梅》中所出现的许多二律背反的现象及其相反相成的价值观念，其实质正是与这两种权力的相互对立和彼此之间的消长起伏有极大关系的。

在《金瓶梅》中，虽然商品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十分令人瞩目。连皇权都不得不向财产让步（否则西门庆根本不可能跻身官僚士大夫阶级），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而且这种状况也是极不稳定的。在《金瓶梅》的世界中。除了西门庆。还有许多普通商人，他们的命运并不好，不是被任意地征税搞得倾家荡产，就是动辄被监禁，弄得走投无路，例如：盐商王四峰、揽头李三、黄四都遭了监禁。李三、黄四的下场很糟，第九十七回写他们被“监了一年多，家产尽绝，房儿也卖了，李三先死，拿儿子李活监着。”就是境遇稍好些的商人如何官人，也因没有好的出路，只好回湖州老家经营水稻田度日。

《金瓶梅》中所描写的中国商人和市民阶层的生存状况与其历史发展阶段的真实状况是很相符的，明代有很多资料记载当时朝廷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什么路引制度、市籍制度、税收制度、专卖制度，铺行制度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即如税收一项，就是个大关卡，运河沿岸钞关林立。商税越收越重，就拿《金瓶梅》中所写的临清来说。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原有缎铺三十三家，布店七十三家，但是好景不长，这些店铺因不堪勒索，大半倒闭了。尤其是万历二十四年（这正是《金瓶梅》在创作的年辰）。明王朝派出大批税监到各大中城市横征暴敛之后，各地的

工商税收增至原来的数倍到十数倍，极大地破坏了工商业的发展，到万历三十年，临清原有缎铺关闭了二十一家，布店关闭了四十五家，杂货店也关闭了四十一家。^⑩工商业所受破坏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最高统治者的这些措施乃是为了小撮特权者的尽情挥霍享有。这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极难发展繁荣的症结所在。

要之，明代社会运河地区经济文化具有如下的特征：开放性、变革性、传统性，保守性及不稳定性。

《金瓶梅》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生动、艺术地再现了我国明代大运河文化丰富的内涵，深刻地揭示了某些复杂文化现象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是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社会、历史、文化的难得的教材。

【注释】

①康熙《临清州志》胡鼎文序。

②同上书，于？明序

③⑦《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壬午，万历三十年九月丙子。

④转引自韩大成著《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一书。

⑤见《明清史料》甲编第 923 页。

⑥以上见《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二·运河上》。

⑦⑨傅崇兰著《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第 83~84 页、295、299 页。

⑧见张度修《临清直隶州志》卷九。

⑩详见王董《〈金瓶梅〉地理背景为山东临清市考》与王连洲《〈金瓶梅〉临清地名考》二文。

⑪中央电视台编《话说运河》第 7 页。

⑫史念海著《中国的运河》第 12 页。

⑬详见《元史·河渠志》。

⑭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01！

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 页。

⑯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350 页。

论明代临清经济的发展与 《金瓶梅》成书之关系

陈昆麟

近年来，关于《金瓶梅》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诸如成书的年代，作者是谁，成书的地点，寓意何在等等，都有许多新的见解。其中最有见地的研究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把《金瓶梅》当作时代的产物去研究。他们认为《金瓶梅》产生在明中晚期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已经形成的时代。因此，这是一部代表市民阶层利益反对封建阶级的文学巨著。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基于这种认识，那么，《金瓶梅》的产生地点必然是一个工商业经济相当发达，资本主义已经萌芽的城市。其作者也必然是生长在这类城市或者十分熟悉这类城市生活的人。近来，通过对《金瓶梅》所反映的主要社会问题及明代临清经济状况的研究，我认为，明代中晚期的临清，资本主义已经萌芽，具备了产生这部文学巨著的条件。临清应当是《金瓶梅》的产生地。

一、《金瓶梅》是一部反映市民阶层 反对封建阶级的文学巨著

《金瓶梅》在成书之后，就被封建统治阶级的卫道士们斥为“淫书”加以封禁。其所以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如此强烈的反对，“淫

书”，并不是其主要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这部奇书对封建阶级的纲常礼教，仁义道德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彻头彻尾的否定。当然这种否定不是用大喊一声的办法直指其弊，而是经艺术的手法来完成的。作者塑造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编织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通过人物在故事中的言行和各种活动，宣告了封建统治阶级行将灭亡。这哪能不触到封建统治阶级的痛处呢！

在历代的《金瓶梅》研究中，第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批注研究者，当推清代大学问家张竹坡。关于其身世，大家都很熟悉，不容赘言。我们所以赞成张竹坡，主要在于他指出读《金瓶梅》不是读小说，而是读历史。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他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全传，都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又说：“凡人谓《金瓶梅》为‘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首先指出，根据张竹坡所生活的时代，是不可能从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等方面去批注的。但是，他能从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伦理学和世俗偏见中跳出来，把别人斥为“淫”书的《金瓶梅》看作天下第一部奇书，是《史记》、是写封建统治阶级衰亡的史公文字，也就非常难能可贵了。在近十几年的研究成果中，孟超先生在他的《金瓶梅人物注》一书中，也力图说明《金瓶梅》的社会意义。他说：“不过，说《金瓶梅》里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封建集团，但也可以说每一个人物也”是这一集团的一部分。一粒砂砾见世界，我想从每一个人身上去看这个集团，从每一个角度上去观测他的全貌，也许更周详、更清楚些。这样，论每个人物也就是发掘他的整体了。”在这里，孟超先生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认为《金瓶梅》主要是在揭露封建统治阶级这一“整体”。这在金瓶梅研究中应该说又大大前进了一步。黄霖先生在他的《〈金瓶梅〉漫话》中，也认为《金瓶梅》是“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并引用明代谢肇浙的话说：“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俚语，市里之猜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

翰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俾枕席之语，驵侩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争妍，狎客之鬼逢迎，奴婢之稽唇淬语”，都达到了“穷极境象，~~骇~~意快心”^②的地步，“不少都可作为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史料来加以引用”。在这里，黄霑先生又从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等更广泛的角度，阐发了《金瓶梅》的社会意义。无疑，这在《金瓶梅》研究中又前进了一步。

但是，我认为近年来最有见地、最值得推赏的研究成果，应当是徐君慧先生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书中在“《金瓶梅》产生的时代背景”一节中，明确地提出了这是一部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状态中代表市民阶层的利益，向封建阶级进攻的文学作品。他指出：“《金瓶梅》取材于《水浒传》，摘取其中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情节加以大大扩充、深化，从而描绘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塑造了西门庆这个集商贾、官恶霸、淫棍于一身的官僚巨贾的典型。所以《金瓶梅》产生于明朝晚期，既是市民阶层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世情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③紧接着又在《历史的惰性》一节里明确指出，一部《金瓶梅》彻底否定了封建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忠、孝、节、义、廉、耻。他说：“《金瓶梅》写了蔡京、杨戬等一帮奸臣，否定了忠；写了王二官、陈经济一帮不肖子孙，否定了孝；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都是二嫁、三嫁、四嫁，林太太孀居外遇，否定了节；西门奸占义弟之妻，应伯爵生死易交，否定了义；官吏贪脏枉法，贿赂公行，否定了廉；韩道国出妻献女，甘当龟头，否定了耻；还塑造了西门庆这个大淫夫、一帮荡妇，以‘淫书’的面目出现，把封建道德打得落花流水，撕碎了每一片遮羞布。”^④这段深刻而精辟的分析，更进一步阐明了《金瓶梅》一书站在市民阶层的立场上向封建统治阶级进攻的主题。因此，我认为这是《金瓶梅》研究中所取得的最大成果。特别是徐君慧先生所作的“不只是讥讽王公贵族家的帐簿不修，更意味着官僚资产阶级行将取代封建贵族而主宰这个世界了；”^⑤的结论，更有独到之处。

我非常同意徐君慧先生的观点。《金瓶梅》是一部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代表新兴的市民阶级向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发起进攻的檄文，是为封建统治阶级送葬的挽歌。这样的一部文学巨著，必然产生于相应的土壤之中。以前，有些从事《金瓶梅》研究的同志，曾经根据书中的许多地名、方言俚语、生活习俗等与临清相同，从而提出《金瓶梅》成书于临清之说。这的确有一定道理。但似乎还不太充分，因为在许多城镇里往往都有诸如“竹杆巷、米市街、菜市街、官驿街”之类的小地名，而方言俚语又可互相学习。有些作者为了标榜自己见多识广、或者出于其他一些不可言传的苦衷，往往故意用一些天南海北的方言。就象现在有些作者喜欢在文章中加上几句外语，或用英文字母来代替人名、地名一样。至于生活习俗，因这里南来北往的商人很多，是可以互相影响的。因此，我认为这些地名、方言俚语、生活习俗等，虽然可以作为一种依据，但最主要的是看看明代中晚期的临清，其经济是否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萌芽状态，市民阶层是否已初具规模。只有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才真正具备产生《金瓶梅》这部天下“第一奇书”的土壤。因此，下边想着重探讨一下明代临清经济的发展，从而寻找出《金瓶梅》成书于临清的更重要的依据。

二、明代临清经济的发展

为《金瓶梅》的成书准备了丰腴的土壤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⑩又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⑪这都说明，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作品，是离不开经济基础

而独立产生、发展的。

那么，明代中晚期，临清的经济状况如何呢？众多史料说明，那时临清的经济已相当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已具有一定的规模。这主要表现在城市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形成上。

临清经济的发展，是与运河的开通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在那尚无公路铁路交通的时代里，水运的通与塞就更加直接地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兴衰了。有人说“运河通，临清兴，运河塞，临清衰”，此话并不夸张。因此，运河的开通，也正是临清经济发展的开端。据《临清县志》记载，元代至元二十六年春，因会通河的开通，而罢胶莱海道运粮万户府。~~延祐~~三年春，调海口屯储汉军千人隶临清运粮万户府以供转漕。^⑨这为临清经济的发展，开通了道路。

明代初期，临清尚未建城。但明皇朝已注意到临清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开始在这里设仓储粮，以备国用。县志载：“洪武二十四年五月……是岁储粮十六万石於临清以给训练骑兵。”永乐初，“临清仓储河南、山东粟，亦以输北平……”^⑩，两省的粮食都运往临清仓储存，数量之多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宣德四年，又令“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於临清仓……”，“寻令南阳、怀庆、汝宁粮运临清仓。”^⑪“宣德中，增造临清仓，容三百万石。”^⑫这些粮仓的建造，为临清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期机。这里有一笔帐很能说明问题。按明朝规定，每条粮船一次装粮三百石。那么，运进三百万石粮食就要一万船次。运出又是一万船次。如要每船平均有人5名，船工一项就有十万人次。而且这只是运粮船。如果再加运商品、运砖的船只，每年在临清码头靠的就有几十万了。而货物的装卸，没有上万人次也是难以完成的。这些人要住宿、要吃饭、要游玩、要日常用品，这必然会促使各种服务行业的兴起。服务行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具和炊具，这又会促使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整个临清的经济都空前发展了，使临清成

为南北交通之要冲。正如县志所云：“至元明建都燕京，全国经济端赖运河，临清处汶卫流域，每届漕运时期，帆樯赖运河，百货山积，经数百年之取精用宏，商业虽勃兴而不可遏。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⑨这段记载虽为民国时期的文字，但其追叙的明末清初时的临清的情况也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

明初，临清虽然已是漕运要冲，但尚未建城。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临清建城已势在必然了。临清砖城始建于景泰元年。吏部尚书王直在他的《临清建城序记》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临清为南北往来交会咽喉之地，……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地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其为要且切也。如此而可以无城池兵戎之保障乎……城其闲旷之地，九里一百步，辟四门，缭经深池，左建帅府，以居总戎。其余蕃宪分司卫所，县邑、学校、仓库百司局，各以位置，兵座有舍，商贾有市……”^⑩这段文字不仅说明当时临清已经是一个布置井然有序的城市，而且可知其城周长比当时已为东昌府治的聊城城周还要长一里又一百步。从内城部局和规模来看，临清的确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重镇了。也许有人要说，在这里只看出了城市布局，与其他县城无多大差别，并看不出商业经济的发展。是的，文中关于临清商业经济及市井繁荣情况的描述是不太细致。但在同时代的另一篇《临清州治记》中比较生动地反映了这一问题。“景泰改元，以济宁左卫为临清卫来司城守。於是薄海内外舟舰之所毕，由开府分曹，达官贵人之所递临，而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檣列肆，云蒸雾滃，而其地遂为南北要冲，岿然一重镇矣。”^⑪由此可见明景泰年间临清的繁荣景象；海内外的众多船只都来到了临清，达官显贵们也来到了这里。守卫临清的士兵和老百姓混杂在一起，大商富贾也都到这里来做生意。也许是舟船上的炊烟，也许是市井人流的热汗，也许是各个作坊里的热气蒸腾直上，形成了云雾滃的景象。

因商贾云集，人流如织，一个砖城已难承受如此重大的压力了，于是乎在正德六年（1511年），又筑土城。城周二十里。按其面积算，是原来砖城的五倍，是当时东昌府治聊城的六倍。

城池的扩大，必然又带来临清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嘉靖年间，临清仍是“……居南北两京之冲镇。河漕之上与卫水交会，四方商贾辏集，多于居民者十倍，诚繁华之地，贸易之所，天下之都会，京师所依重者也……”^⑨如果商业经济不发达的话，商贾是不会多于当地居民十倍的。因此，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在路过临清时，写下了许多赞美临清的诗句。在赞运河的诗中这样写道：“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⑩而在赞鳌头矶的诗中更形象地唱出了临清的繁荣景象：“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⑪

临清这种繁荣昌盛的经济，一直延续到清代初期。康熙十一年《重修旧志序》中是这样写的：“……而况临清由县升州，地居神京之臂，势扼九省之喉，连城则百货萃止，两河而万艘安流。或耕或商、或游，如织、如鹜如归……懿哉，若高阜堤，桥梁塔寺诸景胜，难以琐举，虽无名山之观，而亦非僻壤可比，诚东南之一大都会也……具其甲第连云，人物熙攘，漕运万艘衔尾北上，市肆鳞次摩肩，不减临淄即墨，猗欤盛哉！……盖此地五方走集，四民杂处，商贾辐辏，士女嬉游，故户列珠玑，家陈歌舞，饮食宴乐极耳目之观。此见吾善者几也。至于本境之民，逐末者多，力本者少……”^⑫这段序文至少说明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盖此地五方走集”至“饮食宴乐极耳目之观”，说明外来商贾之多，生活之奢靡。这些人非工即商，是不会从事农业生产的；第二，本境之民又是“逐末者多，力本者少”。封建统治阶级历来把农业视为本，把商业、手工业视为末，这说明就连当地的居民也与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重本抑末大相径庭。也是从事农业的少，从事工商业的多了。这正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济特点的写照；第三，“而况清源由县升洲”一段，说明了临清由

明入清资本主义萌芽经济持续发展的连续性。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明代中期以后的临清，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破土而出，并且奋力与封建经济抗争着。我们再看一看《金瓶梅》中所描写的西门庆。他自己经营着生药铺、绒线铺、缎子铺、绸绢铺，还有专门往来南北的标船。他所拥有的资本也是非常可观的。据第七十九回载：缎子铺是五万两，绒线铺有六万五千两，绸绢铺有五千两，生药铺有五千两，标船上有四千两，放出的高利贷总共一千零九十九两。又用五百五十两白银买了两处庄子。上述各项共折算白银十三万零六百四十两。这只是西门庆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并没将其日常挥霍无度的开支算在内。其中直接用于经商的就有十三万零九十九两白银。用于农业的白银只占用于工商业的千分之四。这样，西门庆的主要经济来源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租赋，而是靠商业资本获得的利润了。这不能不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初期资本家的写照。这样的人物也只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并且比较发达的城市。根据书中所提供的“北方”这一线索分析，非临清莫属了。

临清不仅商业经济发达，手工业也相当发达。

首先是制砖业。明代，临清成为明统治者修建皇城和皇陵用砖的主要产地。《明史》载：“烧造之事，在外临清砖厂……以供营缮。”^⑨并在此设立管理制砖之事的官吏曰陶政。县志载：“临清故有司空分署，岁遗属大夫一人掌管新之政。登上其材，以轻重算。贾人船，转输都官，法甚备也。其后，胥役狎习，抗敝巧法，器多苦恶，僦人告匱，将作始借前箸筹矣。万历辛巳，念庭刘公以起部大夫分署於此。至则召诸陶人问弊，所徭安施……所省公私之费岁又不下千万。……”^⑩这是明万历年间的礼部尚书于慎行在《司空大夫刘君陶政记》中赞颂陶政政绩的一段文字。官府对临清砖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要击之有声，断之无孔，大小一致，然后用纸封裹装船运往京城。开始还是“法甚备也”。后来，因为“胥吏狎习，抗敝巧法，器

多苦恶”，因此又派刘陶政前来加强管理。只是经过刘陶政的一番整顿，就取得了省下公私之费“不下千万”的可喜成果。可以想见，明代临清从事烧造业的手工业工人之多。这一制砖烧陶业，也是一直延续到清朝早期。康熙十一年王俊写的《重修旧志序》中载：“国家凡有营建恒需砖，临清因帆樯之集而以砖附之。设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于其地，督征砖价，分窑成造。转之京师。”^{①②}不仅史料记载如此，现在还有许多实物资料可以证明。现在北京的故宫、几个大城门、十三陵等地的用砖，至今还有许多留有大明临清烧制的印子。那么，毫无疑问，这些从事烧砖业的工人，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早期手工业工人了。

钞关的设立，也是商业经济发展的结果。

明初，统治者就已注意到临清是一商业发达之地，设法增加税收。永乐二十一年，山东巡抚陈济上奏：“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③永乐皇帝听取了他的意见，宣德四年，开始设钞关征税，“于是有滁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州、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④由引文可见临清收税更甚于其他地方。明万历二十六年，又派宦官马堂为驻临清收税专使。^⑤由于马堂的横征暴敛，促成临清工商业者的反抗。《明史》载，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临清民变，焚税使马堂署，杀其参随三十七人。”^⑥这次事变在《临清县志》的大事记和“王朝佐烈士碑”中均有记载。特别是王朝佐列士碑中记载更为详细。文曰：“王朝佐织筐子也，素仗义。万历末季，四遭抽地税，至不遗菜。佣中官马堂者督税天津，兼辖临清。始到，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夺人产，抗者辄以违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有破者大半。远近为罢市。州民万余，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⑦在这段记载中，起码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是民变首领是一编

筐的手工业者；二是举行了罢市；三是参加民变者在一个城市就达万余人之多。而且烧了官衙。杀了贪官污吏达三十七人。这不能不是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以上三点充分说明这是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市民阶层向封建阶级发起的一次反抗。

临清从明代中期经济的发展到晚期的万民变，百多年间，临清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确是在艰难中萌发，在困苦中生长了。当然，这种萌芽是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状态，绝不同于西方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就是同为萌芽时期，中国经受了数千年的封建经济的统治，由此而脱胎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封建经济的烙印。这也是中国萌芽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特点。我们绝不能因为他带有种种封建经济的遗痕。而就否定它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经济。这就如一个刚从娘胎中出生的婴儿，尽管他许多地方与母亲相象，但这毕竟是一条新的生命。总之，明代中晚期的临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萌芽，市民阶层已经形成。那么，这样的经济基础，必然会产生新的上层建筑来为其服务。新的市民阶层虽然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在政治上仍然受到封建势力的歧视和压制。没有权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如果按着封建统治阶级“重本抑末”的老一套办法，那么市民阶层是永远也不会进入政治舞台的，也就无法来保护本阶层的经济利益。《金瓶梅》中也正是通过西门庆买官的描写，来揭露封建阶级的黑暗和市民阶层努力挤上政治舞台的。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也就意味着新兴的市民阶层，将要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而取代封建阶级了。

简短的结语

鲁迅先生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尚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其变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以芝麻打出，取出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②《金瓶梅》也正是这样一部作

品。在封建社会即将灭亡，资本主义萌芽刚刚产生的时刻，它敏感地揭露了封建阶级的黑暗、腐朽和衰败，预示新兴的市民阶级将要取而代之。临清万历年间发生的万民变反对税官马堂的斗争，正是市民阶层反抗封建势力并争取一定权力的大演习。不过在《金瓶梅》中是用艺术的手法来表现两个阶级的较量罢了。《金瓶梅》所以禁而不止，封而不闭，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与它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临清明代经济的发展与《金瓶梅》成书关系之密切了。

当然，《金瓶梅》并不是一部白璧无瑕的完美之作。其缺点还是相当严重的。（关于缺点，已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故不赘）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其有缺点，就一叶障目而完全否定它。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我看来，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乐观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秩序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这时并没有明确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①诚然，恩格斯的这段话是针对着无产阶级的作家来写的，但同样适用于《金瓶梅》的评价。对无产阶级作家的要求尚切如此，我们又怎能苛求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金瓶梅》的作者呢？《金瓶梅》不也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打破了人们对于封建关系的传统幻想，动摇了封建阶级的乐观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封建秩序的永世长存的怀疑吗？因此《金瓶梅》就不失为一部文学巨著，不失为天下“第一奇书”！

【注释】

①孟超《金瓶梅人物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

②黄霖《〈金瓶梅〉漫话》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0页。

- ③徐君慧《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广西人民出版社。
- ④同③第121页。
- ⑤同③第23页。
-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66页。
- ⑦同⑥第四卷第506页。
- ⑧《临清县志》第一册第4页。
- ⑨《明史》第七册第1916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 ⑩同⑨第1916—1917页。
- ⑪同⑨第1924页。
- ⑫同⑧第四册第45页。
- ⑬同⑧第十一册第15页。
- ⑭同⑧第十一册第18页。
- ⑮同⑧第十册第48页。
- ⑯、⑰同⑧第十册艺文志。
- ⑯、⑱同⑧《康熙壬子重修旧志序》
- ⑲同⑨第1988页。
- ⑳同⑧第十一册第37页。
- ㉑、㉒同⑨第七册第1976页。
- ㉓同⑨第七册第1978页。
- ㉔同⑨第二册第281页。
- ㉕聊城地区博物馆藏《王朝左烈士碑》档案资料。
- ㉖《鲁迅全集》第十册第197页。
- ㉗《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2年版第435页。

山东的地理研究

池本义男著

三、山东的地理研究

词话里，山东各县名，尤其是河北西南部的各县名出现过很多。其中，成为问题的地方名称是序中提及的兰陵笑笑的兰陵。兰陵是山东省峄县，作为故事情节展开的舞台中心的清河县。所谓峄县是指江苏省武进县的兰陵。武进县的兰陵是王世贞出生的地方。关于山东的峄县，在晋代，在山东峄县东部五十里处设过兰陵郡。到汉代成了兰陵县。在南宋时期，也称为南徐州南兰陵郡，苏常道。江苏苏常道，是指距武进县西北九里的地方。亦即江苏与安徽及山东的南部交界之处。根据这种版本，认为作者笑笑生就是王世贞。《金瓶梅》的作者不是王世贞吗？

笔者是赞同王世贞一说的。(划线处原文用黄色涂抹，下同，译者注)

在明代洪武二年，划归了山东的兗州府济宁道的峄县，当时把山东的兗州、济宁、枣庄、兰陵、兰城、还有江苏的邳城一带称为峄县。不管怎样，虽然兰陵、峄县从古代就未确定是辖于山东或江苏，但是到了明代这一带都划归了山东济宁府。另外，济宁府是以汇入山东南阳湖的荆清河、郭河和江苏的微山湖等流经西南方向的河流和湖泊为界，在东南部从沂水发源地山东流入江苏的大河是西南面的莒沐湖，莒沐湖成了江苏东面的边界。这两个地方是深入到江苏北部的区域。

关于作为舞台的东平府清河县，与其说是山东、河北、河南交界的地方，不如说是在山东与河北交界之处。关于东平府，在汉代

是指山东的西南部，大运河的东岸，大汶河下游地区的东平国东郡。在隋代，山东郓城县的东部一带被称为济宁州东平郡。在宋代，将郓州作为东平府所在地。在明代，将唐代广州郡的东清河、平原郡合并成东平州，少部分地区划归兗州府，将县城设在须城。因此，小说里有宋代的东平府。现在改称东平县，该县境内西部的东平湖是东山县和梁山县之间的一个湖，东平湖的东面和北面都与黄河相通，是水产品丰富的地区。湖区虽有水稻，但达到自给自足程度的作物却是小麦、高粱、大豆、谷子等等。作为经济作物，自古以来就栽培棉花。因此，对于西门庆日常食用的宋代食谱，能够很容易地购入这些自给自足的产品。因为向农民放债，所以获得其他的谷物也很方便。同时，水产鱼类品种繁多，所以能够买到新鲜的；水果的产量也很高，这一些就是这一带的特产，所以西门庆在家中食用的东西不是从远地运来的。

关于清河县，在汉代将清河、故城、枣强、南宫、清平、恩县、冠县、高唐、临清、武城称为清河县。到了明代，包括上述区域的广平府设在甘罗城。随着江南的开发。包括现在的淮阴，成了淮安府，变成县是从清代开始的。正如上述各县设置那样，清河自秦汉代以来，就是冲衡要地，它位于现今河北省南部、南运河的西岸，邻近山东。清河是连接大名的大名道。隋代以后是连结江苏的淮阴道的据点。

大名在词话中出现过。大名位于河北南部，与山东、河南邻界的地方。大名是卫河、漳河流经的地区，在汉代在元城县曾设过大名府。在唐代，被天雄军占据，在明代也有屯军，称为大名府。

本来，清河是指大清河，亦即济水，指白河汇入的水域。也象东平那样，在清河、大名也有许多河流、湖泊，水产品也很丰富。如上所述，水稻自给自足，但主要是小麦、谷类、高粱、大豆等作物，这类粮食很多。并且，因地势低洼，且沙地很多，所以也是花生的特产区。

再说开封城，开封东起河南东部，位于黄河南岸。战国时代的魏国，五代的梁、晋、汉、周、北宋都曾在开封以南的故城建过都。五代的梁以后，作为开封府总括了郡县。汴州的名称自唐初才有，也称汴梁汴京。在宋代将开封县和浚仪县合并为祥符县。到了明代，将汉代增设的开封、浚仪二县以及宋代的祥符县合并为开封县。初次建都称之为东京开封府。在《金瓶梅》第十五回中，关于向蔡太师送礼的一节里说，西门庆从清河县去东京途中用了半月时间。即使骑马昼夜兼程也得用五天时间。

开封自古以来就以“汴绣”、“汴绢”而著称。开封的丝织品、染织业以及棉花是很有名的，所以小说中所述之高档纺织品都是从此地运进的，在开封，农作物也有水稻；小麦、高粱、大豆、谷类也生产很多。此地也是始自秦汉代的交通要冲。开封毗邻山东、河北、江苏、河南（不该再提河南——译者注）等地。另外，流经开封的河流很多，此地又有湖泊，断定当时此地是水运（或称内河航运——译者注）的枢纽。当时开封水资源充足，不用说，水产资源也很丰富。与军事、政治密切相关的极其发达的漕运，与其他地方的单纯的物资水运不同。开封在成为左右全国经济形势的物资集散地的同时，也是全国文化交流的中心。因此，作为暴发户和勾结官府的商人西门庆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到苏州杭州的流行文化，也能先于别人得到官方消息。内河航运的发达是一个重要原因。

再谈：“饮食物”。（结论详见《食物考》）

例如粮食，随着漕运的发展，从河南、江苏、安徽等地运来的粮食成了官员们的供给饮食，所以在作为据点的清河县设置了粮仓。关于这一点，在小说里也简要地写过。另外，据文献记载，山东各地的粮仓都收购粮食，另外主要是集聚粮食。所以上述地方的自给自足的大米以及从粮仓密买的粮食就是西门庆日常的主食。这是毫不奇怪的。其他的新鲜食物、调料，另外还有服装也是如此，购买流行的东西，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在日本有饲养鱼鹰的。自古以来就有用鱼鹰捕鱼的方法。一提到饲养鱼鹰，自然就会想到爱知县的长良川，认为长良川是唯一的，然而在该县的犬山也有鱼鹰的饲养者。与长良川相比，犬山养得更好。有情趣的是京都是宇治川，九州、四国的各条河上也正在采用此法捕鱼。原来，用鱼鹰捕鱼是中国捕鱼方法，所以当然在中国的各处河流上，自古以来就是用这种方法捕获香鱼和其他种鱼的。一提起中国的河川，你就会想到杂有黄色泥沙的褐流了吧。其实不然，中国有许多清澈的河川，这是自然的。各地还有许多温泉。在日本，家乡的人们，不论是在爱知，也不论是在京都、九州、四国，在拉起香鱼时，总是不客气的自吹自擂地说：“俺是本地的香鱼。”

可与日本的香鱼相媲美的是中国的鲥鱼。鲥鱼曾多次在小说中出现。在西门庆与应伯爵尝鲜的章节中，对于鲥鱼，有详细地记叙。中国人没有不知道鲥鱼的人。在自诩为中国通的日本人当中，有的人仅仅知道中国有珍贵的鲥鱼。在各地，鲥鱼作为名口而称著的理由是它有“鮓鱼”的美称。鲥鱼由于味美、价廉而闻名于天下。鲥鱼，笼统地说，在江南的湖泊里到处都有鲥鱼。鲥鱼从这些湖泊中游来，产卵，在梅雨季节中，沿各个河川上溯。正是因为是这样，河北的白河，浙江的钱塘江、长江，甚至在遥远的云南境内的河川也能见到鲥鱼。在汉口、广东的鱼市场上，每天在任何一个店里，都能见到新鲜鲥鱼。美中不足的是，鲥鱼易于腐烂变质，鲥鱼是在河川中用网捕捞的将当天捕获的鲥鱼，过油稍稍一炸，即食用。有时，市场上出售带籽的鲥鱼干，其味道劣于鲜品。而且刺很硬，所以同日本的香鱼一样，作为天下的名品，“俺是鲥鱼”著名的产地很多。在资料中只见到说，钱塘江的鲥鱼是最好的，但是《武林旧事》中又有另外的说。

要说苏杭的鲥鱼是“俺是鲥鱼”，也许不可不提到举世闻名的“逆鱼”。逆鱼原名逆鱣鱼。栖息于太湖的逆鱼，在五月的梅雨季节中，河川丰水的时候，同鲥鱼一样，产卵，并沿各个河川逆水上溯。特别

著名的是苔溪，苔溪是从包括消费城市杭州在内的余杭以西向南东流去的急流。成群结队的鲥鱼，一出太湖，就溯苔溪的急流布上，每天都有人用网捕捞。苔溪的逆鱼，在古代的文献中也有记载，这一点与鲥鱼相同，不仅在苔溪，在太湖与相通的其他河川里也有同样的鱼类。这就是：“俺是逆鱼”。到了（一定的）季节，只捕获带籽的逆鱼，不为品味，与鲥鱼一样，用油稍稍炸一下，加点盐就吃。另外，将鲜鱼用火稍烘一下，再经日晒干燥，制成干品，还可以用盐渍，槽渍。油炸的鲜鱼的味道和香鱼一样鲜美。干品、盐渍品、槽渍品在天津、京都能见到许多，但味道不佳。这也与鲥鱼相同，其成为品名的原因是鲱鱼属，而且价廉味美，这都是人所共知的。

多余的话（原文为“废话”——译者注）

我的朋友，一位《金瓶梅》的研究者，魏子云先生是皖北人。他虽然出生在产茶区，却对茶一无所知。关于鲥鱼，住在清河县的西门庆，不可能吃到鲱鱼属的鲥鱼。因为魏先生力主此说，特记于此。

明代的山东。东部的渤海湾、青岛正面临黄海。有关沿海的产业经济，在另篇中详述。山东以济南为中心，济南是山东的据点。关于临清、济宁、淄博以及门户博山和周村抄记如下。

临清位于清河县以南，是清源江与漳河汇合并有运河流经的自古以来的冲衡要地。运河是横跨黄河、流经济宁，再经江苏的微山湖、淮安，通扬州，与长江相系。开凿这条大运河，是在元朝，由于此项工程，临清随成了山东西北地区最大的商埠（即物资集散地——译者注）漕运的发展是必然的。明代的史料《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年）纪》中有这样的记载：“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开府分曹，达官要人之所递临。而兵民雄休，商贾萃止骈檣列肆，言蒸雾翕，而其地遂为南北要冲”。嘉庆年间（一五六一）的《临清州志》在康熙年间（一六七二年）和乾隆年间（一七四九年）都续过。临清的人口不断增加，在明末清初人口到了一百几十万。《临清州志》中记载：“见其甲第连云，人物熙攘漕运万艘，街尾北上，市肆毂击肩摩

不减临淄。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从临清，过周村和博山往东一直到淄博，街道都是很繁荣的。在万历二十八年，因宦官税监史马堂的事件，引起了民变。明末李自成的起义咸丰四年太平天国军的起义，同治二年的堂邑宋景诗的起义等等近代的民变、起义几乎都发生在这个地区。此地作为战略基地的要素是很强烈的。反过来看，究其原因，显示了各种物质是丰富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临清是物资集散地并且能充分地利用矿物质源，这是临清成为战略要地的主要原因。同时，当地的矿物资源的利用也发展了手工业，同时也发展和强化了同业公会。在临清，在万历年间有缎庄三十二处，布庄七十三处，大杂货铺数十处。从附近郊区汇集来的土产品有棉花、布类、羊毛、化妆品原料、药材以及由矿物制成的成品等等。经济作物有薯类、蜂蜜、花生等等。在《古今图书集成》、《兗州府物产考》、《临清直隶州志》等史料中，对临清的物产有这样的记载：“织帕幔各极绮丽，转卖他方，羊裘毡？，出自临清都佳”。在临清城里有果子巷、白布巷、箍桶巷、灰厂、粮食市、纸马巷、皮巷、香巷、青碗市、锅市、油篓巷、席厂、鞍子巷、曲巷以及马市街、牛市街、羊市口等街道。另外，从永乐年间起，有供存放从河南及其他地方运来的粮食的粮仓三处，在窑厂六处十一座。对于研究《金瓶梅》密节相关的事情是很多的。就这样，作为现代新兴的货物集散的都市一经定型、富商、财阀也就应运而生，各地工商巨贾纷至沓来。在临清州志中有这亲的记载：“人多机利而食，暇则置酒征歌，连日夜不休，其子弟亦多推理剽掠，不耻作奸。仆亦罗绮，婢皆翡翠，陈歌设舞，不必缙绅，婚丧之仪越礼制而不顾，骄奢相效，巧伪成风”。正因为如此，就象眼睛和鼻子相距很近那样，居住在临清毗邻的城市的西门庆，在奸商活跃、灯红酒绿的街上，日夜沉醉于情场中，却也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

在此，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作者不把小说的舞台（故事发生的情节展开的地点——译者注）设在临清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

通过探索,是这样的假定:作者笑笑生与临清有很深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后篇《绪论与考证注释》中详述,直截了当地说,末尾稍许触及到一点。在大城市临清的舞台上,西门庆之流的罪恶、游手好闲和为所欲为是不能得逞的。而西门庆的权势处在比临清小得多的地方—清河,就显得格外显要。对大城市的经济形势,根据在距临清不远的清河里所见的事情,即可作出冷静的判断。本来,关于西门庆由一个平民变而为暴发的官员兼商人的肮脏过程,以及西门庆的死和其家庭的内幕的故事已经有了,所以没有必要再把大城市当作舞台,把临清的西门庆换到清河县去了。

经临清南下,西南部是工商业及手工业的中心地—兗州府直辖的济宁城。明朝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建成济宁城,在那个时代济宁是政治、军事的据点。在《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这样的记载:“济宁在南北之冲,江淮吴楚之货毕集”。“仰机利而食,不事耕桑”。济宁仅次于临清,则江南来的货物的集散地。所以,明末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扩大了新城区,旧城内同临清一样,有许多巷市。到了明朝,济宁的工商业、手工业迅速地发展起来,其原因是政府介入了军事、政治。但是,与政府的意图背道而驰,在与经济上关系密切的政客、高人们也成执牛耳之势,另外各行业的同业公会,牙行也很活跃。几乎各行各业都被同业公会占据了。政府仅仅能收一点税款。因此,全国的木材、竹材、浙江的食糖,江西的瓷器和茶,湖北的桐油,山西的铁器,四川的纺织品等等都在济宁集散。正如所见这些,同业公会的势力是很强大的。到了清代,内河航运为青帮所控制,一直继续到清末。济宁周围的土产品的棉花、枣、柿、梨。另外还有药材和煤炭、矿物原料等等。到明末,就全国而言,济宁首先开始栽培烟草,到了清代,济宁烟叶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与临清、济宁构成的三角点的是淄博,作为淄博的门户是周村和博山。周村是益都与济南之间的重镇。有所谓冲衢要地必定繁

荣之说，政客商贾的种种企图使该地繁荣起来，即许多官僚来此居住，因而明显看出大地主和勾结政客的商人及官吏三者相互勾结的政治色彩变得愈发浓重。下层阶级多是各种手工业者，他们的产品再作为原料运往济宁、临清。周围的土特产品有棉花、山蚕、棉油等等。同时，也采集其他的土产品，如花椒、柞柘、药材等等。在《青州府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茧绸有椿、椒、？三种，惟？？颇多，椿？山？、生绢皆织自土人。”

博山（旧名颜神镇）位于周村正南，同周村一样，都是淄博的门户。博山原是益都郡的一个镇，同周村一样，因其为冲衡要地，就由小市镇发展起来了。手工业与周村向同，但博山的特点是窑多，有许多黑磁窑、沙铅窑、砖瓦窑、玻璃窑等等。这是因为此地盛产作为原料的煤炭、铅铁、黄丹、红土。《颜神镇志》中写道：“风俗日侈，香花祭棚，靡费不赀，衣服饮食半靡相高。村下细民，山栖谷汲，女织男耕，深居简出，短褐不完，有怀葛之风也”。由此可见贫富差别异常悬殊。

再看山东物产的特色，主食，即粮秣中，水稻很少，小麦、谷子、大豆、高粱为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大部分是棉花和桃、杏、柿、栗、胡桃等果品，尤其是枣和梨的产量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万州烟草的生产也是全国著名的。在与江苏、河南临界之处有水稻生产。看了以上的三处山东的中心地，究其发展的原因，运河的水利是其最大的发展基础，水利使其成为政治、军事的冲衡要地，并进而发展成为全国的物资集散地和经济据点。

就这样，天下的著名的物产堆在此地集散，同时，这里也成了能够尽快地了解交流全国的文化、经济形势的信息的地方。当然，这也使西门庆看到能够进行商品投机的临清，具有许多左右全国经济的要素。作为距临清不远的西门庆，临清是使他动脑筋的地方。另外，小说中提到的奢侈物品类、食品类也不是那么令人惊奇的事情。西门庆作为官员和商人的生财之道是经过精打细算。如

前所述，与其将根据地设在临清、济宁等地。倒不如设在清河县更合适。作为小说，这是相称的。

未完

清河、临清因为什么成了《词话》的主要舞台呢？

另外，峰县，即兰陵的意图是什么？（这句话，译者也不明白。——译者注）

还有，有临清停留期间想要考虑的事情是我非常渴望的。因尚未完成文献研究丛书的第十五编，所以不能去临清考察，我想在最近几年内去临清访问。

和往年一样，虽然在徐州停留，但是怎么也不能（到临清）去访问了

（划线处“——”，原文中系用黄色涂抹过。——译者注）

（杨敬亭译）

《金瓶梅》写临清缘由初探

鲁歌

——
《金瓶梅》与山东临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金瓶梅》的故事有不少回就有作者安排在临清。如果作者没有到过临清。对临清不熟悉，他大可不必这样安排，他仍可以让故事在清河县继续发展下去。

去年我们应山东临清《金瓶梅》研究学会会长张荣楷先生的盛情邀请，乘汽车到临清作了实地考察。《金瓶梅》中所写的临清钞关、码头、晏公庙、广济闸大桥、临清闸、二闸、新河口、流沙河等。也都是临清实有的地名。作者如果未到过临清，对临清不够熟稔，也不可能写得如此具体和准确。

《金瓶梅》的故事，是由《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衍变而来的。《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安排在山东阳谷县，《金瓶梅》将故事改到了清河县，后又发展到了距清河最近的临清。《金瓶梅》作者为什么要这样的改动？我们认为在几个主要原因之中有这样两个：一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与罗贯中对沧州、阳谷、清河的地理方位是不大清楚的。因而《水浒传》中之所写有误。《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给它作了修改与订正。《水浒传》中写武松、武大是清河人。武松在沧州横海郡告别柴进要回家乡清河县看望哥哥武大，还未到清河，在途经阳谷县境内的景阳岗上打死了猛虎，做了阳谷县的都头。一日在阳谷县的街上遇见了兄长，因武大已从清河县搬迁到了阳谷县。这种写法在地理方位是荒唐的，

因为清河在河北沧州西南方约五百里，阳谷县在清河之南约三百里。从沧州到清河，根本不需要经过阳谷。恰恰相反，从沧州到阳谷，却必须经过清河。因此，《金瓶梅》作者将武松、武大改为阳谷县人，将上面的故事情节改为：武松从沧州横海郡柴大官人庄上回阳谷看望哥哥武植，路过景阳岗打死猛虎，做了清河县的都头。一日在清河县的街上遇见了兄长，因武大已从阳谷县搬迁到了清河县。这样改动，在地理方位上是顺理成章的，纠正了《水浒传》中所写的谬误。尽管《金瓶梅》沿用了《水浒传》中清河县与阳谷县“只在咫尺”的说法，但对两县的南北方位打了颠倒却是正确的。二是《金瓶梅》作者对清河、临清一带相当熟悉，而对阳谷县比较生疏。否则他完全可以按照《水浒传》那样把故事仍安排在阳谷县，省略掉武松途经何地的具体交代，或者把《水浒传》中的“清河”改为阳谷东南方的邻县“寿张”，或阳谷西南方的邻县“朝城”。移到《金瓶梅》中来，也不是不行。

事实上，《金瓶梅》的作者不但把《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由阳谷改到了清河，而且在第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七、六十八、七十七、八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九、一百回中，把西门庆、钱龙野、韩道国、来保、陈经济、冯金宝、刘二、孙雪娥、潘五、张胜、王六儿、何官人、韩爱姐等人的一些故事安排在距清河最近的临清。虽未写主人公西门庆亲自到临清，但也写了他与临清密切相关。这些都更加说明了作者是有意识地要写临清。要让《金瓶梅》和临清发生直接的较多的联系。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金瓶梅》之所以写临清。第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曾经在临清生活过，对临清相当熟悉。作者在长篇小说中写他所熟悉的地方，这是带有普遍性规律的事，对此不应有什么异议。

二

《金瓶梅》之所以写临清。第二个重要原因为了通过揭露主人

公富商兼官僚西门庆勾结临清钞关主事钱龙野而偷税枉法的罪行。针砭当时官官相卫、执法犯法、徇私舞弊、肥私害国的现实，以抨击腐败的朝政。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山东临清是沟通南北经济的要道，临清钞关是全国最重要的钞关。西门庆既然是山东的一个大商人，作者就必然要写他购置的货物经过临清钞关如何上税的情况，而这一点是清河所不能代替的。因此，作者就必然要写到临清的钞关。

《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不过“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个生药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不仅在清河县开着一个生药铺，而且还开起了了解当铺、绒线铺、缎子铺、绸绢铺，一共开了四、五处铺面，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是一个少有的新兴大商人，比《水浒传》中的西门庆的生意做得大得多，也富有得多。《金瓶梅》中的西门庆还是一员大官，由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转升为正千户掌刑。当时中国制造丝线、绸缎的主要城市是江南的南京、杭州、湖州等一些商业发达之地。扬州的盐业也在全国名列前茅。从清河到这些城市须走水路。乘船在大运河中行驶，长途贩运。贱买贵卖，临清便是商船往返的必经之地。临清的钞关当时是为国家收税、向朝廷交充内帑的重要机构之一。新兴的奸商兼官僚是最祸国殃民的。这样的人为了获更多的利益，就必然会损害国家。以自己的官职权力勾结钞关税吏以偷漏税银；钞关税吏为了巩固自己的官职权力和继续往上爬，也乐得徇情卖法。何况还能收贿礼。《金瓶梅》都是一部了不起的大百科全书，它也反映了上述的社会现实。在《金瓶梅》第五十八回中，写西门庆和亲家乔大户准备合伙开缎子铺，西门庆派遣韩道国、胡秀等人去杭州购置缎绢货物，商船返抵临清钞关，胡秀先回到清河县，向主子西门庆递上书帐、禀道：“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钞银两……”。西门庆叫女婿陈经济“后边讨五十两银子来，令书童写一封书，使了印色，差一名节级，

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与你钞关上钱老爹，教他过税之时，青目一二。”胡秀领了银子、文书并税贴，次日早起便与一名节级同去临清钞关。第五十九回写韩道国押着十大车缎货回到清河，卸了很久。西门庆问韩道国：“你老爹书下了，也见些分上不曾？”韩道国道：“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西门庆满心欢喜地说：“到明日，少不的重重买一分礼，谢那钱老爹。”他之所以派一名节级一同去，是为了向临清钞关主事钱龙野显示自己是提刑官。不要有什么过不去，果然，钱龙野见了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西门庆的这封书信，十车缎货少收了许多税银。第六十回写来保南京货船又到了临清钞关，使了后生王显回来，向主子西门庆取车税银两。西门庆又写书，差荣海拿一百两银子，又具羊酒金缎礼物谢钱龙野。吩咐对钱主事说“此船货过税，还望青目一二。”西门庆靠给钞关主事行贿的手段，又一次偷税过了钞关，这次卸货，比上次几乎多一倍。“连行李共装二十大车”。钱龙野受贿枉法，只收了不多的税银，但西门庆缎铺开张的当天“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第七十七回写正提刑官西门庆所派的崔本等人给了二千两银子的湖州绸绢货物，船至临清码头，崔本到家禀西门庆，取车税银两，西门庆兑了五十两银子做了车税钱，又写书给钱龙野，“令煥青目”。于是又一次偷税过钞关，起货来家。

叙事性的文学作品是要选取典型的，当时的临清是大运河中的要道其钞关最宜作为全国钞关收税之典型。凡是典型的带有普遍性。《金瓶梅》作者塑造的主人公西门庆是一个富商巨贾兼贪官污吏，他以自己的权势勾结临清钞关的税务官而屡屡偷税，在全国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典型。而临清钞关主事钱龙野，为谋私利而徇情枉法，少收许多税银，而收受贿礼。中饱私囊，也是当时全国税

务官吏的一个典型。作者通过刻画他们互相勾结、配合的丑剧性表演，揭露了富商巨贾与贪官污吏为谋私利而祸国殃民的罪行，从而揭示了朝政的腐败和国库必乏、民穷财尽的原则，预言了充斥着如此样的官绅戏弄法制的国家必衰，朝廷必亡，它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金瓶梅》的深刻，还在于它不仅鞭挞了贪官污吏枉法于已任。而且还揭露了他们的越俎代庖，玩法于任外，即以临清钞关主事钱龙野为例，他不仅在钞关任上徇私卖法，而且在任外也玩忽法纪。第六十七回写黄四的小舅子孙文相与冯淮厮打，冯淮头部磕伤，得破伤风而死，冯淮的丈人白五教淮之父冯二具状告孙文相及其父孙清因孙清在旁喝声来，具状在巡按衙门。批东昌府兵备副使雷启元审问。雷兵备因伺候皇船，转委本府童推官问。白家在童推官处使了钱，童推官行牌提孙清。孙清的女婿黄四给西门庆送上一百两官银，央求西门庆说情，希望抽文书去，还由雷兵备问，就有了生路，西门庆答应转央钞关主事钱龙野，因为钱和雷都是壬辰进士，这事本来与钱龙野在临清钞关上的职务毫不相干，但他和山东提刑所副提刑西门庆是熟人，又和雷兵备是同年进士，于是他在接了西门庆的书贴后，即写信给雷启元。雷即向童推官催文书，连犯人提上去，从新问理。把孙氏父子都开了出来，只追了十两烧埋银子，问了个不应罪名，杖七十、罚赎。偌大的一场人命官司，就这样随便了结了。第六十八回写事后西门庆受了黄四的猪酒，添了两匹白丝、两匹京缎值三十两银子，并中加银五十两，谢了钱龙野、雷启元自然也得的有酬礼，作者揭露了这批达官贵人已结成一个关系网，他们互相勾结、受贿贪赃、徇情舞弊、戏弄刑法，为了一己之私利，已经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

《金瓶梅》具有“借宋骂明”的影射寓意。它对于朝政的主要锋芒所向在于揭露与抨击皇帝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赃官污吏遍满天下，特别是执法

之官为谋私利而肆意犯法，更是作者着力鞭笞的对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把主人公西门庆安排成一个执掌刑法而又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官。第七十六回中有四句诗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宋朝气运已将终。执掌提刑忒不公！毕竟难逃天地眼，那堪激浊与扬清。”他借此而预言明朝也因处处是执法犯法之官而将终。他写提刑官西门庆的货物到临清钞关而犯法偷税，临清钞关主事钱龙野为私利而渎职枉法、以及他们和兵备雷启元在人命案件上的谋私玩法，都完全合于《金瓶梅》的创作主旨，或者说是其主要命意的有机构成部分。

三

《金瓶梅》之所以写临清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选定一个新的适宜于再现典型人物的典型环境，以有助于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更进一步表达作者的思想。

恩格斯精辟地说过：“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884年4月初《致玛·哈克奈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金瓶梅》作者当然不可能知道恩格斯的这一论说，但恩格斯的这一理论是从许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归纳、提炼出来的，也符合于《金瓶梅》中某些高明的写法。

《金瓶梅》第八十一回中写“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蚕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订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就是在临清这样的一个典型环境下，韩道国与汤来保从江南为西门庆购置下布货的商船驶来，韩道国听说西门庆已死，遂安心在怀，瞒着来保，与他商议：“船上布货约四千余两，见今加三利息，不如且卖一半，便益钞关纳税，就到家发卖也不过如此。遇行市不卖，诚为可惜。”来保强不过他，他便在临清码头上发卖了一千两银子的布货，对来保说先带这一千两银子回家去“报老爹知道”。回到家却与老婆王六儿

商议后，二人拐财上东京到蔡太师府中投靠女儿韩爱姐去了。作者写临清码头这样一个有各处乡贩迎着客货而买的典型，成功地刻画了韩道国这一个为拐主子的钱财而善于瞒和骗的典型人物，而这一典型环境是清河无法取代的，作者接着写吴月娘派陈经济来到临清寻船去，陈向来保打听韩道国，来保才知西门庆已死，韩拐财而逃，于是“也安心和他一路”。把经济小伙引诱在码头上各娼店中、歌楼上、饮酒、请娘子玩耍，“暗暗船上搬了八百两货物，卸在店家房内，封记了。”他回清河后对吴月娘谎说韩道国先卖了二千两银子来家，后来同妻弟刘仓往临清码头上。“将封寄店内布货。尽行卖了八百两银子。暗买下一所房子在外边，就来刘仓右边门首开杂货铺儿。”正是临清码头和客店这样一个典型环境，才便于他暗藏主子八百两银子的布货并将其卖掉而得银，且不为吴月娘等人所知；临清码头上有各娼店、歌楼这样典型环境，才便于他引诱陈经济去饮酒、嫖妓。使自己拐盗主子货物的事能顺利地进行。可见写临清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也成功地刻画了来保这一个为拐盗主子的货物而用尽心机、欺主背恩的典型人物，而陈经济到了这样的一个酒色迷人之地则更容易沉沦。这一典型环境同样是清河所不能代替的。

第九十二回进一步写了陈经济在临清这一环境中的沉迷堕落。他在清河向母亲张氏要了二百两银子，在家门首开布铺，又向他娘要了三百两银子，共凑银五百两，搭杨大郎做伙计，往临清贩布去，作者写临清是这样一个典型环境：“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陈经济这个年小后生，“被这铁指甲杨大郎领着游娼楼，串酒店，每日睡睡、终宵荡荡，货物倒贩得不多。”他在娼楼馆上嫖恋着粉头冯金宝，杨大郎又花言巧语说念他娶她回去，于是陈经济用一百两银子抬娶她到家，张氏见他货物贩得不多，把本钱倒娶了一个粉头回来，便气

死了，通过临清这一个典型环境，再一次刻画了陈经济经不起酒色诱惑，不专心于商业经营之事的性格特点；同时也刻画了杨大郎的心术不正，这就为他以后拐走陈经济九百两银子的丝绵绸绢埋下了伏笔。

作者写陈经济，很有和西门庆对比之意，西门庆是一个很能经营商业的人，从一个铺子发展为四、五家店铺，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是一个兴家之主，但他一贯纵欲玩女人，结果三十三岁丢下泼天哄产业，众多的妻妾妇人，而死。陈经济远不如西门庆那样用心经营商业。作者写他多次因吃喝嫖赌而使生意失败、破产或做不成买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败家子。他向母亲要了二百两银子在家门首开布铺，结果因他每日与狐朋狗友饮酒打牌玩乐而花费了不少本钱，他有妻西门大姐，又有收用过的侍妾元宵儿和新娶的冯金宝，却还从浙江严州府勾搭李衡内之妻孟玉楼，结果被玉楼两口儿设计而捉拿入狱。九百两银子的丝绵绸绢被杨大郎拐跑不说，出狱后回家因他毒打西门大姐致使她自缢，被吴月娘探告，而再度入狱，出监后冯金宝已归妓院，家中所有的都干净了，房儿也典了，不久元宵儿病死，只剩下他一人，沿街乞讨，他父亲的朋友王宣接济他些钱，让他做小买卖糊口度日。他却把钱花了个净光，依旧讨饭，王宣二次接济他，给他钱，叫他“拿去务要做上个小买卖，卖些柴炭、豆儿、瓜子儿，也过了日子，强似这等讨吃。”他又拿钱乱吃乱花，甚至赌博，连王宣给他的衣裤都输了，依旧乞食。王宣征得他的同意后，送他到临清的晏公庙做道士。任道士收留了。他答应王宣表示要洗心改正，安分学好，作者写道：“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闸上，都来庙里，或求神福，或来祭愿，或讨卦与？。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钱米的，也有馈送香油纸烛的，也有留松篱芦席的，这任道士将常署里多余钱粮，都令家下徒弟在码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任道士的大徒弟金宗明掌管着大小事务，钥匙都在他手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典

型环境里，作者写陈经济为了执掌钥匙，便于偷盗银两，到码头上任意游玩，把钱米铺掌管在自己手里，而情愿被师兄金宗明鸡奸，他在掌管钱米铺后，仍不好好经营，常拿着银钱往码头上游玩。“这小伙儿旧情不改”。在谢家酒楼上又一次嫖上了冯金宝——她已被卖在郑五妈家妓院，改名为郑金宝。往后没三日不和她相会，花钱不少。“一次或五钱，或一两，以后日间供其柴米，纳其房钱。”“朝来暮往，把任道士囊箧中细软的本钱，也抵盜出大半，花费了不知觉。”结果他和郑金宝被刘二毒打后叫地方保甲捆押到了守备府。他挨刑打被放后奔来临清晏公庙，听左邻说师父任道士已被他气死，他吓得离开临清，逃回清河，与钱米铺也永别了，（第九十三、九十四回。）作者在临清晏公庙、码头、谢家酒楼这样的典型环境里，刻画了陈经济这样一个做了道士仍要嫖妓，不能洗心改正，也不能好好经营商业的典型人物。西门庆虽然也拼命地玩女人，但他尚能很用心地经营他的商业，在这一点上不但陈经济远不能和他相比，而且很富有但只会眠花卧柳而从来不理正事的花子虚也和他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是李瓶儿厌弃花子虚而要嫁西门庆的主要原因，作者还在临清晏公庙这个典型环境里，刻画了金宗明这样一个经常鸡奸两个小徒弟、后又经常鸡奸新师弟陈宗美（陈经济的法名）的宗教败类、坏道士的典型人物。

陈经济甚至在相当雄厚的资本，有高官做后台，他自己也有官职情况下，仍不能很用心地经营他的商业，他被守备周秀的夫人——他过去的情人庞春梅招进守御府中，暗中仍私通，春梅给他娶了开缎铺葛员外的女儿葛翠屏，周秀在军门又带得他升为参谋，冠带荣身，且从杨大郎手中夺得临清码头上谢家大酒店，由他经营。春梅又给他打点出五百两银子做本钱，连同杨大郎赔偿的，共凑了一千两之数，大酒店开张，见一日也发卖三五十两银子。有新升山东济南制置使、又有山东都统制周秀和夫人庞春梅做靠山，这生意该做好了吧？但其实也不然，他尽管已有妻葛翠屏，有情妇庞春梅，

还曾调戏周秀侍妾月桂，但他还不知足，在临清谢家大酒店上又常和韩爱姐云雨交欢，他为了韩爱姐之母王六儿与嫖客何官人被刘二打骂之事，在和春梅交媾时说刘二及其姐夫张胜的坏话，要惩治他们，春梅说等周秀回家来定叫他结果了张胜，被张胜偷听到，持刀将陈经济杀死，终年仅二十七岁。（第九十七至九十九回。）西门庆和陈经济尽管在是否用心经营商业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在纵淫玩女人上却是一样的，而且都死于短命，二人可谓殊途而同归，作者的意图在于形象地说明纵淫乱搞女人的极大危害性，如果把这归结为女人是祸水，那当然是荒谬的；但从作品的客观描写来看，它处处以道德败坏的乱淫为鞭挞的对象和读者的鉴戒，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深远的社会意义。

即以临清的谢家大酒店这一典型环境而言，作者就刻画了母亲两代根本不相同的两类典型人物，做女儿的韩爱姐爱上了陈经济，委身于他，忠实行于他，不再接别人，甚至富商何官人手中有千两银子的丝绵绸绢货物，要“请”她，她也二回五次不肯，她如此执著于爱情。不为金钱所动，不见异思迁，无疑是值得赞美的，她的悲剧仅在于她终未能意识到她的情郎并不忠实行于他，并非恪守他们二人之间的山盟海誓，例如陈经济背着她仍与庞春梅私通，远不能和她的美好情操相比。陈经济死后她又为他守贞节，甚至至湖州后割发毁目，出家为尼，誓不再配他人，至三十岁以疾而终。如此悲惨的结局，委实令人洒一掬同情之泪；但她所信守的封建道德，却不由得颂扬，在临清大酒店上，当韩爱姐不肯下楼接何官人时，其父韩道国急得要命，他一贯“靠老婆衣饭肥家”，因此巴不得老婆王六儿卖身于何官人，而他自己则躲避在外间去歇。“自此以后，那何官人被王六儿搬弄得快活。两个打得一似火炭般热。没三两日不来与妇人过夜，韩道国也禁过他许多钱使。”韩爱姐和陈经济在楼上交欢，王六儿与何官人在楼下行房，这一场景情境本身就够典型了，但女儿对爱是难得地纯洁，母亲的性交却分外地肮脏！至于韩道

国，他过去曾多次将老婆丢给主子西门庆淫乐，靠此而肥家；如今他又将老婆让给嫖客何官人占有，以便得许多钱使，这样的无耻之徒也是一个典型，把社会上这种将老婆交给别人玩弄而图得好处的人称为“韩道国”，那简直是再恰当也不过的了。

《金瓶梅》还多次写到临清码头上的一个酒家店。“这酒家店刘二有名坐地席。他是帅府周守备府中亲随张胜的小舅子，专一在码头上开娼店，倚强凌弱，举放私债，与巢窝中各姐使钱，加三讨利。有一不给，捣换文书，将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凶。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头的班头，欺酒客的领袖。”由于酒家店是一个“娼店”，店中娼妓须到各酒楼趁酒客以挣钱，而谢家大酒店又是“临清第一座酒楼”。因此，酒家店和谢家大酒店有着必然的联系。冯金宝在谢家大酒店上见到陈经济时，收泪对他说：“自从县中打断出来，我妈着了惊唬。不久得病死了，把我卖在郑五妈儿家做粉头……”又说：“奴就在这桥西酒家店刘二那里，有百十间房子。四处行寨子，妓女都在那里安下，白日里便来这各酒楼趁趁。”刘二因陈经济在谢家大酒店上把她包住了。便来骂她：“贼淫妇！他少我二个月房钱。却躲在这里，就不去了！”把她一拳打倒，头撞在阶沿下磕破。血流满地。又踢打陈经济，叫地方保甲把二人都拴了。（第九十三、九十四回。）因酒家店的嫖客何官人又到谢家大酒店上养婆娘王六儿，刘二来大酒店上臭骂他：“贼狗男女！……你在我店中占着两个粉头，几遭歇钱不与。又塌下我两个月房钱。却来这里养老婆！”毒打了他和王六儿。（第九十九回。）在这样的典型环境里，着重刻画了刘二这样一个靠妇女们为娼而发财致富的恶霸地头蛇的典型人物。而为娼的妇女们的苦难过则通过冯金宝的不幸身世作为典型来再现。

在这样的典型环境里，和刘二属于同一类型的有潘五和冯金宝属于同一类型的有孙雪娥，雪娥在清河周守备府被春梅打发出来，春梅吩咐媒婆恭嫂将她卖在娼门、恭嫂不忍伤天理。经开店的

张妈指引。把她卖给了卖棉花的客商潘五。那人娶雪娥到张妈家睡了一夜，次日车载至临清酒家店。“那里有百十间房子，都下着各处远方来的~~寡子~~^行娼的。”雪娥只叫得苦，才知道潘五是个人贩子，买她来做妓女。潘五进门不问长短，把她先打了一顿。睡了两日，只给她两碗饭吃。教她乐器学弹唱，学不会又打，打得身上青红遍了。引上道儿，方给她好衣服穿，妆点打扮，门前站立，倚门卖笑。眉目嘲人。每日拿嘶锣儿，出去酒楼上接客供唱，做这卖淫道路营生。张胜来酒家店遇见了她，遂将其包占住了，后因张胜杀死陈经济而被周统制一百棍打死。刘二也被周统制捉拿，雪娥恐怕拿她，走到房中自缢身死。她的最终命运比冯金宝被罚归院当差的结局更为悲惨。潘五假冒是卖棉花客商而娶妻做娼的伎俩也和刘二人的坐临清之地为虎而独霸一方，各有不同。

在临清这一典型环境里，每个典型人物都是互不雷同的，各有各的性格与表演，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那就是作者对这一环境里的人物都用“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给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1885年11月26日《致敏·考茨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3页）

四

《金瓶梅》写临清的第四个重要原因，是作者着意于再现当时山东最繁华的新兴的商业城市，扩大场景，以充实小说的内容。

临清在明代当时是山东最为繁华热闹的商业经济贸易中心和通都大邑。《金瓶梅》既然从《水浒传》中西门庆的故事发展而来，主要以山东为作品的背景，又着力于描写西门庆这一新兴的富商巨贾兼官僚的暴发史。那么他在刻画西门庆时就不可能不写到临清。但在《水浒传》中，西门庆和临清无关；《金瓶梅》比较尊重《水浒传》中西门庆故事的基本情节内容，因而在写西门庆时，便势必不能把临清写得过多。然而当写到西门庆死后时，情况便不同了，作者就

可以纵意放笔来再现当时的山东具有代表性的商业最发达、最热闹繁华的城市临清。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只写清河一个城市是单调的。《金瓶梅》作者当然深知这一点，要从清河县扩展出去写另外的城市，最适宜于再现的头一个便莫过于临近清河的临清了。因而书中所再现的城市，仅次于清河的便是临清。

作者写临清，同样表达了他对社会、人生、宗教、道德、人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远思考，运河初开，船只往来，商业发达了，货物流通了，在临清设了钞关，富商却大量偷税，税吏却受贿肥私，交通方便了，游人增多了。“不拘官民，船到闸上，都来庙里，或求神福，或来祭愿……”。如此令众人尊敬的临清晏公庙的道士们，本该虔诚地学习经典，但其中却混杂着或鸡奸徒弟与师弟，或上酒楼饮酒宿娼的宗教界的败类，经济发展了，商贾增多了，船只聚会，车辆辐辏，使得临清大码头分外热闹繁华。这就必然会有众多的妓女供商人们玩乐泄欲开心。于是出现了买良为娼、靠妇女们卖身而大发横财的刘二和潘五式的恶霸流氓与水客骗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着重再现的不是妓女们的欢笑，而是他们的不幸与痛苦，第九十三回写被卖在郑家为娼的冯金宝在临清谢家大酒店上见到陈经济时，“不觉簇地两行泪下”。经济便取袖中帕儿替他“抹了眼泪”。金宝弹唱的曲儿《普天乐》是：

泪双垂、垂双泪。三杯别酒，别酒三杯，鸾凤对拆开，
拆开鸾凤对，岭外斜暉看看坠，看看坠岭外暉，天昏地暗，
徘徊不舍，不舍徘徊。

好一个“普天乐”！用这一曲牌唱出的却是卖身为娼的女子的满腹辛酸！第九十四回写被骗卖为娼的孙雪娥在临清酒店上见到张胜问她，她不禁“簇地两行泪下”，回答说“一言难尽……”。她和另一妓女金儿弹唱的词曲是：

前生想咱，少欠下他相思债，中途漾却，绾不住不同

心带。说着教我泪满腮、闷来愁似海，万誓千盟，到今何在？不良才，怎生消磨了我许多恩和爱！

唱出的仍是被卖入娼门的妇女们的满腔委屈和怨恨。《金瓶梅》的作者在书中曾反复慨叹“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为人莫作妇人身，百般苦乐由他人！”为妇女们终身被男人玩弄、糟践而不平，由以上种种也可以看出他对不幸的妇女们的深切同情。

我们认为《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是嘉靖间大名士、兰陵人、有《金瓶梅》抄本的王稚登，他在嘉靖与万历年间不只一次地到过山东临清，对临清大码头，泊舟、酒楼、妓女、寺庙等情况很熟，他写过一首题为《临清观音阁下泊舟怀吴幼贞》的诗：“红粉楼中曲断肠，青莲寺里客思乡，分明嘉靖年问事，曾与崔郎共乞浆。”《金瓶梅》作者认为临清乃至全国人民的苦难是由帝王的享乐、朝廷的失政造成的，皇帝要运“花石纲”、建“艮岳”等等，过穷奢极欲的生活，就必然要使全国人民百姓受苦遭殃，第六十五回中写道：“朝廷如今营建艮岳，敕旨令在尉朱？往江南湖汀采取花石纳，运船陆续打河道中来，头一运将次到淮上，又钦差殿前六黄太尉来迎取卿云万态奇峰，长二丈，阔数尺。都用黄毡盖覆，张打黄旗，费数号船只，由山东河道而来，况河中没水，起八郡民夫牵挽。官吏倒悬。民不聊生。”第六十八回中更具体地写到临清等地人民所遭受的困苦“当此民穷财尽之时，前者皇船载运花石、毁闸折坝。所过倒悬。公私因弊之极；而今瓜州、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一带，皆毁坏废圮，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即使河中有了水，临清繁华了，但随之应运而生的却是靠妇女们卖身而发财的恶霸、水客，从各地被拐卖来的娼妓和以金钱买女人肉体而乐的嫖客，道德的沦丧，人心的歹毒，人性的丑恶也都和帝王的失政。朝廷的腐败有关。《金瓶梅》中的临清构成了这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宏伟画卷里出色的风俗画。

《金瓶梅》中“临清钞关”摭谈

马鲁奎

《文学评论丛刊》第18期刊载王达津先生论文《(金瓶梅)的写作时代与作者》，对小说中五十八回、八十一回所涉及“临清钞关”之事，以中官马堂监税临清为依据，推定《金瓶梅》所写“到临清上税不能早于万历二十六年”，并断言《金瓶梅》成书上限“当然在万历二十六年之后”。文章发表后，曾引起人们众说纷纭。而徐朔方先生力排众议，在1984年第3期《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金瓶梅)成书新探》一文，对此与史实错舛之误直言予以驳正，指出“万历二十六(1598)始设以太监为税监的税使和正常的始于宣德四年(1429)的钞关不可混为一谈，此说难以成立”。笔者认为这个见解是正确的。

《金瓶梅》作为现实主义小说，无疑是折射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作者选择临清钞关这一典型环境，不仅在五十八回、八十一回中出现，在四十七回、五十二回、五十九回中也都涉笔。故事通过对钞关多层次的描述、剥落，把主人公富商巨贾兼贪官污吏西门庆依仗权势，勾结钞关税官屡番偷税；把钞关主事钱龙野私减课税，贪收贿礼，中饱私囊，徇情枉法的嘴脸剥得何等净光。从凡是典型均带有普遍性而言，在故事表层结构下的深层次里，不正揭示了朝政的腐败和国库匮乏，必衰必亡的缘由吗，作者用心良苦始见一斑。作为研究明代社会经济与《金瓶梅》成书的重要关节，尤其与史料相触处，采用大胆假设，多方臆测而去推论这种理论研究领域常用的方法去研究是难以奏效的，甚至会诱人得出错误的结论。“临清钞关”这一问题涉及史实和资料的搜集、甄别，这只能通过认真调查和考证，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足以服人的论断。为此，借此一

角，仅供零星资料，以资补证。

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北宋、元、明、清，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尤其金建中都（今北京）于燕京，中都官僚、贵族、军队及百余万人民所需粮食急剧增长，年运量由九十万石至一百七十余万石不等，这些漕粮大都通过卫河，转输临清而运往中都，当时临清在京师门户天津还设立了“临清万户府”专门管理临清至京师运河上的漕运，临清作为北方漕运上的重要口岸已初具雏形，《马可波罗行记》中把临清当时描绘为“此城附近有一宽大之河，其运赴上下流之商货，有丝及香料不少，并有其他物产及贵重货品甚多。”^①

明永乐九年（1411），宋礼疏浚会通河后，岁运漕粮百万石，运河成为漕粮的中转运输孔道。临清扼据会通河与卫河交汇处，为南北向及西向运输的“舟航之所必由”^②漕运日趋兴盛，自然带来了商业繁荣，是时临清“帆樯如林，百货山积……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③但是，“财赋虽出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④临清已成为京师所依重的商品集散地，其辐射能力已构成广袤的流通网络，漕粮、商品运销所及除本省各府州县外，还远抵京师、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以及辽东等地，遍及明代十三个布政司中的九个。

基于临清构成漕运咽喉、商业都会，百货骈集，商贾云集以及诸王练兵，粮仓储积、吐纳，贡砖烧制、解运，商市税征等原因，永乐二十一年（1423），山东巡抚陈济上疏：“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⑤永乐皇帝朱棣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宣德四年（1429），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钞关之设自此始。”^⑥计有鄆县、济宁、徐州、扬州、淮安、临清等十一处，并规定各钞关差御史及户部官照钞法例监受收船料钞，惟临清、杭州除征收船料钞

外,还要兼征商税^⑦。宣德十年(1435),朝廷将临清钞关升级为户部榷税分司,以直控督理关税,以御史或郡佐(通判等官)充任专职^⑧。临清榷税分公司在正统、成化间曾两次罢废不置,景泰及弘治初又两次恢复,每岁户部派遣主事一人来临清,督理船料商税,由临清会通税课局具体收税,而以州印票防之,所收税钞分季解京,以充内帑,大约岁至四万金。嘉靖二十九年(1550)后,曾一度改为东昌府幕为监收官,后又恢复旧制。隆庆二年(1568)始给钞关主事关防敕书。万历年间临清钞关年收征船料商税八万三千余两,比京师崇文门钞关有盛,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全国课税额四分之一^⑨。而山东一省万历六年一年中税课折银只八千八百六十两,仅及临清所收十分之一稍强,足见临清钞关之突出^⑩。钞关主事,掌核商贩所报数以定税额,实际上是钞关主要负责人,万历二十六年以后,中官领税、领矿遍及天下,中官马堂到临清(实际万历二十七年到任),奸民纳贿于中官,而税使苛敛,天下骚然。正像谢肇淛万历年间所写《五杂俎》那样:“国家于临安、浒墅、淮安、临清、芦沟、崇文门,各设有榷关曹郎,而各省之税课司经过者,必抽取焉。至于近来,内使四处,税益加重,爪牙广布,商旅疾首蹙额,几于断绝矣。”而《金瓶梅》所写西门庆贿赂钱龙野主事,只写主事,而未提及领税中官。这与《金瓶梅》本事对读,成书只能在万历二十七年之前,而非在其后,王达津先生之说应为参差之误。

明一代自洪武元年(1368)至崇祯末年(1644)计 277 年,户部派遣来临清钞关主政、主事计 146 人(正统、成化两次废置除外),分别为:

宣德年间(四年(1429)——(1435))

刘澄(四会人)。

弘治年间((1488)——(1505))

王济(滨州人),罗荣(莆田人),居达(大兴人)等十三人。

正德年间((1506)——(1521))

张鹏(浦城人),何文邦(南海人),林春泽(候官人),何岩(扶沟人)等十一人。

嘉靖年间((1522)——(1566))

林绍(扶沟人)等四十九人。

隆庆年间((1567)——(1572))

吴肇东(太湖人)等八人。

万历年间((1573) ——(1620))

郭师吾(如皋人)等四十二人。

天启年间((1621)——(1627))

彭津(新兴人)等七人。

崇祯年间((1628)——(1644))

黄道敬(莆田人)等十五人。^③

临清户部榷税分司,俗称“临清钞关署”,署址在会通河南支西岸,今为后关街二轻局处。原钞关署座西朝东,中轴线上自东而西依次为阅货厅(临河岸,稍北侧),通商坊、裕国坊,(以上称“正关”或“前关”。)关堞(堞雉南角筑有玉音楼)、关署仪门、公堂、船料房,北、南侧院为巡拦舍房(后部分称“钞关衙门”或“后关”),建筑厅、堂、室四百余间,占地面积近四万平方米。现仍存关署大门、公堂、穿厅、船料房、巡拦舍房百余间。笔者五十年代对以上所述古建筑大都亲眼目睹,与《临清县志》所述相实无二。现临清钞关署遗址仍存有明正德十五年(1520)所立“重修户部分司公堂记”碑,由正德九年(1514)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翰林院儒林郎唐皋(歙县人)撰文,同科进士,临清户部分司主事林春泽,字子德(候官人)立石。碑文中写道:“户部分职其分署临清……於宣德间主事刘君澄所创。”并于是年增其旧制,扩“其西则新为公帑,设重门案牍之度,藏泉布之……”还“置炉以司煅植庶物”,碑文中不仅叙述重修工程中庶工门垣、驰道、公堂等,还提到新增设船料税银库房、制定银库守则及熔化残破旧币,铸制新币等内容;这些史实既印证了《临清县

志》等遗存文献资料，又为研究《金瓶梅》中“临清钞关”提供了实物例证。

临清钞关从明宣德四年设置，至光绪二十七年（1910）运河河道阻塞，漕运罢止，四百七十多年间，历经沧桑，舟车攸萃，五方走集，四民杂处，故事颇多；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中官马堂征税临清，诸亡命从之者数百人，白昼锒铛夺人产，州民万余纵火焚烧马堂署邸，击毙其党羽三十七人，开了中国手工业工人反抗封建统治残酷压迫之先河。编筐夫王朝佐，慨然独承其责，一免众人之难而就义，更为千载传颂的英雄史诗。^②清道光三十年，郾郡士民为其所立“工朝佐烈士神道碑”和“王朝佐烈士祠”遗址至今仍在，供人瞻仰。再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肇庆、韶州、南京等地传教后，沿运河北上，去北京觐见万历皇帝，于万历二十七年来到临清钞关，太监税监马堂拦船盘查，扣留了利玛窦所带雅琴、自鸣钟、万国舆图等觐见贡品，后经种种留难，才辗转见到万历皇帝。^③万历年间刊行的以明代社会现实为依托的小说除《金瓶梅》外，《^④清机闲评》、《金银翫》等也都对临清有所述及。

以上所述，作为明代商贾贩徒经常往来，当朝巡抚、巡按及守备府、朝廷户部、工部重要官员及名人贤达多曾趋临，使艺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的“临清钞关”，在以明代民间市井为环境的小说中出现，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作为熟知临清历史的临清人来说，此为老生常谈，但作为异乡之客，在陌生的资料中探寻端倪，有所笔失实可谅解。正像徐朔方先生在1988年6月为刘辉先生《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一书所撰写序言中再次提到此事时所说：“用作内证的某些史实比较冷僻，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做学术工作而偶有失误，在所难免，然而它们和正确的论证同时并存，甚至以曲绳直，这就使《金瓶梅》的一些有关史实更加真伪莫辨了。”所以对临清钞关的考证势在必行，尤显重要，基于以上原因，赘语拙文，以供参考。若有偏舛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九九〇年九月

草于临清鳌头矶

【注释】

- ①《马可波罗行纪》第132章。
- ②王直《临清州治记》，（康熙）《临清州志》卷四·艺文。
- ③《临清县志》卷十。
- ④王直《临清建城记》，（康熙）《临清州志》卷四·艺文。
- ⑤⑥《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
- ⑦《明会典》卷三十五。
- ⑧（乾隆五十年）《临清州志》·张度《序》。
- ⑨《续文献通考》卷十八，赵世卿《关税亏减疏》。另见《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一十一。
- ⑩《明会典》卷三十五，户部二十二。
- ⑪见（乾隆五十年）《临清州志》。
- ⑫见《明史纪事本末》。
- ⑬《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一章。

附碑文：

重修户部分司公堂记

惟户部之分职其分署临清□□□□□□□□□□□□□□□
□侧軒堂陋□今之至也入门而改观矣予□其□同年林子德數為□
道故以□□職者□□□□□□□□□□□□□□□以部使或御史其□
□□□□□□□□□部使蓋久而后定然率岁易其人更代□□□□
□□□□□□□□於宣德間主事劉君澄所創闢岁既遠春澤□堂日
就頽敝將新焉訖於時今年春度時少□□□□□□□之旧者新之
移□后□其前與辟其左右各若干□足以容眾凡吏庶之趨而立者伏
而聽者□之可進退之退也址之洼陷實之土而加崇焉堂之前為廉稍
遠地□堂成匾之日經國左右翼以廊序以栖卒之在公者其□有堂以
便退公以出入賓則仍趙君文載之旧而增右□柱耳加之匾曰浣心其
西則新為公帑設重門案牘之度藏泉布之委頓咸於斯而匾曰敬事而
又置爐以司燭植庭物門垣馳道斥於其旧髹堊藻飾煥然一新堂之費
弗□煩民弗病於有司一匿稅之罰所取資焉堂之构始事文之后而落

成於被禊之前役不患巨民不告□將□之久不可以弗识也予惟天下之事成於志而廢於志之弗恒也况事有非可以已者而兴之又可以覩志也是舉他人視之若迂緩兩可已不知經□以取下德之崇也明以烛幽知之用也广以容物仁之俗也直以履正礼之徑也茲堂之新予之志益可覩矣周书□崇惟志光王之所以明飾百工者

□□焉者矣书此以俟

□□庚辰夏四月吉旦

进士及弟翰林院

□□撰儒林郎新安唐 奉著

□□主事林春泽 立石

(碑阴)

督正署税课局兼临清仓副使王景桢

书办厅□官张隆□

税课局吏 雷执□

书办吏 林文举 许 潜

赵 礼 张舜贤

马 镇 李 庆

阴阳生 郭 政

医 官 胡世昌

店 户 陈 泰 穆 渊

朱 連 陈 儒

唐 林 徐 计

监 工 王□□ □□良

木工李□□ 石匠刘□□

《金瓶梅》与临清方言、土语

黑建文

《金瓶梅》故事写清河，借《水浒》西门庆与潘金莲的一节铺设的演义，明写晚宋，实写明末中等商业城市之市井风情的社会小说。是明清四大奇书之一。其意义在它真实地记述描绘了明中、末叶数十年间的社会情况，成功地塑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开创了中国白话长篇小说的先河。

《金瓶梅》与清河毗邻的临清渊源很深，关系密切。一是书中多次写到临清，书中描写的人物活动也多次出现在临清；二是书中所用语言，除掉成语、谚语、歇后语与临清地方流行的相一致外，尤以临清回族聚居的三大清真寺周围的街道及沿卫运河两岸回族居住的一些村庄居民中。如“发送”一语，在回族风俗是指料理丧事，“知感”是回族（依伊斯兰教义）感谢真主安拉的恩典，“知谢”是对来参加红白喜事的亲友表示感谢之意。另如“掖送”（偷拿物品），“藏掖”（收藏起来不让人知），“请受”（继承遗产）……等土语都是回族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而在远离县城的乡村中这些土语则很少听到。

据我所知临清城乡居民，广泛流行的地方方言、土语，与《金瓶梅》书中使用的也颇为相似。如说小孩怕剃头叫做“护士”，家畜中的骡、马、驴统称“头口”，火筷子叫“火箸”，蛮横不讲理叫“强汗”，揭人隐私称做“揭条”，脸皮厚而又玩皮叫“皮脸”……这些用语的语言含义都和《金瓶梅》书中相似。

近日翻阅《金瓶梅》全书，随手摘出以下几十则方言、土语，象“打滚撒泼”（倒在地下打滚耍赖）、“惹气”（惹人生气）、“尽让”（宽容忍让），“两头和番”（两面三刀挑唆闹事），“装憨”（假装憨傻），“由头”（找出理由），“摸量（约摸），“挤撮”（嫉妒排挤），“嚼舌根”

(胡言)、“栽派”(委托嘱咐)、“虫蚊”(泛指昆虫)、“定心汤”(分娩后产妇习惯喝草木灰加红糖的汤)、“喜面”(回族儿女串亲时吃的捞面)、“使唤”(使用招唤)、“延脸”(嘻皮笑脸)、“吐了口儿”(答应了)、“嚼牙楂骨”(胡说八道)、“嘴头子”(能说会道的嘴)、“针脚”(针线活)、“贪嘴”(好吃)、“汗邪”(多管闲事)、“添脸”(无耻不要脸)、“你这行子”(你这个人的鄙称)、“找后帐”(追问已经过去的事)、“寒碜”(恶心憎恶)、“指搠”(指人脊梁骨)、“大赖了”(马马虎虎)、“楞了睁了”(呆楞)、“题念”(想起念道)、“掉搅”(捣蛋玩皮)、“洋沟”(庭院的淌水沟)、“捏着把汗”(提心吊胆)、“浪?”(妻子责问男人外出不归、有怀疑男人有外遇之意)、“抿子”(妇女用以蘸榆皮粘液梳头的工具象牙刷)、“死了”(死了)、“不下气”(不肯屈身求人)、“霸拦”(霸占)、“不待见”(不喜欢)、“搅缠”(胡搅蛮缠)、“耳刮子”(嘴巴子)、“咬群”(不安分)、“墓生”(男人死后生的子女)、“瞎诌”说瞎话)、“疑形”(疑心又恶心)、“言不的语不的”(无法说)、“花的狐哨”(花花绿绿)、“牵的离门离户”(立即赶出门去)、……等，作者在运用这些方言、土语时也与地方用语，含义的习惯极为一致。书中方言、土语用字，有许多是错别字，但字音却是符合当地习惯的。例如把“抬杠拌嘴”之拌写为“办”“背音晃子”写为“背蛤蜊子”。

临清的方言、土语，在流传中多年只知意不知字，但在《金瓶梅》书中却可找出，如“头口”一语。我小时候，家中饲养着骡、马大牲畜，每到饮水时，父亲说饮“头口”(口读户音)去，可我好多年就不知道“头口”二字是什么，现在才明白。又如“不待见”就是不喜欢，在临清习俗口语上常说，可写出来是哪几个字却写不出。另如“掉搅”一语，在临清是指某人既坏又不好惹，可这二个字也都写不出。类似这样例子还有不少。

《金瓶梅》的作者，运用临清方言、土语达到灵活自如，娴熟自然的地步，决非一个没有长期生活在临清的人所能写得出。王莹先生认为《金瓶梅》是临清明末名士谢榛所写，的确不无道理。谢榛故

里在临清旧城的西门外，是回族聚居的地方。谢榛青少年即在此度过，他熟悉并得心应手的运用这些语言是完全可能的。我摘录的《金瓶梅》中的方言、土语，其中有许多是听自我祖母和二伯母的，有一些是流行于民间的，其中的一些流行于回族中间的，在 30 年代到处都可听到，现在除掉一些 60—70 岁的老人，青年人已不再说这些方言、土语，也不懂得它的含义了。

书中方言、土语在沿卫运河西岸居住的回民村洪官营、八里圈、齐店、郑庄、黑庄等村子里也颇为流行，其中尤以洪官营为最。《金瓶梅》书中引用一个歇后语“马回子拜节——来到就是。”意即回族人拜年不真磕头行礼，（回族不过春节、不兴磕头），只是走形式，看来作者对回族的风俗习惯是相当熟悉的，这也是与作者长期生活在回族聚居的地方分不开的，不然象回族人常用的“知感”“知谢”“指搠”、“发送”等土语是很难用得上的。再如“达达”一语在回族中多年流行，是子女对父亲的称呼。据考证此语在元代为尊称，而在《金瓶梅》中为昵称，临清至今在回族中仍可受到这种称呼。但在山东的其他地方却听不到。由此也可看出作者身世与临清的密切关系。

过来对《金瓶梅》的作者研究受沈德符影响较深，一直解脱不出来。我的看法，作者青少年生活过的家乡语言，对他以后写作语言运用上影响很大。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初期白话小说。这在《三言》、《二拍》、《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中均可看出。《三言》、《二拍》因系短篇，虽可看出，但不明显。《醒世姻缘传》、《红楼梦》就很明显了。曹雪芹幼年生活在南京，十几岁迁住北京，他写的《红楼梦》是他 40 岁以后的事自然就北京语言为主体了，儿化音很多。书中描写涉及人物多是达官、贵人、公子、王孙、小姐、夫人，所以就多官腔，雅音了。粗鲁语只能在焦大、薛蟠口中道出，虽只一星半点，但也可看出曹雪芹运用方言、土语之妙，也可看出他受北京地方语言影响之浓。《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有人认为是蒲松龄，根据之一

也是说《醒世姻缘传》所用语言是淄博一带的土语，与蒲松龄现存的通俗作品中土语一致。所以我认为从书中运用地方语言，特别是方言、土语的熟练程度来考证作者实在是破解作者之谜的一条重要端绪。当然这里说的是明、清时期形成的白话长篇小说。

再论运河经济文化与《金瓶梅》

陈东有

1、一部《金瓶梅》，是作者蘸着大运河水写出来的。它说的是运河边上的凡人凡事，第一次生动地描写了在小农自然经济的层层包围之中如此这般的真实人物与并非完全虚构的故事；它令那些习惯了过去、哀叹着今日、担忧着未来的道学家、文学家、官僚、绅士以及不曾喝过运河水的山民村夫惊叹诧异，或指其奇，或责其淫，或说其奢，或咒其恶。

2、这便是《金瓶梅》，十六世纪中国大运运河经济文化的产儿，又是十六世纪中国大运河经济文化的见证。

一、运河经济文化构成的经济条件

3、作为一定社会发展总和的文化，从文化层面上分析，是以经济文化为基础的。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分析，经济又是前提条件，进而形成相应的观念文化。

4、大运河开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于鲁哀公九年（前486年）开凿了连接长江和淮河的邗沟。大运河总体开挖，是隋炀帝干的事，他先后下令开凿了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加深加宽以邗沟为基础的山阳渎，开凿了自京口（今江苏丹徒）至余杭郡（今杭州西）的江南运河，开凿了“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市西南）”（《隋书·炀帝纪》）的永济渠。于是，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二千七百公里的人工水道出现在中国东部地区，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

大水系。

5、应当指出的是，这样一条水道的诞生，并非出自于经济的目的。或者说，运河开凿的动机主要还是出于国家军事、政治的需要、出自于君王个人享乐的需要（见拙文《运河经济文化与〈金瓶梅〉》，《萍乡教育学院学报》一九八九年第三期）。然而，这条以南北之势纵横东亚大平原的黄金水道随着它的经济价值的客观存在而逐渐显示出极其重大的经济意义，成了唐以后内陆运输的重要干流。《新唐书·食货志》载：

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诸仓转并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

“凡三岁”，指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平均每年漕运量为三百三十万余石。北宋始，运河经济意义则从漕运扩大到河岸城镇的发展。《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极其生动的北宋运河经济文化图。《宋史·河渠志》云：

汴河自隋大业初疏通济渠，引黄河通淮，至唐改名通济。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受，受黄河之口属于淮、泗。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岁漕江、淮、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舟，百物众宝，不可胜计。

6、南宋偏安江南，运河由于江山两分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江南运河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另一方面，长江以北运河由于“南宋统治者为了防金兵南下，破坏了运河上的各种设施，务使金船不能南下”（见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加之黄河多次泛滥，河道变异，夺泗入淮，夺淮入海，或破坏运河河道，或淤抬运河河床，通济渠一线，残破不堪，水干河涸，南宋时期的历史地图上自开封到灵璧近三百公里的汴河（通济渠）只是一条虚线（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朝一统，定都大都（今北京）。出于一统政治和漕运之需，先后解决了山东境内泗、卫之间约两百公里的一大段河道和大都到通州之间二十五公里的一段河道，不仅疏

通了大运河，而且由于河道拉直，运河全长缩至一千七百公里。临清由此而位居南北水道与中原水道三叉路口。不过，元运河仍有两大难题：一是山东段会通河水源不当，二是黄河泛滥仍然时常中断水道。明永乐九年，成祖采纳济宁同知潘叔正建议，以会通河作为整浚运河的主要线段，任命工部尚书宋礼总管，征调十六万民夫修治一百九十九公里的河道。宋礼采用白瑛建议，取汶水独流，堵汶水入海通道，令其全部注入运河，在南北漕道脊背处的南旺口（今济宁市北）分流入南北运道，又以“相地置闸，以时蓄池”（《明史·宋礼传》）的方法在南旺至徐州（落差一百一十六尺）之间置闸二十一座，在南旺至临清（落差九十尺）之间置闸十七座，使南来北往船只顺利通过南旺这个运河的脊背高地，于是，大运河才开始全部发挥出它的功能，产生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7、元代，漕运多从海路，明初沿袭元制，务海运。海运虽然便宜，但要担风险，翻漕船，溺军卒，事故频繁。若从陆路，车马费用数倍于漕运。况山高路险，关卡重重，军民叫苦不迭。永乐十三年始，运河畅通，漕运大兴，海运基本罢停，加上大量制造便于运河载负的平底水船，漕粮全由运河入京。朝廷随之先后建立和健全了沿河漕运机构设施，分派官吏，征用民夫。又不断修治河道，把握汛期，以利畅通久运。《明史·食货志·漕运仓库》载：

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内兑运者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兑者七十万石。兑运之中湖广、山东、河南折色十七万七千七百石，通计兑运、改兑加以耗米入京、通两仓者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

这就难怪永乐九年潘叔正提请疏浚会通河时说：

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见《明实录》永乐九年二月条）

8、如果运河仅仅只用于一年五百万石漕运，即使“国用以饶”（《明史·陈？传》）其经济意义还是有限的，漕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其他船只载着种种货物南来北往。京师（北直隶）、山东、南京（南直隶）、浙江这几个运河流经地区的官吏百姓、行商坐贾当然借运河舟楫北上南下；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流域的人们也选择此道，先顺江东下，再走运河上京下府、走南闯北。于是，北上漕船、南下货舟、官船私货、私船官货、丝绒绸缎、竹木瓷器、官征民用、南杂北土、东特西产、游宦之子、寻利商人，在河上一年四季，船只来往如梭，以致常常造成过闸拥挤，停船待闸的现象。运河成了中国最繁忙的交通要道。

9、交通运输是商业发展的首要前提，交通促进商业的发展，商业、交通二者又势必促进商业运输线上河埠商镇的经济发展。由漕运所引出的仓站、闸站和漕粮支运、兑运的交接处，无疑是人口集中之地；江河交叉之口、州县水陆相会之所，当然是车马会聚之地。既有人口车马之聚，当有车马人口日用之需，于是酒楼饭馆、旅舍客栈、商铺货店、码头驿站，配套的经济行业随之而兴。于是，过去的荒丘野地，此时成了繁荣小镇；过去小村僻庄，此时成为重镇都会。仅以临清为例：

临清有县自后魏始，隋唐以来，废置相寻，未为要地，至元始创开会通河……至县境与卫河合流，置闸河淤以通漕运。永乐迁都北京，复加疏凿，……于是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集，达官要人之所通临，而兵民集杂，商贾萃止，骈樯列肆而云蒸雾涌，其地遂为南北要冲，当然一重矣。（王？《临清州治记》）

弘治二年，朝廷“升山东临清县为临清州，以馆陶县及邱县隶之”（《明实录》弘治二年正月条）。大学士李东阳生活在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他的两首《鳌头矶》如此描绘临清：

其一：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其二：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10、运河两岸成了当时最繁荣的经济“特区”。

11、交通的发展既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自然也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明中叶，是值得数典夸祖的中国人自豪的中国手工业空前繁荣时期，一般史家也用“资本主义萌芽”来作定性分析。然而，却难得有人用文字来指出这种“萌芽”离不开运河水的滋润。没有运河，苏、杭、嘉、湖境内的盛泽、震泽、濮院、王江泾、双林等地每年生产出来的难以计数的丝绒绸缎如何流向全国各地及域外四方从而保证销路？瓷器最佳运输方案便是舟行，没有运河，景德镇等地官窑、民窑中每年生产的数十万件产品北上途中不知要受多大的损失。各地著名的酒、茶、盐、纸、竹木、薪炭等产品也大多是在运河这条交通线刺激下加倍发展起来的。

12、一句“东南财赋地”含义深刻。唐始，东南以其地利，物产丰富，担负起此项重任。南宋始，又以其世道持久太平，江南运河的发达，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国家经济主要来源。明代，弘治年间大学士丘浚在《大学士衍义补》中说道：

臣按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

宣德四年始，朝廷开始设置“钞关”，征收商税，当时有郭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其中只有上新河和九江二钞关不在过河之畔。“岁征本折约三十二万五千余两，万历二十五年增银八万二千两，此定额也”（《明史·食货志·商税》）。一般钞关对来往商船收纳“船料”（按同船的长宽大小而酌情收钞的税款），而临清、北新二钞关又兼收货税。为此反映当时经济变化的材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由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而形成的经济发达地区大多同运河密切关联。

13、隋炀帝开通济渠……于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属而为一

矣。……会通河自济、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为一。炀帝此举办其国促数年之祚，而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五册山东上，四部丛刊三编史部。）运河的开凿，使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得以长发展，出现了让下令开凿运河的君王所意想不到的深远意义。开凿并疏浚后的大运河，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条件在经济的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进而构成了重大的经济文化意义。

二、运河经济文化内涵与《金瓶梅》

14、正如上文所述，运河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是指商业和手工业，这又是运河地区、尤其是更为发达的江南运河地区，成为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地区的前提。在这些密集的人群中，有运送漕粮的军民，有管理河道闸站的力夫，更多的是过往行商、当地的坐贾以及以各种手工业和服务业谋生的市民。傅衣凌先生在他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一书中转引《明清史料甲编》第十册第九二三页的“总计临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来估计“临清、杭州也都曾经达到近百万人口”。我认为，若论杭州，“百万人口”不会是夸大之数。若论临清，“百万”似有夸饰之嫌。不过，从官方户口统计上是不能准确地计算交通要道商镇河埠的人口数的，因为流动人口往往要超过定居人口。即使从官方户口统计数字来看，临清州在明中叶以后，已成为山东东昌府中人口最多的地区。从这个角度看，傅衣凌先生的估计不无道理。下面列两则史料从另一角度也可见临清等沿河商埠曾有过的繁华：

御史耿定言：临清等处官民之家多有塌房店舍，居停商货，宜依在京例收钞。（见《明实录》宣德六年二月条）

……随查各关监督预叶文案，在河西务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座），今止三十余家矣。在临清

关，则称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存两人颖；又称临清向来设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颖。（见《明实录》万历三十年九月条）

15、其实，与运河经济文化相关联的商贾远不止运河两岸，由于商人活动的流动性，他们往往把运河的气息带回自己的家乡，在许多商镇城市扩大了运河经济文化的影响。当我们研究明代才形成的晋商、晋南商人、徽州商人、江西商人等商人集团时，会发现他们无一不喝过运河的水，乘过运河的舟楫；不少人还在运河岸边居住过，做过生意，赚过利钱。

16、从自然地理条件看，东亚地势西高东低，使得中国的东部没有一条严格意义上的南北流向的大江长河，海、河、淮、江皆由西向东流归大海。这在海路危险、陆路艰难的古代，对政治上追求封闭保守的王权国家来说，创造了一个使老百姓安分守己的地理环境，各级地方官吏可以在自然分割与人为划分相结合的封闭条块中当“父母”，做“上人”。而中国的经济主体一小农自然经济模式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改变，当然得力于这种地理条件。明中叶，运河的畅通，使得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不仅商业和手工业得以长足发展，而且由于南来北往同外面的“世界”的接触，许多人大开眼界，如同杜丽娘从闺房走进后花园和刘姥姥游逛大观园，运河两岸经济“特区”人的观念和心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7、中国传统的宗法伦理以“三纲”“五常”为中心，也为衡量标准，将人的欲望限制起来。限制到一种什么程度？从未有过明文规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决不是禁欲文化，即使宋代哲学和明清官方理学也不是禁欲主义，连外来的禁欲主义佛教文化到中国后也显得格外宽松。但是，中国伦理发展史一直是以对人的欲望予以批判作为前提的。随着货币在现实世界中作用意义的发展，金钱则

成了物欲的具体体现，成了物化的物欲，也成了人的欲望的物化。自然，金钱也就被种种伦理力量推到了道德正面范畴的对立面。然而在运河经济论氛围中，在商镇河埠，在市民商贾心里，金钱成了追求的目标，利润成了自身的价值。而且还形成了一种趋势，一种自然而然的必然。正如要让那些“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山民村夫放弃宗法伦理道德是一件难事一样，要这些走南闯北、出钱进利的市民商贾不谈利润、不求物欲也是一件难事。当人们处于“以物易物”阶段，有可能将物欲限定在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准上。在商业贸易阶段，人的物欲则不可能停留在这个水准上，追求余利甚至尽可能多的余利是商业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所致。伦理道德与商业规律是两个不同范畴、不同属性的问题，对商贾的伦理评判与对商贾效益的评价也是不同性质的两个问题。因此，在经济生活中，道德与物欲不产生矛盾时，二者自可兼之；若产生矛盾时，更多的人不愿受到伦理的束缚，而弃义取利，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正当。这种心态观念已经不止是出现在曾为高利贷张目的李开先文章之中，不仅是后来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了工商大贾摇旗呐喊，在运河地区芸芸众生的生活实际中，就已大量地出现了冒小农自然经济社会宗法伦理之人不违的弃物求利欲，轻来世重现世的行为。

18、据山东博平县志所载：

至正德嘉靖年间而古风渐渺，而犹存什一于千户焉。……（注：今）社村保中无酒肆，亦无游民，……畏刑罚，怯官府，窃铁攘鸡之讼，不見于公庭。……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乘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紗裙细，酒垆茶肆，异调新声，汨汨浸淫，靡然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据吴晗《读史札记》转引）

又看山东郓城县志所载：正德、嘉靖以后，

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服，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植牛采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许焉。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益衢巷，货杂水陆，淫巧姿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撞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以华侈相高，日用服饰，拟于市宦。（据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转引）

又看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五册山东上“风俗”云：
……兖、东二郡，濒河招商，舟车辏集，民习奢华，其俗也，文若胜乎
……

19、临清州如何？《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东昌府部汇考六》云：

临清州，州绾汶、卫之交而城，齐赵间一都会也。五方商贾鸣？转毂，聚货物坐列贩卖其中，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人仰机利而食，暇则置酒微歌，连日夜不休。其子弟亦多椎埋剽掠，不耻作奸。士人文藻翩翩，犹逾他郡。

这里，传统的“安贫乐道”不见了，有的只是追富而忘乎所以；传统的忧国忧民也不见了，有的只是为自己而求享乐。山东原是风淳俗厚的齐鲁之地，尚且如此，那么，到江南运河区去看看，“其中七风之变，吴中尤甚”，“一呼则数十成群，强府县以理外法所不可从之事，稍拂其意，则攘臂奋？，哄然而起。提调官莫可谁何，于是兰袍大王之号兴，愈变而愈不古”（见管志道《从先维俗议》，据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转引），这已是到了目无“王法”的程度。

20、运河地区民众吃穿住行等生活方式的变化和他们对社会的态度，是他们思想观念变化的具体表现，这些表现显然是同传统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等价值标准相左的，在矛盾冲突的。这种矛盾冲突仅从上述记叙的文字色彩中就可见其激烈程度了。这使人想起《金瓶梅》同《歧路灯》两部作品的反差，前者为运河经济文化的杰作；后者是古都道学家的教科书。这使人想起《聊斋志异·黄

英》中黄英姐弟与马才子之间的观念冲突，前者以为“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药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后者则死守“风流高士，当能安食”，“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这使人又想起，明代中叶始，为何王学左派首先在江浙发难，在运河周围地区颇有市场；李贽虽受朝廷所难，《焚书》却屡焚不绝；而当时社会的确“举业至于抄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见顾炎武《日知录·艺文》）。这使人又想起，有明一代为何官商、皇商愈演愈烈，贪官污吏禁而无忌。这使人想到，明代所出各类通俗小说五百部（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计），近半数与运河经济文化相关，大都以表现市民心态为特色。这使人想到，商税…事，明初朱元璋视之为“抑逐末之民”手段，到了明中叶，却成了君王朝廷及各级官僚生活的主杰源之一。这又使人想到，张居正在万历九年开始实施的以货币替实行赋税形成的“一条鞭”法得以成功。这又使人想到，明中叶始，有越来越多的官僚士大夫为商贾说话，有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弃科举而事工商。（这段简括文字的有关详述，请见拙著《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花城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四月版。）

21、我们可以这样去确定运河经济文化的内涵：由于运河的全线疏通，其经济价值得以充分发挥；伴随着漕运，运河作为东亚贯穿南北交通的唯一一条黄金水道，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东部的交通、商业、手工业，进而促进了运河区域城镇的迅速发展；相应地集聚而形成了一支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以商贾为主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在当时已具有相对举足轻重的社会经济意义；由于其经济活动、社会生活不同于周围传统的以小农自然经济环境中的民众，因而产生并发展了与传统和周围世界很大不同的思想观念与伦理心态，有了对自身价值的考虑，在生活方式上出现了追求利欲和现实享乐的特征。这一切，构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文化氛围，它笼罩了运河经济地区，并随着运河经济的扩散而传播出去，影响到相关联的

附近地区的商镇河埠。实际上构成了具有与小农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大社会不同经济结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观念心态的小社会，因其社会活动主要是商业，我称之为商业小社会。

22、《金瓶梅》就是在这种经济文化氛围中诞生的，写的便是这个商业小社会中的人物与故事。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应伯爵等人物离开了运河经济区，离开了商业小社会还可以如此这般地生存下去。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作者不是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其创作动机与写实手法会有如此之矛盾冲突，又能写出一部如此被小农大社会传统文化氛围熏陶出来的人们指“奇”骂“淫”的杰作。

23、当然，我们不可能把这里所概括的“运河经济文化”和“商业小社会”的概念绝对封闭起来，而说成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传统文化和明王朝之外的新文化、新社会。既然是运河经济文化，那么运河区周围的山乡村野及运河区内的南北两京、各省、府、州、县中的传统与正统的文化因素自然对它有着极大的张力作用；既然是商业小社会，那么小农自然经济大社会对它层层包围仍有决定性意义。朱明王朝并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虽然嘉靖、万历两位既长寿又驰政的皇帝客观上给当时社会带来一定的自由、宽松；运河交通仍然是条内陆水道，虽然它贯通南北；尽管当时已有海外物质与精神的介入，但具有强大而又深沉的同化力量与自制能力的传统文化仍然左右着人们，消化一切外来的和内滋的新生事物。更何况，参与运河经济的商贾市民无论在血缘与精神上，还是在经济与政治上，都同小农自然经济和专权政治以及宗法伦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便是运河经济文化最终不能成为大气候、商业小社会不可能独立于世的根本原因。这一切，我们都可在《金瓶梅》的故事中深深体会到，《金瓶梅》的杰出，也正在于把这样一种繁杂的文化现象形象地再现在字里行间。

三、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与《金瓶梅》研究之关系

24、首先，是《金瓶梅》的深入研究引发了我们对运河经济文化的思考。文学本身的意义在于娱乐、泄情、审美。由于中国传统文学观中的载道动机和作品本身的写实手法，使得《金瓶梅》这部写实杰作同时又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文化发展到十六世纪时的一个断面，尤其是真实地再现了这个时期运河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为此，《金瓶梅》具有了一种特别的认识意义。小说固然不能成为史实性的证据，却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史料所难以说明的问题。

25、汉文化曾有过三次较大的由北向南的迁移。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而导致的晋室南迁，汉文化核心由黄河中下游的中原移至长江中下游的江南，东南地区不仅经济富饶，而且人才聚会。后来北魏一统中原，北方又渐次恢复了汉文化中心的位置，到隋唐之际，北方十分繁荣，但是在经济上却不能不依靠东南之地而“常转漕东南之粟”（《新唐书·食货志》）。第二次是安史之乱所引起居民南徙，中原兵戈烽火，南方太平繁荣。叛乱平定之后，北方虽然恢复，对南方的经济依赖有增无减，“凡东南邑郡，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载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李肇《国史补》卷下）。前文所引韩愈的“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即出于此时。晚唐五代时期，北方又陷战乱，民不聊生；南方安定无事，经济和文化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此后北宋王朝虽立足中原，却一直力图均衡南北，终因金兵入侵，中原他属，南北再次失去平衡，出现了第三次文化中心南迁。元人一统中华，虽然称雄中原，但汉文化中心终难北上。朱元璋建都金陵不是没有这一文化原因的。永乐皇帝迁都北上，又同时设置留都南京，也有尽全国保持南北文化平衡的考虑。“明代全国的商业，逐渐集中到长江下游和大运河两条线上，万历六年（1578），全国商税课钞，南直隶

一省达一千三百万贯，独占四分之一”（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这三次（尤其是后两次）汉文化中心南迁都同大运可息息相关，而且我们可以发现，汉文化中心向南迁移和北方对南方经济的依赖总是得大运河之力。

26、于是我们把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空间变异作线性分析，可以看到这条线的趋势是由西北向东南。那么这条线是如何从汉晋隋唐的黄河中游走向清代、近代乃至现代的长江下游，最终奔向当代的沿海地区的呢？现在《金瓶梅》从经济到文化层面的展示启示我们：是有了运河这条通道，是运河经济文化作为过渡条件。若从小说发展本身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说，十六世纪运河经济文化小说《金瓶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长江下游经济文化小说《子夜》、今日沿海经济文化小说《商界》正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从封闭性的黄河中游内陆区走向开放性的长江下游和沿海区的形象三部曲。

27、第二，运河经济文化的研究毕竟不是《金瓶梅》研究的最终目的。《金瓶梅》所载负的运河经济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对另文化发展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运河经济文化的研究正可以使我们的“金学”研究取得新的角度、新的进展。对于这一点，欣赏《金瓶梅》的读者自可不必顾及，研究者却不能绕开。否则，有关《金瓶梅》背景的研究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解不开的谜。作者的问题、作品成书的年代问题，离开运河地区，离开运河变化发展，其解释都将难以令人满意与信服。

28、论及作品本身，同样不能离开运河经济文化这个重要的背景。如果我们同意这一点，并能够分析运河经济文化同紧紧包围着它的小农自然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会认知作者一面肩负着沉重的伦理说教，一面却是更执着地实写商业小社会中活生生的人生。这种人生同小农大社会中的奴隶心态臣民的人生不同，是有着较强“自我”心诚的商贾市民人生价值观的表现，因此作品中的这些人物言许都不是用传统的道德概念可以概括的。西门庆在作品

中自始至终是个商人，经商营利是他的主要活动，做官是他自己的“意外”收获，从政是他的“第二产业”。他的日常生活不过是这个商业小社会中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他的价值观念是运河经济文化的必然表现。说他“市侩”、“恶霸”、“淫棍”、“流氓”，只不过是用现代概念来重复小农自然经济文化中的观念，不无道德牵强、伦理附会。应伯爵等人的“帮闲”“贴食”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失去“自我”意识的“鸡鸣狗盗”食客，而是商业小社会中商业活动不可少的“自食其力”“帮忙”者。贬潘金莲、李瓶儿为“淫”“恶”，褒吴月娘、孟玉楼为“贞”“善”或贬为“奸”“滑”，不仅未跳出作者创作动机中的伦理说教范畴，也不合古情今理。对于作品中男女性行为及其描写仅以“风气”一词解释，未免浮浅，这种解释失去了从特定经济文化背景去考察人生态度的基础，若以“风气”而论，《金瓶梅》可以放到南朝之梁陈与五代之南唐去讨论了。将《金瓶梅》的美学意义讨论停留在伦理范畴的善、美和恶、丑关系的相对分析上，也仅是就传统小农自然经济文化背景和依据宗法伦理审美观去作分析，并未能揭示出商业小社会中生活本质特征在于竞争而运河经济文化又有助于这种竞争的存在与发展，更未能揭示出反映这种小社会的文学作品的美学意义正在于真实地展示出在生活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各种人物为求生存发展而挣扎与抗争的命运轨迹。（请参见拙文《金瓶梅文化意义刍论》，载《明清小说研究》一九九〇年第三、四合期。）

一九九〇年十月七日二稿

恶棍与官商

——从西门庆说开去

王崇山

恶棍与官商，大概是当今《金》学界对西门庆人物形象的一种公评与共识。笔者学步，滥调新弹，也借以发挥几条云云：

一、反了“重本轻末”旧观念，“金钱万能”渐成明末社会新潮流。

且说重本(农)轻末(商)，作“观念”看，其实往往也谨只不过是中国历代封建官吏的一种清高标榜。官对商的爱好，官与商的结合，则自古有之。春秋既有经商先富后当秦相的吕不韦，战国也有遁官从商而为“陶朱公”的范蠡。直至明朝，总的商业发展已成大观，所谓“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饶官商，衡游蓟北。”张瀚出身“行商世家”而为尚书，徐阶身居首辅而私家兼“为贾”。上上下下，这种官与商的互有联系的现象已不罕见。而西门庆却是这一时期在文学作品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罕见典型。

这些为官的之所以不再“乐治桑麻”；而去亲近向以为“末”的“商贾”矮说穿了，就是越在封闭的社会里，行商的往往越更容易给人带来大量的金钱。这些金钱常可超过“恩赐”的“俸禄”，“吃请”、“受贿”以及“搜刮一方”之所得。而一旦有了大量的金钱，则既可直接供其生活的挥霍享乐，山珍海味、声色犬马、娶妻纳妾、玩妓踢球，样样为所欲为。而且利用金钱还可间接、直接“通官”、“买官”来坐。并且小钱买小官，大钱买大官。嘉靖年间的掌朝大奸严嵩，已经“认钱不认人”，“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衡金之多寡则畀之”。可见金钱已成“万能”，所谓“有钱买得鬼推磨”是也！这在明末政治腐败伦理丧尽之时，已经形成一种新潮流。风气既成，不少人就“要钱不要脸”了！在这种情况下，视商为“末”的旧观念，则早已淡薄，以

至殆尽！西门庆一生经商并为“官商”，临死不提“田产”二字，而只把共有几万银两交待给女婿陈经济。可见他只信奉“拜金主义”，脑子里根本没有“重本轻末”的想法。这个官商典型人物的出现与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对于“重本轻末”旧观念的彻底否定。

二、反了“儒道尊严”旧观念，赌徒恶棍不学无术竟成明末官场新宠儿。

中国自孔夫子以降二千年间，总有个“学而优仕”的说法。即要想做官，要能做官，都必须“学而优”。即如为人不耻的秦桧，也是“政和进士”及第，靠“学而优”当了宋朝宰相的。至于什么是“优”、当然时代不同自有不同的标准。古人讲的是通“四书五经”之优，今人讲的则是“马列主义文化科学知识”之长。但无论什么，自古至今，一个“学”字却不可少。

文行至此，我们再把目光定点到明末社会。在那虽然仍行“科举”，但却盛行“售官”买官的时代，还讲什么才学？即不论什么平庸之辈，也可靠钱当官。“学而优”的儒道尊严大为贬值。为官“平庸”尚属小可。而比平庸更坏的奸佞恶霸、地痞流氓，只要有钱，钱多，不但可以当官，而且更有步步高升当大官者。越是肯于花钱送礼的下级，越在上级的眼里成了“X工人”、“宠儿”。中国的官场，至此已成一片黑暗：《金瓶梅》给我们描绘的正是这样的一幅明末黑暗官场的百丑图。百丑之中，西门庆更是耀眼的一个。

试看西门庆其人。他“文”不通翰墨，大字不识两口袋，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教义，他哪里知晓？而且“武”也缺乏足够的看家本领，作者虽介绍他也曾习过一点“拳棒之术”，但却经不起武松的三拳两脚。此辈除了知道“交通官吏”走后门、请客送礼拉关系网之外，可谓“不学无术”。但他这个原本“开生药铺”的“浮浪子弟”，竟可步步发迹，由理刑副千户而升正千户，变成山东举足轻重的大官，连荆都监、吴巡检、夏提刑、李知县之流这些地方官员，全都得巴结着他点了。这些一齐朝向西门庆点头哈腰的府县官吏，想

必原比西门庆肚子里装的墨水要多，嘴上也更会说些“子曰”、“诗云”的文辞；但只褙着钱袋，腰杆硬梆的“西门大官人”，竟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地站在他们面前，却不能不说对于“儒道尊严”的亵渎与嘲讽！

三、恶霸与官商，核心还是个“官本位”。

说西门庆是恶霸，这不管是在《水浒》，在《金瓶梅》，还是在戏曲舞台上，总是给人的第一印象。西门庆是恶霸的代表，这且不必细论。而说西门庆是“官商”，就须分析一下了。

“官商”一说，不知起于何代，如前例举的春秋吕氏、战国范公之类，有的弃商入官，有的弃官经商，我看还都不应称其为“官商”。因为他们都不身兼其二。两汉以来，诸如盐铁商品，有了国家专营，因而也就应该有了身兼官商的人。不过，那“资本”是国家的，“赢利”也是国家的。至于经营的方式如何，有无个人从中渔利的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当今所谓的“官商作风”，恕我于史寡闻，均不得而知。我要论的是西门庆这个文学形象。他初始经商，继而为官，便“亦官亦商”至终，他的经商“资本”是个人的，“赢利”也是个人的，搞的是纯个人“资本主义”。他用经商之所得，通官，赂官，买官；同时又是利用自身为官的特权，扩大经营，牟取暴利。这一切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四百年前，竟有资格成了当今“官商”的前辈，“官倒”的先驱。

有人只从西门庆的“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个人品质方面论断，认为这个形象更多表现的是“商人的本质”，我则所见略异。我认为剥开西门庆的精神内核，以及从他一心向往，并上勾下联，实际所处的官场中心地位来看，他表现的仍然主要还是中国式的“官本位”意识，而只不过这类西门型的“官本位”意识的“底座”，却已颇多暴露了一些封建道德残破的缺口而已。

试看他从当小生药铺掌柜的时候，便设法钻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事过钱，交通官吏”，不甘心只当一个安分守己的小

买卖人，而羡慕并乐于接近政府的官员。进而他有了钱就买官来做，并为自己能戴上一顶乌纱帽而沾沾自喜。而且他官欲无限，做上小官爬大官，直至不惜破费上万银两进京为蔡太师上寿送礼，并以能交上这位掌朝大官而很自以为荣耀。试想，当众多地方官员都巴结他，并向他“求情保荐”的时候，那瞬间令他内心“陶醉”的究竟是什么？是“金钱”的闪光还是“权”字力量的体味？我认为已经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虽然“权”也是钱买来的，但西门庆知道，一旦有了官权，就再不“受治于人”而“治于人”掌刑握玺，对别人的身家性命都可“生杀枉之”了，何愁没有更多搞钱的“门路”？

所以说，中国的封建制度，给人培植最深的还是“官本位”思想。即使西门庆这个出现于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官商人物，尽管在他身上多了一点商人习气，灵魂污染上浓浓的铜锈，也总愿意当官，并且一旦穿上官服，就更增强了“官本位”意识。他虽然是个“吊儿郎当”的官儿，平时“上班随便，不把‘公事’认真，但他在逛妓院时，却也多了一点小心，注意暂时换下官服，脸上还蒙一块黑色眼罩，似乎光怕被人认出，有损于“官员”的形象。由于他多年的“交通官吏”。并且当了官儿，对于官场的应接酬酢，上下礼仪，渐已烂熟于心，行动也游刃有余了。外地什么“级别”的官员来，备什么规格”的酒席；有的可以坐家待客，有的则必须鸣锣开道，率众接送于县界，这些他都已做到心中有数，应酬自如了。这一切说明“官本位”已成西门庆的行为“规范”与思想“核心”。

四、西门庆发迹的种处契机

西门庆这个文学典型为什么只能出现于《金瓶梅》小说所描写的明末社会与运河岸边？什么是这个人物形象的滋生土壤？“恶棍”与“帮闲”又是怎样相辅相成，互相辉映的？试作几点探究。

A. 以临清地区为代表的运河文化的滋生土壤。

关于《金瓶梅》的研究，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渐趋一种共识，即认为小说所描写的地域背景当是北方靠近运河的某个城市。临清

《金》学会的同志根据实地，更直接提出小说是“明写清河，实写临清”并有人进而推断向被认为“千古之迷”的小说作者当是原籍太湖之滨的“南兰陵”而从小便迁居临清的明“后七子”之一的“大名士”谢榛。尽管各家各派还众说不一，而第四界全国《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已议定今年来临清召开，即可说明大家在某些方面已有较多的共识之处。

一部重大作品的出现，一个作品中的典型人物的产生，当有一定的历史地域的文化背景。《金瓶梅》的产生则以运河与运河文化为背景。而临清恰恰就独一无二得天独厚在具备能够代表明代兴起的运河文化的背景条件，并构成了产生《金瓶梅》的典型环境。这从小说的内容也可看出，临清正是《金瓶梅》人物故事的发源地。

试看明代的临清州，城跨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上，汶、卫交汇，南通河南江浙，北抵京师，位处都城南面之“辅地”并为明朝二都的咽喉。当时的朝官坐镇，重兵把守，其地理位置在军事与政治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尤其在当时海运已罢，陆路交通又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江南的粮食财宝几乎全靠这条运河的漕运，同时北方的货物也需南销。于是便官船私船，云集临清，临清顿时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与转运枢纽，也迅速变成北方的一大商业城市。如果说大运河是当时贯通中国南北的一条经济大干线，临清则是这条大干线上的一颗闪亮的明珠。明珠映照下的杂色人等，既有八方逐利而来的坐商行贾，也有悠游观光的文人墨客，还有南北进京、出守的官员，也都必经此道。游僧卜医，间杂其间；赌场妓院，应运而生。当时大学士李东阳路过临清，在一首《咏鳌头矶》中所写“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的诗句，以及《金瓶梅》第九十二回具体描写“看临清市上，是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的文字，都是如实反映了这座畸形的商业城市的当时景况的。

在这样的商业城市里，除正当经营者外，贪欲膨胀、唯利是图、背私舞弊、巧取豪夺者大有人在，地痞流氓、骄横无道、生事害人者大有人在，有了金钱便挥霍无度、“唯肆贪婪”者也大有人在。这里是贪官污吏的舞台，也是穷人弱者的地狱。这正是在黑暗中国封建桎梏破裂处刚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伴生出来的一些怪现象，也是在繁华文明大幕掩盖下的一些阴暗面。这与解放前的大上海有些类似。这些倒也都可视为是一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来加以考察看待。由于经济的猛涨与冲击，造成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使整个民风民俗有了很大的变化。据《临清县志》记载，当时的临清，“逐末者十室有九，并说“盖此地五方走集，四民杂处，商贾辐辏，士女嬉游。故户列珠玑，家陈歌舞，饮食燕乐，极耳目之欢。至于本境人民，逐末者多，力本者少”“濒河招商，舟车辏集，民习奢华，其俗也，文若胜乎质。”这些旧地方县志的记载，或许不够全面。但从至今这座已比明代大为收缩的濒临运河的小城看来，似乎某些遗风犹存，即与附近的内地县城相比，也大有不同，颇有特色，个性鲜明。从而也可想见当年。

这座明代畸形发展的商业城市的出现，颇有代表性地反映着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以及运河文化的形成。这正是《金瓶梅》赖以产生的典型环境，也是滋生西门庆这类人物的有利土壤。

例如正是仰仗靠近这条运河的便利，西门庆才很容易地指派伙计行船江南，采购南京苏杭的丝绸与棉布。运河岸上设着规模颇大的收税钞关，西门庆才得买通税官钱老爷得逞“三车并作两车”的偷税漏税。有那么多的外地官员到临清来，西门庆有机会不断地忙于应酬并与之交结。江南的大米、金华的火腿与甜酒竟然变成西门庆这个北方居民的家常便饭。甚至专供便溺的江南杩子，也成了追求时髦的西门庆家的“如厕”用具。为西门庆唱曲儿的，除了家养的乐班、当地的歌妓，还专买来一个善唱南曲的苏州少年。西门庆

奸淫无度，便有胡僧远来送药，吴月娘广做善事，更近有众多僧尼道姑的伺候。这一切说明，由于运河的畅通，在临清这个北方的商业城里，便可集天下之所有，应有尽有；商品交换，文化交流，五花八门，也已见怪不怪。

所谓“文化”，广义而言，是指社会物质的与精神的两大方面创造的总和。这往往首先在城市里得到集中的展示。

所谓“运河文化”，据我的理解，即应专指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由于运河的开发所带来的以商业为主导的极富特色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所造成的新事物层出不穷的现象。这“新事物”带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也闪着新旧斑杂的光圈。这在一座濒临运河的商业城市里，无论从地理名物、经济交通、服饰饮食、民俗民风等的各个方面都会体现出来。西门庆这个亦官亦商，既有官僚作风又有商人习气的典型形象，运河文化就是此类人物的滋生土壤。

B、封建制度溃烂而生的社会蛀虫，与恶霸和帮闲的相畏相成。

我认为西门庆既是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官商“骄子”，同时又是旧的封建制度开始溃烂阶段的社会“蛀虫”。这个人物的出现，既代表着一种社会发展的新倾向，对于旧的社会肌体起着破坏作用，同时他又依附于旧的肌体，吮吸着溃烂的脓血，借以维持着自己的生命。

试看西门庆的商业经营，总不能求其独立的发展，他还离不开官场，并借助权力以推动。他满脑子想发财，却更乐意当官。朱明王朝，其封建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达到十分完备的阶段，程朱理学，还要更进一步地来强化人们的封建意识。而正在这种时候，强弓之末，大封建的堡垒开始崩溃，大封建的肌体开始糜烂。物极必反，这时封建与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相当激烈。长篇小说“四大奇书”皆产生于这一时期，即反映了这种现实。而作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

梅》所塑造的西门庆这个人物，我却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反封建的英雄。他的极端“性开放”对于封建的伦理道德似乎还只有破坏性还无革命性。他也不是一个如西欧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种资本积累时期出现的苦斗的资产阶级创业人物，他把钱都花在纵淫享乐上。他的品行代表了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所“共有”的那一方面的最坏的东西。

试看西门庆一段自白：“咱闻那佛祖西天，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土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他这番亵渎封建伦理的狂言，并不说明他反封建道德，反封建制度。而只表明他是一个封建阶级的败家子，玩世不恭者。他虽然不顾一切地追求淫逸享乐，去践踏天上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但不也要寻个退路，许个条件，去“广为善事”甚至捐资修庙，以求心的平衡与自慰吗？

那些以应伯爵为首的西门庆的帮闲十兄弟之流，与恶霸西门庆一样都是当时社会的蛀虫、人间的害群之马。令人感慨的是，西门庆养着这伙帮闲，供他们些酒食，这伙帮闲也更助桀为虐，为虎作伥，处处抬举着西门庆，插科打诨，以增添西门庆的乐趣，出谋划策，以鼓励西门庆更做坏事。如应伯爵这类帮闲，比西门庆这类恶霸还更显得是些丑角，令人特别的讨厌。我说，社会上假如没有众多的应伯爵式的帮闲，西门庆这类少数的恶霸也难产生；社会上假如多有武松式的人物，那西门庆之流就永远站不住脚！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恶霸与帮闲互为依靠、相辅相成，又互相辉映，构成《金瓶梅》世界的百丑图，又各自个性鲜明。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匆匆草于临清一中

“达达”考

魏 聊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古典文学名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小说写作的地理背景就在鲁西——古东昌府一带，书中也大量地使用了山东方言，这就为研究考证它的人提供了最重要的内证，它直接关系着成书与作者籍贯的考证判断。在所有方言中，亲属称谓方言更显的至关重要，《金瓶梅》中的“达达”一词就引起许多研究的争论。

著名学者朱星先生认为《金瓶梅》中有些方言词并非纯山东话，如“达达”吴中方言也有，常州人说“爹爹”(tia tia)，宜兴人说(ta ta)即“达达”，可知常州宜兴人所说的都是“爹爹”的转音。^①故而，对《金瓶梅》中山东方言的这种认识就成了他的论点——《金瓶梅》作者苏州人王世贞的一个论据。

还有的学者认为“达达”是华北常用称谓词“大大”的转音。

近几年，《金瓶梅》著名的学者王莹先生在临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认为“达达”并非“爹爹”或“大大”的转音，而是另有根源，^②这种论证方法是较为可靠的，因为本源往往表现在实质意义。笔者也对鲁西的地方称谓“达达”“大大”做过一些调查研究，发现“达达”和“大大”都是一种对父亲或父辈人亲昵的讨好的称谓，而且读音极为接近，但却系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根源。“大大”是古代婚姻制度的残存称谓(另有考证)而“达达”则是起源于外来语译音的遗留。临清的孩子们是使用这种称谓最频繁的，临清人认为“达达”是来源于金元统治的称谓遗存，这在《金瓶梅》中可找到证据。第十二回：“小玉说道：朝廷昨夜差了四个夜不收，请你老人家往口外和番，端的有这话么？李瓶儿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听

说你老人家会叫的好达达。”以上这段话意思很明显。番，是边境少数民族的简称。汉人与犯边的番人讲和，自然用番语最亲昵的称呼“达达”向其讨好效果最好。此处小玉暗讽李瓶儿喊西门庆“达达”，故说“请你老人家去口外（长城外）和番。”此可知“达达”一词确为当时汉族对少数民族讨好用的遗留。同②但王莹先生没找到其它有力的旁证史料。

其实，一语道破也很简单，元朝人、蒙古人也。蒙古人、鞑靼也^①。《金瓶梅》成书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其作者最熟悉的和番是什么呢？当然是元初或明初汉族人与元朝蒙古人讲和了。汉人对从遥远北方过来的陌生鞑靼族人最有可能采取的称呼是什么呢？只有鞑靼，汉人与鞑靼边陲盟约，言欢讲和，当然也可以讨好地称对方为鞑靼。笔者认为，鞑靼(da da)与“达达”(da da)读音完全一致。鞑靼二字落在纸上的时候就简写成“达达”了，而且“达达”与华北常用语“大大”也不是一点联系也没有。“达达”之所以不光表示讨好，还带有父亲的涵义就是因为“达达”(da da)与“大大”(da da)读音也极为接近，那时，“达达”一词叫来叫去，就容纳了“大大”的某些涵义，所以“达达”又具备了对父亲或父辈人爱称的意义。这就是“达达”一词的形成和内涵。《金瓶梅》中还有许多临清称谓方言，如称“姑姑”为“姑娘”等。所以，笔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位临清人，至少是一个在临清长期生活过的人。

【注释】

①《论金瓶梅》P382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

②《金瓶梅作者之谜》P325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辞源》卷四 P3371

鞑靼(da da)部落名。本别部，唐末始见其名，后乃为蒙古的别称。元亡，其宗族走漠北，去元之称号，称鞑靼。

《金瓶梅》占卜术与临清

玄述贵 朱纪轩

《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元明小说中合称四大奇书。《金瓶梅》注重实际，精于描写，而其三书所不及，可谓难得佼佼者。由于作者学问渊博又善于命相学，所以小说里面涉及算命看相典型事例很多。笔者在从事文史工作中，亦对命理不祥颇有兴趣。尤其《大六壬金口决》常用以为求卜者运算。

近来阅读了《金瓶梅》，观看了《麻衣相法》、《柳庄相法》、《渊海子平》、《易经》、《大六壬金口决》、《鬼谷先生命理前定》等，查阅了有关资料以及临清、阳谷、寿张县志，并亲赴临清进行考察，我认为《金瓶梅》一书，是以临清为背景，是熟悉临清乃至鲁西平原的人所作。

自《金瓶梅》问世，署名兰陵笑笑生以来，在四百年间，人们对于作者究竟是谁，一直在猜想推测，据一般人的意见，认为是山东人所作，因作品中多用山东方言，而古兰陵又在山东峰县，今属枣庄市。有的人认为作者是明后七子之一的文学家王世贞，因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提到作者出于嘉靖间的大手笔。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寒花随笔》中写道：“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书，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严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对之。”或又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姚平仲《纲鉴挈要》载：巡抚王抒事注谓“抒有古画，严嵩索之，抒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凤洲既抱终天之恨，因而写《金瓶梅》以复其父之仇。可

又无实据，不被人公认。凤洲生于南方，在北京为官，晚年因病离职从事诗文著述。《金瓶梅》写北方民间之情形有绘声绘色之妙，在小说中独树一帜。王凤洲对临清鲁北地区的方言土语、风土民情、地理环境、城镇街道，不会了如指掌。

又在《顾曲杂言》论及本书的一节中，则云：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其~~浅鄙俚，时桌吴语，即前后血脉也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大名士手笔，指拆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家乡）；林灵素则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云，所谓嘉靖间在大士……就知说的王凤洲了。

笔者认为王凤洲参与编写《金瓶梅》是实，而但当重任者则是王凤洲的朋友临清人谢榛。据《中国人名大辞典》所载：谢榛，临清人，字茂榛，自号四溟山人，又号脱屣山人，刻意为影诗，有闻于时，西游彰德，赵康王宾礼之，嘉靖间游京师脱昌黎卢楠于狱，朝士多重其谊，时李攀龙，王世贞等结社燕京，榛以布衣为之长，称五子，秦晋诸王争延致之。河南此皆称谢先生，有《四溟集》。

卢楠，明凌县人，以赀为国学生，博闻强识，负才忤现今令，令诬杀之，榜掠论死，系狱数年，谢榛赴京师为称冤，适平湖陆光祖代为县令，乃平反其狱，后遍游吴越，病染而卒。卢楠骚赋最为王世贞所称。

谢榛虽为布衣，但才气过人，行侠仗义，为卢楠鸣不平奔赴京师。见到王凤洲之父被奸相严嵩诬陷致死，欲除掉严嵩而力不及，只好借写书抨击严嵩。

《金瓶梅》在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写道：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东平府清河县中，有一旧家子弟……这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俺这清河县近着沧州路上，有一条景阳冈，岗上新近出了一个吊睛白额老虎，时常出来吃人……

谢榛并未盲目照搬《水浒传》上所写在阳谷县景阳岗武松打虎。他敢于对《水浒传》打虎地点，以及把武松由清河县人改为阳谷县人，是亲自到现场调查后而改变的，笔者在主编的《台前县志》中，收入了谢榛在张秋镇题《瓠子河》诗一首。

金堤重到感秋风，振予忧思汉武功。
雉堞遥连千树暝，龙珠不见二潭空。
菱荷老尽秋霜后，箫管寒崖落日中。
白发沧州幽事在，菱花绿酒故人间。
谢安自信游山剧，潘兵唯怜作赋工。
无数峰峦秋色里，高歌相对欲争雄。

这首诗写在张秋镇原载《东平州志》，张秋镇又分属阳谷、东平、东阿、寿张四县所辖，足以证明谢榛是亲自深入鲁西实地考察，所以《金瓶梅》中的占卜术与临清地区完全吻合。

算命相面术，自从五代徐子平、麻衣道者奠定基础以后，经过两宋元朝的氤氲作气，浸润蔓延，到明代已风靡鲁西民间，谢榛又一身多艺，对《金瓶梅》中的占卜面术，在我到临清调查中，均能找出答案。

一、盲人算命：《金瓶梅》第十二回“潘金莲私仆受辱，刘理星~~星~~胜求财”中写道：婆子领定，迳到潘金莲卧房明间内等了半日，妇人才出来坐下，贼瞎子见了礼坐下，妇人说与他八字，贼瞎子用手捏了捏说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己丑时，初八日立春，已交四月，算命依子平正论：娘子这把字虽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济，子上有些妨碍，乙木生在正月间，亦做身旺论，不克当自焚，有两重庚金，羊刃太重，夫星难为，克过两个才好。”妇人道：“克过了”贼瞎子道：“娘子这命中，休怪小人说：子平虽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丑中又有亥水，水太多了，冲动了，只一重巳土官煞混杂，论来男人煞重掌威权，女人煞重必刑夫。所以主为人聪明机变，得人之崇。只有一件，今年甲辰岁道并临，灾殃立至。命中又犯小耗勾纹

两位星辰打搅，虽不能伤，却主有化肩不和，小人咀舌常沾些啾唧不宁之状”。妇人听了说道：累先生用心与我回背、回背，我这里一两银子相谢，先生买两茶吃，奴不求别的，只愿小人离退夫主爱敬便了”一面转入房中拨子两件首饰递与贼瞎。贼瞎收入袖中说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块，刻两个男女人形，画着娘子与夫主生辰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红线扎在一起，上用红纱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上心，用针钉其手，下用胶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头内，又用朱砂书符一道，烧灰暗暗搅茶内，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来，不过三日自然有验……妇人听言满心欢喜，当下备了香烛纸码，替妇女烧了纸……”就潘金莲算命一例，经在临清调查，西夹道一位男盲人运用的算命术相与此相同，也为占卜者“回背”，今叫破解，借以索礼。

二、老婆算卦：第四十六回：（元夜游行遇雪雨，妻妾戏笑卜龟儿）写道：“西门庆往衙中去了，月娘约饭时前后与孟玉楼、李瓶儿三个同送大师父回家去，因在大门里道站立，见一个乡里卜龟儿卦的老婆子……月娘使小厮叫进来，在二门里铺下卦贴，安下灵龟说道：“月娘指着玉楼，你也叫他卜卜”。玉楼道：“你卜个二十四岁的女命，时一月二十七日寅时生”。那婆子从新搬下卦贴把灵一转到命宫上住了，揭起第二张卦贴来，上面画着一个女人配着三个男人，头一个小帽商人打扮，第二个穿红官人，第三个是秀才，也守一库金银左右侍从伏侍。婆子道：“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克过方好。”玉楼道：“已克过了”。婆子道：“你为人温柔和气，好个性儿，你脑那个也不知，喜那个也不知，显不出来，一生上人见喜，下钦敬，为夫主宠爱，只一件，你饶与人为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顶缸受气，小人驳杂，饶吃了，还不知道是你，你心地好了，虽有小人也拼不动你。”玉楼笑道：“……月娘道：“你看这位奶奶往后有子没有？”婆子道：“济得好见个女儿罢了，子上不敢许，若说寿道尽有。”月娘道：“你卜卜这位奶

奶。”李瓶儿笑道：“我是属羊的……。”上述算命术，至今在临清和鲁西北地区广为流行。现叫《金袋子》占卜法。用白布缝上三十二个小方兜，每兜上写个喜字，用红线丝着青铜方孔钱，查到占卜人岁数，即把灵龟（铜钱）安到命宫上，从兜内抽出一封贴，照贴算命。目前临清魏湾村的赵运龙先生即为会演此术。

三、设卦铺演先天易数：在六十一回“西门庆乘醉夸豪富，李瓶儿带病晏重阳”写道：“西门庆随即使陈经济拿三钱银子送到城边真武庙门首，黄先生家门上贴着：妙演先天易数，每命卦金三钱，陈经济向前作揖，奉上封金说道：“有一命烦先生推算。”写与他八字，女年二十七岁，正月十五日午时，这黄先生把算子一打就说：“算个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时，理取印绶之格”借四岁行运，四岁己未，十四岁戊午，二十四岁丁巳，三十四岁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岁伤日干，计都星照命，又犯丧门五鬼，灾杀作吵，夫计都者，阴晦之星也，其象忧如乱丝而无头，变异无常大运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二、三、七、九月病灾损，小口凶殃，小人所算，口舌事非，主失财物，或是阳人，为不利。”抄毕数陈经济拿来家，西门庆正和应伯爵，温秀才坐的，见抄了数来，拿到后边，解说与月娘听，见算明中多凶少吉，不觉眉间带上三黄锁，腹内包藏一肚愁。目前临清虽未发现设馆算命，但在民国时期就有数家。目前在大众公园北门，益华工厂附近设摊占卜者数人。茌平温陈乡杜庄杜玉环（已故）善演《先天易数》。

四、相面：第二十九回（吴神仙长画推冰鉴潘金莲署夏浴兰汤）写道：“西门庆道‘请仙长相相房下众人’”。一面令小厮后边请大娘出来。于是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等人都跟出来，在软屏后潜听。神仙见月娘出来，连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就立在旁边观相，端祥了一回说：“娘子面如满月，家道兴隆；唇若红莲，衣食丰足，必得贵而生子，声音神清，必益夫而发福。请出手来，月娘从袖中露出十指春葱来。神仙道：“干姜之手；女人必善持家；照人

之鬓坤道定须气秀，这几桩好处。还有些不足之处，休怪贫道直说。西门庆道“仙长但说无妨。”神仙道“泪堂黑痣若无宿疾必刑夫；眼下皱纹。亦主六亲若冰炭。”

女人端正好仪容，缓步轻如出水龟。

行不动尘言有节，无肩定坐贵人妻。

相必，月娘推后，西门庆说：“还有小妾辈请看看。”于李娇儿过来，神仙观看良久：“此位娘子，额尖鼻小，非侧室必散嫁其夫，肉众身肥。广大衣食，而荣华安祥，肩耸声泣，不贱则孤，鼻梁微低，非贫即夭，请走几步我看，李娇儿走了几步，神仙道：“额尖露背并蛇行，早年必定落风尘。假饶不是娼门女，也是屏风后立人。”相毕李娇儿下去……玉楼相毕，叫潘金莲过来。潘金莲只顾喜笑，不肯过来，月娘催之在三，才采出来。神仙抬头观看这个妇人，沉吟半晌，方才说道：“这位娘子发浓鬓重，光斜视以夺淫；脸媚眉弯身不摇而自颤；面上黑痣、必主刑夫；唇中短促。终须寿夭。

举止轻浮惟好淫，眼如点漆坏人伦。

月下星前长不足，虽居大厅少安心。

叫春梅也上来，叫神仙相相。神仙睁开眼儿，见了春梅，约不到二九，……出来道了万福。神仙观看良久，说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发细眉浓，稟性要强，神忽眼圆，为人急燥，山根不断，必得贵夫而生子；两鬓朝拱，主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飞仙，声响清，必益夫而得禄，三九定然封赠、但，左眼大，早年克夫；右眼小，周岁克娘。左口角下这一黑痣，主常沾啾唧之灾；右腮一点黑痣，一生受夫爱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口惹涂朱行步轻。

仓库丰盈财禄厚，一生常得贵人怜。

神仙相毕，众妇女皆咬指以为神相，西门庆封白银五两与神仙。《金瓶梅》中的相面术，不仅与《麻衣相法》，《柳庄相法》吻合，而且在临清现有十余人出此生意，并在鲁西北各地均有相面者。

五、批八字：在第二十九回写道：“贫道初知十三家子平，既晓麻衣相法，又晓六壬神课，……抬过坐席，讨过笔砚来，神仙道：“请先生贵造，然后相尊容。”西门庆便说与八字，属虎的二十九岁了，七月二十八午时生，这神仙暗暗捏指巡绞良久说：“官人贵造戊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午时七月二十七日白，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刚辛酉，理取伤官格，子平云：伤官伤尽复生财，财旺生财有转来。立命中宫。七岁行运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贵造，依贫道所讲，元命贵旺，八字清奇，非贵则荣之兆。但戊土伤官，生在七、八月，身忒旺了，幸得壬午日，子午宫有癸水，水火相济，乃成大器，丙午时，丙合辛生，后来定主威权之职，一生旺盛快乐安然，发福迁官，主生贵子，为人一生耿直，十事无二，喜则和气春风，怒则迅雷烈秋，一生多得妻财，不少纱帽，临死有二子送老，今岁丁未流年，丁壬相合，目下丁火来克，克我者为官为鬼，必住平地登云之喜，添官禄之荣，大运现行癸亥，戊土得癸水滋润，定见发生，目下透出红鸾天喜，定有熊罴之兆，又命首驿马临申，不过七月必现矣。西门庆问道：“我后来运限如何？”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说，但八字中不宜阴水太多，后到甲子运中将壬午日冲破了，又有流星打搅，不出六六之年，应有呕血流脓之灾，骨瘦形衰之病。”西门庆问道：“目下如何？”神仙道：“八月令流年，日逢破败，五鬼在家吵闹，小气恼不足为灾，都被喜气临门冲散了”。西门庆道：“命中还有败否？”神仙道：“年赶月，月赶日，日赶着时实难矣。”西门庆听了满心欢喜，便道：“你相我面如何？”神仙道：“……”当前鲁西地区盲人算命多用此术。年老文人会批八字者相当多，多数不串乡，不要钱。

六、民俗占卜与六壬神课：第八回《盼情人佳人占鬼卦，烧夫灵和尚睹娇婆》写道：话说西门庆自娶了与玉楼在家，燕尔新婚如胶似漆……不曾往潘金莲家里去。……坐在小椅子上盼不到西门庆来，骂了几句负心贼，无情无绪，用纤手向脚上脱下两只绣鞋来，试

打一个相思卦。正是逢人不敢高声语，暗卜金钱向远人。打相思卦，虽写的不细，但能反映临清一带古老妇女民俗占卜法。民间少年女子盼定婚，求人问卜又含羞，便用绣鞋一双暗自祷告，向空中一扔，如双底朝下主成，一上一下主暗昧，均鞋口朝天主不成。新妇盼丈夫回来亦用此术。

《金瓶梅》在二十九回中虽然反映六壬神课这一深奥占卜术，但未具体运算，在临清也未发现用六壬神深占卜者。

笔者不才，却能敬演《孙膑神课大六壬金口诀》，如有机会，可当场表演。

《金瓶梅》是一部古典杰作，其中命理学说并不是任意构思，而是紧扣临清民欲，各有所宗。所以说，临清人谢榛，才华出众、秉公仗义，为朋友王凤洲之父被奸相严嵩诬陷而鸣不平，深入到鲁西北各地考察，写出《金瓶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金瓶梅》菜系研究

王宝玉

我国是一个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饮馔文化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千百年我国劳动人民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的结晶。

笔者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于临清召开的全国《金瓶梅》新闻发布会期间曾对书中提到的菜肴进行了实作初探。经与会专家、学者的品尝认为很有研究价值，在各位专家、学者们的鼓励帮助下，经过我这一年多的研究实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下面我把研究的过程与结果介绍一下，望各位专家、学者教正。

《金瓶梅》一书中写到了大量的菜肴如：燕窝、鱼翅、烹龙肝、炮凤腑、黑熊掌、紫驼蹄、水晶鹅、烧鹅、烧鸭、糟鸭、熏鸡、劈晒鸡、柳蒸糟鲥鱼、烧肉、熏肉、猪头肉、干板肠、骑马肠、爆炒猪腰子、香喷喷油炸的烧骨、炖烂的鸽子雏儿、肉粉汤、百宝攒汤、一龙戏二珠汤、鸡尖儿汤、蜜煎梅汤……就以菜肴中的“烧猪头”而言书中第二十三回就详细地描写了其制作过程和风味特点。

潘金莲道：“……拿二钱银子买猪头来，教来旺媳妇烧猪头咱每吃。说他会烧的好猪头，只有一根柴禾儿，烧的稀烂。”

惠莲……于是起身走到大厨灶里，舀了一锅水，把那猪首、蹄子刷刷得干净。只用的一根长柴安在灶内，用一碗油酱、并茴香大料拌着停当，上下锡古子扣定。那消一个时辰，把这个猪头烧的皮脱肉化、香喷喷五味俱全。将大冰盆盛了，连姜蒜碟儿、教小厮用方盒拿到前面李瓶儿房里，旋打开金华酒筛来。

以上所写甚是明白。

菜名：烧猪头

主料：猪头一个、蹄子四个。

配料：姜米、蒜米。

调料：油酱一碗、茴香大料。

制作方法：

1、舀一锅水，把猪首、蹄子剃刷干净。

2、用一碗油酱、茴香、大料拌着停当。

3、用锡古子上下扣定拌好的猪首、蹄子。

4、只烧一个时辰即成，吃时带姜蒜碟。

特点：皮脱肉化、香喷喷五味俱全。

又如第六十一回：

伯爵道：“常二哥蒙你厚情……教他娘子制造了这螃蟹鲜”……西门庆令左右打开盒儿观看、四十个大螃蟹，都是剔净了的，里边酿着肉、外用椒料、姜蒜裹就、香炸油、酱油醋造过，香喷喷酥脆好食。

菜名：螃蟹鲜

主料：螃蟹

配料：肉馅、姜蒜米

调料：椒料、团粉、香油、酱油、醋

制作方法：

1、将螃蟹洗净、揭下蟹盖。

2、将肉馅与蟹肉、蟹黄调好味、酿入蟹内。

3、用椒料、姜蒜米、团粉将螃蟹裹住。

4、把整理好的螃蟹入香油锅内炸熟捞出。

5、酱油、醋对好汁，将炸好的螃蟹在里边过一下即可食用。

特点：香喷喷酥脆好食。

再如第九十四回

春梅道：“你教我说，我心里拦着，吃不下去”。良久叫过小丫鬟兰花儿来分付道：“我心内想些鸡尖汤儿吃。你去厨房内，对着眼妇

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鸡尖汤儿与我吃口儿。教他多有些酸笋，做的酸酸辣辣的我吃。”……原来这鸡尖汤，是雏鸡脯翅的尖儿，碎切的制成的汤。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两只小鸡，退刷干净，剔选鸡翅尖，用快刀碎切成丝、加上椒料、葱花、芫荽、酸笋、油酱之类，揭成清汤。盛了两碗儿、用红漆盘儿、热腾腾兰花拿到房中。……重新坐锅，又做了一碗，多加了些椒料、香喷喷教兰花拿到房里来。

汤菜名：鸡尖汤

主 料：雏鸡翅尖

配 料：葱花、芫荽、酸笋

调 料：椒料、油酱

制作方法：

- 1、将小雏鸡宰好后，退刷干净，剔选鸡翅尖、用快刀碎成丝。
- 2、酸笋切丝、芫荽切末、葱花。
- 3、把鸡丝、酸笋、葱花、椒料、油酱之类，揭成清汤加上芫荽即成。

特点：酸辣辣、香喷喷

以上都是书中直接写出如何制作的菜肴，还很多是我们现在还在制作且操作过程基本上继承和沿袭了过去的做法如第三十四回与第六十七回中：爆炒猪腰子

明《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上载：

将猪腰子切开，剔去白膜、筋丝，背面刀界花儿。落滚水微焯、滤起，入油锅一炒，加小料、葱花、芫荽、蒜片、椒、姜、酱汁、酒、醋，一烹即起。

现在的做法与之基本相同，鲁《菜谱》载：

炒腰花

主料：猪腰子两个。

配料：水发木耳 5 钱、笋片 1 两、大葱 5 钱、大蒜 5 钱。调料：酱油 3—5 钱、湿粉团 5 钱、料酒 1 钱、香油 1 钱、醋 2 钱、植物油 5 两、味精 2 分、高汤 1 两。

制作方法：

- 1、将腰子片开，取出腰臊，打上麦穗形花刀，改成3分宽的长条，大葱切成指段葱，蒜切成片，笋切小象眼片。
- 2、勺内放入植物油烧至九成熟，将腰花倒入油内一促，倒入漏勺，碗内加入高汤、味精、湿团粉、酱油、料酒调成汁。
- 3、勺内加油8钱，烧热时将葱蒜下勺一烹，再加入笋片、木耳，煽炒几下倒下腰花，烹上醋颠勺，即倒上碗内的汁，颠翻一下，淋下香油即出勺。

还有一些是书中提到菜名，与今已不再叫这个名称并有的做了一些改进的菜肴如：烧鸭、烧鹅等。明《宋氏养生·部》载：

烧鸭（炙鸭，本条记载的是北京烧鸭）。

- 一、用肥者，全体漉汁中烹熟。将熟，油沃架而炙之。
- 二、用全体，以熟油、盐少许遍沃之，腹填花椒、葱，架锅中烧熟。

第六十一回也曾提到烧鸭用炉烧的。书中写道：“常二哥蒙哥厚情，成了房子，无可酬答，叫他娘子制造了这盒螃蟹并两只烧鸭儿，邀我来和哥坐坐。”……又是两大只院中炉烧熟鸭……

通过以上研究得出烧鸭的制作方法如下：

烧鸭

主料：肥鸭一只

调料：熟油、盐、花椒、葱、酒

制作方法：

- 一、把宰好的鸭用熟油、盐、酒抹遍鸭身。
- 二、把花椒、葱填入鸭腹中。
- 三、把整理好的鸭子放入锅中煮九成熟。
- 四、将熟鸭子架起来，在火上烤熟。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临清召开的全国《金瓶梅》新闻发布会上，我曾制作了几只鸭子，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认为此烧鸭比北京烧鸭要好，香而不腻、风味独特、不需要象北京烤鸭那样吃时带

荷叶饼和面酱，以去油腻之味。

还有很多是只提到菜名而现今的菜谱上没有，也就是已经失传，有待研究的菜肴如：

红邓邓的秦州鸭蛋，秃肥肥干蒸的劈晒鸡、乌皮鸡、舞鲈公、干板肠、柳蒸糟鲥鱼等。

关于柳蒸糟鲥鱼，我曾查阅了很多资料，访问过许多老厨师，也未能找到制作此菜的方法，经过我进一步的研究最后得到一些制作的过程。

柳蒸糟鲥鱼的柳蒸是一种烹调方法，而糟又是一种烹调方法；鲥鱼只是原料。但这种原料却是很名贵的，在第五十二回中写道：

……伯爵用箸子又拨了半段鲥鱼与他（李铭），说道：“我见你今年还没食这个哩，且尝新着。”……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阑上来，饿了我不会吃饭儿。你们那里晓得，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道儿，吃到牙缝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说，就是朝廷还没吃哩，不是哥这里有谁家有？……

糟鲥鱼在第三十回中写道：

……就把糟鲥鱼蒸了来，伯爵举手道：“我还没谢的哥，昨日蒙哥送了那两尾好鲥鱼与我，送了一尾与家兄去，剩下一尾对房下说，拿刀儿劈开，送了一段与小女，余者打成窄窄的块儿，拿他原时红糟儿陪着，再浇些香油，安放在一个磁罐内，留着一早一晚吃饭儿，或遇有个人客儿来，蒸恁一碟儿上去，也不枉辜负了哥的盛情。

…

元《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载糟蟹制法与以上所说的糟鲥鱼基本相同

糟蟹

歌诀云：

三十团脐不用尖
糟盐十二五斤鲜

好醋半斤并半酒
可餐七日到明年

但是这样做的糟鲥鱼未必能够做到象第三十四回中写到的入口而化、骨刺皆香。

现在鲁西北一带还流传着一种“糟鱼”做法，做出的糟鱼骨刺皆酥、入口而化，其制作方法如下：

将鱼放在锅中加糖、红香糟、醋、酱油在旺火上烧开后用微火炖七——八小时即好。

柳蒸的烹调方法在元《饮膳正要》中记载的柳蒸羊中有所记载：

柳蒸羊（元代宫廷菜）羊，一口，带毛。右件于地上作沪，三尺深，周围以石烧，令通赤。用铁芭盛羊，上用柳子盖履，土封，以熟为度。

通过对“柳蒸羊”、“糟蟹”、“糟鱼”的制作方法的研究得出柳蒸糟鲥鱼应为如下做法：

柳蒸糟鲥鱼

主料：鲥鱼

配料：蒜、鲜柳子、石头子。

调料：红香糟、香油、白糖、醋、酱油。

制作方法：

1、将锅底放上蒜，上面放上宰杀好的鲥鱼（千万注意在宰杀时不能去鳞，因为鲥鱼名贵之处就在鳞上，为脂性鳞，含脂肪4.5%，蛋白质18.5%，肉质细嫩）。

2、将各种调料放入锅内，先用旺火烧开，后用微火炖七——八小时即好。

3、在地上挖一土坑，底下放入烧的通红的石头子，上面放上铁笆子，放上糟鲥鱼，上用柳子覆盖，用土埋住，候石子凉后即好。

特点：色泽红亮。糟汁浓郁、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

或用糟蟹法制的糟鲥鱼，用柳蒸法制作宜佳。

书中还有一些是以菜名影射事的如第二回中的梅汤，梅者，媒也。和合汤，和合乃两相合洽之谓，既影照此，还又确有此汤。

再如第四十九回写到梵僧吃的汤饭。

……次又拿了一道汤饭出来：一个碗内两个肉圆子，夹着一条花肠滚子肉，名唤一龙戏二珠汤；一大盘裂破头高装的肉包子……。

有人认为，一龙戏二珠汤为男性生殖器，而裂破头高装肉包子则为女性生殖器影照梵僧吃饭后送与西门庆的用途。但是这种汤和包子又确实能够做出来。

·龙戏二珠汤

主料：瘦肉、五花肉

配料：葱、姜末

调料：盐、粉团、香油、清汤

制作方法：

1、将瘦肉剁成肉泥，加葱、姜末、盐、粉团搅均匀。

2、将五花肉切成园长条，打上花刀。

3、锅内加清汤，把搅好的肉馅团成两个大圆子，和打上花刀的肉下锅中煮熟即成。

此菜在八九年五月的全国《金瓶梅》新闻发布会上做出后，与会者一致认为与书中所写非常想像。

以上是我对《金瓶梅》一书中部分菜肴的一点粗浅认识研究，不当之处还望各位专家学者教正。

《金瓶梅》部分遗迹遗址简介

王连洲

石佛寺

一、《金瓶梅词话》

24回：李瓶儿说冯妈妈：“你是石佛寺长老，请着你就张致了。”37回又说：“妈妈子，你做了石佛寺长老，请着你，就是不闲。”

二、康熙《临清州志·卷二·庙祀》载：“石佛寺，在城北，距城十里。”

三、民国《临清县志·十一册·金石》载：“石佛立像。高约八尺，在城北石佛寺内。今其村即以石佛名。像之下端有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正书。虽未详其年代，惟邑人以为唐时造像无疑。俗传像身瑛珞垂珠，均嵌以宝石，今则年湮代远，但余嵌镶痕迹，宝石已无一存矣。

四、现状：城北石佛寺村仍未易名。庙无存，石佛今移到城中公园内。

观音庵(寺)

一、《金瓶梅词话》

39回：金莲对王姑子说：“你住的观音寺后面就是玄明观，”常言道。男僧寺对着女僧寺，没事也有事。

50回：李娇儿做寿：“观音庵王姑子，请了莲花庵薛姑子来了。”

二、康熙《临清州志·庙祀》载：“观音阁，在鳌头矶上。”又记：“弘润庵，在鳌头矶。”

三、民国《临清县志·卷二·古迹》载：“中州之鳌头矶、观音阁于其上。”“俗称其地为观音咀。”

以上二条记载参证，可知临清之鳌头矶、古为庵，因其上有观音阁，故《词话》写为观音庵。约建于明景泰以前。

四、现状：是城中唯一保存较好的明代建筑。位于大众公园北门外。

临清钞关

一、《金瓶梅词话》

58回，胡秀说：“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

记载钞关的其它回有：47、67、74、81等回。虽是托名在清河，而实写的是临清钞关。

二、康熙《临清州志》

《卷一·公署》载：“户部榷税分司（俗称为钞关），在会通渠西浒。”

《卷一·职官》载：“钞部，户部榷税分司明宣德十年设关，以御史或郡佐充之，无专职。正统成化间再罢。景泰弘治初再复，乃岁出主事一人，督收船料商税之课，课无定额，大约岁至四万金钞。不盈百贯者谓之小税，掌于税课局官，而以州印票仿之，分季解京，以充内帑。嘉靖庚戌（二十九年 1550）以东昌府幕一人为监收官，久罢。”

三、民国《临清县志》

“钞关：明宣德十年设关于此。内有厅堂、有仓库、有巡栏舍。仪门之外，南为舍人房，北为船料房。前为正关，有坊二：曰裕国、曰通商，南侧为玉音楼。又临河为坊，曰国计民生坊，之北为阅货厅。河内沿索达两岸，开关时撤之。隆庆元年，关主事刘某购北邻民房五十余间扩充之。清乾隆十年巡抚喀尔善檄知州王俊重修，有碑记。民国十九年废，二十二年，鲁北民团军指挥驻防其间，指挥赵仁泉

增建舍宇，形势益复崇焕。

四、现今状况：

临清市二轻局，为昔时钞关主院。尚有清代修的厅堂二座与碑刻二座。四面均辟为民宅。

临清二闸

一、《金瓶梅词话》

93回：“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

二、康熙《临清州志》

《卷一·河渠》：“闸四，曰会通，曰临清，元旧址，明尚书宋礼复置，在汶北支，久废。……曰新开，曰南板，永乐十五年（1417西酉）平江伯陈？创建，在汶南支。”

《卷四·艺文》载：“州人刘梦阳，南板新开二闸记，二闸相距仅三百弓。旧闸草创，一以砖堰之名曰砖闸，一以板障之名，曰板闸，继后改为石闸。”

三、民国《临清县志·二册·河渠》“汶河闸座：会通、临清二闸均建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会通河开凿之后四年，明永乐、弘治间宋礼、白昂相继重修。临清闸久废，会通闸尚存旧址，今已改为会通桥。南板、新开二闸即所为头闸、二闸，明永乐十五年平江伯陈？创建，正德八年河漕御史刘恺重修。自运河停，南板、新开二闸犹历修补为东南二方行人往来之要道。”

四、现状：元代二闸，在会通河北支上，临清闸已在地下发掘出来。会通闸，尚存会通桥遗迹。明代所设二闸，在会通河南支上均存遗迹。书中指新开、南板二闸。

南门外五里土同

一、《金瓶梅词话》

48回：“出南门到五里祖坟上，……，坟内正面土山环抱。”

93回，“原来这座酒楼乃是临清第一座酒楼，名唤谢家酒楼，里面有百十座阁儿，周围都是绿栏杆，就紧靠着山岗，前临官河，极是个人烟热闹去处，舟船往来之所。”

10、14、59、65、80诸回中的“山头”均实写临清土山。

二、民国《临清县志·二册·古迹·山水》下载：“土山：在土城景德门内汶河东岸，南起头闸口东偏北，达车营街南首，长约里许，坡陀起伏，形成数段，每段高约六七丈。相传明永乐时，浚会通河泥土积累而成。上植树木多株，蔚然深秀，登临遥望东南，则阡陌纵横，村庄鳞次；西北则高塔耸峙，栉比，每当夕阳西下，暮烟十丈，万家灯火，一览尽收。即旧志十景所谓土山晚眺也。据旧志，山上曾建大土阁，今已无存。”

三、现状：尚有可观的规模。东山脚下辟为“龙山公园”。距砖城南门五里外。

头闸口（新河口）

一、《金瓶梅词话》

48回：“狄县丞率领一行人，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
七八将近新河口止。”

49回：“西门庆、夏提刑（从清河）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

81回：汤来保，一日在临清“钞关上纳了税，放船过来，在新河口起脚装车，往清河县城里来。”

二、康熙《临清州志·卷一·河渠》载：“按汶水为会通河。元至元间（二十六年）自安民山开渠，导汶绝济，直抵临清，入卫河。”“永乐十五年平江伯陈？凿汶南支，”亦入卫河。

按：明永乐开的汶河南支与卫河交汇处为新河口，是相对于元代运河的土著称谓。亦称头闸口。

三、现状：临清城内的汶河南支（新河）尚较完整。河上的二闸、新开闸、南板闸尚存遗迹。

新河口闸

一、《金瓶梅词话》

72回：玳安道：“他好小近路儿，还要赶新河口上回说话哩。”

二、康熙《临清州志·卷一·河渠》“闸，曰新开、曰南板、永乐十五年平江伯陈？创，在汶南支。”

《艺文·州人刘梦阳南板新开二闸记》记：南曰南板、曰新开、二闸相距甫三百弓。旧闸草创，一以砖堰之，曰砖闸。一以板障之，曰板闸。之后改为石闸。”“廷议都宪刘公（刘凯）总师通漕于酉岁春（正德八年）撤其旧而创。”

其中，南板闸即新河口闸。俗称头闸。

现状：经历次维修，留有遗迹。

临清码头

一、《金瓶梅词话》

17回：苗青、陈三、翁八刺刹苗天秀后：“苗青搭了船只，载至苗青码头上。”

77回：“崔本治了二千两湖州绸绢货物，腊月初动身，雇船装载木到临清码头。

81回：“不想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蚕荒蕪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临清一带码头，着客货而买。”

92回：扬大郎跟着陈经济”家中起身前往临清码头寻缺货去。“

93、94、95、98、99诸回均写到临清码头。

二、康熙《临清州志》

知州于睿明州志序：“临清地居京畿之臂，势扼九省之喉，连城之百货萃止，两河而万艘安流。”

知州贺王昌州志序说临清“甲第连云，人物熙攘，漕运万艘，衔尾北上，市肆毂击肩摩。”

志书虽未记载码头，但由上文中已可见临清码头数量与规模矣！根据考查知临清城区汶河上有南门外码头（《梼杌闲评》中多次

提到)钞关前码头。卫运河上有三元阁、狮子桥、广济桥,与临清闸等几处码头。

《词话》各回所写并非专指一处码头,但多系指上述几处码头而言。这就是 81 回所说“临清一带码头”的含义。

三、现状:南门外、钞关前、三元阁三处码头,遗迹尚存。

一、《金瓶梅词话》

1 回:清河知县对武松道:“我今日就参你在我这县里做巡捕都头,专一在河东水西擒拿盗贼,你意下如何?”

95 回:薛嫂对月娘道:“奶奶,你还不知道,如今周爷、朝廷新与他的书,好不管的事情宽广。地方河道军马钱粮,都在他(那)里打卯递手本。又河东水西,捉拿强盗,贼情正在他手里。”

67 回:冯二儿子的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绰号白千金。”

二、临清地方志详细记载隋大业四年开凿的运河,赐名官河。由南而北流经临清城区偏西部,临清人士称西河,把河两侧的广大城乡称做河东、河西。由来久之。

三、现状:至今临清土著仍呼河西侧城乡为“河东、河西”,有口皆碑。

狮子街与石桥

一、《金瓶梅词话》

15 回:月娘等“到狮子街灯市李瓶儿新买的房子里来。”

47 回:苗青躲在“狮子街石桥西首乐三家。”在 8、9、10、39、42、79、诸回中多提及此街与桥。

二、康熙《临清州志·卷三·孝义》下载:“王勋:官巡抚,好义喜施。先是临清诸街、水道咸汇。大寺门前居民受患者不下千余家。隆庆元年勋独捐资,力修沟渠,建石桥于卫河东岸,名狮子桥,至今赖之。有碑文载其事。”

三、现状:此石桥毁于四十年前,按志载地图,此街现为运河东

北岸，东南西北方向约200米。为运河东移侵没。

临清广济闸大桥

一、《金瓶梅词话》

93回：“王老到于码头上，过了广济闸大桥，见无舟船，停泊在河下，来到晏公庙前。”

二、康熙《临清州志》

《卷一·河渠》下载：“桥四，曰广济、弘济、永济、通济。广济在卫河中，明兵备付使陈璧创。”

《卷四·艺文·诗》一首

过广济桥 至圣裔 孔胤樾

此身生百累，	感君樽际忘。
陶然？竹舆，	何用哭沧桑。
径黑无矩步，	隶卒失其常。
渔灯近渡口，	喧语震山岗。
中流肃然静，	群动听衣裳。
巨橹冲蛟窟，	惊湍引星光。
日气即入晦，	物理自宜藏。
尺波亦蓄险，	哲士介垂堂。

三、民国《临清县志·第三册·建置志七·交通类》载：“浮桥；跨卫河。为临西来城之要津。明弘治时付使陈璧创建。万历时于西岸石为道。清顺治间州人李际泰募赀造舟十三又于东岸叠石二十余级。昔人所称之官桥晓月即此。乾隆时，毁于兵焚，今舟余二三，石基惟东岸尚存。”

四、现状：按浮桥即广济桥。今日桥已无，惟其余仍称浮桥口。

临清晏公庙

一、《金瓶梅词话》

93回：杏庵对经济道：“此去离城不远，临清码头上，有座晏公

庙。那里鱼米之乡，舟船辐辏之地钱粮极广。清幽潇洒。”二人“出城门经往临清码头晏公庙来，止七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庙，天色已晚。”“王老到于码头上，过了广济闸大桥，见无数舟船停泊在河下，来到晏公庙前。”经济“自此就在晏公庙做了道士。”

94、98回均提及。

二、康熙《州志·卷二·庙祀》载：“晏公庙：在会通桥西、传闻有催道士在此仙升。”

三、清宣统《山东通志·临清直隶州》载：“晏公庙：一在会通闸，一在南板闸间。晏公，江西临江人，生于元，讳戎仔，封平浪侯。”

三、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辞典》：“平浪侯晏公敦之庙。晏公，水神传为明太祖所封。”

上述三条资料可证临清晏公庙当建于明永乐十五年开凿会通河南支之后一二年。

四、现状：在会通河北支会通闸处析为民居。

临清闸（以会通闸代）

一、《金瓶梅词话》

81回：韩道国等从扬州码头起身“一日来到临清闸上。”

92回，“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

二、康熙《临清州志·河渠》下载“闸四：曰会通、曰临清，元旧址。明尚书宋礼复置。在汶北支，久废。”

三、民国《临清县志·二册·河渠》“临清、会通二闸均建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会通河开凿后四年、明永乐、弘治间相继重修。临清闸久废，会通闸尚存旧址。今已改建为会通桥。”

四、现状：今在汶河北支入卫河口，即会通闸旧址处，挖掘出古桥一座，名问津桥（明万历州人秦大藩重建，崇祯时维修，题为问津桥。据云为闸桥合一，即是从前会通闸。临清闸约为今天桥处。不

存遗迹。

宝 塔

一、《金瓶梅词话》

89回：见永寿寺内“宝塔依稀侵碧汉。”

二、康熙《临清州志·艺文》载孔胤樾、汪大年、余俨等咏“永寿寺塔”诗数首。

三、民国《临清县志·二册·古迹》载：“舍利宝塔，在城北五里许，卫河东岸、永寿寺南。”《三册·寺庙》载“多宝寺，在旧城中，传有万石佛及舍利塔，高三丈，今祀。”

四、现状：城北之舍利塔尚存。

僧 正 司

一、《金瓶梅词话》

49回：西门庆迎请宋巡按时，“合属州县方面有司，军卫官员、吏典生员、僧道阴阳，都具连名手本，伺候迎接。”

二、康熙《临清州志·卷一·公署》载：“僧正司，在大宁寺，即司仪处。”

三、现状：僧正司所在的大宁寺（明初建筑）于65年折毁。唯中殿尚存。

县（州）治 所

一、《金瓶梅词话》

1回：武松打虎“哄动了那个县治。”书中多回提县门前、县东街、县西街，均是据清河县县河所而言。同时又提到州。如：56回：伯爵说：“他见是本州一个秀才。”

99回：“哄动了清河县，大闹了临清州。”

二、康熙《临清州志》

《卷一·职官》载：“临清初为县，设官如县治。明弘治二年改州，置知州。”

三、民国《临清县志·三册·廨署》载：“县署：在砖城中，明洪武时，自曹仁镇移置中州。景泰间始徙今治。弘治己酉（1489二年）知州张扩而新之。为正门、仪门，甬道中穿戒石亭，又北为正堂五楹，曰宣政。左右各三楹曰分政。后为二堂三各五楹，二堂曰和衷，三堂曰思政，又其后为官宅。东西屋宇十数。为库三，在正堂两翼曰銮輿库、架阁库、国用库，二堂东为丰盈库，胥吏室分列墀之东西。

按：临清县址：明洪武二年由宋址移到汶河南岸的中州纸马巷。景泰元年建砖城后，再移至砖城中。弘治二年县升州，随扩建为州治所。

四、现状：砖城内的县（州）治所久不存在。唯残留洪武二年“旧县遗址”，当为景泰县址迁砖城后，在原县址处修建的纪念性建筑。

工 部

一、《金瓶梅词话》

65回：“管砖厂工部黄老爹来吊孝。”51、68、72等回多处提到。

二、康熙《临清州治》

《卷一·公署》载：“工部营缮分司，在中州。”

《卷一·职官》载：“工部：工部营缮员外郎，明永乐间设。初侍郎或郎中，后以往事督徵山东、河南、直隶河间诸府砖价，于临清建窑厂，岁额城砖百万。嘉靖五年（1562戊戌）尚书赵璜请员外郎一人莅之，三岁一代。”

三、民国《临清县治》

《第三册·建置志·废署》载：“工部营缮司署，在中州工部厂。为明署。清乾隆四十一年，临清升为直隶州，知州李涛就工部旧署始建考棚。成为州试院。”“清末罢科举，邑绅冀痴折毁，改筑小学堂

非复旧日雄伟矣。民国八年省立十一中学校长范步瀛，仍其旧址，而新之。”

四、现今状况：为临清市第三中学。据访：校门乃依试院时样式建筑。

美肴佳馔犹留香 ——《金瓶梅》食谱临清风味考

赵冰瑞

我国明代长篇小说异军突起，相继问世了几部伟大的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等，这几部书风格不同，内容迥异，各有千秋，堪称明代“四大奇书”。

《金瓶梅》与其他三部长篇小说比较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书中大量采用了方言、俚语、俏皮话，多处描写了民间风俗，同时详尽地描写了当时的美肴佳馔，可以说是一部明代食谱。据初步研究，书中（以《词话本》为准）写到了主食、菜肴、糕点、酒、茶、干鲜果、小菜调料等多达三百余种，大大超过了其他三部“奇书”；与比其晚百余年的《红楼梦》比较，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为研究明代饮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金瓶梅》一书写了这么多肴馔，为我们提供这样一种印象：这些食物的原料大都出产在长江以北，冀鲁一带，其中多数饮食至今仍在鲁西，确切地说在山东临清流行。有些食物虽已不见，但在江浙一带也早已失传。有些则因历史太久或被淘汰、或被改进，更名改貌。笔者认为作为明清沿运河北方商业城市的临清在饮食方面既代表了山东鲁西风味，又博采众长，形成了有这一特色的饮食习俗，与《金瓶梅》中描写的饮食有很多近似之处，因此推断《金瓶梅》作者应该在临清久居或是临清人。下面对《金瓶梅》中饮食与临清的食物作些比较，以便为确定临清系《金瓶梅》的写作背景提供一些例证。

《金瓶梅》写了三百多种食物，笔者大致把它们分为面食、菜肴、酒、糕点、干鲜果、茶和饮料、山珍海味、小菜和调料等八种。下面逐一作些分析。

《金瓶梅》书中写了面食约 55 种，其中又可分面食和粥汤两种。这 55 种中只有 5 种是用糯米或大米为原料，其余都是用北方的小麦、小米、黄米、豆类制作的。元代开挖运河主要是解决南粮北运，而在运输途中应会遗散一些南来的糯米、大米。元以后，地处运河沿岸的临清已把大米作为辅食了。

50 种面食中有多种至今在临清仍能见到吃到，有的则存其物异其名或一物多名。如：炊饼（即烧饼）、黄米面枣儿糕、烙饼（即锅饼或叫厚饼）、荷花饼、卷饼、寿桃、寿面、玉米面鹅油蒸饼、葱花羊肉一寸的扁食儿、粽子（临清有糯米、黄米两种）、冷糕（即切糕）、花糕、包子、桃花烧麦、馒头、元宵、火烧、裂破头高装肉包子、菜卷子、黄芽韭菜肉包、一寸大小角儿、馓子麻花、猪肉韭菜饼儿等。以上这些食物，居住在临清的市民一看便知是何物，而且颇有亲切之感。还有粥汤如绿豆白米水饭（即绿豆大米稀饭）也是临清常用饭食。河漏虽不常吃，但五十多岁以上的临清人几乎都吃过、见过。¹ 在北方流行，实际上是水饼的别称。水饼、炸酱面、温面都是临清市民最爱吃的饭食。

还有几种面食，在临清较疏，但这类食物也没理由不在明代的临清流行。如蛤蜊面、春不老蒸乳饼、酥烧（也可能是油酥火烧）、割肉水饭、肉兜子等。

第二类为菜肴，共计 105 种。这类情况比较复杂，因为菜肴随着交通发展，人们迁徙，各地尤其运河沿岸交融变化较大，但《金瓶梅》中的菜肴则大都以鸡、鸭、鹅、鱼、肉、蛋、虾、蟹等为主要原料，基本上与现今临清宴席用料相同。笔者以《金瓶梅》第 34 回和 75 回中出现的菜肴为例，就可以看出这些菜肴在临清现今仍能吃得到，而且几乎是家常菜。如 34 回中出现的菜肴有“干蒸的劈晒鸡”、王瓜拌辽东金虾、白炸猪肉、水晶膀蹄、油炸的烧骨”。劈晒鸡即风干鸡（炸）王瓜是黄瓜的别名。“炸”即油炸。白炸猪肉即类似干炸肉或炸里脊。水晶膀蹄与水晶肘子极类似。油炸的烧骨即类似香

酥鸡或红烧排骨。第 75 回中有“烧脏肉酿肠儿、黄炒的银鱼、银苗豆芽菜、春不老炒冬笋、黄芽韭和海蛰。”烧脏肉酿肠儿即临清市上的粉肠、南肠。银鱼即面条鱼，北方近海有之。银苗豆芽菜即炒无根豆芽。春不老和冬笋都可以通过粮船运到临清，春不老也叫雪里蕻、能制腌菜、能冬藏远运。韭黄拌海蛰，很多北方人都吃过。当然还有一些名不见于临清菜谱，但这类菜占的比重很小。

第三类是酒。书中共涉及到酒 23 种。这些酒有一部分现在临清已不见，在外地如江浙也不见。如金花酒早已失传，再如艾酒、内酒、河清酒、浙酒也不见有售。现能见到的有：南酒（一种糯米酒）、白酒、竹叶青酒（山西产）、黄酒、豆酒（四川有绿豆大曲酒）、葡萄酒、黄米酒（临清出产过），这些酒在临清仍有售。

第四类是糕点。《金瓶梅》书中写了约有 31 种，基本上是糕、酥、饼、卷之类的甜食。有的名字虽异、形状不同，但原料、味道差别不大。其中有些种类还有流传，有的则相似。如，果馅饼、玫瑰饼、果馅椒盐金饼、丁皮饼、糖薄脆、白糖万寿饼（即长寿糕）、果馅寿字雪花糕、玫瑰元宵饼、香茶桂花饼、玫瑰八仙糕、玫瑰饼果馅金饼等等。其中用玫瑰做的糕点多达 5 种。现在每到夏季临清则有大量“鲜花饼”上市，这种“鲜花饼”则是选用鲜玫瑰花做的。其他品种据临清老糕点师回忆，过去这些品种也大都有过。

第五类是茶和饮料。书中写到茶、饮料有 22 种。明代饮茶与现在大不相同。现代茶的名称主要以红绿茶区分，有些品种又以产地命名，如黄山毛峰、西湖龙井、武夷茶、屯绿、滇红；有的以香料名称命名，如茉莉花茶、玉兰茶、珠兰花茶；有的则以形状命名如老君眉、旗枪、大方等。饮用一般为泡、煮两种。明代饮茶方式不但在临清，就在外地也属罕见。过去临表饮茶倒是有准备茶肴的习俗。如果仁、瓜子、核桃仁、花生仁、五香牛肉干、豆腐干、姜片、麻糖、蜜饯等，这也许是明代以果仁盐笋入茶的演变、发展吧！《金瓶梅》中还有一些饮料如梅汤、牛奶子，现也是临清人常见的饮料。

第六类是山珍海味。这类有几种。如：通印子鱼（产于福建通应江）、伊鲸洛鲤（产于河南伊河和洛水）驼蹄、熊掌、豹胎、猩唇、虾米、螃蟹、燕窝、驼央、黄忍、白鳖。这些珍味大都在内地罕见，而且产地大都在深山、草原、油海，并非一地之有。明代临清是北方沿运河大商埠，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之称，饮宴中自然会有如此众多的山珍海味了。

第七类是干鲜果类。共 32 种。其中大部分为北方的干鲜果，如：雪梨、莲子、榛松、栗子、荸荠、菱角、白鸡头（鸡头米）、苹婆（苹果）、盖柿、大枣、干枣、核桃等。以上这些临清都可以见到。再如块糖、扭孤儿糖（即糖瓜子）、柳叶糖、饴糖（高粱饴类）方糖、蜜饯等也是临清常见的糖果。书中还写到南方水果如荔枝、龙眼、衣梅、香榧，这几种除荔枝因产地太远外，余者都可以加工后沿运河到临清来。

第八类是调料、小菜类。计 19 种。小菜有：甜酱瓜茄、五方豆豉、十香瓜茄、糖蒜、酱的大通姜、辣菜、酢醋滴的苔菜、银丝细菜、香芹、天花菜等。甜酱瓜和蘑茄是临清特产、清代曾做贡品入京，名噪一时。银丝细菜当系腌龙须菜，其他大多为临清常见的小菜。调料有：香油、酱油、白糖、玫瑰、桔酱、番茄、糟笋。这些也多系临清烹饪用调料。

明清以来，临清形成了运河沿岸的商业城市，这里因是南北通衢要路，其生活深受外地，尤其受北京和江浙的影响。如北京人爱吃炸酱面、温面，而临清也把此当成喜爱的食品之一。江南的杩子也曾在临清使用，而且延续到四十多年前。《金瓶梅》中也有吃“炸酱面”、“温面”的描写。如第 52 回中写道：“画童儿用方盒拿上四个小菜儿，又是三碟儿蒜汁，一大碗猪肉卤……然而拿上三碗面来”用甜酱炸肉丁在临清叫猪肉卤，是吃炸酱面的主要调料。第 96 回写到：“因向经济：‘兄弟，你吃面吃饭？’量酒道：‘面是温淘’……须臾掉上两三碗温面上来”。临清称用温开水淘过、加醋蒜和其他菜

的面条为温面。这两种面的吃法与《金瓶梅》中吃法完全相同。

“食在临清”，临清的确从历史上就讲究饮食其烹饪技术在冀鲁也颇有盛名。明清时代的临清应该说比现在更讲究饮宴。《金瓶梅》后几回多处写到临清，我们也有理由把《金瓶梅》中的食谱与临清饮食习俗联系起来。综上述，笔者认为《金瓶梅》中的饮食可以基本说是北方风味，而又带有明显的临清特色。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金瓶梅》与临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对《金瓶梅》描写的饮食进一步研究，可以为考证《金瓶梅》的作者以临清为写作背景以及方言归属等提供内证。

跋语

《金瓶梅》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确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的主要着墨处是借西门庆家庭内部妻妾之间的争宠，来影射明朝廷内部的矛盾斗争，并把西门庆和官府、朝廷的勾结，做了细微的描写，直接暴露了明王朝的黑暗与腐朽。作者通过隐喻的手法，淋漓尽致的勾画，无疑是将明王朝推到当时世人面前示众，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份揭示历代封建黑暗统治的教材。

从《金瓶梅》的问世起，就被反动统治者列为“禁书”，它们禁的，我认为不完全是污秽的一面，更主要的是从政治上的无情揭露，可能是这个原因，使作者不敢直书其名，不敢留下可以追寻的任何相关资料，兰陵笑笑生也与我们设下了诸多谜，当然，还有故事发生的背景地之谜。这使我们真正了解《金瓶梅》这部奇书的内含寓意颇费心思。

兰陵笑笑生肯定是熟悉《金瓶梅》书中所描绘的故事场景地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土人情以至会话当地口语的。《临清与(金瓶梅)》这本书，也是想通过弄清故事发生地之谜这一线索，从而解开诸多谜，以求对《金瓶梅》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临清市《金瓶梅》学会，有志于“金”学研究，试图将书中提到的“临清”可否认作为《金瓶梅》故事的场景去寻觅，去破译书中的诸多谜呢？这是否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大胆的探索呢？

临清，自元会通河的开通，特别是明王朝迁都北京以后，疏浚了大运河，南北物资依靠漕运济京，临清又是汶卫交汇，势扼运河咽喉之地，使临清迅速成为“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於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

“山后通”，“连城则百货萃止，两河而万艘安流”的繁华商业都会。由于经济的发展，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礼部尚书王崇庆说：“吾见是地，有衣冠人物之盛，有甲科先后之继，有商贾辐辏之繁，蔚乎隆矣。”学士张元桢说：“兹州天下重镇，遐迩京师，玉帛万国，舟车攸萃，而文化沾被，视他邦为先。”这与《金瓶梅》一书中所描绘的故事场景几乎吻合。故《临清与(金瓶梅)》一书，以所能搜集到的及研究者考论的一些文章，汇集成册，便于让“金”学界诸贤教正。

临清《金瓶梅》学会，成立较晚，会员大都学历浅、水平差，手头资料又少的可怜，只凭着对“金”学研究的爱好，近年来，虽有些文章问世，大都论识浅薄，难中就里。《金瓶梅》一书的出版，就是诚恳的向“金”学界专家、学者请教，以图提高我们的考论水平，使“金”学界增添几个热衷于“金”学研究的学生。

郭维元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

于对桐轩窗下